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 比较分析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THEDA SKOCPOL

[美] 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 比较分析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THEDA SKOCPOL

[美] 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译 者 序

本书的英文版初版于1979年。甫一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种佳评如潮而至。我们在该书英文版的封底上就可以看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评论是:“作者以清晰的架构和精细的运思,对三场革命进行了极具挑战性的比较;该书值得研究、批判、检验、深化和争论。”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的评论是:“我深信,《国家与社会革命》将会被认为是革命起源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出版的当年,作者就获得了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社会问题研究奖,第二年又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1980年度的杰出学术贡献奖。此后,该书被不断重印,至2003年底,已经重印了28次;其中在1980年、1984年、1985年、1987年、1993年、1999年和2002年还被重印了两次。

迄今为止,在谈及20世纪的革命研究、国家自主性理论和方法论时,该书仍然是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都有广泛的影响。一本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著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出跨学科的长时段影响,与作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下面,我们主要以革命研究的理论传统为中心,来简要介绍本书所取得的学术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理论上的争论。

一、革命研究的代际更替

革命现象虽然久已有之，但是，对革命问题的系统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以来才在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传统。我们看到，在对该书所做的各种评论中，大多数评论者都将此前革命研究传统划分为三代，而本书则被看作是第三代革命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¹

根据有关学者的归纳，第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以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到过的“自然史学派”的革命研究为代表。这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致力于对革命的爆发过程进行描述，持续的时间则大约是20世纪初至40年代，其鼎盛时期则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的代表著作有勒庞的《革命心理学》、索罗金的《革命社会学》和佩蒂的《革命过程》等。在研究对象上，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对革命进行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则是对革命的过程进行细致的描述，研究的结论一般体现为革命进程各个阶段上的主要特征，最后则总结为各种革命模式。

第二代的革命研究，主要是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所批判的三种主要的研究途径。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这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致力于解释各种革命发生的原因，持续的时间大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中期，主要的代表作品有格尔的《人们为什么造反》、詹森的《革命性变迁》、斯梅尔塞的《集体行为理论》和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等。在研究对象上，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放大了革命的处延，将革命与暴力事件一起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第一代的革命研究主要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那么，在第二代的革命研究中，心理学的挫折理论、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和政治学的利益集团竞争理论都曾经被用来对革命进行研究；在研究结论方面，这一代研究者大有提出某种关于革命规律的“普适性理论”的抱负。

第三代的革命研究，就是以本书作者为代表的结构性途径的革命研

究。这一代的革命研究的典型特征是,结构性视角成了他们的主要途径,持续的时间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伊朗革命这一段时间,主要的代表作包括艾森斯塔特的《革命与社会转型:对文明的比较研究》、佩基的《农村革命:不发达世界的社会运动与农业出口》、崔伯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日本、土耳其、埃及和秘鲁的军事官僚与发展》和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仅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第三代革命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少量的重大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不是对大量的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比较-历史分析也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在研究结论方面,这一代革命研究不但试图找出革命的生发原因,而且还试图将革命的进程和革命的后果也统一纳入研究框架之中。

二、本书的四大特色

本书的写作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版时间是1979年。作为第三代革命研究的晚期著作,在进行研究之前,作者在集中批判第二代革命研究的同时,对第三代革命研究的早期成果也有明显的借鉴和批判。

根据斯考切波本人的归纳,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之中的革命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即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聚合-心理学理论的典型特征是,试图从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则视革命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政治-冲突理论则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尽管这三类理论在具体的观点和主张上差异巨大,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三者之间又极其类似。这三类理论中,聚合-心理学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将革命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事件,都试图用政治暴力或集体

行动这类带有极强的普遍性的概念来研究革命。具体而言,前者将革命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暴力;后者则将革命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虽然从价值与环境之间出现不协调的角度来解释革命,但同样将革命看成是价值失范之后所出现的集体性暴力行动。在作者看来,如果对这三种理论作进一步的归纳就会发现,这三类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研究分支。这是因为,这三种理论都将革命看成是在社会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暂时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失衡现象。²与此同时,这三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革命的概念,将革命看成是集体性的暴力事件。之所以要做这种“放大”,其在理论上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提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命题,提出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定理那样的普适性的因果解释;其在现实中的目的则在于,找出发生革命的共同原因,以帮助当政者,通过对原因出现的条件实施干预而防止革命的出现。

在作者看来,这三种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极其明显的共同缺陷是,他们在解释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时,出于提出普适性理论的追求,在各自的理论中都把革命的出现归结为某个单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归结为革命性情绪的传播、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和扩展或价值失范的大面积出现等。这种把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意志因素的做法,就不但忽视了导致革命生发的一系列结构性条件,同时也带有很强的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色彩。

作者据此认为,就研究的深度和可靠性而言,20世纪流行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的革命研究,反而比不上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重点关注的阶级关系,常常是千姿百态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而且,在成功的革命转型中,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实际上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冲突,明显地存在于一些国家的革命进程之中。因此,在追溯革命产生的根源时,阶级分析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基本视角。但作者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的重要性,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家在进行研究时却过分强调了阶级冲突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一种革命得以发生的潜在根源。在从潜在

根源到革命发生的实际过程中,还有一系列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忽视这些因素所起的实际作用,就很难准确地描绘革命产生的真实画面。作者进而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取向的革命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将革命的发生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原因,因此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的因素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针对先前的革命理论中所表现出的唯意志论,作者提出,在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是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的。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地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这些冲突又受到了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冲突的展开方式,则取决于每次革命形势最初的出现方式。冲突的逻辑并不由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所控制,而不管这些阶级和集团是否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革命冲突所造成的后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的,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社会研究中,首先要弄清旧制度下革命形势的出现(而非“制造”)的原因。然后,则必须要研究受制于客观条件、以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处于各种情势之下的种种群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的相互纠缠,塑造着革命进程并产生出了新制度。而如果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采用这种非个人性的、非主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就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的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而如果结构性视角意味着要集中关注各种关系,那么,在各种关系中就必须既包括既定国家内处于不同境遇的群体之关系,也要包括跨国性关系。在追溯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时,作者所考察的结构性的关系包括: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即,被作者纳入分析视野的结构性的关系包括: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革命性危机出现之后,又出现了差异性的革命模式和革命后果?作者认为,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各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组织模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于这三个国家所处的国际背景的差异。在革命性危机出现之后,法国和俄国之所以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而中国则没有出现,是因为法国和俄国农民的自治传统及组织能力,地主上层阶级不能直接控制他们的生产和日常管理;而中国村社自治传统的缺失和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能力的强大,使得农民在帝制政权垮台之后无力组织大规模的造反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将他们组织起来。在革命的后果方面,法国革命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俄国革命则导致了一党专政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因为,在俄国革命时,俄国的工业革命已经粗具规模,为国家推动的强制工业化提供了基础;而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在组织技术上,也因为大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而能够对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中国革命虽然师法俄国革命,但是在社会基础方面又更加类似于革命时期的法国,所以,中国的革命精英虽然从俄国学习了新型的政党组织技术,但同时却面临着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在革命之后,中国虽然也走上了国家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但并没有像俄国那样发展出官僚主导的政党国家,而是一个更具有大众动员色彩的政党国家。

由此也就引出了作者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国家的潜在自主性问题。作者提出,国家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因此,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则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如果我们把国家看成是一套以行政和强制为基础的组织体系,那么,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但是,国家在实际上所具有的自主性的程度,以及潜在自主性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则因具体的场景而异。从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出发,作者进而提出,追求更大自主性的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支配阶级进行某种竞争。这是因为,国家是一种依赖于从社会中提取资源并进行分配的组织。一旦这些资源被提取出来,这些资源所投向的目标可能会偏离现存支配阶级的利益。而且,这些资源可能大部分都

会用来强化国家自身的自主性——这就必然会威胁到支配阶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维持既存的政治秩序,而维持既存政治秩序的最便利的途径,就是维护现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但是,国家在维持既存政治秩序的同时,也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在共同维护现有的阶级秩序方面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又与支配阶级之间存在着出现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与此同时,由于任何国家都在特定的地缘政治内与其他国家之间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地缘政治环境既为国家创造了任务和机会,同时也限制着国家应对国内外的任务和危机的能力。因此,革命的分析者不但要考察阶级关系,而且要考察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对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关系。本书在考察各国的革命性危机时,也主要集中分析了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对革命进行研究,尤其是对社会革命进行比较研究时,在研究方法上所遇到的一个独特的问题是,由于社会革命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在数量上并没有大到可以进行统计的地步;与此同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爆发的社会革命也并不具有可重复性的特征。因此,统计和实验的方法很难适用于对社会革命的研究。这就给社会革命的研究者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既不采用数量统计,又不是单纯的历史叙事的同时,能够提出一套因果解释模式,从而使得社会革命的研究能够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作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各国历史轨迹中选取一些片段来作为比较的单位,从而为那些本身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作出解释。那么,如何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来提供科学的解释呢?作者在本书中大致通过了两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第一是,在案例本身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基于社会革命本身的复杂性,可以采用多变量的方式寻找多个案例背景的共同原因,即求同法。第二是,通过与反例的对比,来进一步确证求同法所得出的结论。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通过求同法来寻找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政治危机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通过与没有出现社会革命的英国、普鲁士和日本的对比,进一步确认了求同法所得出的结论,同时也为反例提供了解释。正反对比的结果,作者实际上也就解释了六个国家的

发展模式,并基于这六个案例而发展出了一套革命理论。

三、对本书的各种批评

在作者看来,结构性视角、国际与世界历史的背景、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和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是本书的四大特色所在,也是本书相对于先前的革命研究的突破之处。这种突破刷新了社会科学的革命研究传统,也引起了各方面的讨论。根据译者的有限阅读,相关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即结构性视角、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和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

基于结构性视角,作者在本书所提出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make)出来的;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后果。革命的最终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相对于先前的理论追寻革命生发的单方面原因而言,这种结构性视角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正是由于作者对这种结构性的作用的强调,引出了所谓的结构性与能动性的争论。在一些学者看来,斯考切波的结构视角无异于是一种机械的结构决定论者。有学者认为,这种机械性的结构决定论的典型表现就是,作者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一些革命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例如,在研究俄国革命时,对于在俄国革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托洛茨基,斯考切波就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两次。³有学者甚至提出,社会结构只是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如果革命者是一帮很平庸的人,革命照样不会成功。⁴除了从革命者的能动性角度进行批评外,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即使从结构性视角出发也应该注意到,在一系列导致革命生发的原因中,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也并不完全一样。而斯考切波在对社会革命进行考察时,只是强调了各种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的“接合”(conjuncture)导致了社会革命的生发,而对于在各种力量走

向接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因素则明显重视不够。例如,斯威尔(William H. Sewell)就通过对法国革命的考察而提出,斯考切波在研究法国革命时,严重忽略了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忽视,使得斯考切波的著作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任何重大的革命之后,我们都会看到,一套新的文化系统取代了旧的文化系统。⁵

对作者的批评比较集中的第二个领域是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斯考切波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国家有着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这些结构和性质相对应的利益和行为方式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理论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复兴。就在本书出版不久,作者还与伊文斯(Evans)和罗斯齐美尔(Rueschemeyer)共同推出了《重新回归国家》一书,从而使得作者在这一时期又成了著名的“回归国家学派”或国家中心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与此前所盛行的社会中心论相比,国家中心论的突出观点就是,强调不能把国家简单地看成是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竞争性力量的裁判或支配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追求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性质,它能够一定程度上依照自己的偏好、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归国家学派不但在解释日本、土耳其、埃及和伊朗等国的政治发展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解释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声誉卓著。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国家及其官员在推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斯考切波在本书中所重点阐述的国家具有自主性的观点,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而且,她同时强调的国家自主性的强弱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在革命研究中,斯考切波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她在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上。除了强调国家具有自主性之外,作者在分析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传统的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自主性强的国家,但是,由于受制于竞争性的国际环境和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国家能力较为虚弱。正是由于一系列的结构条件所导致的国家能力的这种虚弱性,使得君主官僚制国家在面临内外压力时,不能有效动员相关资源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从而走向解体。但是,大卫希斯(Evenly B. Davidheiser)通过对瑞典、德国和

俄国的政治转型的研究提出,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并不是像斯考切波所说的那样,是传统国家的虚弱才导致了革命的发生;相反,正是在那些传统国家的国家能力过于强大的地方,才更容易出现革命。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大卫希斯进一步将国家能力的强弱细化为两个指标,即国家穿透(state penetration)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强国家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穿透既深且广。与此同时,强国家就意味着社会对国家的穿透很弱,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不能渗入国家。在广泛而深入的国家穿透过程中,由于执行着穿透任务的各种制度和机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那些在具体目标上存在差异的机构之间,出现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⁶

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由于斯考切波过分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并主要是以国家为中心来分析革命的原因和进程,从而也就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本来应该很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她所提出的要加以分析的三对关系:即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框架中,明显忽视了城市工人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而言,城市工人在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在分析1789年波旁王朝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时,她也过分强调了军事竞争所引起的支出的增加,而没有充分注意经济衰退所引起的收入的减少。因此,斯考切波所列出的国外军事压力、国家与上层精英间的冲突,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就不足以充分解释1789年法国革命的原因。⁷

本书所受到的第三个方面的批评,则主要针对作者所一再强调的比较历史分析。布拉俄伊(Michael Burawoy)通过对斯考切波所使用的求同法和求异法这一逻辑推理结构进行整理后发现,作者在推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这是因为,当作者在运用求同法来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政治危机的共同原因时,重点考察的是三对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国家与上层精英间的矛盾,以及农民的团结和自主化程度。在这三对关系中,这三个国家同时满足的条件只有两对,即国际军事竞争所引起的危机和由农民的团结和自主所导致的反叛。在国家与上层精英的矛盾方面,法国和中国满足这一条件而俄国不满足;在农业的资本主义

发展方面,法国满足、俄国和中国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共同的原因应该是国际危机和农民的团结导致了政治危机的出现。但是,当我们运用求同法的结论去考察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1848年的德国革命时,却发现无论是在国际军事危机还是农民的团结方面,这两个国家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实现了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化),但是,这两个国家却都出现了政治危机。⁸因此,一些学者进一步批评,作者在使用比较历史分析之时,存在着机械性地将同一推理体系强行套进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权力结构的国家的倾向。正是由于这一倾向的存在,使得作者在一些地方表现出了某种凝固的历史观。例如,赵鼎新就指出,作者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动员时,动员的对象仍然是晚清时期的农村结构。⁹

四、争论的发展与第四代革命理论的出现

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作者在捍卫自己的某些观点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某些观点实施了一定的修正。正是在这种捍卫与修正的过程中,一方面使作者自己从一个国家中心论者转向了历史制度论者;另一方面,在作者的影响下,本书在分析框架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开放性特征,也促成了一批新的学者在此基础上逐渐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四代革命理论。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流派中,尤其是在对其结构性视角的批评方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对斯考切波的上述批评归结为两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认为作者忽略了人的理性,尤其是大人物的理性能力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化理论的批评,认为作者忽略了在革命过程中主导着人们的认知模板和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而斯考切波本人的回应,也显然主要针对这两个方面展开。针对前者的批评,斯考切波提出,她的研究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共性,因为,她并没有否认行动者的选择在事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但是,她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同样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表现在:理性选择理

论常常强调的是个体的理性选择能力,而在诸如革命一类的重大事件中,重大的行动却常常是由群体或组织所作出的;在以群体和组织为集体行动单位的地方,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能力无疑要受到他人和组织规则的塑造。与此同时,理性选择理论常常关注的是既定制度之下的某个时间点或者某一具体事件中的理性选择与行动问题。在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或具体事件中,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常常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一旦我们在考察某一长时段事件的前因后果时,就必须更加关注结构性要素。¹⁰作者进一步提出,相对于文化论者而言,结构性视角的研究反而是更加强调由行动的主观意志所导致的能动选择与行动。因为,意识形态自身并不能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必须要经过相关群体的再加工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在任何一个社会的革命情势下,常常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于一体。处于不同地位的参与群体都会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界定相应的情势并做出选择。而且,在当代世界所实际发生的革命运动中,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中,政治冲突和组织体系本身就为意识形态的再加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意识形态的领袖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利用意识形态来动员群众投入政治运作。而在另外一些革命运动中,例如在墨西哥革命中,政治冲突主要表现为军队在农村中的冲突,并没有为观念的加工和传播提供多大的空间,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并不明显。所以,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体系能够成为我们理解革命的万能钥匙。¹¹作者虽然在这里仍然坚持理性和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构性条件,但实际上已经为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功能留下了空间。而且,甚至早在1982年,基于意识形态在伊朗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就已经将她的社会革命概念进行了修正,将社会革命的概念从“国家和阶级结构得到快速而根本的改造”修正为“国家、阶级结构及其支配性意识形态得到了快速而根本的改造”。¹²

作者的这一回应表明,她试图在长期争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性与能动性(structure-agent)之间作出某种调和。这种调和不但反映出了作者所继承的两个大的理论传统之间的内在张力,同时也为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讨论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本书的作者受托克维尔的影响非常之大。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作者的国家中心论立场和

一系列术语都非常类似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而且也在无意中传递了作者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扩展《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伟大抱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与社会革命》就是一本20世纪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是，与此同时，作者又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作者从她的老师摩尔那里明显地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非常注重生产关系为政治危机的出现所提供的结构性条件。¹³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革命的爆发时，除了强调结构性条件外，还强调一个重要的因素，即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本书中，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所具有的这一特点，与作者的取向拉开了距离。因为在作者看来，强调阶级意识的做法与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革命理论一样，都是一种意志论。而当本书过于强调结构论的做法引出不少的批评之时，作者的回应又开始为主观意志和意识形态留出了一定空间。

那么，作者是如何调和这种结构论与意志论，或者说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张力的呢？作者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接合”(conjunction)一词无疑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接合”或者如另外一些类似学者所使用的“关键接合点”(critical conjunction)，是指这样一种历史时段：在这一时段上，一系列分散的因素开始结合到一起并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了具有分水岭作用并设定了下一阶段历史路径的重大事件。那么，各种因素到底是怎样在某一历史时段上“接合”到一起并产生出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呢？80年代以来的第四代革命研究者们研究，就明显带有与《国家与社会革命》对话的性质，而在对话的同时则明显地采用了上述的“接合”分析的框架。根据佛兰(John Foran)的归纳，第四代革命研究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包括：阿米尔的《为国王所包的头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詹姆斯的《革命与革命性运动》、高尔德斯通的《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反叛》和高德温的《中美洲的革命性运动：比较分析》等。第四代革命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对象，仍然是革命所以发生的原因。但是，与第三代研究者不同的是，他们试图超越第三代研究者们过分强调结构性条件和某些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而试图将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内在构成和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因此，第四代革命研究者们处理的

变量更多、观察的角度更为多元、更为注重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结构性与能动性的相互作用、分析的对象和数据也更为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爆发的伊朗革命、拉美和非洲国家的革命为他们增加了新的素材)。¹⁴而第四代研究者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本书的框架和观点为跳板或中介而发展出来的。

五、关于翻译过程中的几点说明

我们很荣幸能够受上海人民出版社徐晓明先生的委托翻译本书。但是,翻译一本名著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表现为担心我们的翻译水平不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原意;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以处理的术语。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简要说明一下有关几个术语的处理方式。

首先是,英语中的“country”、“nation”和“state”这三词,传统的翻译都将其翻译成带有很强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而这三个词在英文中所表示的意思则明显地带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三个词本身又有不同的含义。准确而言,作者在本书所使用的“state”似应翻译成“国家政权”更为贴切。考虑到传统的巨大作用和习惯用法,我们仍然翻译成了“国家”。但是这种做法又使得我们在翻译其他两个词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关于这种做法及其可能引起的问题,也许并不是本书翻译时才会遇到的)。在实际处理的时候,我们在遇到需要将其他两个词翻译成“国家”时,尽量以括号注明;而有时又必须要将“state”翻译成“政权”时,也只好采用这种做法。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regime”。这也是令我们中文翻译者大伤脑筋的一个词。目前国内相关专业在翻译这个词时,将其译成“制度”、“机制”、“体制”、“政权”、“政体”、“政制”甚至“体系”的都有。在本书中,我们之所以将其翻译为“制度”,主要的理由基于两点:一是这个词本身是指“一套政府体系及其运作方式”,其含义要大于“政权”或“政体”;二是冯棠先生在翻译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已经将其翻译成了“制度”,

这种译法已经被广泛接受,同样形成了某种传统。但是,这样翻译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将英文的“institution”也翻译成是“制度”。为了表示区别,我们只是在“old regime”或“ancient regime”、“new regime”连用时,才将其翻译成是“旧制度”或“新制度”;而其他地方则根据上下文而定;其他地方的制度,则译自“institution”。第三是,作者在分析中国政治时所使用的“gentry”一词,译成“绅士”或“士绅”的都有。为了强调这一阶层与政权的联系并体现其“士”的特征,我们选择了“士绅”作为对应词。最后,关于作者的姓名,中文的翻译中曾经出现过“斯科克波”、“斯考克波”、“斯科克波尔”等译法。结合英语和波兰语的发音,在与出版社编辑商谈后,我们译成了“斯考切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斯考切波分析国家与社会革命的方法及观点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但是她在分析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某些观点则是我们不敢苟同的;她的分析方法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本书主要由何俊志和王学东合作翻译。何俊志负责翻译序言、导论和第一部分,即序言和第一、二、三章;王学东负责翻译第二部分和结论,即第四、五、六、七章和结论。双方翻译结束以后,由何俊志负责统稿和校订。在翻译和校订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剑曾帮助翻译序言部分的初稿;复旦大学国关学院硕士生代豪曾帮助输入并翻译第五、六、七章和结论部分的注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军梅副教授帮助翻译了俄国地图;复旦大学高教所硕士研究生陆华帮助翻译了法国地图。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于1998年出版了由刘北成先生翻译的台湾版本,该译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译本,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参考了该译本,特此致谢。

最后,我们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先生的统筹、协调,以及责任编辑徐晓明先生的鞭策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忠华博士的帮助。

何俊志

2006年10月15日于复旦大学

注 释

1. 关于革命研究的代际更替的文献,可参见 Jack A. Goldstone, *Theories of Revolution: The Third Gen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32, No. 3. (Apr., 1980), pp.425—453; Jack A. Goldstone, *Th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evolu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8. (1982), pp.187—207; John Fora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Revisited: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11, No.1. (Mar., 1993), pp.1—20.
2. Theda Skocpol, *Social Revolutions and Mass Military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0, 2. (Jan., 1988), pp.147—168.
3. David D. Laitin, Carolyn M. Warner, *Structure and irony in Social Revolutions*, *Political Theory*, Vol.20, No.1. (Feb., 1992), pp.147—151.
4. 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0 页。
5. William H. Sewell, JR.,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 on the French case*, in Theda Skocpol,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9—198.
6. Evenly B. Davidheiser, *Strong States, Weak States: The Role of State i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4, No.4. (Jul., 1992), pp.463—475.
7. Jack A Goldstone, *re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13, No.5. (Sep., 1984), pp.709—710.
8. Michael Burawoy,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Vol.18, No.6. (Nov., 1989), pp.759—805.
9. 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120页。
10. Theda Skocpol, *Why am I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s*, *polity*, Vol.28, No.1. (Autumn, 1995), pp.103—106.
11. Theda Skocpol, *Cultural idiom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A rejoinder to Swell*, in Theda Skocpol, *Social revolu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99—212.
12. Theda Skocpol, *Rentier State and Shi'a Islam in the Iran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11, No.3. (May., 1982), pp.265—283.
13. Jerome L. Himmelstein; Michael S. Kimmer, *States and Revolutions: The Implications and Limits of Skocpol's Structu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6, No.5. (Mar., 1981), pp.1145—1154.
14. John Fora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Revisited: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11, No.1. (Mar., 1993), pp.1—20.

序 言

有些著作作为老问题提出新证据；另外一些著作则提出新观点，并激发读者用新视角去看待老问题。本书无疑属于后一种类型。本书提供了一种分析现代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社会革命转型的参照性框架，并且运用了比较-历史方法，力图对1787—1800年的法国革命、1917—1921年的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的中国革命的原因及后果作出解释。第一章通过对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革命”理论的假设与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反思，概括性地提出了一些分析原则，其目的在于，为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革命事件的特征和疑点确定新方向。但是，第一章的提纲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论证。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力图使其在具体运用中变得有血有肉。本书的第一部分，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帝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分析，追溯了这三国革命性危机与冲突的根源。分析的重点是，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危机以及革命动乱中的农民起义。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革命本身——从最初的爆发到相对稳定并有着特殊结构的新制度的巩固：法国的拿破仑体制、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独特的中国共产主义体制。这一部分将特别关注革命领导集团的国家建设与革命后社会中新政权的结构与活动。这三个国家由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广泛而深入的过程，可被视为一种社会革命模式的三个可比较的实例。因此，本书将着重叙述这些革命的相似点和各自的特点，并以某种与过去的理论或历史的探讨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

任何著作都会打上作者本人独特经历的烙印，本书也不例外。本书的观点孕育于本人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作为研究生就读于哈佛大学之时。尽管现在已是时过境迁，但是，那时却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的时代。当时，美国正以残酷的战争反对越南革命，而国内争取种族平等、要求停止对外军事干涉的运动风起云涌。这些运动对我国政治制度的道德能力提出了挑战。这个时代激发了我理解革命变迁的兴趣。而且，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也渐趋成熟。然而，《国家与社会革命》不应该被误解为是直接产生于日常的政治态度。它是图书馆和书房这些相对平静的象牙塔中的产物。作为一名研究生，我主攻宏观社会学理论和比较社会与政治史。在这些学科交汇地带不断产生各种疑团。我试图解开这些疑团，然后推演出结论。本书的论点与分析，是多次归纳总结的成果。

首先，我在学术上最初接触的是南非的个案。这块不幸土地上的历史令我感到惊异，因为它显然否定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关于社会秩序与变迁的解释，它也对下述所谓常识和令人安慰的预言发出了强大的挑战：群众性不满将会导致反对公然实行压迫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革命。胜利女神似乎并不必然会眷顾争取自由的正义事业。在我看来，要解释南非有色人种的处境和社会经济变迁的长时段趋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比结构-功能主义或相对剥夺理论要更为有效。当然，严格根据阶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则存在如何将南非的国家结构与白人角色概念化的困难，更不用说对二者进行充分解释。然而，要理解南非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或不太可能发生革命，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并对南非的国家结构与白人角色的概念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促使我的思想逐步定形的经历是，我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根源所进行的长期深入的探讨。为了构造我的研究纲要，我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入手，比较了太平天国起义、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相关得失，并力图做出解释。我沉醉于对晚期中华帝国和现代中国的研究，并逐渐对公认的社会科学概念——（如传统的或封建的）——（对于中国及其他的农业国）的适用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我开始相信，只有通过观察阶级与国家结构的特定互动关系，观察国内和国际

形势的长期复杂的相互作用，才能理解革命的原因。

如果说其他绝大多数从事比较革命研究的学者是沿着由西向东的研究路线——根据法国革命解释俄国革命，或根据俄国革命解释中国革命——那么，我的学术历程则恰好相反。在首先对中国进行研究之后，我把目光转向法国，将其作为有关西欧比较政治发展全面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尽管我认识到，人们会“认为”法国与英国更为相似，但是在我看来，法国绝对主义的旧制度在诸多方面都与帝制中国类似。我也分析了法国与中国革命在进程上的基本相似之处：二者都肇始于地主上层阶级的对专制君主的反叛，都发生了农民的暴动，都以更加中央集权的、更为官僚化的新制度的诞生而告终。最后，我开始用分析中国和法国革命同样的视角来解释俄国的旧制度和革命。而且，强调农村结构和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似乎有助于理解1917年以后、直到1921年和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

在我对革命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在导论中提及的特点。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就我所知，比起那些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国家而言，这些文献对那些经历过革命的国家异同点所提供的因果解释要么毫不相干，要么完全错误。我很快就发现其症结所在（至少我自己很满意）：那些社会科学理论对革命所做的解释，依据的是一些模型，而这些模型是对自由-民主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抗议和政治变迁的理想假设。因此，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把革命想象为：典型社会改革运动的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变体；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于视之为：以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为先锋的阶级行动。我心里想，不足为奇的是，要解释这些以专制君主政权和农民为基础而形成社会秩序的农业国家所发生的革命原因和成就，这些理论几乎毫无用处。

以上述学术经历为基础，最终累积为本书的一个可能的计划浮现在我脑海中：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加以比较，同时将它们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阐明我对当前革命理论的不当之处所做的批判，再尝试提出一

个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性的假设。虽然我拒斥我所知道的各种革命理论的假设和基本论点,但我依然有一种冲动,想要阐明这些在不同形势下所发生的重大革命的一般逻辑。比较历史分析似乎是一种展开研究的理想方法。

幸运的是,在我的比较分析中所包含的三场革命已经被历史学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们广泛地研究过。对于那些希望基于先前未被发现或未被利用的原始资料而作出新贡献的专家们来说,浩如烟海的现存文献可能是一种灾难。但是,对比较社会学家来说,这简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视野广阔的比较历史研究必然要从“第二手资料”——即历史或文化领域的专家们以专著或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引用大部分论据。比较历史学者的使命——及其潜在的独特学术贡献——并不在于通过比较研究来发掘跨越时空的各种新资料,而是要发现涵盖各种历史场景的因果规律的一般性论点,并确立起对这些一般性论点的兴趣和初步的有效性。比较研究者们既无时间也无充分的技巧去做第一手研究——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研究的基础。与此相反,比较研究者们必须集中精力,在各种专家们的作品中找出并通盘考虑从理论思考和比较分析逻辑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通常的情况是,假如专家们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的争论焦点,在比较分析的视角看来却无关宏旨,那么,比较分析学者就必须准备采用那些专家所提出的证据,并将其用于多少有些与原来的使用者不同的分析目的。

即使专家们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就不同的国家而强调不同的主题与讨论焦点,比较研究者们也必须尽可能系统地针对同一主题而逐一找到各种情形下的信息。质言之,只有在专业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基本文献之后,比较研究者的工作才可能展开。惟其如此,比较研究者才能期望找到一些至少是与每一主题相关的材料,而这些主题又是从比较角度提出解释性论证所必须要研究的。

正如本书所附的参考资料所表明的,我已经尽可能广泛地引用了有关法国、俄国和中国的丰富文献。涉及每个国家的文献都极具深度与广度,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专著和论文都有英文和法文的原本或译本。我能够轻松地阅读这两种文字。除了个别时候,由于我对某些历史文献中

的某些主题兴趣不大之外,在寻找基本资料方面我并未遇到太大的挑战。假如说有的话,那就是如何更为全面地审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以及如何恰当地权衡、利用专业学者们的成果,从而提出一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论证。我是否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还需读者(包括历史学家和区域研究专家)自己来评判。对我来说,如果本书能够在下面两种人中激起辩论并推动他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指的是那些对某一次革命感兴趣和想一般地理解现代革命(其历史原因、成就及未来图景)的人们。比较历史学是理论与历史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也应有助于二者在未来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对本书的论证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加工,常常觉得像是独自与一个神秘莫测的怪物进行一场无止境的战斗。但实际上我并未孤军奋战。许多人都慷慨地施以援手,帮助我更好地把握总体设计,并指出部分论述的得失。

我最基本的学术素养得益于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本科时,我就拜读了他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正是该书将我引入了视野宏大的比较历史学领域,并使我明了农村结构及其冲突是理解现代政治模式的关键。后来,在哈佛大学摩尔主持的研究班上,我接受了进行比较分析的严格训练,获得了进行比较分析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甚至还得以形成了自己的各种解释。摩尔为我们设置了严格的任务,对作业常常提出尖锐的批评。研究班上的同窗之谊提供了相互切磋砥砺的良好氛围。事实上,在摩尔班上的两位同窗好友莫尼拉·查拉德(Mounira Charrad)和约翰·莫伦考夫(John Mollenkopf)在我进行比较革命研究的全过程中一直给我鼓励和忠告。

另一位对我有长期而重大的影响的人是艾伦·凯·崔伯杰(Ellen Kay Trimberger)。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知道她在对日本和土耳其的“自上而下革命”进行研究;从那时起,她的观点、意见和友谊使我在分析法国、俄国、中国时都获益匪浅。

像许多处女作一样,本书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因为时间太紧,而要处理的问题又过于庞杂。然而现在回想起

来,这一艰难的写作历程值得付出。无论这篇“大”论文多么不完美,但比起一篇范围狭窄而精雕细刻的论文来,却有更多展开的潜在空间。我要向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致谢,他对论文的初稿提出了具体而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并鼓励我承担起这项几乎难以完成的研究。论文的正式指导教师是可敬的乔治·加斯伯·霍曼斯(George Caspar Homans)先生。他给予了细致的指导,并督促了我尽快地完成。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另一成员李普塞特先生(Seymour Martin Lipset)自始至终提供着睿智的建议。而且当论文写作时间拖得太长,甚至超过了我最初的计划时,他显示了极大的宽容。丹佛斯研究生奖学金为我提供了最后几年博士生学习的经费。该奖学金允许获奖者自由从事选定的课题研究。

论文完成以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热忱地给予了鼓励,并提出了关键性的修改意见。我在哈佛任教时的同事和我的学生们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完成此书。还有许多人的帮助都加速了本书的面世。位于波士顿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小沃尔特·李普寇特先生(Walter Lippincott Jr.)安排了书稿的初审;我不但由此获得了出版合同,还得到了约翰·邓恩(John Dunn)和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相当宝贵的意见。彼得·埃文思(Peter Evans)也为第一章的修改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玛丽·富尔布克女士(Mary Fulbrook)则为第三章的修改提供了很多帮助,而她的报酬只是哈佛研究生会提供的一小份资助而已。此外,哈佛大学社会学系青年教师研究基金也让我受惠良多。

一些朋友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对本书的初稿撰写了书面评论。他们是:苏珊·埃克斯坦(Susan Eckstein)、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沃尔特·高登弗兰克(Walter Goldfrank)、彼得·高文奇(Peter Gourevitch)、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约耳·米格达尔(Joel Migdal)和乔纳森·列特林(Jonathan Zeitlin)。此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施穆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林恩·亨特(Lynn Hunt)、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倪志伟(Vitor Nee)、玛盖里·萨法蒂-拉尔森(Magali Sarfatti-Larson)、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和伊

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都对我的相关论文做过评论。这些评论深深影响了本书在随后部分的写作。当然,如果说本书的优点要感谢这些先生们的话,本书的缺点则完全由作者本人负责。

内尔·米勒(Nellie Miller)、路易莎·阿莫斯(Louisa Amos)和林恩·麦凯(Lynn Mckay)三位女士以极快的速度精确地打印出了最后的完成稿。特别要感谢的是米勒女士,因为在每一阶段的修订工作中,大部分打字工作都是由她完成的。

最后,我当然要感谢我亲爱的丈夫比尔·斯考切波(Bill Skocpol)所提供的帮助,并将这本书献给他。他不但对本书的各个部分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帮我处理了许多具体而繁琐的事务,如打印论文的最初的修改稿,核对引文等等;他以极大的耐心对待我在写作过程中的情绪波动——本书的每个部分都包含着他的努力。他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但是没有他的真诚帮助,这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著作就不可能完成。

目 录

译者序 / I

序言 / XVII

导 论

第一章 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3

第一节 结构性视角 /15

第二节 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19

第三节 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25

第四节 比较历史方法 /34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41

第一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59

第一节 旧制度法国：波旁绝对主义的矛盾 /63

第二节 清帝国：从天朝帝国到帝制垮台 /80

第三节 帝制俄国：一个落后的大国 /93

第四节 作为反例的日本与普鲁士 /112

第三章 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 /141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 /147

第二节 村社革命：俄国农民的激进主义 /158

第三节 两个反例：没有农民造反的英国和德国革命 /170

第四节 中国农民的软弱与士绅的脆弱 /178

第二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第四章 变革的内容与路径：聚焦国家建设 /201

第一节 政治领导集团 /204

第二节 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 /208

第五章 法国“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 /216

第一节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217

第二节 1789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223

第三节 战争、雅各宾派与拿破仑 /227

第四节 新制度 /238

第六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 /254

第一节 1917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255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为掌权而斗争 /260

第三节 斯大林主义者“自上而下的革命” /268

第四节 新制度 /273

第七章 中国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 /289

第一节 1911年之后的社会革命形势 /290

第二节 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党的盛衰 /294

第三节 共产党与农民 /304

第四节 新制度 /314

结论 /342

参考文献 /353

本书表格与图形

表格

表 1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185

表 2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330

地图

图 1 旧制度下法国主要行政区划:1789 年 /65

图 2 欧俄的主要区域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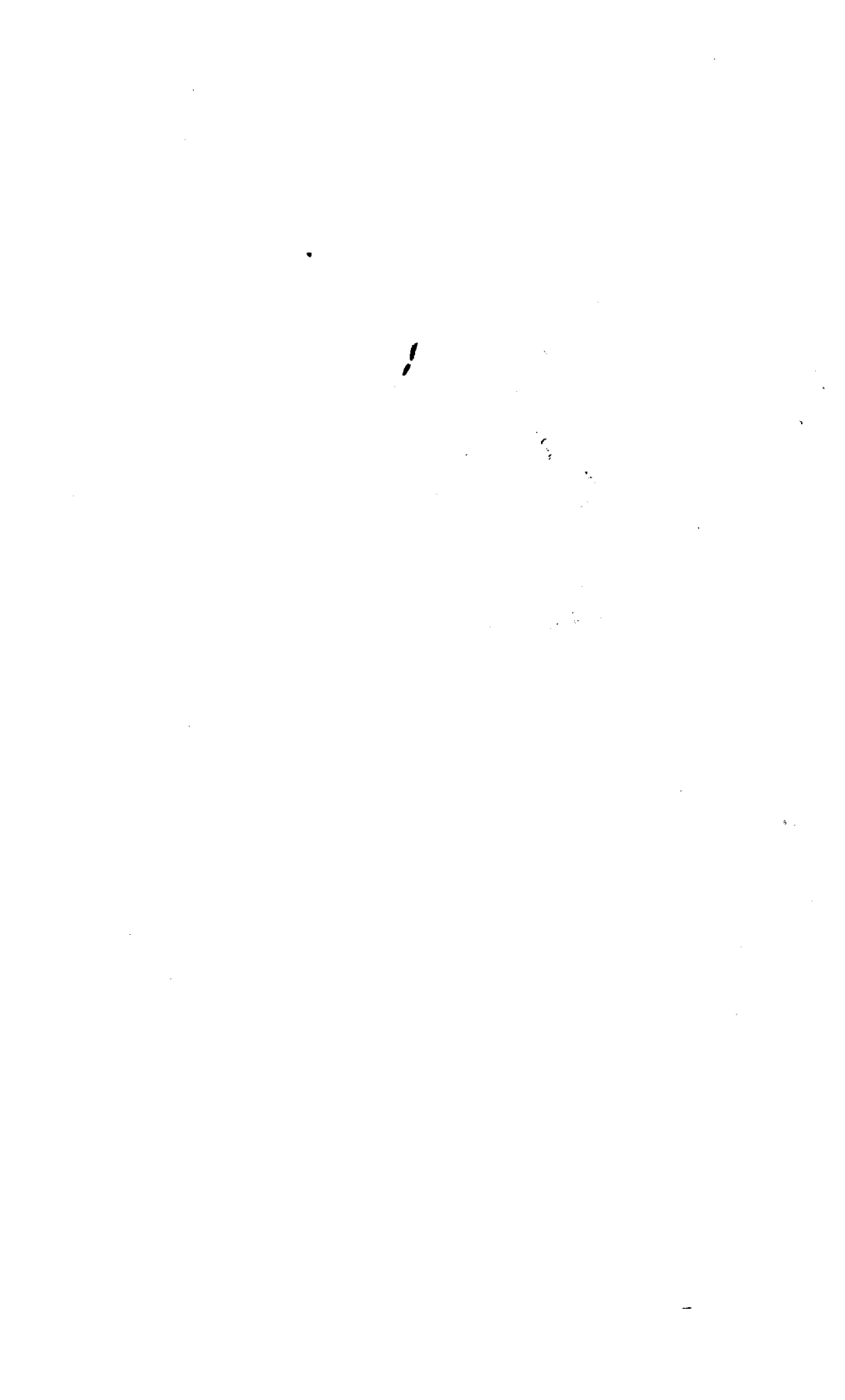
图 3 法国的各省份(不包括科西嘉):1790 年之后 /222

图 4 欧俄地区的铁路与主要工业区:1917 年以前 /260

图 5 中国各省及其邻近区域:1930 年 /298

图 6 中国的铁路和主要工业区:1930 年前 /301

导 论



第一章

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在方法论和理论上不同观点的争论，都与实质性问题密切相关……
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提示并提示了方法与概念的选择范围和运用方式。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在世界现代史上，社会革命是一些极少发生却又意义重大的事件。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中期的越南，这些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组织(State-organizations)、阶级结构和支配性意识形态。革命造就了一个个的新国家，这些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不但大大超过了其革命前的状态，而且还远远胜出了处于类似环境中的其他国家。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征服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墨西哥革命使这个国家在政治上获得力量，并成为获得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工业化水平最高、且最不容易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最终达到了顶峰，使得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并得到了改造。此外，新的社会革命还引出了一股非殖民化的浪潮，并使得像越南和古巴这样的新殖民地国家也挣脱了极端依附的枷锁。

社会革命不仅仅具有重大的民族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社会革命还催生出了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和吸引力的模式与理想——尤其是在那些经

过革命改造后的社会曾经是疆域辽阔、而且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而成为过实际或潜在大国的地方。法国革命之后，爱国主义鼓舞下的军队曾经征服过欧洲的不少地区。即使在征服之前和军事失败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法国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理想，一直在激发着人们去寻求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想象力：其影响所及从日内瓦直至圣多明各，从爱尔兰直达拉丁美洲和印度，并在随后影响到了从巴贝夫到马克思和列宁等革命理论家，乃至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者们。俄国革命表明了，革命的国家权力能够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将一个落后农业国改造为在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工业和军事强国，这种现象不但令资本主义西方大为震惊，而且还刺激了新兴国家的雄心。俄国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所追求的目标，也正是中国革命在20世纪下半叶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表明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能够领导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来进行经济和军事斗争，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国，并自称是为世界上的穷国带来了一种革命和发展的样板”¹。对于20世纪中期的革命民族主义者们来说，“延安道路”和“农村包围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理想和模式，并重新激起了他们的希望。而且，正如赫马西(Elbaki Hermassi)曾经强调过的，重大的革命不仅影响到了外国的仿效者，而且还影响到了另外一些国家中的那些革命理想的反对者，从而被迫对由此而产生的新兴民族力量的挑战或威胁做出反应。赫马西指出：“这些革命的世界历史特征意味着……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超出了发源国的疆界，在各国内部和国际上都触发了潜在的革命与反革命浪潮。”²

当然，社会革命并不是导致现代世界变迁的唯一动力。在“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的矩阵中(即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欧洲国家体系在全球的扩展)，政治剧变和社会经济变迁遍及每个国家。但是，在这一复杂的矩阵中，社会革命值得特别关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于民族和世界历史具有非凡的意义，而且还在于它所带来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变迁模式。

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型过程，首先在于它是两个同

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相反，造反行动，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时候，或许包含有被支配阶级的反抗——但是其最终结果并不是结构性变迁。³ 政治革命所改造的是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而且并不必然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⁴ 诸如工业化这类进程虽然也能够改造社会结构，但却并不必然带来突发的政治剧变，或者是基本的政治结构的变化。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这一社会革命的概念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都不同于其他的革命定义。首先，它确立了一种复杂的解释对象，这类事例在历史上相对少有。它不通过仅仅集中关注许多具有不同性质和后果的事件所共有的某种分析性特征（诸如暴力或政治冲突）来增加解释对象的数量。⁵ 我确信，过分的分析性简化不能让我们对革命做出有效和充分的解释。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理解像 1787 年至 1800 年发生在法国的那种大规模的冲突和变化，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根据革命事件与暴动或政变所共有的某个方面，而将解释对象孤立出来。我们必须因其复杂性而将革命看成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整体。

其次，这种定义将成功的社会政治转型——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所发生的实际改革——看作是社会革命的具体构成要件，而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这种转型视为是“革命”过程中的附带现象。⁶ 我所确信的基本原理是，由于宏观结构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可能出现成功的社会革命，也可能出现失败的社会革命，或没有通过改造阶级关系而实现的政治转型。由于我在比较历史分析中的意图是集中关注这一问题——实际发生的社会革命的不成功和非社会革命性的政治转型将在这一框架中进行比较——我的社会革命的概念，必然要把成功的变迁作为一个基本的特征来进行定义。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社会革命呢？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分析革命的原因与结果的模式呢？在我看来，当前社会科学的革命理论都不能很好地满足上述要求。⁷ 因此，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入一种能够替代所有

(或者说大多数)现存解释途径的新模式,并论证这一新模式的分析原则与方法。与当前盛行的理论所用的解释模式相反的是,我将要论证,应该用结构性视角来分析社会革命,并且应该特别关注国际背景,应该关注国内与国际因素对旧制度下的政权组织崩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新的、革命性政权组织的建立情况。此外,我还要论证,比较历史分析是用来建立既有历史根基、又能超越个案局限的普遍性革命理论的最佳方式。

为了便于在随后陈述这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替代模式,很有必要在这里区分一下社会科学革命理论的主要类型,简要归纳每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的著作中所体现出的重要特点。我将要以此而概括的理论形态都可以被称作是“普遍性”理论(*general theories*)——也即:他们是一些涵盖广泛的概念性框架和假设,这些框架和假设试图运用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情形。本书所追求的并不是去建立这种普遍性理论。相反,就像其他的一些以历史为基础的比较性革命研究的著作一样——如小巴林顿·摩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20世纪的农民战争》和约翰·邓恩(John Dunn)的《现代革命》⁸——本书基本上是对一组案例进入深度分析。尽管与上述的姊妹著作具有类似性(或许比后两本著作更为彻底),但是,本书除了致力于逐个描述案例外,还要关注理解并解释在我所讨论的这一组革命中起作用的一般逻辑。确切而言,在普遍性理论中所发现的各种概念和假设也潜在地与比较历史的解释任务紧密相关;事实上,任何比较研究要么是利用了从马克思到当代的作者们的社会科学革命理论中所产生的观念,要么就是对它们予以反驳。因此,接下来我将简要概括这些普遍性理论。这种概括虽然导致我不能马上讨论更为丰富的现存的比较历史分析的革命研究所提出的观点,但是,对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确认,还是为我们在后面所做的评述提供了一种简捷的方式。

我认为,从解释的有效性的角度,可以将当前流行的重要社会科学的革命理论归结为四大类。我将在随后逐一讨论每一类理论。在这四个大类理论中,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的核心观念,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作为这种社会变迁模式的积极倡导者,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一些一以贯之地关注理解社会革命的分析

家。确实，自马克思去世之后，在这个喧嚣的世纪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和政治传统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倾向：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革命理论包括：从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体现出来)等技术决定论者，⁹到列宁和毛泽东等政治战略家，¹⁰到乔治·卢卡奇和安东尼·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路易·阿尔都塞等当代的“结构主义者”。¹¹然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马克思本来的革命研究途径却仍然是后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基础。

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要素能够十分明确地加以确认，而无需否认所有的要素都以一种开放的状态在广泛地经受着各种估量和解释。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并不是孤立的暴力事件或冲突，而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各种运动，这些运动产生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饱受冲突折磨的社会的客观结构性矛盾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理解任何社会的关键，是其生产方式或者社会经济的生产力(技术和劳动分工)与以财产所有权和剩余产品占有方式为基础的阶级关系的结合。后者，也就是生产关系尤其重要：

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对应于劳动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揭示了整个社会最隐蔽的秘密和整个社会最隐蔽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支配与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与此相应的、特定的国家形式。¹²

根据马克思的一般性理论公式，社会革命性矛盾的基本根源，是某一生产方式之中的社会力量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出现了断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¹³

因此，这一断裂的表现就是激烈的阶级冲突。新的生产关系诞生于现存生产关系的束缚之中——资本主义产生于封建主义之中；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之中——从而造就一种动力基础，使得每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通过不断与现存的支配阶级进行斗争而增强团结和自主意识。由此而导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

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¹⁴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贵族统治下是被压迫的阶级，在中世纪的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例如在法国）；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事实上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表制国家里夺得独占的政治统治。¹⁵

与此类似，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¹⁶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自诞生之日起，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进行的。最初是个别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结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

其结果是，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¹⁷

革命本身是由自觉的、日益上升的革命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阶级行动来实现的。革命阶级或许会受到诸如农民等阶级盟友的支持，但是，这些盟友既不具备充分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在全国层面上从政治上组织起来。一旦革命取得成功，就标志着从先前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统治形式转变为新的生产方

式。在新的生产方式中,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与新近取得成功的革命阶级的领导(霸)权一道,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合适的条件。简言之,马克思将革命视为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阶级分裂的产物,革命通过阶级冲突而将一种生产方式改造为另一种生产方式。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另外三组革命理论的形成时间则晚得多(尽管这些理论家都从经典的社会理论家那里获得营养,这些经典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托克维尔、迪尔凯姆和韦伯,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革命理论已经密集地涌现出来。这一新近的发展最初关注的是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的根源,其公开的目的常常是要帮助国内外的现存政权阻止革命条件的出现,或者帮助这些政权将有可能出现的条件予以改善。无论这一目的是否已经达到,他们毕竟还是建立起了精细的理论。这些理论要么是为了解释革命,要么则将革命包含进了他们试图要解释的更为广泛的现象之中。大多数的这些新近的理论都可以归结为是下述三类主要途径的一类:聚合-心理学理论(aggregate-psychological theories),这一类理论试图从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¹⁸系统/价值共识理论(systems/value consensus theories),这一类理论视革命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¹⁹政治-冲突理论(political-conflict theories),这类理论认为,在解释集体暴力和革命之时,必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²⁰在每一种视角下,都曾经产生过重要而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聚合-心理学方面是托德·格尔(Ted Gurr)的《人们为什么造反》;系统/价值共识理论方面的理论著作是卡尔梅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的《革命性变迁》;政治冲突视角方面的著作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从动员到革命》。

在《人们为什么造反》一书中,²¹托德·格尔试图建立起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普遍性理论,以解释各种大规模的“政治暴力”。他在该书中将政治暴力界定为: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反对现政权的所有集体攻击行为,攻击的对象是现政权的代理人——包括竞争性的政治群体和现职官员——

或政策。这一概念包含了一系列的事件，其共同的性质是实际或威胁使用暴力……这一概念包括革命在内……同时也包括游击战、政变、反叛和骚乱。²²

格尔的理论比较复杂，而且在精心解释的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令人感兴趣的微妙之处，但是就本质而言还是比较简单：当社会中的不少人变得义愤填膺时，尤其是现存的文化条件和环境条件鼓舞着人们以攻击性方式来反对政治目标时，就会出现政治暴力。当人们觉得有资格获得有价值的事物和机会，而现存的事物和机会与之存在着差距时——即著名的“相对剥夺”条件——出现时，人们就会变得义愤填膺。格尔提出了解释各种政治暴力形式的具体模式。他区分了骚乱(turmoil)、阴谋(conspiracy)和内战(internal war)这三种主要形式。革命与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civil war)均属于内战范畴。内战与其他冲突形式的区别在于，它比骚乱更有组织，比阴谋更有群众基础。因此，从逻辑上讲，革命出现的原因基本上被解释为，在一个社会中出现了广泛、强烈和多方面的相对剥夺，而且这种相对剥夺既触动了大众，也触动了有抱负的精英。²³如果潜在的领袖和追随者都产生出剧烈的受挫感，那么他们都会广泛地参与并精心地组织起来，此时就有可能产生政治暴力，而内战的基础性条件也就出现了。

查尔斯·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²⁴代表了可以说是政治-冲突途径理论总结的巅峰之作。这一途径是在与格尔等人从受挫-攻击途径解释革命的争论过程中产生的。他们所提出的基本的反论是有说服力的，也很容易说明。政治-冲突理论家们提出，无论人们的不满聚集到何种程度，除非他们能够最低限度地成为有组织集团的一个部分并获得某种资源，他们就不可能参与政治行动(包括暴力行动)。即使在这个时候，政府或竞争性集团也可能会通过提高他们承受的行动成本，成功地压制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志。而且，正如蒂利所说，政治-冲突理论家们认为：

革命与集体暴力常常是直接从群众的核心政治进程中产生，而不是群众的紧张和不满情绪扩散的表现……各种被动员起来的群体向现存政府提出的具体诉求和反诉，比那些群体的普遍满足和不满更重要。对权力结构中既定职位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²⁵

事实上，蒂利拒绝将这一类的暴力作为分析对象。因为他坚持认为，集体暴力事件只不过是群体权力竞争和目标冲突在正常进程中的副产品。相反，他认为，分析的对象应该是“集体行动”，即“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共同行动”²⁶。蒂利在分析集体行动时主要借用了两种一般性模式：“政体模式”(polity model)和“动员模式”(mobilization model)。²⁷政体模式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政府(在民众中控制着主要集中性强制手段的组织)、竞取权力的群体、包含有上述两种成分的组织(能够正常地以低成本获得政府资源的竞争者)和挑战者(所有的其他权力竞争者)。动员模式包括一些用来解释权力竞争者参与的集体行动模式的变量。这些变量包括既定的权力竞争群体在与政府和其他竞争群体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群体利益、组织化程度、集体控制的资源数量，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威胁。

对蒂利而言，革命是一种集体行动中的特殊情况，在革命过程中，斗争的双方(或多方)都为了获得对民众的根本政治统治权而战斗，而且挑战者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取代了现存的掌权者。²⁸如果承认这一概念，那么造成“多元主权”(multiple sovereignty)革命情势的原因就包括下面几项。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社会中的资源从一些群体转向另外一些群体(尤其是那些先前没有从特定政体中获得过资源的群体)的长时段趋势。其次，要考察任何在中时段上发生的事件——如革命意识形态的散布和群体不满情绪的增加——也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些事件，才使得革命性的斗争群体容易出现，广大的民众也容易支持他们的主张。最后：

当先前默默忍受的社会成员……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政府的要求与另一个声称要控制政府的实体的要求……而且他们顺从了另一个实体的要求时，革命运动就会来临。他们为另一个实体提供税收、为其军队供给人员、供养他们的官员、对其符号致敬、投入精力为其服务并提供其他资源，尽管这些行为是他们先前曾经顺从的政府所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多元主权时代就开始了。²⁹

而且，成功的革命不仅取决于多元主权局面的出现，还有可能取决于“政权内部的成员和提出独占政府控制权要求的竞争者之间结成联

盟”³⁰。同时还必须要取决于“革命联盟能够控制充分的武力”³¹。因为，在这些附加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革命挑战者才有可能击败并取代原来的掌权集团。

不管是格尔还是蒂利，他们都将革命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事件，都运用政治暴力或集体行动这类普遍性理论来解释革命。而卡尔梅森·詹森(Chalmers Johnson)的《革命性变迁》³²在分析革命时则与马克思类似，主要是从社会整合与变迁的角度，用宏观社会学理论来分析革命。詹森提出，与生理学和病理学研究一样，“对革命的分析与对持续运作的社会的分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³³通过借用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詹森提出，一个正常的、没有危机的社会应该被看成是“价值协调的社会系统”，在功能上能够适应环境变迁中的紧急事件。这种社会系统的内部由一系列的制度构成，这些制度用规范和角色来表达和执行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价值取向也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成为大多数正常的成年社会成员认识现实的标准。而且，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也必须要根据社会价值来加以合法化。

詹森对革命的界定和解释，所根据的都是这种价值协调的社会系统模式。詹森说，暴力与变迁是革命的独有特征：“发动一场革命就是为了促进系统的变迁而愿意使用暴力；准确而言，是通过采用暴力策略而达到社会结构变迁的目的。”³⁴当革命者取得成功之时，革命所首先改变的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之所以要采取以价值取向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运动，只不过是用了暴力反抗当局而做准备。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运动并不会首先出现，除非现存的社会系统遇到了危机。在詹森看来，如果从外部或内部出现了新的价值或技术，从而出现了价值与环境之间严重不协调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一旦出现不协调的现象，社会中的人们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并由此而转向由革命运动提倡替代性价值。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当局就失去了合法性，从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强制性力量来维持秩序。但是，他们这样做只能取得暂时的成功。如果当局聪明、灵活而富于技巧，他们就会通过改革来使环境和价值“重新协调起来”。但是，如果当局顽固而“不肯妥协”，那么革命就会用暴力的形式替代当局，并实现系统的变迁。只要出现某些“偶然形成的因素”，

削弱了当局诉诸于(脆弱而暂时有效的)强制性手段的能力,上述情况就会发生。

高高在上的强制性力量可能会延缓暴力运动的爆发;但是,一种由哥萨克来维持劳动分工的社会,就再也不是一种价值共享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势下[例如,今天(1966年)的南非],革命就会成为一种地方性传染病,如果其它情况相同的话,起义的发生就不可能避免。这一事实表明……要以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解释革命,就必须考察一个系统的价值结构及其问题。³⁵

成功的革命最终会实现社会系统的价值与环境之间的再度协调,而这是软弱无能或顽固不化的旧制度权威所不能实现的。实际上,在詹森看来,只有当革命之前的权威走向了失败并失去其合法性时,革命而不是演化性变迁才变得可能和必要。在詹森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中,价值取向和政治合法性是解释革命情势出现、当局的选择、革命力量的性质和成功的关键因素。

即使从上述的简要概述中,也很容易清楚地看到,在几种主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之间,对于革命问题存在着大量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体现在解释革命的方式上,甚至还体现在如何界定革命的问题上。在本书中,作者并不打算在这些分歧的方面佯装中立。很明显,这里所使用的社会革命概念,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变迁和阶级冲突。这一概念拒绝像格尔和蒂利那样,在抽象层面上远离结构性改造,也不会像詹森那样,将社会价值的重新定向作为革命性社会变迁的关键要素。而且,在我对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所做的全面分析中,也不拟考虑相对剥夺和不满情绪这一解释性假设——主要是因为,我接受了政治-冲突理论对这种观念的批判。我同时还会远离系统失衡、权威合法性丧失和意识形态转向革命世界观的观念(我将在论证的过程中解释这一做法的理由)。相反,为了理解在社会革命中所卷入的某些冲突这一具体目的,我将大量地采用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冲突视角的某些理论。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阶级关系概念——阶级关系是由根植于生产资料的控制和非生产者对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剩余的榨取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识别社会内部的一种基本冲突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工

具。阶级关系常常是千姿百态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在成功的社会革命转型中，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实际上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在本书将要进行深度研究的案例中——法国、俄国和中国——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关系尤其值得分析。这种关系是基本的紧张关系的外在体现；即使在公开的阶级冲突尚未爆发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影响着革命前旧制度之下的经济和政治动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期间，农民的确直接打击了地主的特权。这些在农村中发生的阶级冲突，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革命所实现的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造。因此，简而言之，理解这些在革命期间发展出来的公开的阶级冲突的原因和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必须要用政治-冲突理论家们的思想来补充阶级分析。一方面，应该去识别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客观性阶级关系所引出的根本的、潜在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要理解阶级成员是以何种方式在何时认识到：他们是否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展有效的斗争？被支配阶级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成功地与剥削他们的阶级进行战斗？支配阶级又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具备了集体行动的能力的？为了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政治-冲突理论的主张，即集体行动建基于群体组织及其获得的资源——常常是强制性资源——的观点，就尤其具有说服力。因此，在本书的历史性案例分析中，我们不仅会识别阶级和阶级利益，我还将会考察，使得阶级成员能够为了自身利益而发动斗争所需的组织和资源的出现和缺失（及其具体形式）。

因此，在这些具体的方法中，我找到了与理解社会革命相关的两种理论途径。然而，如前所述，本章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评判各种革命理论的相对优势与不足。勿宁说，主要是对他们事实上所共享——尽管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的某种概念、假设和解释模式提出质疑。

为了替代所有当前流行的革命理论所共有的特征，就需要重新确立起三个基本的分析原则。首先，为适当地理解社会革命，需要分析者采用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与过程。但是，所有现存的分析途径在分析革命的发生方式时，都是以唯意志论为基础的。其次，如果不以国际结构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作系统的参照，就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

革命。然而，现存的革命理论都主要或完全关注的是国内的冲突和现代化进程。再次，为了解释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必须将国家理解为行政和强制性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经济利益和结构中享有潜在的自主性（尽管当然也会受到限制）。但是，当前流行的革命理论，则要么将分析对象解析为崩溃的国家与社会，要么则将政治和国家行动还原为社会经济力量和利益的代表。

上述三点主张非常重要。它不仅代表了对现存理论所共有的缺点的批判，而且也是本书从整体上分析社会革命的基础。下面将依次对这三个主张加以系统阐释。

第一节 结构性视角

如果摒弃前述关于革命研究的主要视角之间的冲突，我们会非常明显地看到，四种视角关于革命总体进程的画面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在这一共同的总体画面中：首先，社会系统或社会的变化产生出了怨愤、社会性方向迷失、新阶级或集团利益，以及追求集体动员的潜能。然后，由此而建立起了一种有意识的、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运动——结合了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力量——有意识地进行推翻现存政府甚至有可能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活动。最后，革命运动以冲突的形式解决与当局或支配阶级的矛盾。而且，革命运动如果取胜，就会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并实施自己的纲领。

在前面我们所考察的几种视角中，大约都将这种普遍性的革命进程模式视为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或者是由有意识的目标所引导的运动（由于每一视角的理论和方法论特征的差异，具体观点也略有不同）。没有一种视角曾经质疑过下述假定：对革命的发生而言，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出现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努力使领袖和追随者紧密联系起来，以推翻现存的政治或社会秩序。因此在格尔看来：“在政治暴力的基本因果顺序中，首先是不满情绪的形成，其次是这种不满情绪的政治

化,最后是用实际的暴力行动去反对目标和人物。”³⁶而且,正如前面对格尔的观点进行总结时所表明的,只有当领袖精心组织群众不满观点的表达时,革命才会发生。与此类似,卡尔梅斯·詹森所强调的是,个人迷失方向的现象散布开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转向了由革命的意识形态运动所提出的价值,然后就是与现存权威展开冲突。蒂利将他的理论注意力大部分集中于有意识的革命进程的最后阶段——有组织的革命者们为了竞取统治权而与政府展开冲突。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相对剥夺和系统理论的理论家们所强调的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以解释革命组织的出现和大众的支持。最后,很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也在一般意义上坚持这一前提,即革命是由有目的的运动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观察革命的产生时提出,经过长期的预备性斗争,就会出现有组织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自为的阶级”³⁷作为必要的中介条件,以通过革命运动来解决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少理论流派,都过分强调了在马克思本人的革命理论中最有意志论色彩的那些主张。当然,大多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都不是这样。但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特征就是强调意志论,因为他们强调先锋政党在组织“无产阶级意识”方面的作用。而且,强调意志论也是诸如卢卡奇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他们强调阶级意识和霸权在将客观经济矛盾转化为实际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即使在理论家们有意识地将社会-结构分析转化为社会-心理解释时,也仍然会将革命的发展看成是一种劝诱过程。根据这一图景,只有出现不满或迷失方向的人们、或者为革命目标而动员起来的人群时,革命性危机才会发生(或出现)。只有形成这一目标,并出现有意识的革命运动时,对旧制度的破坏和改造活动才会发生。其结果是,这一图景鼓励分析家们,无情地将民众的不满情绪或根本的敌对目标和价值当作核心问题加以考虑。例如,蒂利最初在构建他的集体行动理论时所强调的是,将群体的社会组织 and 资源的获取,作为政治暴力的社会心理理论的明确替代模式。但是,由于他从竞争者们在斗争中所追求的特定目标——根本的统治权——的角度来界定革命情势,他的结论反而是回应了詹森关于革命意识形态领导的

理论和格尔用不满来解释群众支持革命组织的假设。³⁸与此类似，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将阶级意识和政党组织作为革命的核心问题加以考虑时，他们变得更加不关注探讨革命的客观的结构性条件。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做的经济分析已经非常充分，因此他们主要将理论创新的努力投向了考察正确和错误的思虑，即当客观条件出现时，什么样的正确或错误的思虑，才是将潜在的革命转变为现实，而且更具政治可操作性的主观条件。

关于革命发生方式的的目的性图景错在哪里呢？一方面，这种图景强烈地暗示，社会秩序基本上或大致上依赖于需求得到满足的多数人（或下层阶级）达成了共识。这一图景暗示，革命的基本而有效的条件是，这一共识性支持的消退；换言之，如果在大众中充满了有意识的不满情绪，任何政权都难以存续。当然，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完全接受这种观念，但是，当他们强调阶级意识或霸权时，他们就已经在无形中悄然隐含了这种观念。毫不奇怪，格尔和詹森非常明确地赞成这种观念。³⁹当蒂利将革命描述为政府和革命组织为争取大众支持而竞争时，他们实际上也滑入了其中的一种窠臼，认为是大众的选择在决定革命情势是否发展。⁴⁰然而，很明显，任何上述的关于社会秩序及其瓦解和变迁的共识性和意志论的概念，都是非常幼稚的。在大多数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都掩盖了事件的真相，例如，对于公开实行压制而且在国内已不享有正当性的南非政权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些理论就不能提供有效的解释。⁴¹

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历史上实际发生的社会革命的原因和过程时，目的论图景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在原因方面，不管社会革命会在将来（即在一个工业化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会采取何种可以想象的形式，事实是，在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正如杰里米·布莱彻（Jeremy Brecher）恰当地指出的：“事实上，革命运动很少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⁴²确实，在革命性危机到来之前或在危机过程中，革命性组织和意识形态有助于巩固激进的先锋队的团结，同时也非常有助于新制度的巩固。但是，这些先锋队——更不用说拥有大规模动员起来并被灌输了意识形态的大众追随者——从来没有创造过他们要加以利

用的革命危机。相反,正如我们在随后几章会看到的,革命形势的发生是因为国家政权和阶级统治的政治——军事危机的出现。而且,只是因为由此而创造出来的机会,革命的领袖和反叛的大众才能推动革命改造任务的实现。此外,反叛的大众常常会自行其是,并没有被公开的革命领袖和目标直接组织起来并接受其意识形态的鼓舞。至于历史上的社会革命的原因,温德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曾非常正确地指出:“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⁴³

正如目的论图景会误导革命原因的研究一样,它也会误导对历史上的革命过程和结果的研究。因为这一图景强烈地暗示,可以从最初发动革命的核心群体的活动、意图或利益的角度来理解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尽管格尔似乎并没有将革命想象为完全的破坏性活动,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行动应该直接归因于最初引发革命的、因受挫而愤怒的大众和领袖的活动。对詹森而言,以革命暴力的形式实现价值的重新定位,是在旧的、功能失调的社会系统中生长出来的意识形态所促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把革命过程的基本逻辑归结为,历史上相关自为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行动。

但是,这些观念都过于简单化了。⁴⁴事实上,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地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这些冲突又受到了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冲突的展开方式,取决于每次革命形势最初的出现方式。冲突的逻辑并不由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所控制,而不管这些阶级和集团是否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采用任何单个阶级、精英或组织活动的视角来破译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逻辑,都是不适当的,而不管这些阶级、精英或组织在参与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的,“演员在戏剧中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戏剧家、制作人和舞台设计师。”霍布斯鲍姆的结论是,“因此,对于那些过分强调意志和主观因素的革命理论,我们要谨慎对待”。⁴⁵

任何对革命的有效解释，都需要分析家“超越”参与者的观点，去发现超出既定历史场景的重大规律。这些规律所覆盖的对象应包括：曾经发生过革命的局势中类似的制度模式和历史模式；革命曾经在特定过程中发展的冲突模式。正如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所指出的：

不是人们的动机不重要；动机在事实上制造着包括革命在内的事件。但是，人们的目的，尤其是处于一场革命中的人们目的是如此众多、如此多变和如此矛盾，以至于在其复杂的互动中所产生的结果既不符合任何人的意图，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能预见的。正是在这种互动和结果面前，新近的历史学家们对导致革命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和“非个人性的无情力量”各执己见。如果历史解释不考虑这些“力量”，换言之，如果它仅仅依赖于对行动者的明确意图的理解，那将是非常有局限性的。⁴⁶

为了解释社会革命，必须要找到问题点，首先要弄清旧制度下革命形势的出现(而非“制造”)的原因。然后，必须要能够确定受制于客观条件、以一种复杂的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而且处于各种情势之下的种种群体行动——正是这些行动的相互纠缠塑造着革命进程并产生出新制度。如果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采用这种非个人性的、非主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就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的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这种视角是分析社会革命所必需的。

第二节 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如果说结构性视角意味着要集中关注各种关系，在各种关系中就必须既包括既定国家内处于不同境遇的群体之关系，也要包括跨国性关系。跨国性关系不但会促成所有社会革命危机的出现，而且必然会有助于塑

造革命的过程和后果。事实上,对所有现代社会革命而言,其原因与成就都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均衡状况有着紧密的关系。不幸的是,现存的革命理论并没有明确地采用这一视角。固然,他们都暗示,革命与“现代化”有关——但是,这种观点却使它们几乎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民族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趋势和冲突上,而且是个别地、孤立地进行考察。

正如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曾经指出过的,所有现代化进程的概念都必须要从西欧的经历出发,因为西欧是商业——工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发源地。⁴⁷然而,直到最近都居主导地位的理论框架——结构-功能主义和单线论的马克思主义——都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国发展的直观逻辑作了过分的普及。尤其是,现代化被看成是一国内部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要么被视为是技术革新和劳动分工的扩大,要么被视为是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成长——被看成是会引发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相互补充的变化的初始条件。这一假定的典型表述是,每个国家,或许是在范例的刺激下,或许是在早发国家的影响下,都将会像英国一样,迟早会经历或多或少受过压缩的根本性的转型。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所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⁴⁸一个世纪之后,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虽然可能会对有关民族发展的具体历史模式持有完全类似的观点表示不安,但是,实际上他们所有人都在根据同一逻辑而描绘他们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概念。⁴⁹

把现代化看成是国内社会经济动态运动过程的概念,与将革命理解为根植于并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观念之间,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也许是快速而杂乱的经济扩张刺激并在随后挫伤了大众的预期,从而产生了广泛的不满和破坏现存政府的政治暴力。社会的分化无论如何都超出并压倒了建立在价值共识基础上的社会整合。由此而刺激产生了推翻现存权威并重新定位社会价值的意识形态运动。或者在旧的生产方式的母体中可能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为新阶级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新的阶级通过革命而建立起了新的生产方式。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现代化都会通过改变社会民众或群体的情绪、价值承诺或集体动员的潜力而造成革命。而革命自身,

又造就了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或者至少是消除了障碍)。

但是,作为一种以类似的方式在各国出现的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现代化概念即使在欧洲也没有厘清其最初的含义——更不用说随后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转变。从一开始,国际关系就与先前存在的阶级和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在各国共同促进和塑造着各国变迁过程中的差异性和类似性。这一现象在经济发展、商业和工业变迁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真实。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扩张到了全球各地,贸易和投资的跨国流动已经影响到了所有的国家——尽管是以一种不均衡、有时甚至是迥异的方式。英国在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方面的最初突破,部分是依赖于17世纪前期以来它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地位。随后,各国在19世纪展开的工业化,也部分地——以各种方式——受制于商品、移民和投资的国际流动以及每个民族国家试图影响这些流动的做法。而且,当全球的“边陲”地区被囊括进以工业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网之后,它们先前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就往往会以一种不利于随后的经济自足和多样化发展的方式得到强化和修补。即使随后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使得工业化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某些地方展开,其工业化的进程也必然会在形式上迥异于早发国家的工业化。我们并不必然要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由一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结构和市场动力所决定的。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跨国性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总是会强烈地(而且是有差别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⁵⁰

另外一种跨国性结构——竞争国家之间的国际体系——也塑造着现代历史的动力和不均衡进程。欧洲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而且也是这样一种大陆性政治结构存在的地方,即没有一个帝国政权控制着整个欧洲的领土和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450年之后)。经济交换系统地存在于不受单个国家控制的广阔领土之上。这就意味着,首先,由欧洲的地理扩张和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出的财富增长,没有被转而用于维持一套蔓延整个欧洲的、笨重的帝国上层建筑。而对由政治帝国——如罗马和中国——所包裹的其他世界经济中所产生出的财富来说,这种转向常常是其最终命运。但是,欧洲的世界经济很独特,它是在一种竞争性的国家之中发展出来的。⁵¹用沃尔特·多恩(Walter Dorn)的话来说:

正是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竞争性特征,使得其政治生活不同于所有先前和非欧洲的世界文明。其实质在于国家之间的独立与合作的共存……这些国家的扩张性冲动挑起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阻止任何单一的强权将其他国家压制在永恒的臣属状态。⁵²

特别是由于英国实现了商业化和全国性的工业化,欧洲国家体系内部的竞争刺激了整个欧洲的现代化发展。⁵³ 国家体系内部周期性发生的战争,促使欧洲的君主和政治家们集中、管制、并从技术上改进对军队和财政的管理。而且,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种冲突促使他们用爱国主义的诉求来动员普通大众。接下来,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模式也产生了反应,首先是通过官僚机构来自上而下地引导和管理工业化,最终还用革命政权来发动大众的卷入,就像苏俄所发生的那样。

而且,伴随着欧洲从16世纪开始经历的经济突破,欧洲国家体系的竞争性机制还推动了欧洲“文明”在全球的扩展。最初,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促使和推动伊比利亚人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扩张的一个条件。后来,英国在与法国展开全球竞争的刺激下,不断进行斗争,最终实现了对整个欧洲新开辟的殖民地的正式控制,树立了事实上的霸权地位,并取得了先前的新世界的所有权。至19世纪后期,几乎是更加势均力敌的欧洲工业强国之间的竞争,推动着对非洲的瓜分,并使大多数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大规模转变的浪潮中,这些殖民地作为新的、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出现在目前的全球国家体系之中。到那时为止,即使是像日本和中国这样在传统上远离西方、并避免了殖民地化的国家,也被完全纳入到了全球国家体系之中。用前工业化的标准来看,日本和中国都曾经是发达而强大的农业国家;这两个国家都避免了完全和永久地沦为臣属地位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人侵引发了革命性的剧变,很快就形成了强大的国防能力,并在国际性的国家体系中维护了民族的独立。

有些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包括非常著名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试图用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最初是欧洲最终是全球)国际性国家体系的结构与动力。⁵⁴ 为了做到这一

点,这些理论家通常会假定,各个民族国家都是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集团用来在国内外追求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国际性经济优势的工具。但是,本书采用的是另外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坚持认为,在更为根本的层次上,民族国家是用来在国内维持对领土边界和人口的控制、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实际和潜在的军事竞争的组织。作为一套跨国性军事竞争结构,国际性国家体系最初并不是由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在整个世界现代史上,它代表了一种对跨国现实进行分析的独立层面——其结构和动力与世界资本主义相互依存,但是其存在的原因则并不应该归因于世界资本主义。⁵⁵国家在军事上的相对实力和国际优势(或劣势),并不能完全用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经济地位来解释。国家的行政效率、动员大众的政治能力和国际地缘政治地位等因素也会产生作用。⁵⁶此外,国家改造国民经济(也会产生国际性影响)的意志和能力,会受到各国军事地位和先前与军事相关的行政和政治能力的影响。⁵⁷正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家和国际性国家体系的转型一样,这种“转型”也会“反作用”于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的进程与形式。

因此,正是从欧洲开始,现代化总是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完全是在历史形成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跨国结构的背景中进行的。只有在概念上变化花样,社会分析家才能只在国家(nation)层面上孤立地理解包括社会革命在内的转型。只要民族国家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最好(至少为了分析以国家中心的现象)采用国家/社会这一框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但是,在考虑到分析单位内部与模式和过程相关的变量的同时,跨国性因素也必须作为主要的背景性变量考虑进去。⁵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跨国性背景与此相关。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性国家体系的结构,各个国家在这一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世界时间”的变化和传播,既会影响到革命得以发生的整个世界背景,也会影响到革命领袖能够从国外借用的特定模式与选择。

经历社会革命的国家(实际上或有可能)会以几种方式卷入跨国结构之中。历史地看,不平等或竞争性跨国关系有助于塑造任何既定国家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并由此而影响到革命得以发生(或不发生)的现存“国内”背景。而且,跨国关系会影响实际革命紧急时刻的事件进程。

只有在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不利地位的国家中,才会发生现代社会革命。尤其是,军事落后或政治依附的现实,决定性地影响着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进程。尽管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总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但是,国际性国家体系的这种发展——尤其是战争中的失败、入侵的威胁和反殖民控制的斗争——实际上直接推动着所有革命性危机的爆发。由于这类发展有助于损毁现存的政治权威和国家控制,因此也就打开了基本冲突和结构转型的通路。而且,国际军事的均势和冲突,也为完成并从政治上巩固社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这一点之所以会成为事实,是因为这种均势和冲突分散或转移了外部敌人的注意力,他们本来的兴趣在于阻止革命的成功,或者在国内危机期间从中渔利。在对革命做最后的分析时,我们仍然要看到,社会革命的后果也总是不但会受到国际政治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突然出现的新政权所面临的世界经济限制与机会的制约。

至于在“世界时间”(world time)方面,“现代化”的某些方面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到整个世界。⁵⁹将国家/社会(state/society)作为分析单位,就可以对类似的、一再出现的国家发展形成有限的概括。但是,即使在做完这一工作后,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历史顺序和世界历史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比较与解释社会时,人们很快就会想到相关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后发革命的行动者可能会受到早发革命进展情况的影响;例如,中国共产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有意识的效仿者,而且一度直接从俄国革命政权那里得到建议和援助。另一种可能性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如工业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形式的革新——可能会介于两场具有广泛影响的类似革命之间。其结果是,为后发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必然性。而先发革命则没有这种机会和必然性,因为它发生在现代世界历史的早期阶段。

对于这两类跨国性背景的影响,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点结论。在分析跨国性关系的国内效果时,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假定——就像目前的革命理论家们常常做的那样——任何一种这类效果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处境、需求和观念。当然,这种情况或许会发生(例如,就像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突然使整个行业的人们失业)。但是,实际上,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同样或更有可能将跨国性影响转入国内政治的人物,因为他们必须要

调适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因此，为了理解划时代的现代化动力部分地造成和塑造革命转型的方式，就应该将旧（政府的）政权与随后突然出现的新政权与国际舞台的交叉点，尤其是与国际性国家体系的交叉点，视为最佳的观测场所。

如果忽视革命得以发生的国际和世界历史视角，就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的革命理论。如果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迄今为止的革命理论家都忽视了这些背景，那是因为他们不适当地过分关注国内“现代化”的性质及其与革命的相互关系的观念。作为一种补救性措施，这一部分简要地强调了现代化的跨国性视角，并提出将这些方面与革命分析联系起来的方式——尤其强调国际性国家体系的重要性。实际上，这种强调预示了在下一部分中要提出的观点，即在社会革命改造中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国家政权组织的中心地位。

第三节 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实际上，凡是论述社会革命的人都会承认，革命始于公开的政治危机——如1787—1789年法兰西君主的财政困境和三级会议的召集。同样地，人人都会明显地认识到，在革命进程的斗争中，有组织的政党和派系突出地卷入其中。而且，应该认识到的是，革命以新国家组织的巩固而告终，新国家组织的权力不但被用来加强已经发生的社会经济改造，而且被用来推动进一步的变迁。没有人否认社会革命在政治方面的这一现实。然而，大多数革命理论家都倾向于将引发革命的政治危机要么看成是偶然性的导火线，要么则看成是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中更为根本的矛盾和紧张所引出的附带性现象。与此类似的是，在社会革命中卷入的社会集团被看作是社会力量的代表。在社会革命中产生出的新国家组织的结构与活动，则被当作是在革命冲突中注定会取胜的社会经济或社会文化力量的利益表达。

在这种推理背后总有这样一种假设——如果说还只是隐含的话——

政治结构和冲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至少是“最终”)社会经济力量和冲突。国家仅仅被看成是一个争夺基本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构成“国家作为政治冲突舞台”这一特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其中的活动者为了进行社会与经济冲突而诉诸特定的手段——诸如强制或诉诸公共利益等手段。事实上,这种关于国家的一般性思维方式,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共同点。在这两种社会理论的主要传统之间,关键的差异只是在政治舞台上所使用的手段不同:主要是基于共识的正当权威,还是主要是基于强制的统治。而且这一差异又分别对应每一理论传统所坚持的社会秩序基础的观点。

有一种理想类型的观点认为,国家是正当权威的舞台,其中所包含的是政治博弈的规则和政府的领导及其政策。这些规则、领导和政策由某种规范性共识和社会成员的多数偏好所支撑。当然,这种观点与自由的、多元的社会观形成了共鸣,这种观点将社会看成是由自由竞争的群体所构成,社会成员被社会化为承认共同的社会价值。在关于革命的理论性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这些观念的各种版本,尤其是见诸于相对剥夺理论家托德·格尔和系统理论家卡尔梅斯·詹森的观点之中。在他们看来,在解释革命的爆发时,重要的是现存的政府权威是否丧失了正当性。当不满的社会和迷茫的大众开始感觉到参与暴力是一种可接受的方案时,或者转向了革命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新价值时,革命就会爆发。格尔和詹森都觉得,政府的权力稳定直接依赖于社会的心理倾向和大众的支持。二者都不相信国家的强制性组织能够有效地(长久地)压制社会中多数人的不满和反对。⁶⁰在他们的理论中,国家要么是社会的一种功利性共识的一个方面(格尔),要么就是价值共识的一个方面(詹森)。国家能够以大众共识和正当性的名义支配暴力,但是国家并不主要建基于有组织的强制力之上。

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政治-冲突理论家的蒂利——则将国家视为基本上是一种有组织的强制力。稍作回忆就会发现,在蒂利的政体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政府界定为“在特定人口中集中控制着主要强制手段的组织”⁶¹。与此类似,列宁这位在论述革命的政治方面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称:“常备军和警察是国

家权力的主要工具。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⁶²列宁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蒂利⁶³都不认为国家强制力的有效性依赖于价值共识或大众的满意。二者都非常明白，国家能够压制民间力量和革命运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解释革命的成功方面，蒂利和列宁都将重点放在了垄断了强制力的旧政权的崩溃和革命家对武装力量的建设上。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冲突理论家蒂利也犯了与格尔和詹森一样的错误。他们基本上还是将国家看成是解决社会冲突的舞台，尽管他们认为这种冲突的解决是通过统治而不是自愿的共识来实现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蒂利都将国家看成是一套有组织的强制系统，总是承担着这样的职能，即支持支配阶级或集团凌驾于被支配阶级或集团之上的优越地位。

在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中，国家与社会似乎在字面上被拆解了。他用政治术语给各种集团贴上标签，并讨论这些集团之间的关系；他并不谈论阶级或社会集团，而只是讨论在政体中拥有权力的“成员”集团或联盟，以及那些被从中排挤出去的“挑战者”集团。他对成员集团的界定——“任何拥有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的常规的、低成本通道的竞争者”⁶⁴——强烈地暗示着，统治集团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完全交叠。国家成了一种（基本上是强制性的）由政体中的“成员”集团所支配的工具，那些在人群中拥有权力的集团就是被讨论的对象。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分析，并没有拆解国家与社会。马克思将社会秩序看成是建立在阶级冲突和统治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是一种专门化的社会权力，并不等同于或者包括所有支配阶级的权力。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仍然还是用社会术语来解释国家的基本功能：不管其历史形态如何变化，国家同样被看成是阶级分化的生产方式的反映；而且，根据其定义，其不变的地方是，国家的一个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功能是，抑制阶级冲突并执行其他政策，以支持占有剩余产品的有产阶级的统治。⁶⁵

因此，无论是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中，都没有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而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的利益

等同或融合。如果局限于这两种理论的范围之内,其结果就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现存的支配阶级或团体与国家统治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根本的利益冲突。社会被刻画为团体间的支配和权力冲突。建立在集中的强制性手段基础之上的国家,则被看成是一种工具性和客观性的统治形式和一种冲突的目标,而没有将其视为一套自为的组织(organization-for-itself)。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新近发展情况又如何呢?在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近年来实际上重新产生了对国家问题的兴趣。⁶⁶在批判一种广为流行的庸俗化观点——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一种由代表支配阶级利益的领袖和利益集团有意识加以操纵的工具——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⁶⁷、尼科斯·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⁶⁸、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⁶⁹、高兰·瑟本(Göran Therborn)⁷⁰和克劳斯·奥非(Claus Offe)⁷¹等当代的分析家们从支配阶级的直接控制中提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对国家自主性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但是同时也涉及了欧洲封建主义的绝对主义阶段。他们在理论上集中关注的是,阐明现存的生产方式所施加于国家结构和行动范围之上的广泛的结构性的限制。而且,在一种创新冲动的鼓励下,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国家的支配阶级要执行一种服务于整个支配阶级利益的政策,他们可能就必须摆脱特定的支配阶级集团和个人的控制。当然,这种根本利益就体现为维持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结构和生产方式。

随着这种争论的不断展开,有些参与者——尤其是那些最热衷于去理解国家如何才能反对支配阶级的抵制而维持现存生产方式的人们——似乎接近于断言,国家的潜在自主性不仅体现为反对支配阶级,而且表现为对抗整个支配阶级或生产方式。⁷²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小心地试图避开这一系列的观点。⁷³相反,有些分析家,如奥非则简单地假定,尽管从原因上讲,国家结构和政策具有当然的重要性,但是,其实际功能的发挥则是由于它能够建立一种“选择性机制”去维持现存的生产方式。⁷⁴其他的一些分析家,尤其是所谓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用阶级斗争的还原论(class-struggle reductionism)这个标签来替代名声不好的支配阶级的工具论(dominant-class instrumentalism)。⁷⁵在这种观

点看来，国家结构和功能不仅仅是由支配阶级单独控制的。勿宁说，国家是由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客观上受既定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和阶级结构所限制的斗争——所塑造和冲击。最后，在这场争论中所出现的新观点见诸高兰·瑟本的一本新书，该书直接关注的国家结构一类的话题。由于置于不同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氛围中，瑟本建构和对比了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形式和功能的国家组织和活动的典型模式。他试图在每一种模式下，直接从相关的基本阶级关系中推导出国家结构。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波朗查斯一道，瑟本坚持认为：“国家既不应该被看成是一套特殊的制度，也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工具，而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关系——既定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的物质化浓缩。”⁷⁶

这样，新近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上的争论突然停止了，因为争论中的大多数参与者要么倾向于完全以一种功能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国家，要么则视国家为阶级关系或阶级冲突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提出（或者说是重新提出，因为这确实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不仅是由支配阶级创造出来并加以操纵的，确实也算是一种进步。然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们而言，还要直接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自身到底是什么，其结构变化和活动是如何与社会经济结构建立起关系的？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还是简单地假定，国家形式与活动的变化对应于生产方式的形式和变化，国家统治者不可能反对支配阶级的基本利益。他们的争论局限于国家及其功能是如何随着生产方式和支配阶级的变化而变化的。其结果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融入社会的这种持久的社会学倾向，几乎无人提出质疑。

然而，如果我们要更好地分析社会革命，就必须质疑这种持久的社会学倾向。乍一看来，社会-结构决定论视角（尤其是包含了阶级分析的这一视角）似乎是一种富有成效的途径。这看起来似乎是事实，因为，社会革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阶级冲突，并导致了基本的社会-结构转型。然而，社会革命的历史事实一再表明，需要一种更为国家中心的途径。正如本书的核心章节将表明的，引发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根本不是社会紧张或阶级矛盾的暂时反映。勿宁说，他们是居于旧制度下的国家

结构中心的矛盾的直接表现。在社会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治-冲突集团并不仅仅代表社会利益和力量。勿宁说,他们已经是在斗争中所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围绕着了国家结构的形式在投入战斗。在社会革命的激进阶段上所出现的先锋政党,一直在致力于建立起集中的军队和行政机构的任务。如果没有这些机构,革命的改造将无法得到巩固。此外,社会革命不仅改变了阶级关系、社会价值和社会制度,它同样甚至还会更多地改变国家结构。而且,社会革命对转型之后的国民经济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由于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且还是由于革命所实现的国家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总之,社会革命所特有的阶级关系的剧变和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旧制度下国家政权组织的崩溃、与新制度下国家政权组织的巩固和运作之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我们只有严肃地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宏观结构,才能理解社会革命的转型。国家应该适当地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冲突展开战斗的一个场所。勿宁说,它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⁷⁷当然,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是在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同时也是在国家与国际经济运动的背景下建立并必须在其中运作的。而且,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只是整个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体系中还可能包含有让社会利益得以在国家政策中得以表达的制度,以及将非国家行政者动员起来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然而,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则是上述国家权力的基础。

只要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存在,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它们在实际上所具有的自主性的程度,以及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都因具体的场景而异。值得强调的是,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和后果,只能从特定的政治系统和特定的历史性国际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导论到第二章都讨论法国、俄国和中国等农业国家的国家权力的制度形式的原因。同时我还将指出,在这些农业国家中,地方支配阶级和国家的统治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领域。而现在则无需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便

于随后的讨论，注意到国家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并探测其可能会追求的独特利益就够了。

在从经济和社会中提取资源方面，政权组织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支配阶级进行某种竞争。一旦这些资源被提取出来，这些资源所投向的目标可能会偏离现存支配阶级的利益。这些资源可能大部分都会用来强化国家自身的自主性——这就必然会威胁到支配阶级的利益，除非更为强大的国家权力是必需的，而且实际上也是被用来支持支配阶级的利益。但是，国家权力并不必然会被用来支持支配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国家统治者如果只是致力于执行国家自身的“职能”，就有可能与支配阶级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国家通常执行两项基本任务：它要维持秩序，它要与其他实际或潜在的国家展开竞争。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国家常常致力于维持现存的经济和阶级结构，因为这通常是维持秩序最为顺利的方式。然而，面对它治理之下的各个从属阶级，国家拥有自己的独特利益。尽管在将被支配阶级束缚在社会之内并让其在既定的经济体系中持续工作方面，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国家自己在维持充分的物质秩序和政治和平方面的根本利益，可能会导致它——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对被支配阶级的需求做出让步。这种让步又可能是以支配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却并不与国家本身在控制人民、抽取税收和军事录用方面的根本利益相冲突。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国家总是存在于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并与其他实际和潜在的国家相互作用。一种现存的经济和阶级结构限定和影响着既定的国家结构和统治者的活动。那么，地缘政治环境就为国家创造了任务和机会，并限制着国家应对国内外的任务和危机的能力。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海因兹(Otto Hintze)曾经论述的，首先有两个现象限制着“国家的实际组织。第一是社会的阶级结构，第二是国家的外部秩序——彼此之间的相对地位，以及它们在世界上的总体地位。”⁷⁸事实上，国家卷入国家之间的国际网络，是在其管辖之下的反对群体和经济安排——甚至包括支配阶级和现存生产关系之中具有潜在的行动自主性的基础。例如，国家的统治者可能会在国外进行军事冒险，从而耗尽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或者会暂时或者会从根本上损害到支

配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基础。又如,统治者还可能会在面临国外军事竞争或征服威胁的情况下,试图发起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或者通过国家的干预来重新调整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类规划也许能够成功执行,也许不能成功执行。但是,即使成功地推行这些规划,仅这种努力本身,就可能在国家与现存支配阶级之间产生出利益的矛盾冲突。

以上关于国家的观点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组织”和“现实主义”的国家观。与大多数(尤其是新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的是,这种观点拒绝将国家看成是从产生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分析层面,或者是具体的阶级关系和冲突的政治方面。相反,它坚持认为,国家是控制(或试图控制)边界和人口的实际组织。因此,革命的分析者不但要考察阶级关系,而且要考察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对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关系。在本书的核心章节中对社会革命的历史案例进行讨论时,对旧制度矛盾的分析和对革命性危机出现的分析,将主要集中于分析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对新制度的出现及其结构所做的分析,将主要集中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革命运动与国际环境和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会自始至终包括农民,因为农民在革命的各种冲突中都是关键的造反参与者。与那种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相比,旧制度和新制度中的国家组织都将在本书的分析中居于更为中心和更具有自主性的地位。

一种组织的、现实主义的国家观不仅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途径,而且也不同于将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作为重要解释概念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途径。如果国家组织能够顺利而有效地应对它所声称的任务,那么,正当性——无论是道德认同意义上的正当性,还是更为经常使用的完全接受现状的正当性——都很可能是社会中的大多数群体对国家形式和统治者的妥协与谅解。在任何情况下,最为重要的都不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与默认,而是在政治上最有权力而且是被动员起来的集团、而且常常是特定政权自己的干部的支持与默认。在丧失了正当性,尤其是在这些关键的集团中丧失了正当性的背景下,如果国家不能持续有效应对现存的任务,或者被证明是不能有效处理由危机环境突然引发并威胁到政权的新任务(社会学和历史学总是会对原因作各种解释)时,就可能会发生

剧烈的暴乱。但是，即使在严重丧失正当性之后，如果国家的强制性组织还具有连贯性和有效性，它也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稳定——而且能够在面对大众的反叛时固若金汤。⁷⁹因此，在分析实际或潜在的革命情势中的国家时，那些组织的结构、它们在国家机构整体中所处的地位、它们与阶级力量和潜在的动员群体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分析重点肯定会比主要或完全集中于政治正当性的分析更有成效。特定政权的正当性在其干部和其他在政治上有权势的集团心目中的衰退，在分析政权的崩溃时可以被当作是一个中介性变量 (mediating variable)。但是，基本的原因却位于国家组织的结构和能力之中，而这些因素又受制于经济的发展、阶级结构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简言之，国家从根本上说具有两幅面孔，从而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去理解革命之中的国家组织的崩溃和建立，我们就不能只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我们还必须要关注国际条件和压力与阶级结构之中的经济和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叉点。正是在这些交叉点上，我们会发现国家的执行管理人员及其追随者们，是如何在设法抽取资源并建立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因此，这里才是一个寻找导致社会革命的政治矛盾的观察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发现在社会革命危机中塑造着国家组织重建的力量的地方。

在本章的前述部分中，我批判性地讨论了现存革命理论所共有的三项分析原则，并提出了替代性的分析原则。事实上，在现存理论的共同倾向中还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社会革命起因的目的论图景和现代化的国内视角之间相互补充，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种理论都是用社会经济还原论的方式来理解国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这里所提出的替代性原则之间也是相互补充的。我们将从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的视角来分析社会革命的原因和进程，既关注国际和世界历史的结构和进程，同时也关注国内的结构和进程。而且，由此在理论上所带来的一种做法是，将国家——理解为居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形势的交界面从而具有潜在的自主性——推向关注的中心。

下面这一部分将讨论适合用来解释社会革命的分析方法。

第四节 比较历史方法

本书一开始所界定的社会革命——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快速而根本的改造,伴随其中并部分是以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的形式来实施的——在世界现代史上相对较少发生。而且,每一场这种革命都在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开。那么,社会学家如何才能有希望对这类社会革命做出具有历史根据的解释呢?

在新近的美国社会科学界中,学者们长期避开对具有自身合理性的社会革命进行研究,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对那些拥有大量案例的现象,才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在这里,长期存在着一种自觉地抵制美国社会科学的前辈们所喜爱的、以“自然史”(nature history)的途径研究革命的倾向。以莱福德·爱德华兹(Lyford Edwards)、克雷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和乔治·佩蒂(George Pettee)为首的“自然史学派”,在试图对典型的革命进程做出一般性概括时,只是考察了少数的案例。⁸⁰在抛弃了这种太过“历史化”的途径后,作为替代,后来的革命研究者们,则寻求只通过大量案例的研究来进行理论概括。因此,在1964年的一本名为《内战》的书中,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把“理论的对象”界定为是“一系列现象,人们可以从这些现象中建立起信息丰富的、可检验的、适用于对象的所有情形的概括,而且其中的有些概括还只适用于某些情形”⁸¹,他接着进一步断言:“从词典学意义上看,只有两个或三个案例的一项陈述,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概括,但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概括则常常必须建立在更多案例的基础之上;它必须涵盖大量的案例,案例的数量要充分到能够适用于某种机械的检测程序,就像统计分析所使用的数据那样。”⁸²有不少其他当代的革命研究者也同意埃克斯坦的观点。其结果是,人们在解释革命时所偏好的策略是,将革命包含进更为广泛的范畴之中。这些范畴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范畴(如卡尔梅斯·詹森)、政治暴力范畴(如德得·格尔)、或“集体行动”范畴(如蒂利),这些范畴都涉

及各种类型的政治事件的某些共同方面。⁸³

当代的革命分析家们将革命归入一种具有包容性的现象，并不表明他们的理论与社会革命无关。当然，他们相信，他们的一般性理论可以“应用”于历史上的各种革命情形，或者说也应该被进行单个案例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所采用。在某种意义上，詹森、格尔和蒂利等人的理论确实可应用于单个案例的研究：人们在任何和所有社会革命的情形中，都能够发现相对剥夺、多元主权、系统失衡和价值重构的意识形态运动。从原则上讲，历史学家和案例分析家在讨论一次既定的革命时，能够使用任何和所有的上述观点。事实上，由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理论是由这种一般性的概念术语来构设的，很难说这些概念不能应用于某一给定的案例。例如，哪个社会才不存在某种广泛分布的相对剥夺呢？当我们观察某一社会时，如何才能知道社会系统失调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理论途径本来是想避免太过于侧重历史的革命研究途径的缺陷，但是，最终却几乎没有为案例分析者们想要考虑的各种因素提供更多的线索，因此，也就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支持某一解释而排除其他解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则不那么具有概括性，与新近的社会科学理论相比，他们提出的是更有历史基础的范畴，而且对这类社会革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暴力）转型的解释也更为精细和彻底。因此，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常常被历史学家们一贯和有效地用来阐明各种特殊的革命。⁸⁴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学的相互作用却并不完善，因为历史案例并没有被用来检验和修正这种理论所做出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家们主要致力于强调，在革命过程中肯定会发生的阶级关系中的阶级冲突和变迁。但是，他们没有设计出一些方法，来检验这些因素是否能够用来区分革命和其他转型，或者是否能够用来区分成功的革命和流产的革命。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所考虑的因素是革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关节点：比起单纯与阶级关系和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的变量而言，与旧制度国家的力量和结构、以及与国家组织和阶级结构相关的因果变量，更能区分成功的革命、失败的革命和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与此类似，在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学者们对革命结果所做的解释中，他们强调的是阶级结构的变迁和更长时段内的经济发

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忽视了军队、行政等在国家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方面、以及国家与社会阶级的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往往是更明显、更直接的转变。这就意味着，他们也没能识别出将革命与非革命性国家发展模式区别开来的政治制度变迁。

正是由于在理论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某种裂口(gap),使得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新近的学院派社会科学理论家们,在解释革命时都遇到了麻烦。尤其是历史学家们,常常会注意到这种缺口的存在。其中有些人抱怨说,新近的社会科学革命存在着模糊之处。⁸⁵另外一些善于辩论的人则断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或解释不适用于他们要分析的案例。⁸⁶不幸的是,梦想破灭的历史学家们有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学科应该避开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⁸⁷他们提倡的替代途径是,对革命案例进行逐一分析,用每一案例自身的分析术语来进行研究,或者根据当时当地的行动者的自己的语言来进行研究。在实践中,这种相对主义的方法是很难奏效的,因为历史必须,至少也要隐含地依赖于理论观点和比较的参考点。⁸⁸但是,一方面是历史学家与区域研究专家,另一方面是社会理论家,二者之间常常就存在着沟通上的裂口。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一裂口的存在,就像有裂口存在的其他场合一样,只会自然而然地鼓励纯粹的一般性革命理论的增多,但是这些一般性的革命理论却不能有效解释历史上的革命;也会增加一些专家对特定案例的观点,但是这些具体的观点又没有自觉地接受更具有一般性的分析和解释原则的指导。然而,弥补这一裂口的方式,却并不是居高临下地指责这一缺陷。勿宁说,唯一有效的矫正途径就是,实际建立起来的革命解释能够阐明真正的一般性因果模式,既不忽视、也不完全脱离每一场革命及其背景的各个方面。

幸运的是,有一种方法能够在建立这种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实现这一目的,在涵盖各种案例的同时,也具有历史的敏感性。诸如社会革命一类的事件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并不只是以大量案例为基础的范畴才能形成解释性假设。理论家为获得满意解释,也不只有将一般性概念应用于特定案例这一条途径。为了对社会革命做出概括,为了建立起因果关系的解释,人们可以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在各国历史轨迹中选取一些片段来作为比较的单位。“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可以一般地用

来泛指任何或所有与此有关的研究：即其中有两个或更多的民族国家、制度综合体或文明的历史轨迹并行发展。在这种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比较历史可以泛指各种不同目的的研究。有些比较历史研究，如查尔斯（Charles）、刘易斯（Louise）和理查德·蒂利（Richard Tilly）的《反叛的世纪：1830—1930年》，就旨在表明，某种一般性社会学模式可以适用于不同国家的背景。⁸⁹其他的一些研究，如莱因哈德·班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国家建设与公民身份》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就基本上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在一个综合的整体之中对国家和文明进行对比。⁹⁰但是，还有第三种比较历史的方法——我在这里将其称之为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压倒一切的目的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

在社会科学中，比较历史分析有着悠久而独特的系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的《逻辑体系》一书中曾对比较历史的逻辑进行过清晰的展示。⁹¹这种方法也曾经被经典的社会历史分析家如亚历克谢·德·托克维尔和马克·布洛克采用而产生过强有力的解释效果。⁹²它也被当代的学者所阐述和应用，其中就包括（或许还是最有名的）巴林顿·摩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⁹³比较历史分析尤其适合用来建立对本身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与此不同的是，数量更为充分、且能够加以操作的现象，就适合采用实验调查的方法；数量非常庞大的现象，则适合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变量太多且案例不充分的现象。

从逻辑上讲，比较历史分析是如何展开的呢？通常的做法是，人们会尽量在潜在的原因与要加以解释的既定现象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在这里可以使用两种主要的方法。第一种是：人们会确定对具有共同现象的几个案例进行解释，这些案例也具有相同的一系列原因，尽管它们在其他似乎有因果关联的方面各不相同。这种方法就是密尔所说的“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第二种是：人们可以对比一组案例，其中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和假定的原因曾出现在正面的案例中，但是这种现象和原因都没有出现在反面的案例中。除此之外则反面案例与正面案例之间非

常类似。密尔将这种方法称之为“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单独地看,求异法比求同法更能建立有效的因果联系(假定人们能够发现需要对比的反面案例。)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尽可能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期许地将这两种比较的逻辑结合起来。其做法是,在使用几个正面案例的同时,也用合适的反例来加以对比。

本书就将采用这种方法。法国、俄国和中国将作为三个成功社会革命的正例,而且我将要提出,在这些案例中显示了类似的因果模式,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差异。此外,我将援引几个反例,以确认因果主张的各个特殊部分。在这样做的时候,除了要加以对比的因果关系之外,我还将始终在每一个明显相关的方面,尽量寻找正例与反例的类似之处并进行对比。例如,1905年流产的俄罗斯革命将要与成功的1917年革命进行对比,以确认关于与战争相关的进程导致国家镇压能力的崩溃,从而对俄国社会革命成功所产生的关键作用。而且,我还要选取英国、日本和德历史的某些方面,将其运用于不同的场合,以确证有关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性政治危机和农民反叛的原因。这些案例非常适合用来作为反例,因为这些国家在与法国、俄国和中国类似的时间和环境中,经历的是非社会革命性的政治危机和转型,因而是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国家。

粗略看来,比较历史分析似乎与“自然史学家”莱福德·爱德华兹、克雷恩·布林顿和乔治·佩蒂的方法没有多大差异。他们也深入分析和比较了一些历史案例。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在目标还是分析方法上,比较历史方法的革命研究与自然史方法的革命研究都存在着差异。比较历史分析的目标是确定革命的原因,而自然史学家们的目标则是寻求揭示在革命进程中会典型表现出来的特有周期和阶段顺序。正如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莱福德·爱德华兹的《革命的自然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

每一种能够用概念术语加以描述的社会变迁都会有……自身的特有周期。这就是这项研究所依赖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一种大致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这种对周期的描述似乎是分析各地的社会变迁的第一步。⁹⁴

就方法论而言,自然史学家们在分析革命时,试图让各种案例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爱德华兹)的一些完整案例(如布林顿)符合某种比喻,这些

比喻似乎最能描述他们的共同发展阶段，从而就可以推定革命的“自然”顺序。例如，布林顿明确地采用了一套在爱德华兹那里还是含蓄使用的疾病的比喻：

我们将视革命为某种热病……在革命爆发之前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社会中……会出现骚乱的迹象……它们是……医学上的前驱症状的信号，对敏锐的诊断医生来说，这就是疾病来临的迹象，但是还不会充分发展为疾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症状自己会充分显露，此时我们可以说革命的热病已经开始了。这种症状逐步发展，没有规律，时进时退地发展为一场危机，常常还伴随着种种伤害，即最具有暴力倾向的革命家们的恐怖统治。在危机进入缓慢的康复期后，常常还会以一两次旧病复发为标志。最后，热病结束了，病人自己恢复了健康，或许还会因为这一经历而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强壮，至少暂时会对类似的攻击具有免疫力，但是不可能完全焕然一新……⁹⁵

确实，自然史学家们也至少是隐含地提出了一些关于革命原因的理论假设。这些假设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假设——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努力去通过历史案例的比较来证明这些假设。相反，这些理论假设只是被当作一个整体而简单地用于分析之中，历史材料基本上是被用来阐明阶段顺序的比喻。这种自然史分析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毫无价值——事实上，他们为革命进程提供了不少的洞察，在今天都仍然有阅读价值——但是，这些分析非常不同于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要在正面案例中进行比较，并且要在正例与反例之间进行比较，以识别和确证原因，而不是对革命进行描述。此外，比较历史分析并不以任何方式假定或试图提出，各种革命案例的进程中，都在具体轨迹上存在着可描述类似轨迹。因为，即使在革命期间发生冲突的性质和时间不同，例如，即使某一案例在保守性的反动中达到顶点，另一案例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出现或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分析上类似的系列原因也可能在每一案例中发生作用。在一项比较历史分析中，这种差异并不构成在各种革命案例中识别类似原因的障碍。与此同时，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变化，也可以通过对正面的历史案例的比较而得到解释。

当然,比较历史分析并不是没有它的困难和局限,有几个尤其相关的方面,需要在这里进行简短的讨论。首先,根据既定的逻辑应用这一方法时必然会遇到困难。人们常常不能恰当地找到符合某种比较逻辑的历史案例。即使找到了一些大致符合的案例,也不能熟练地控制潜在的相关变量。因此,对于实际可能起作用的原因——也就是说,哪一个因素在实际上影响或没有影响研究对象——就不得不做一些策略性的猜测。其结果是,总有一些历史案例的背景性特征没有得到检验,而这些背景性特征又与要考察的原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比较历史分析有可能或者没有将它们揭示出来,或者是必须要简单地假定它不具有相关性。⁹⁶

另一组问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比较历史分析必须要假定(就像任何多变量逻辑一样),比较的基本单位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一假定以前还充分有效的话,对于革命这样的宏观现象则几乎不可能充分有效。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些现象发生在独特的、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发生变化的世界历史背景之中,它们发生在一个社会之间紧密联系的国际结构之中。对大多数既定的比较历史分析而言,关于独立单位的想象常常可以得到维系。例如,为了探测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原因,我将把旧制度下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基本上看成是类似而且互不相干的农业国家。但是,在大多数宏观分析中,人们迟早必须要认识到世界背景和时间的独特影响以及各个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将会分析独特的世界历史背景对18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而且,我还将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革命实际上通过共产国际传播了共产党的模式和政策。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比较历史分析绝不能替代理论。事实上,只有结合不可缺少的理论性概念和假设,比较历史分析才能具体加以应用。因为单靠比较历史分析自身,就不能界定要加以研究的现象。它不能选择合适的分析单位,或者说决定应该研究哪些历史案例。它也不能提供要加以探测的因果假设。所有这些都必须要来自于宏观社会学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必须要由当代的理论争论来激活,而且,还必须要对一系列历史案例的证据模式保持敏感性。

比较历史分析为理论思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检验或支撑。它鼓励人们去阐明在宏大理论视角(*gr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下提出的因果性观点,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结合多种观点,以维持对基本目标的信心——即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而实际阐明的因果定律。无论理论上的灵感来自何处,只有当比较历史分析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一目标时,它才算取得了成功。如果比较历史分析能够被成功地应用,它就可以作为一种调节理论与历史的理想策略。如果比较历史分析不被机械地加以应用,它就既能促进理论的扩展和重构,又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观察具体的历史案例。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本章的前几部分构造了一种参照性的理论框架,并引入了一种分析方法,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从原则上应用于对许多可能出现的社会革命的研究。当然,本书并不是对社会革命的所有可能的历史案例进行深度研究。也不是从所有可能案例之中抽出“随机”样本进行分析。事实上,当比较历史分析被用于研究具有某种共同的基本特征的几个案例时,它最为有效。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仔细地挑选案例,清楚地确定将这几个案例归结为一类的标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成功社会革命转型的案例。因此,在这一点上,还需要一点篇幅来阐明选择这些案例的理由。

之所以要选择这几场社会革命来进行分析而没有选择其他的社会革命,是因为有一些重要的实际理由。一方面,所有这三场社会革命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之中:其国家和阶级结构并不是在革命之前才创设出来的,也没有在殖民统治下发生过根本的改变。这一考虑排除了不少复杂之处。而在对后殖民时代和新殖民背景下的革命进行分析时,这些复杂之处都需要系统地包括进去。而且,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爆发之后——都经过了或多或少是延续很长的阶级与政治斗争——并在革命性国家权力

的巩固中达到顶点,其过去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久,使得能够对所有这三场整体性革命转型进行研究和比较。换句话说,有可能对革命的进程——即从旧制度的崩溃到结构独特的新制度的出现——进行追踪。对比较历史分析而言,黑格尔的格言确实值得坚持:密那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

然而,还需要以更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但要选择对法国、俄国和中国进行逐一集中研究,而且要将这三个国家所有作为社会革命的相似案例而归为一类。因为,根据大多数现存的为了做比较研究而对革命进行界定和归类的方式中,法国、俄国和中国都不属于同一类,因此三者也就不能放在一起。⁹⁷法国革命是20世纪之前在欧洲爆发的革命,它被典型地理解为是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资本家的革命或自由——民主的革命。根据人们的归类框架,俄国革命要么是一场反对绝对主义的革命,要么是一场国家主义者——发展型革命,或者是一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革命。有些分析家或许愿意将其与法国革命一道,归为不同于中国革命的类型,但是没有人会同意见,既可以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归为一类,也可以将其与中国革命归为一类。⁹⁸对中国革命来说,尤其是不能与法国革命归为一类,这可以说是因为法国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或“自由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则二者都不是;或者是因为中国应该被归为是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式革命,但是无论如何归类,都不能将其与欧洲的革命归为一类。

但是,本书的前提是,无论是在旧制度方面,还是在革命的进程和结果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显示出了重要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足够充分,能够保证将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种模式来对待,并要求为它们提出一种具有一致性的因果解释。所有三场革命都发生在富裕而又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农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曾被殖民者征服。它们的旧制度都是原生型官僚独裁制(proto-bureaucratic autocracies),而且都突然面临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军事竞争对手。在所有这三场革命中,外部力量引发的危机与结构性条件与趋势相互强化,造成了一种危机的接合点(conjuncture):(1)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丧失了能力;(2)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普遍反叛;以及(3)动员大众的革命领导人竭力巩固革

命性国家权力。在每一种情形中，革命的结果，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以及将大众结合为一体的民族国家，而且这个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大国的潜在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与革命前的地主上层阶级相关的民族社会变迁的障碍被清除，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特权，新制度下更为强大的集权国家和大众政治参与，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潜力。

不管其他的范畴体系会如何假定，法国与中国革命——是我比较的三个案例中的两“极”——之间的差异并不如它们之间作为对比的时空和文化背景所显示的那么大：法国革命与早期欧洲自由主义革命的相似性没有那么多，中国革命与第三世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革命的相似性也没有那么多。法国革命实际上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明显有别于17世纪的英国革命，而更类似于中国和俄国革命。农民的反叛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革命的政治后果是一个更为集权、更为官僚化，而不是一套自由主义的议会制政体。至于中国革命，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20世纪中期新国家建立的革命，从它自己的历史时期来看似乎是太短视了。中国曾经拥有一套帝国性旧制度，其文化与政治史可追溯到几百年以前。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革命，最初始于1911年上层阶级反对专制君主制国家，而不像法国那样始于贵族的反叛。⁹⁹此外，中国革命最终导致了一个发展导向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政权更类似于革命后的苏联政权而不是当代的第三世界的非共产主义政府。

事实上，为了进行比较历史分析，可以根据这些充分的相似之处，将这三场革命归为一类，而且，这种比较肯定会获得更大的收获。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类似的社会政治特征，能够扩充一些方法来加以强调和解释，而这些方法，则正是那些决定将这三场革命分别归入不同范畴的分析家们所忽视的。首先，从这三场并行的革命中，可以了解到不少农民参与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还可以了解到不少国家的行政和强制组织在旧制度下崩溃和新制度下重建的动力。在不少其他的比较历史分析中，革命的这些方面要么被低估，要么则被抛在一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大多数的替代性范畴框架强调的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构造，或者是正当性政治权威模式和新旧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设想。

但是，我们将不仅强调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共同性。由于比较历

史方法的灵活性及其对历史的敏感性,我们还可以把注意力投向每一场革命所独有的特征。无须否认的是,法国革命带有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俄国革命的结果带有极强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即使在我们主要考察和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模式的共同性之时,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其中的两个案例或单个案例的差异和特征。对于这些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是共同因果关系中的变形,部分地归结为三国社会结构的差异,部分地归因于世界历史的时间和三场革命先后顺序的差异。其结果是,革命的这些独有特征及其世界历史背景,以前曾促使其他学者把这三场革命分别归入不同的范畴,但是;在这种以其共同模式为背景的研究中,将得到新的解释。

本书的安排

本书的以下各章将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进行比较历史分析——在第一章中所建立起的参照性框架下构思和实施分析的展开。第一部分要讨论在旧制度法国、俄国和中国所出现的客观革命形势的结构和历史条件;第二章集中分析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第三章要分析农民的状况。为了有助于确证主要的观点,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将用专节简要表明被认为是在法国、俄国和中国产生社会革命形势的关键条件,在日本、普鲁士/德国和英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完全存在的。因此,第一部分的比较逻辑基本上是强调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相似方面。这一点主要通过反例的对比来加以突出。

在第二部分中,一方面,比较的逻辑要完全集中关注社会革命正面案例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因为在第二部分中,法国、俄国和中国在革命起因上被认为是具有当然的类似性。因此,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背景为基础而解释革命的后果。这一部分将要表明,革命性危机所释放出的冲突是如何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后果,这三场革命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的模式,又在哪些方面各有特点。在第二部分中,第四章将提出要加以考察的每一场革命的分析思路;第五、六、七章分别探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性冲突和后果。

注 释

1.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xxxv. 另外,前面关于中国与俄国的一句论述也引自舒曼的解释。

2. Elbaki Hermassi,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volu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2(April 1976): 214.

3. 不断震荡着中世纪欧洲和帝制中国的农民起义就是极好的例子。中国的起义偶尔也能推翻王朝统治,甚至取而代之,但是并不会带来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进一步的讨论和参考文献,参见第三章。

4. 按照我的理解,英国革命(1640—1650年以及1688—1689年的革命算在一起)是政治革命的极好例证。这一革命的主要成就是,通过居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反抗试图成为绝对君主的国王,建立起了议会制政府。我将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中讨论这一案例。另一个极好的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的例子,是我将在第二章讨论的日本明治维新。

5. 试图通过分析性简化来解释革命的例子,可参见本章注释18和20与引用的各种著作。下面将较多地谈到两位重要理论家的观点。他们是托德·格尔和查尔斯·蒂利。他们都把革命归入了更为宽泛的分析类型,尽管这些类型中存在着对立的状况。

6. 将结构转型视为附带现象的学者有三例,他们是:Arthur L. Stinchcombe, *Stratification amo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in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ed. James G. M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pp. 169—180;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chap. 7; and D. E. H. Russell, *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Armed For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chap. 4. 那些试图将结构转型视为附带现象的学者,常常认为这样做无伤大雅,因为只要在考察了所有暴动的原因之后,无论这种暴动是否引发了实际的变迁,那么就可以接着追问,导致暴动走向成功变迁的附带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如果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就必须假定,成功的社会革命性转变不存在独特的、长期的和结构性的原因或前提条件。人们也就必须要假定,社会革命也只不过是政治革命或群众造反拥有某种附带的和短期的成分,如军事成就或意识形态领袖决心在掌权之后实施变迁。本书的全部观点都建基于相反的假设——社会革命有着长时段的原因,它们产生于旧制度的结构性矛盾的外化,并且潜在地继承了旧制度遗产。

7. 我在这里可以毫无保留地列举出社会科学革命理论的所有文献。有两本著作对有关文献作了统计。它们是A. S. Coha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alsted Press, 1975) and Mark N. Hagopian, *The Phenomenon of Revolution* (New York: Dodd, Mead, 1974). 有关重要的评述可参见: Isaac Kramnick, *Reflection on Revolution: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in*

Recent Scholarship, *History and Theory* 11;1(1972): 26—63; Michael Freeman, Review Article: Theories of Revolu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July 1972): 339—359; Barbara Salert,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ries: Four Theories* (New York: Elsevier, 1976); Lawrence Stone, Theory of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18;2 (January 1966): 159—176; Perez Zagor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8: 1 (March 1973): 23—52; and Theda Skocpol, *Explaining Revolutions: In Quest of a Social-Structural Approach*, in *The Uses of Controversy in Sociology*, eds. Lewis A. Coser and Otto N. Larse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pp. 155—175.

8.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Eric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per & Row, 1969); and John Dunn, *Modern Revolu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9. Nikola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trans. from the 3rd Russian ed. 1921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esp. chap. 7.

10. 参见: Robert C. Tucker, ed., *The Lenin Anthology* (New York: Norton, 1975), esp. pts. 1—3; and Stuart R. Schram,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9), esp. pts. 2—6。对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的基础做过很好阐释的著作是 Coha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chap. 5。

11. 尤其参见: George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1);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and Louis Althusser, *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 pp. 87—128 in *For Marx*, ed. Althusser,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历史发展的统计, 参见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12. Karl Marx,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vol. 3,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ed. Frederick Engels, p. 791.

13. 引自 Marx's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eprinted in Lewis S. Feuer,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pp. 43—44。

14. 引自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printed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p. 40。

15. 同上, 第 37 页。

16. 同上, 第 26 页。

17. 同上,第 42—43、45 页。

18. 这些理论家相信革命起源于人们的情绪活动,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各种心理学的动机理论。有些人将他们的观点建基于认知理论,例如:James Geschwender,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Social Forces* 42: 2 (1968): 127—135; Harry Eckstein, *On the Etiology of Internal wars*, *History and Theory* 4:2(1965): 133—63; and David C. Schwartz, *A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Behavior*, in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James C. Davies,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p. 109—132。然而,最为盛行且充分发展的各种聚合心理学理论则建基于暴力行为的受挫-攻击理论。在这方面的重要理论家和著作包括:James C. 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ising and Declining Satisfaction as the Cause of Some Great Revolutions and a Contained Rebellion*,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s.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Robert Gurr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9) pp. 671—709; Ivo K. and Rosalind L. Feierabend, *Systemic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Aggression: An Application of 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 in *Anger, Violence and Politics*, eds. Ivo K. and Rosalind L. Feierabend and Ted Robert Gur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2) pp. 136—183; and with Betty A. Nesvold,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ross-National Patterns*,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s. Davis and Gurr, pp. 60—68; and Ted Robert Gurr, *A Cause Model of Civil Str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December 1968): 1104—1124;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ivil Violence*, *World Politics* 20 (January 1968): 245—278。

19. 我归为这一类的理论家和著作包括(此外还有在注 32 中引用的 Chalmers Johnson): Talcott Parsons, *The Processes of Change of Social system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chap. 9; Anthony F. C. Wallac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 (April 1956): 264—81; Neil J.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and Edward A. Tiryakian, *A Model of Social Change and Its Lead Indicators*, in *The Study of Total Societies* ed. Samuel Z. Klausner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Books], 1967), pp. 69—97。

20. 政治-冲突理论家们的著作包括: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3), and *Rising Expectations and Political Turmoi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6:1 (October 1969): 5—22; William H. Overholt, *Revolu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Croton-on-Hudson, N. Y.: The Hudson Institute, 1972); D. E. H. Russell, *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Armed For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and Charles Tilly, *Does Modernization Bree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3 (April 1973): 425—447, and *Revolutions and Collective Vi-*

olence,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s.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pp. 483—556.

21.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 同上, pp. 3—4。

23. 同上, esp. pp. 334—347。

24.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25. Tilly, Does Modernization Breed Revolution? p. 436.

26. Tilly,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 7.

27. 同上, ch3.

28. 同上, chap. 7.

29. Tilly, Revolu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s. Greenstein and Polsby,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pp. 520—521.

30. Tilly,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 213.

31. 同上, p. 212.

32.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我在下面的概括中主要采用的是第一至第五章的内容。

33. 同上, p. 3.

34. 同上, p. 57.

35. 同上, p. 32.

36. Gurr, *Why Men Rebel*, pp. 12—13.

37. 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会区分两个概念。一方面是“自在的阶级”，由一些在生产过程中的财产关系上具有客观上类似处境人所构成，但是这些人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和组织。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自为的阶级”是指拥有自觉意识和组织的阶级。这一区分的著名例子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法国农民的讨论。这篇文章收录在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pp. 171—172。

38. 尤其参见: Tilly,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p. 202—209。

39. 例如，格尔断言，公共秩序只有在这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持——它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即在这种秩序下，一个社会内部能够给人们提供通过工作来实现自身抱负的手段 (*Why Men Rebel*, p. x.)。对詹森而言，一个维持稳定的社会就是一个“价值共享的共同体”。

40. 参见前注第 29。该注的内容来自于蒂利专著中的第 11 页。

41. 例如，参见，Herbert Adam, *Modernizing Racial Domination: South Africa's Political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也可参见，*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Armed Force*, chaps. 1—3。这两部著作都强

调具有内聚性和稳定性的南非政权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尽管到处充满了非白人多数群体的不满和抗议。

42. Jeremy Brecher, *Strike!* (San Francisco: Straight Arrow Books, 1972), p.240.

43. 引自于 Wendell Phillips 的观点(没有确切的参考书目),参见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73), p.336.

44. 蒂利避免把革命过程和结果看成是特定行动群体有意造成的,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避免从有目的运动的角度来陈述造成革命形势的原因。其原因是,蒂利将革命形势的出现,描述为各种被动员起来的群体联合行动的结果,并且暗示,在革命期间,这种联合常常会分裂,从而产生出一系列的群体内部的冲突,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够完全控制。这种关于革命进程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蒂利却将革命形势看成是有预谋地挑战现存政府统治权的联盟所造成。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带有过强的目的论色彩,而“接合”(conjuncture)观念——指由各种因素决定、而且并非有意识地相互合作(或有意识地革命)的过程和群体活动结合在一起——在解释社会革命的原因时,似乎比内部群体联合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我将在适当的地方,尤其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明确阐述我信服这种看法的理由。

45. Eric Hobsbawn,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 San Francisco, August 1975), p.10.

46. Gordon Woo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ed. Lawrence Kapl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129.

47. Reinhard Bendix,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1967), pp.292—313.

48. 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of Volume 1 of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p.8—9.

49. 例如,可参见 Neil J. Smelser, *Toward a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8) pp.125—146; W. W. Rosto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Marion J. Levy,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S. N. Eisenstadt,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6); and Bert F. Hoselitz,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eds. David E. Novack and Robert Lekachm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4), pp.150—162.

50. 那些只关注一国内部经济发展的理论,受到了两种观点的有效批评。其中的一种批评的典型代表是 Alexander Gerschenkron, 他与此最为相关的论文收集于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

versity Press, 1966)和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另一种批评的观点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家,能够很好地概括他们观点的著作包括: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4 (September 1974): 387—415; and Danniell Chirot, *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世界体系理论家尤为有效地指出了现代化途径的缺陷,但是他们自己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也在随后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下面这篇著作:Robert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25—92。

51. 有关欧洲国家体系的这些观点来自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chap. 1。

52. Walter S. 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p. 1。

53. 对欧洲发展过程中国家竞争的重要性做出过很好的综合性强调的观点可见诸一篇未刊的博士论文:John Thurber Moffet, *Bureaucratiz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Regimentation of the Western Social Order*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1971)。

54. 参见 Wallerstein, *Rise and Demise*; and *Modern World-System*, 尤其是第三章和第七章。对沃勒斯坦的国家观所做的更为详细的归纳和批评,可参见我的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85 (March 1977): 1075—1090。

55. 在形成我自己的有关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的观点的过程中,主要参考的文献包括: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and Otto Hintz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ed. Felix Gilbe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正如海因兹所指出的:“……既不是资本主义造就了现代国家,也不是现代国家造就了资本主义(p. 427)。”勿宁说:“国家事务和资本主义事务之间紧密地相互关联在一起,……他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历史发展的两个方面(p. 452)。”

56.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Tilly,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Otto Hintze,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in *Historical Essays*, ed. Gilbert, pp. 178—215; and Randall Collins, *Some Principles of Long-Term Social Change: The Territorial Power of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Illinois, September,

1977)。

57. 沙皇俄国和苏维埃俄国,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和帝国时代的德国,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都是印证这一观点的真实性的鲜明实例。

58. 这一分析视角获益于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Societi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6: 5 (October 1967): 25—28。

59. 关于“世界时间”的概念,可参见: Wolfram Eberhard, *Problem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State and Society: A Reader* eds. Reinhard Bendix, et 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25—28。

60. For Johnson, 参见 *Revolutionary Change*, p. 32. For Gurr, 可参见 note 39 above 也可参见 *Why Men Rebel*, Chap. 8。

61.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 52。

62. V. I.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he Lenin Anthology*,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1975), p. 316。

63. 事实上,蒂利在国家是否从根本上依赖于民众支持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他对革命斗争中的国家所做的界定,和有关军队的主张都在暗示他不这样认为;但是,他关于革命情势的概念则认为,当大众支持的革命竞争者反对现存国家权威的禁令时,革命形势就会出现,这实际上又在暗示他同意上述说法。

64. Tilly,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 52。

65.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基本观点,可参见: Frederick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reprinted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reprinted in Tucker, ed., *Lenin Anthology*; Ralph Miliband, *Marx and the State*, in Karl Marx, ed. Tom Bottomor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3) pp. 128—150; and Robert C. Tucker,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lassical Marxism,” in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Norton, 1970), chap. 3。

66. 关于这方面文献的综述,可参见 David A. Gold, Clarence Y. H. Lo, and Erik Olin Wrigh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Monthly Review* 27: 5 (October 1975): 29—43 and 27: 6 (November 1975): 36—51。

67. 尤其可参见: 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al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and Poulantzas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no. 82 (November-December 1973): 83—92。

68. 尤其可参见: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 Timothy O'Haga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ed. Robin Blackbur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p. 238—253; *The Capitalist State: 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New Left Review* no. 95 (January-February 1976): 65—83;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and *The Crisis of the Dictatorships*,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69. 参见: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70. 参见: Göran Therborn,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6(3) (Spring 1976): 3—16; and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71. 尤其可参见: Claus Off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German Political Studies* 1 (1974): 31—56; The Theory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cy Formation, in *Stress and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apitalism*, eds. Leon N. Lindberg, et al. (Lexington, Mass.: Health, 1975) pp. 125—144; and Claus Offe and Volker Ronge, “These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1975): 137—147。

72. 尤其可参见: Poulantzas, Problem of Capitalist State, in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ed. Blackburn; and Offe and Ronge, “These on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73. 视国家为具有潜在自主性的两位新马克思主义者是: Ellen Kay Trimberger in “State Power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Japanes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7 (Spring 1977): 85—98, and in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78); and Fred Block, in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volution* no. 33 (May-June 1977): 6—28。这深受这些著作及与 Trimberger 和 Block 的个别交谈的影响。

74. Off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Capitalist State*。

75. 在我看来,“阶级斗争还原论”似乎是一种揭示波朗查斯在下述著作中的观点的好办法: *Capitalist State: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and in *Crisis of Dictatorships*。美国的一些结构主义者也建立起了这种视角: Gösta Esping-Andersen, Roger Friedland, and Erik Olin Wright, Modes of Class Struggle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Kapitalistate* no. 4—5 (Summer 1976): 186—220。

76. Therborn, *Ruling Class*, p. 34。

77. 对我的国家观产生过最直接影响的经典和当代的著作包括: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3 Vols.,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Vol. 2, chap. 9 and Vol. 3, chaps. 10—13; Otto Hintze, essays in *Historical Essays*, ed., Felix Gilbert, chaps. 4—6, 11; Tilly, ed.,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Randall Collins, *Conflict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chap. 7; and Collin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Political Sociology, pp. 42—69 in Bendix, et. al., eds., *State and Society*; and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也可参见注释 73 的参考文献。

78. Hintze,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Gilbert, ed., *Historical Essays*, p. 183.

79. 参见: Katherine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and Russell, *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Armed Force*。

80. 主要的著作有: Lyford P. Edwards, *The Nature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27; reprint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orig. 1938; rev.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and George Sawyer Pettee,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8)。

81. Harry Eckstein, ed., *Internal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 8.

82. 同上, p. 10。

83. 例如, 卡尔梅斯·詹森对革命性变迁的界定, 就套了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外框。用社会系统理论自己的说法, 这一理论普遍适用于所有时空中的所有社会, 包含从部落社会的复兴运动到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宗教战争, 再到当代民族国家的社会革命在内的所有变迁。托德·格尔和查尔斯·蒂利之间尽管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但是他们都试图将革命定位于诸如“政治暴力”和“集体行动”这类一般性的理论之中。正是由于他们希望只对那些数量众多的事件进行理论化, 以使他们的模式能够接受量化检验, 所以格尔和蒂利都是从与其他许多政治事件有共同点的分析侧面来界定革命——即格尔的政治暴力和蒂利的有组织的行政行动与掌权者的更替——而没有关注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作为一种重要的结构性转型的独特性。

84. 诸如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总体上一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解释。对于非资产阶级革命, 分析的重心是放在阶级矛盾和冲突在革命发生和过程中的作用, 而对于后果则很少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

85. 例如, 可参见: Stone, *Theory of Revolution* and Zagorin,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参见注释 7 所作的充分引述)。

86. 例如, 可参见: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and J. H.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87. 这一观点的典型使用者是历史学家 Cobban 和 Hexter 等, 他们批评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解释应用到特定革命中的做法。

88. 对这一观点的阐述, 参见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89. Charles, Louise, and Richard Tilly,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90.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Wiley, 1964). 参见注释 69 所引用的安德森的著作。尽管本迪克斯的理论视角是韦伯式的, 安德森的视角是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他们都使用了类似的比较途径。

91. 参见 Ernest Nagel, ed., *John Stuart Mill's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Hafner, 1950), bk. . III, chap. 8.

92. 关于托克维尔对比较方法的使用, 参见 Neil J. Smelser, *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6), chap. 2. 关于 Marc Block, 参见 William H. Swell, Jr., Marc Block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6:2(1967): 208—18.

93. 关于当代学者对比较方法的讨论, 参见: Smelser, *Comparative Methods*;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4 (1971): 682—693; Hopkins and Wallerstein,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Societies*; and Morris Zelditch, Jr., *Intelligible Comparisons*, in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d. Ivan Valli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267—307.

94. Edwards, *Natural History*, p. xviii.

95. Brinton, *Anatomy of Revolution*, pp. 16—17.

96. 强调这一困难的著作是: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1976). Smelser, *Comparative Methods*, chaps. 6—7 *passim*, discusses ways to handle it.

97. 例如, 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学者, 从根本上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如法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至少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类似的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常常将革命明显地区分为反绝对主义的、自由民主革命和集体主义的、强化国家的革命。最后, 目前在研究者中越来越流行的一种做法是, 将所有的“欧洲革命”(从英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各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发生的民族解放革命分离出来。采用这种区分的著作有: Elbaki Hermassi in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volu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2 (April 1976): 211—235, and by Martin Malia, in “The Escalation of European Revolution: 1640, 1789, 191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odern European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Georgia, December, 1975), pp. 5—9. Hermassi 和 Malia 都将中国革命视为民族解放(边陲或第三世界)革命。

98. Malia 在《欧洲革命的扩展》中视俄国革命为与包括法国革命在内的其他所有欧洲革命相同的反绝对主义革命。Hermassi 在《走向革命的比较研究》中视俄国革命为一种“发展型”革命的典型, 既不同于法国式的“民主”革命, 也不同于中国式的“边陲”革命。摩尔在《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中, 视俄国革命和中国

革命为一种“农民/共产主义革命”，与之相对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国革命。摩尔的分类或许最具有典型性，尽管其他学者可能还会贴上其他标签。

99. 学者们常常假定，中国有两场革命，一场革命发生在 1911 年，另一场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然而，我相信，一种更为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将中国革命看作是一个过程，其跨度从 1911 年旧制度的崩溃（以及当时任何新的全国性政权巩固自身的企图归于失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种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运动的出现和相互竞争，直到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而胜利的取得又部分是由下述事实决定的，即国民党从未成功地统一和控制中国。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权力》（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的第五章中所区分的始于旧制度崩溃的“西方式”革命和源自挑战虚弱的第三世界政府的一场运动而兴起的“东方式”革命，那么，我就会提出，中国革命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西方式”革命的类型。亨廷顿的分析性区分是有用的，但是他将案例放错了地方，而且他的标签也需要加以更改。

第一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对一场革命的爆发而言,仅有“下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去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上层阶级不能够”照旧生活下去。

——列宁

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明显地源出于政治危机之中,而这些政治危机又位于旧制度国家的结构和形势的中心。1787年至1789年在法国、1917年的上半年和1911—1916年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不但破坏了专制君主的基础,而且还瓦解了由中央协调的、施加于具有潜在反叛性的下层阶级之上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当旧制度国家不能有效应对国际形势所带来的挑战时,革命性危机便进一步发展。君主政权经受着经济上更发达的外来权力的新威胁或更激烈的竞争。而且,由于专制性国家组织与地主上层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性关系,他们在做出反应之时会受到限制或制约。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

为了解理解引发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政治危机的性质和原因,我们需要先了解旧制度的结构,以及它们在革命爆发前所陷入的冲突。我们可以首先从这一事实开始,即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都是由专制君主维持统一的国家,专制君主的任务主要集中于维持国内秩序并与外敌竞争。在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旧制度下,都有相当完备的帝制国家(imperial

state)——也即,高度分化并由中央协调的行政和军事等级体系,在专制君主的庇护下履行职能。¹这些帝制国家都是原生型官僚制(proto-bureaucratic):有些职位,尤其是高级职位实现了功能专门化;有些职位或官员职责的某些方面受制于明晰的规则和等级监督;在每个政权中,从私人财产和私人事务中分离出来的国家职位和职责部分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制度化了。然而,这三个帝制国家都没有充分官僚制化。²与此相应的是,也没有一个国家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并在社会中享有充分的权力。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旧制度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帝制国家都不能直接控制、更谈不上重组地方农业社会经济关系。他们在职能的变化和扩展上受到了限制,也就是说,它是被用来:发动对外战争;在国内监督社会以维持表面上的普遍秩序;通过征兵和对土地、人口和贸易征税而抽取社会经济资源(但是不能对一切都征税,因为对个人收入的评估相当困难)。

法国波旁王朝、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清王朝的帝制国家矗立于占主导地位农业经济之上。在这种农业经济中,土地和农产品的(非国家)所有权分属于数量众多的农民家庭和上层地主阶级。在每一种旧制度下,最为重要的支配阶级(即占有剩余产品的阶级)基本上都是地主上层阶级。即使这个阶级有可能因为与商业财富联系紧密而焕发青春,基本的格局仍然不会改变。市场关系在这三个革命前的社会中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³已经有了一些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以及控制着商业和工业的阶级。然而,大多数贸易都是以地方或地区为中心(而不是全国性的),农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要大于商业或工业,产品的资本主义关系既没有在农业事务中居主导地位,也没有在非农业事务中居主导地位。上层商业和工业阶级与原有地主上层阶级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或者与帝制国家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在所有这三种旧制度下,商业——工业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在政治方面基本上并不存在相对紧张的关系。相反,这种基本的紧张关系存在于生产者阶级与支配阶级和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地主支配阶级与专制性帝制国家之间。

就像在所有农业国家中一样,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潜在反叛是旧制度法国、俄国和中国的一种地方性疾病。在这里只需注意到这种在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基本的紧张状况,因为我们还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这

一点。在这里，我们需要集中关注帝制国家与上层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从这种关系中可能产生出的冲突。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在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帝制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在控制和剥削农民方面完全是伙伴关系。无论历史上的具体情况如何（尤其是绝对主义之前的法国），在革命前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组织的绝对地位，并没有受到地主上层阶级的挑战。支配阶级在地方层面上完全不能抵抗农民的反叛；他们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来支持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特权。更有甚者，支配阶级也开始习惯于利用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来谋取私人财富。而且事实上，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俄国和中国，这种通过国家职位间接占有剩余财富的现象非常明显。

但是，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制国家与地主阶级在剥削方面还是一种伙伴关系，那么在控制农民的人力和从农业——商业经济中榨取剩余财富方面，它们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君主感兴趣的是从社会中榨取更多的资源，并将它们有效地用于军事强化和由国家发起、由中央控制的经济发展。因此，地主上层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成了君主要克服的部分障碍；因为地主阶级主要感兴趣的事情，要么是阻止国家更多的榨取资源，要么就是利用职务之便来吮吸国库，而这些做法都会巩固国内社会经济现状。⁴

在旧制度之下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君主与地主上层阶级之间的这种客观上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是否会以某种形式产生出实际上的政治冲突，则取决于各个专制——帝制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制度形式。没有一个国家是任何意义上的议会制政体，因而也没有为支配阶级的代表在国家的政策制定活动提供一种常规性角色。这些国家同时也是没有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国家。支配阶级的成员享有各种特权去获得和利用国家的官职。仅有这一条途径还不足以确保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帝制国家的活动。但是，由于在既定的帝制国家结构的高层，支配阶级的成员获得了一种形成自觉的集体组织的能力，因此它们有可能能够阻碍君主损害它们经济利益的活动。这种阻碍最终有可能发展为对专制政治权威的有意挑战——与此同时，也可能产生出独特的意外后果，破坏帝制国家自身在行政和军事上的统一。

毫无疑问，我们通常可以预期，帝制国家的君主从来不会试图追求与

地位如此重要的支配阶级的经济利益相悖的政策。但是事实是，在通向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上，君主却面临着超乎常规的两难困境。正如我在本章一开始所简要表明的，导致旧制度垮台的矛盾，并不仅仅源于国内条件。在革命前的时期内，每一种旧政权——波旁王朝的法国、罗曼诺夫的俄国和清王朝的中国——都发现自己与外来的民族国家之间，处于紧张的军事竞争之中，这些民族国家都拥有建立在通向资本主义工业或农业和商业的经济成就之上、因而相对强大和更有灵活性的权力。能否成功应对这种外国的军事竞争，取决于君主迅速从社会中动员超常资源的能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迅速进行结构性改造的改革能力。

农业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历史性的赶超，从而能够捍卫它们的独立并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并不是不可能。普鲁士和日本——将作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两个反例，在本章的结尾部分进行讨论——在 19 世纪动员起来有效地应对了外国的竞争，从而避免了社会革命转型。在普鲁士和日本，国家的精英在应对外部危机时，既没有受到落后的农业经济的阻碍，也没有受到能够在利益和能力上约束国家行动、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上层阶级的阻碍。相反，在传统正当性的名义下，官僚机构的官员能够推行一系列设计出来的改革和政策，从而通过动员和配置而增加了资源。

但是，在 18 世纪晚期的法国、19 世纪初期的俄国和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事实证明旧制度的君主无法推行有效的基础性改革，无法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应对和经受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尤为紧张的外国军事威胁。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正好是由于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清王朝没能成功地应对外国压力。一方面是君主与大臣们的制度性关系，另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与地主上层阶级的关系，使得帝制国家不可能成功应对国外的竞争和入侵。其结果是，旧制度要么是受与更发达的权力之间总体战争的影响而走向瓦解（如俄罗斯），要么是在国内因政治权势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反对君主试图动员资源或强制改革而解体（如法国与中国）。无论是以哪一种方式，其结局都是，在此以前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唯一整体防护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走向了分崩离析。由于再也得不到由专制君主的威望和强制性权力的巩固，原有的阶级关系在下

层的攻击面前脆弱不堪。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当“支配阶级不能照旧维持其统治时”,社会革命性政治危机就出现了。此时就会出现一场“支配阶级的政策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了一个爆发的裂口”。⁵

为了更确切地展现最终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各种相互交叉的力量,我们就必须要详察每一案例中的细节,并将各个案例进行比较。我将在本章的余下部分中进行这一工作,讨论每一旧制度下国家、经济和支配阶级的特征。我还要考察历史上的具体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性的动力与旧制度下的社会政治结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了革命性危机。在本章的最后,我还要通过对普鲁士和日本——这是两个另外的类似国家,它们同样经受着更为发达的外国的冲击,但却没有经历社会革命——所发生的政治危机的原因和后果所做的简要讨论,提出有关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更为具体和可信的观点。但是,主要部分还是要讨论那些实际上产生了社会革命的旧制度。首先是波旁王朝下的法国,然后会转向更晚的清王朝中国(这种顺序安排既是出于分析上的方便,同时也符合年代顺序,因为中国的旧制度终结于1911年)。在中国之后,我们将转而讨论罗曼诺夫沙皇治下的俄国,考察的时段则覆盖从其19世纪中期的建立到1917年重大革命事件的爆发。

第一节 旧制度法国:波旁绝对主义的矛盾

长期以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主要是基于两种基调所做的选择或综合: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出现及其对专横的传统权威的批判。⁶因此,大革命的原因也就被归结为是法国社会和文化演进的内在因素。确实,国际背景也并没有被忽视。但是它常常只是被用来说明:商业的增长和启蒙观念的传播,尽管是整个欧洲和大西洋范围内的现象,但是在革命前的法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尤其是相对于当时其他的非自由主义的君主国而言。⁷

然而,在过去的大量研究中,很少有著作强调欧洲国家之间普遍的军事竞争,也很少有著作在这一视角下,集中关注旧制度法国的矛盾处境。⁸

在动态性的国际背景日益被商业化的英国支配的情况下，法国却——尽管强有力的经济扩张持续了半个世纪——从几乎支配欧洲的地位沦落到军事失败和王室破产的屈辱境地。对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进行解释，就能理解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具体政治危机。而且，在这里提出的因果模式，也将被证明可以用来与造成其他大革命的因果模式进行比较。

国家

在分析旧制度法国时，我们首先要在历史上定位统一帝制国家的行政机器的巩固。虽然皇室梦想成为绝对君主并长期为此而努力，但是一直到路易十四（1643—1715年）统治时期，绝对君主才在法国成为支配性的事实。⁹1648—1653年的福隆德运动*是部分领主贵族最后一次拿起武器反对集权化的王室。它同时也构成了“大革命之前颁布限制绝对主义王权的宪章最后一次努力，这次运动的失败确保了绝对主义原则的胜利……”¹⁰法国从此就被置于王室行政机器的统治之下。三十几位可随时撤换的监督官(intendant)在各省代表国王的权威。以前曾掌握全权的世袭贵族省长被降为边缘角色，监督官们负责直接的征税、王室司法、经济管制和国内秩序的维持。乡镇事务也被置于监督官的监督之下，城市的主要职位也一再被王室占有，以勒索钱财。¹¹旧贵族中的显要人物则被送到新建的凡尔赛宫去充当近臣。这个新宫是成功的绝对主义的最高象征，其壮观程度无与伦比，同时又冗员充斥，阴谋四伏。

绝对主义虽然在路易十四时期取得了成功，但是，旧制度法国的国家结构仍然出奇地错综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叠床架屋。尽管绝对君主的行政权威至高无上，但是其独特的结构——御前会议和监督官——实际上并没有替代权力分散的中世纪制度，如诸侯领地和法庭、城市自治机构、位于外省而被称作是“省区”(pays d'état)的省三级会议(代表大会)。绝对君主的权力结构也没有完全取代早期君主的行政安排，如高等法院(后

* Fronde 原为一种儿童游戏的投石器，曾经被当局明令禁止；福隆德运动即为了破坏秩序和反对当局的运动，始于高等法院联合地方法院要求国王撤回派往地方的监督官。——译者注。

面将详细讨论这一司法自治机构), 先前的重要职务和权限, 以及将王室行政机构的职务出售给富人所有并可自行出售和遗赠的实践(称之为捐官制, venality of office)。尽管路易十四建立了丰功伟绩, 但是他仍然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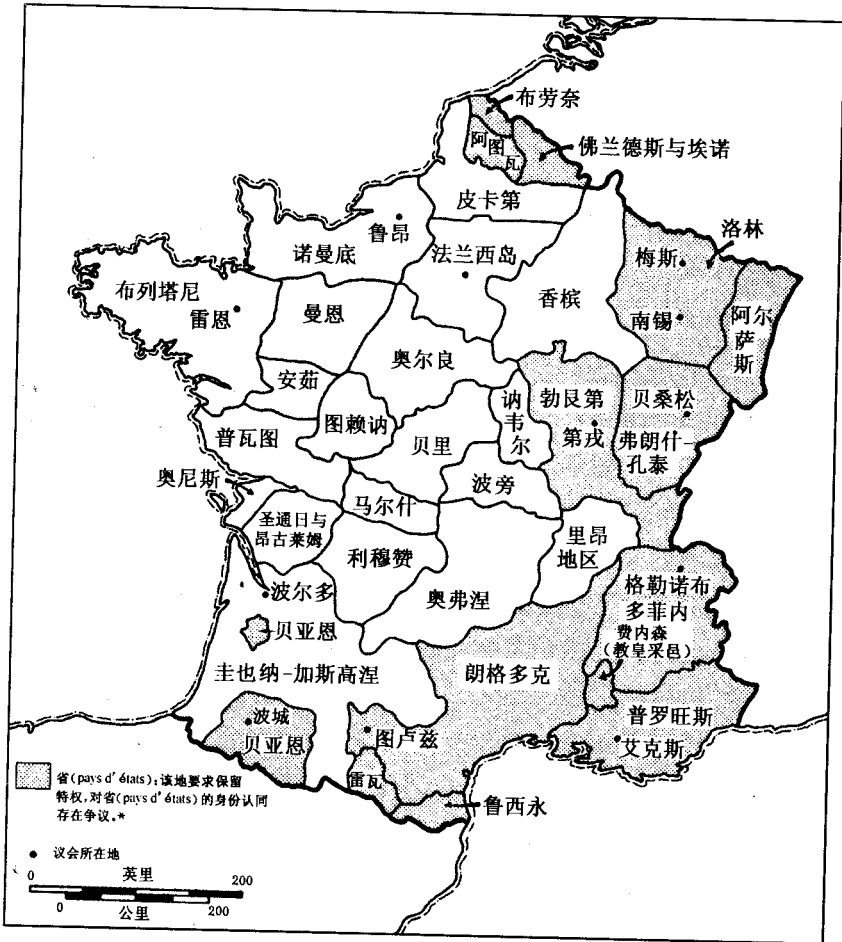


图1 旧制度下法国主要行政区划:1789年

资料来源: M.J. Sydenham,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p. 40.

* 除这里的解释外, 维基百科的解释是: pays d'états 是旧制度下的一种形式的省, 像省级国家, 有一个代表三个等级的议会, 与王权协商税收, 确保教区的分配, 征缴税收, 并适当保存一部分资金用于交通发展。——译者注

续了悠久的王室传统，将新的控制施加于已有安排之上，又没有完全废除旧的制度。因此，成功的专制倾向于凝固、实际上是保护了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领主特权、城市自治、省的独立——但是这些制度的功能却已经被替代或取代了。

在维持国内统一与秩序的同时，扩张军队也是波旁绝对主义赤裸裸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内战，并成功抵挡住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主义之后，法国的君主转而希望角逐欧洲国家体系的霸主地位。¹²如果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具备同时对付两类敌人的能力：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君主和繁荣程度不断提高的商业——海军强国荷兰和英国。最初，前景似乎十分看好。法国政治统一、领土集中、人口众多，以及——只要秩序能够得到维持就会出现的一——潜在的繁荣。在卢瓦侯爵(Marques de Louvois)的领导下，法国在建立了欧洲第一支一年轮换一次的皇家常备军。而科尔伯(Jean Baptiste Colbert)则创建了一支海军，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以引导和培育工业、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并以各种方式改革财政，增加了可用于战争的税收收入。¹³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法国最初的军事胜利——王后权利战争* (1667—1668年)和荷兰战争(1672—1678年)——刺激了阻止其扩张的反法同盟的形成。其结果是，法国随后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8—1697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中受到了严重挫折。更有甚者，在1715年至1789年期间，法国不仅不能统治欧洲，甚至还不能维持无可置疑的一流大国地位。当然，敌对国家的同盟仍然在联合起来反对法国。但是，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完成的绝对主义体制的缺陷，以及法国经济和阶级结构的性质，也造成了同样严重的困难。这方面尤其值得与英国一比，因为正是英国在这一时期赶上法国，成功地上升为欧洲(而且最终证明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霸主。

经济

在17世纪和整个18世纪，法国还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其

* 又译为“遗产战争”。——译者注

复杂的有产者利益网络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法国不能快速转向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化。在大革命前夕,经过 50 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农民仍然还占全国 2 600 万人口的 85%;¹⁴农产品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0%。¹⁵商业和有些(前机械化的)工业无疑在 18 世纪的法国有所扩张(尽管这种增长大部分集中于大西洋港口的腹地,但是这些地方在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然而,无论商业和初生的工业有多少发展,他们仍然与农业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联系的共生关系,而且还受到了后者的限制。¹⁶

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阶段上,工业的进步必须要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繁荣。法国的农业尽管按照大陆的标准衡量是发达的,但是却相对落后于英国的农业,也相对落后于法国的商业和工业。¹⁷无论是属于农民的土地还是地主出租的土地,都被分割成了小块。在当时盛行的三圃制耕作制度下,个人所拥有的土地细小而分散,而且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和某些公用地要休耕。由于法国的国土广袤,国内廉价运输大宗货物的交通条件极为有限,农业地区分工的发展相当缓慢。对英国和荷兰而言,在 16 世纪至 18 世纪所发生的农业生产革命突飞猛进,其特征是块根作物和饮料作物的耕种,牧场的建立,以及使土地不再需要休耕的肥力的增加。然而,类似的改造在法国则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

新的农业技术引入的条件是,废除某些村社习俗和领主权利,以能够合并和统一经营重要的地产。但是在法国却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权利平衡:数量众多的小农大约拥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地主上层阶级也拥有大量的地产,而且还拥有可以从商业角度加以利用的领主特权。因此这两个群体都被置于了这样的地位,即农业生产革命的自然出现,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是他们的能力所及。主要由农民承担的、由王室以一种非理性方式征收的沉重税负也阻碍了革新的推行。最后,还有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原因阻碍了农业经济的结构变迁。在 18 世纪中期(1730—1770 年),由于连续四十多年的好天气、良好的国内秩序和人口的增长,农业产品的总量在传统结构的约束下呈现出了巨大的增长。与这一增长过程相伴的是,价格和地租的提升,为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都带来了繁荣,使得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英国反例的政府官员和进步地主非常之少,从而也

就限制了他们对根本性的结构变迁需求的感知。

反过来,法国的农业落后也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其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阻碍了一个稳定扩展的大规模商品市场的出现。对那些品质居中而最应该采用机器生产的产品来说尤其如此。在16世纪末,法国的农业或许还领先于英国。但是在自此之后的1630年至1730年间,法国的农业、贸易和工业不断因为战争、瘟疫和饥谨而退步。其间,英国的经济则稳定增长,农业生产关系和技术上第一阶段的革命圆满实现。在整个18世纪期间,包括对外贸易扩张在内的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长大体相当。但是,英国的人均产值在18世纪开始之前就已经领先于法国,而且即使在产品增长的同时农业革命也在不断深化。因此这一阶段促进了英国在1760年之后的工业革命。总体经济的扩张,无疑是英国经济实现突破的一个基础性因素,但是,18世纪的法国经济也有毫不逊色的增长率。除了疆域更大所带来的国内运输的难度外,法国的明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农业经济。即使在繁荣期间,法国的农业经济为工业产品所提供的潜在市场也比英国小得多,因为法国中等收入的人口比例更少。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一直维持经济的增长。除非受到战争破坏的限制,人口的增长必然是紧随于产品的增长之后,并且很快会超过产品增长的速度,从而导致物价暴涨和饥谨的出现。正是这类危机导致英国在1770年之后的一次工业衰退——即使当时的英国正在采用新的生产技术。“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法国经济的农业基础再次更为清楚地表明,它没有能力维持持久的增长。在1600至1630年、1660至1690年、1730至1770年,一次又一次的经济扩张的爆发,最终都以需求疲软而收场,因为更为可亲的食品掏空了人们的腰包。”¹⁸

支配阶级

到18世纪时,法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支配阶级。它不是政治和司法意义上的“封建阶级”。但是它也不是“资本家”阶级——不是“企业家”意义上或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即通过工资劳动和市场利润来榨取剩余价值,并扩大投资以扩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化。但是,当时却存在着一个基本上统一的支配阶级——这个阶级主要是从农民的农业中直

接或间接地榨取剩余价值。¹⁹这种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是,部分地通过由地主统治的司法制度来抽取苛捐杂税,并获得君主制国家所庇护的税收的再分配。事实上,如果以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使用“封建”这一术语,以表明某种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关系(即由地主阶级通过强制性的制度性手段来榨取剩余价值),²⁰那么,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前的支配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性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地认识到这一支配阶级的特征和制度基础。

当然,18世纪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按等级(即教士、贵族、第三等级)分层的社会。正如佛朗科斯·弗雷(Francois Furet)所表明的,国家行政机器和商业的同时(和共生)成长所促进的社会构成和社会理想,已经导致中世纪后期秩序系统的废弃:

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君主们在打乱等级社会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们在18世纪还在一如既往、而且是变本加厉地这样做。国家尽力发展商业产品,敌视地方权力,促进国家统一,国家——与金钱一道,它本身就是金钱,甚至还超过了金钱的作用——是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国家日益损毁、蚕食,甚至破坏等级之间、尤其是贵族的垂直性团结关系。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在社会层面上,国家,尤其是通过其职位,已经构建出了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另一种贵族。到18世纪时,一些新的群体构成了贵族的多数。在文化层面上,国家为自此之后在国家的庇护下聚集起来的王国的统治集团,提供了另外一套不同于荣誉的价值系统:祖国和国家。简言之,由于国家是社会晋升的分配者,它通过成为吸引财富的一极,使得君主制国家即使在它维持等级社会遗产的时候,还是创造了一种平行且相互矛盾社会结构:一个精英集团,一个政府阶级*。²¹

在旧制度法国,财富和官职,而不仅仅是等级身份,才是通向成功的钥匙。²²贵族们的命运也有着天壤之别。较为贫穷的贵族被排除在巴黎上流

* 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 governing class,这一集团不同于社会支配阶级 [dominant class] 的地方在于,他们主要是凭借其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地位而居于统治地位。但是,这一阶级又不同于纯粹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 (ruling class)。——译者注

社会和省城的舒适生活之外，他们在购买最令人尊崇的军队和行政职位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那些通过海外商业或王室财政而获得巨额财富的平民，或者通过不断购买国家官职而步步高升的人们，则既可以稳步获得贵族头衔和特权，而且也可以进入上流社会。事实上，18世纪不少最为显赫和富足的贵族世家，似乎也只不过是三、四代前才被封为贵族。

一方面是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这种区别到了18世纪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流动区域而不是屏障——至少从统治集团的角度看是这样。在财富和官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中间层次上，等级才事实上是一道真实的屏障。但是由此则造成了社会紧张——曾经相互敌对的贫穷贵族和有教养的第三等级非贵族，开始共同反对富有的特权阶级——直到大革命期间，这种紧张关系都没有完全缓和。但是，革命性危机却并不是由这种紧张关系所造成的。²³

也并不是任何一种阶级矛盾——各个统治阶层之间因生产方式的冲突不可调和而分裂——创造了革命性危机。正如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在其出色的研究中所表明的，²⁴在旧制度下，80%以上的私人财富是“业主”(proprietary)财富：

在旧制度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财富构成，其运作模式是非资本主义式的，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业主”财富。它包括投资于土地、城市地产、捐官和年金权(annuities)。这种投资的回报不大，约在1%至5%之间，但却相当稳定，年度变化很小。这种回报并不是通过企业家的努力来实现的……而仅仅是通过所有权和时光的流转而实现的。²⁵

在农业经济中，业主的财富主要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凭借土地而间接地从佃户那里剥削地租，佃户则持有或使用几片“领地、农场、分成制租田(métairie)、牧场、耕地、林地”；另一种是“领主权，包括捐税、垄断权，以及从(封建)采邑存续下来的各种权利……这仅仅是强加在封地财产上的一种财产秩序”。²⁶城市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权也是租金收入的另一来源。然后就是捐官和年金收入，泰勒很好地描述了这两种财产形式的特征：

在人们所偏爱的各种私人财产中，对官职财产的热望几乎与对土地财产的热望一样强烈。捐官就是一种长期投资。捐官通常能带来虽然低但却稳定的回报，而且，只要所有者定期交纳年费(droit

annuel)……他就能在每一官职可能的限制范围内,出售给某一买主,赠送给他的继承人,或者甚至将其出租给某人……一般而言,对官员的投资就是对身份的投资。人们追求它的原因在于地位,在于它能将人带入令人尊敬的地位。²⁷

此外,……业主财富还投资于年金。在广泛意义上,年金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转让给其他人而得到的年度收入……永续年金是一种无限期的年金,只有在债务人主动选择归还本金,从而不再支付年金时才会终止……其固有的领域包括家族内和家族之间的融资,对市政当局、省三级会议和王室财政部门出售的年金的投资。²⁸

即使第三等级中最为富有的成员,也在靠对年金、捐官、地产和领主权的混合使用而致富。泰勒强调指出:“在大多数贵族和中产阶级业主之间,由于投资形式的一致性,而将他们造就为一个在经济上统一的集团。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²⁹只有那些参与海外商业的人(大多数是非贵族)和那些卷入到王室高层财政的人(大多数都被封为贵族),才握有更具有流通性和更具有风险性的财富流通形式。但是,对这一集团而言,业主财富也更有吸引力。大多数成功的商人或金融家,都将他们的财富转移为业主资产;与此类似的是,他们通常会自己或让自己的后代把精力转移到相对更迎合社会口味的活动上来。

于是,“业主财富”就成了支配阶级的财产基础。但是,在业主财富上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各种财富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旧制度法国特定国家结构?绝对主义君主和陈旧的“多层”(multiply layered)的国家结构,都在为支配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决定性的支持。法国农民仍然在坚守前市场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秩序观念,如果他们认为正义的公社理想公然遭到侵害,他们就会参与暴动和叛乱。³⁰因此,由于地主不能再控制地方层次上的重要强制手段,他们就只能将求助于绝对主义行政机器的保护作为最后的手段。与此同时,在绝对主义保护伞下得以维持的各种领主制度、自治制度和省区制度对于支配阶级也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大体而言,这些制度并不会导致资产阶级(或者说第三等级上层)去反对贵族,因为所有等级中的富人都拥有领主权、占有捐纳的官职,都属于这样或那样的特权集团。³¹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这些制度在相当

程度上表达和巩固了富人反对穷人的优势。因为，无论其具体的社会政治目的有何差异，这些权利和团体所共有的特征是，他们给富人们带来了由国家保证的税收优势和收入机会。与土地财产权相应的是，这种免税权和机会是整个支配阶级财富的主要基础。

这种依赖于国家的情势，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一个支配阶级。这个支配阶级在两个方面都享有既得的特权：一方面是旧的制度形式，如领主权和据为私有的官职；另一方面是新的绝对主义的职能，主要是与国家促进军事成功能力的相关特权，以及与这个国家就经济扩张征税相关的特权（因为国家的税收来自于无特权阶级）。这样一个支配阶级，将会与作为一个商业化、但却是非资本主义农业帝国的法兰西同兴共衰。只有当这样一个法兰西被证明是不能存活于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环境，君主与在国家结构中拥有许多立足点的支配阶级发生冲突之时，革命性危机才会出现。

战争与财政困境

随着 18 世纪所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越来越明显的是，法国君主已经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战争的胜利，对于维护法兰西在国际舞台上的荣誉和保护其海上贸易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法国君主已经无力取得战争的胜利。18 世纪中期，法国在海洋和陆地上两面开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 年)和英国七年战争(1756—1763 年)。在每一场战争中，法国的资源都被耗到了极致，其至关重要的殖民地贸易也被英国的海军切断。其结果是，法国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将北美和印度的大片帝国土地拱手让给了英国。³²

当时的法国存在着一个主要的战略困境。作为一个位于海岛的商业大国，英国能够将所有的资源集中于海军——从而能够被用来保护和扩张殖民贸易，并由此而获得军事冒险所需的税收收入。由于国内无须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英国可以把有限的财政补助用来资助或煽动大陆上的反法同盟。然而，法国则深受其“水陆两栖的地理位置”之苦。法国是，或者想成为“最大的陆上强国和最大的海上强国之一……部分陆地部分海洋的战略，决定了法国不能像英国(或普鲁士和奥地利)那样，将有所的能量投入一个或另一个方向；不管其是否愿意，她不得不同时做两手准

备”³³。只有在法国能够超身于大陆上同时发生的任何大战,从而将资源集中于海上战事时,她才有希望击败日益成为其主要敌人的英国。“然而,这是一个法国人难以追求的利益,除非她舍弃(如果说不是支配的话)在欧洲至少是发出决定性声音的诉求……但是,路易十四在早期的伟大成就,却已经为他的后代设置了标准。”³⁴

对法国而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困难是,国家财政资源的匮乏。部分是因为法国相对于英国而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财富,部分是因为税收体制被难以计数的特权精英的免税和减税弄得漏洞百出——这些特权精英包括官员、包税人、贸易和工业集团以及教士和贵族³⁵——法国国王发现,他难以筹集到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绵延不断、一再反复的大战,尤其是要用来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敌对同盟。波旁王朝的君主不但没有放弃其海上抱负,反而是仅仅向私人金融家借高利贷——甚至还常常向君主自己的官员那里借贷。与国家出售给私人购买者的永续年金一样,捐官也是一项长期的投资,其本金则从来无需要偿还。³⁶此外,国王还一直向其难以计数的财政代理人借短期贷款(因为法国没有统一的国库),其方式则仅仅是,命令他们预先或超额交纳他们凭借捐纳的官职所征集的税收。³⁷

与法国君主相反的是,英国政府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以低利息筹集到贷款。因为英国政府能够通过英格兰银行来做好这件事。作为一个公共机构,英格兰银行的存在和运作依赖于英国独特的商业繁荣程度,也依赖于通过议会对政府债务的审慎控制和保证,从而取得上层阶级的信任。白伦斯(C. B. A. Behrens)告诉我们,其结果是,“虽然看上去……英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和平时期、甚至在 18 世纪末,也没有超过法国税收收入的一半,但是,在这个世纪的两次最大战争的最后阶段上,英国的支出却似乎很可能是超过了法国的支出。”³⁸

由于一再爆发的战争和接连不断的失败恶化了法国君主的财政困境,连续几任的财政大臣都试图改革税收体制:废除大多数特权集团的免税权,并在各省和地区之间平等分配税负。由于直接征收所得税超出了 18 世纪所有政府的能力所及,现存的农业直接税和消费品的间接税就必须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有效征收,很可能还要提高所有税种的税率,因为归根到底,王室需要更多的收入。³⁹当然,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抵制这一改

革。但是，最为重要的抵制却来自于那些富有的特权集团，他们既有社会地位，而且还占据了国家机器中的要职。

最为积极地对国王试图榨取更多税收的做法进行抵制的机构，无疑是各地的高等法院(parlement)。这些在名义上只不过是王室行政机关组成部分的司法自治机关，位于巴黎和一些重要的省会城市，本来是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法庭。然而，它们的另外一些特点使得他们成为上层阶级反对国王权力的重要据点。首先，法官的职位为私人所有，因此就不能轻易撤换。而且，作为自治机关，高等法院控制着进入这一等级的通道。其次，法官们常常都是富人，大多数人都享有各种免税权。在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看来，“他们的财富不仅仅包括他们的官职，这本身就代表着大量的投资，而且还包括数量可观的债券、城市财产和农村领地。”⁴⁰此外，法官还尤其在保护领主财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有关领主权利争端的上诉法庭，高等法院致力于捍卫这种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形式奇特的财产”。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写道：“事实上，如果没有高等法院的司法支持，领主权利的整个体制早就崩溃了，王室官员没有兴趣维持这种体制，因为这一体制将从能够纳税的人(农民)那里抽取的税收转移到了不纳税的人手中。”⁴¹

第三，由于法官们拥有各种形式的财产，过着时尚的生活，居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包括重要的地区中心)，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与那些旧贵族(佩剑贵族)、依靠领主财产生活的人和靠商业和金融发家的新兴富裕家族(刚被授予贵族称号)相互通婚、相互交往。⁴²同样，他们“与那些尚未上升到贵族等级的官员保持联系……(并)维持着与一个社会声望不那么显赫的团体——律师——的联系”。⁴³

最后，根据传统，高等法院拥有“抗议”那些他们认为违背了王国传统做法的王室法令的权利。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引起公众(大多数情况下是上层阶级)争论的过程中，延迟他们不喜欢的王室政策的执行。这种后果常常会导致国王失去对负责执行遭到反对的政策的大臣的信任。⁴⁴

在18世纪，高等法院一再反对大臣们改革税制的努力。除了抵制王权本身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拟议中的改革会终结类似

于法官一样的富人和与他们有关系的领主、食利者和官员们的特权。18世纪中期前后,高等法院甚至开始声称,作为人民反对君主的代表,他们对王室政策享有准立法性的批准权。最后,在1787年至1788年之间,高等法院通过集结上层阶级和大众的支持,再一次反对大臣提出的改革建议,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从而“为革命打开了大门”⁴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紧随于一场18世纪的战争,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国避开了大陆上的纠纷,在北美独立战争中遏制了英国海军。尽管如此,“为美国的独立付出的代价则是一场法国革命”。⁴⁶为了在财政上支持剥夺英国美洲殖民地的战争,王室财政官们(约在1774年至1788年之间)为了筹集新的借款而殚精竭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将王室的支出和债务急剧升到了一个天文高度。在1770年至1788年之间,支出飞升了两倍半以上,⁴⁷而到1788年时,“仅仅是偿还债务,就耗掉了年度支出的一半以上”⁴⁸。正当财政官员们在想方设法控制先前大战(七年战争)的债务时,美国战争的财政负担又扑面而来。“1780年和1781年曾实行过最后一次超额征税;在特权侵蚀其财政的原有体系存续期间,经济已经再也不能承受重负了。”⁴⁹然后,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1770年之后,法国陷入了一次周期性的整体经济衰退——这种环境减少了税收收入和投资基金,并致使国家的财政代理人纷纷破产。⁵⁰

而且,正如J. F.波舍尔(J. F. Bosher)敏锐地提醒我们的:“大多数波旁王朝的君主们都幸免于债务破产;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末年的财政困境,很可能与法国革命前夕的困境一样糟糕。”⁵¹他问道:“为什么路易十六的财政困境会发展成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为什么这种困境会引发一场革命?波舍尔的回答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打破了旧有的躲避机制:

波旁王朝的每一次其他危机,都通过司法会议(一种特殊的司法程序)而最终得以解决,这个会议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会计师、包税商和其他金融家(王朝所有的捐纳官员,国王通常向他们预借税款)……将他们说成是渔利者,因此应该对困境负责……司法会议提供了一种合法的手段,以废除拖欠金融家们的债务,并强迫他们弥补

巨额亏空。在会议上，国王利用金融家们暂时的虚弱，以进行金融制度的改革……

但是，到了18世纪，包税人、收税人、大司库、承租人及其他高级会计师们，共同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贵族，他们与支配阶级结合在一起的相当高，以至于国王无法召开反对他们的司法会议。长期存在的一系列司法会议终结于1717年……那些试图做一些攻击金融家之事的财政大臣，尤其是特雷（Terray）、杜尔哥（Turgot）和内克尔（Necker），都在政治上受挫而被迫退休。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财政困境才发展成为一场重大危机。⁵²

简言之，当不可扼制的战争倾向于将18世纪的波旁王朝带入严峻的财政危机之时，它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在社会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支配阶级。这一阶级依赖于绝对主义国家，并卷入其国际性使命。但是，它在经济方面感兴趣的是，将国王加在它的财富之上的税收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能够通过国家机关中的制度性据点，来发挥其反对绝对君主的政治职能。

革命性政治危机

在1787年，君主财政危机的消息在支配阶级内部猛然引发了普遍的信任危机。⁵³为了抢在高等法院之前占尽先机，财政大臣卡隆（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召集了一次贵族会议（来自所有三个等级的支配阶级的代表），并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关于财政困境的分析报告，以及彻底进行法律和税收改革的建议。其主要的建议是，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土地的新税制，而无论是贵族所有还是非贵族所有的土地；并建立一种代表所有地主、而无论其成员的等级地位如何的地区议会。毫无疑问，贵族们拒绝了这些想法；卡隆下台，其职位被布里埃纳（Loménie de Brienne）接替，后者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一套稍作修改但体现同样想法的法令。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为布里埃纳的法令登记，而且，还在获得广泛支持的情况下，提出了召开长期废弃的三级会议的要求。支配阶级再也不相信绝对主义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而且也为其特权担心，他们希望有一个代议机构来向国王建议，并就新的税制达成共识。

事实上,国王拒绝了这一要求,并着手制服高等法院。但是,反抗四处扩散,在外省尤其剧烈。外省的高等法院、省区议会、以及由贵族和/或第三等级上层所创立的特殊机构喧嚷叫嚣要反对“专制制度”而召集三级会议。民众的示威,尤其是高等法院拥护者们的示威,支持这些特权者们反对国王。而且,并非所有的监督官、军事区长官和军官们都可以被指望用来镇压反抗。⁵⁴

与持续存在的财政危机相伴的是,许多军官在镇压反抗活动中的懈怠情绪,也是驱使王室最终屈从而召开三级会议的直接原因。而且,官员们的懈怠情绪也引发了大面积的行政混乱和军事崩溃。官员们来自于各种有特权的背景——富有的贵族、富有的非贵族和贫穷的乡村贵族——官员存在着各种长期累积的不满。有些不满直接针对的是其他官员,另外一些则是所有官员对王权的不满,因为王权从来就不能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⁵⁵但是,能够解释官员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事实上所有的官员都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因此,在1787年至1788年期间,他们许多人都认同高等法院。凯瑟琳·乔利(Katherine Chorley)在其经典性著作《军队与革命艺术》一书中,通过比较历史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前工业社会,军官们通常认同自己出身的特权阶层,并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该阶层的利益。⁵⁶直到法国革命的发动阶段,甚至在国王已经屈服并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之后,法国革命都是一场在富有的特权阶层领导下,将各阶层卷入进来反对王权的斗争。在这一期间,对军官们不愿镇压反抗的态度的预期,恶化了政府的权威性危机。反过来,这种状况又暴露了政治和社会的分裂,最终导致国王或支配阶级的保守派都不可能诉诸单纯的镇压手段。

众所周知,三级会议的召开不但无助于解决国王的财政危机,反而引发了大革命。三级会议引发大革命的事实固然毋庸置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一些法国大革命史家提出,三级会议的召开之所以导致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它将由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capitalist bourgeoisie)、或者说第三等级的上层推上了全国性政治舞台。⁵⁷这种情况发生于当时所爆发的这样一场争论之中:会议的召开方式是依照传统的按等级投票的方式进行,还是依照更加统一的按人头投票

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一争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是,有更多的迹象表明,其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挑起了一个阶级或等级去反对另一个阶级或等级,而是这种争论加深了旧制度下行政体系的瘫痪并导致其解体——从而使得支配阶级更容易受到具有真正社会革命意义的下层反叛的伤害。

在整个 1788 年和 1789 年初,法国的支配阶级一致希望建立一个更少专制色彩、更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政府。但是,在采用何种原则来恰当地决定代表谁的利益、并拥有何种制度化的权力方面,却并没有形成一致的主张。⁵⁸ 三级会议的召开,必然会使这些问题处于突出地位,从而导致支配阶级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处于最为极端的分裂状态。因为,此时的三级会议并不是一个能够有效调节支配阶级多元利益的、成熟的代议机构。相反,三级会议还处于从无到有的构造状态,召集的代表来自于构成 1789 年法国社会的杂乱无章的社区、团体和自治机构。在一直延续到 1614 年的“惯例”准则之下,三级会议的构造过程就释放出了难以计数的利益和原则冲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富有的特权阶层之中,他们因等级身份、贵族级别、财产类型、地区联系、城乡籍贯、职业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差异,而处于一种复杂的分裂状态。

而且,在 1789 年初,围绕着按等级表决还是按人头表决,产生了一种广泛的集团分裂。那些反对传统的惯例(constitution)、支持统一的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在这个机构中,三个等级的代表按人头表决)的人,不仅仅包括第三等级的代表,还包括很有分量的一小部分贵族——这一部分不成比例的贵族,因其出生和/或长期居住在城市而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文化。⁵⁹ 事实上,革命的资产阶级/第三等级中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物,原本是一些贵族。⁶⁰ 对这一现象无需大惊小怪。因为,在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实际上面临危险局面的并不是阶级或社会等级结构——因为只有大众反叛才会将这两种结构置于危险境地——而是政府结构。而且,一种强调财富、教育和广泛公众声望的代议体制,无疑会使人们主要想到具有城市背景、拥有众多关系的贵族。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与决心恢复封建政治制度的教士贵族和农村贵族的分歧,要大于与基本上来自于城镇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之间的分歧。

但是,在当时,革命的发动并不需要阶级矛盾或分歧完全与等级界线相一致;支配阶级内部的各种政治争论就足够了。由于这些冲突起初是破坏、继而是瓦解了旧制度的行政体系——毕竟,这一体系一直就是建立在国王、大臣和监督官们所协调的各种自治机构和捐纳官员的常规运作之上的。在1788年和1789年,在代议机构应该如何组织、何种民怨应该上达天听等问题上,上述的团体和个人之间出现了争吵,就为民众不满的表达敞开了大门。支配阶级内部的领导人开始诉诸城市的民众团体,以支持他们争取有各种解释的“自由”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在鼓励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首先是高等法院、随后则是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们也开始玩这种把戏。

到1789年夏天时,结果就造成了“市政革命”,一场全法国范围内的城镇中的政治革命的浪潮,其中当然也包括著名的“在巴黎攻陷巴士底狱”。⁶¹在1788年至1789年同时发生政治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⁶²成群结队的工匠、店主、临时工、粗工游荡于城市之中,他们在寻找武器和粮食,既要面包又要自由。⁶³自由革命的活跃领袖们,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们,组建了新的市政府,取代了由君主任命或者忠于王室行政机构的官员,将更受民众拥戴的抗议者们招募为城市民兵。接下来,民兵既充当了对抗王室军队的力量,又在协助保护城市的秩序和财产。因此,到1789年初夏时,支配阶级内部围绕着代议形式的争论,在巴黎国民大会和遍及法国的各种自由城市支持者的胜利声中,走向了终结。与这一胜利相伴的是,对行政和强制手段的控制,从正常状态下中央集权的君主行政机构分散到了各城镇,大多数都被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们所控制。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市政革命才仅仅是法国革命进程的开端,其随后就从反对绝对主义的宪政改革,深化为更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造。因为,下层阶级的斗争——首先是农民的斗争,本来,支配阶级中没有任何人邀请他们加入争吵——将会表明存在着自身的动力和逻辑。而且,在失去王室行政机构之后,尤其是乡村贵族们,已经没有了防范底层反叛的屏障。但是,我将在随后的几章中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将离开法国,而转向分析晚期帝制中国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情况。

第二节 清帝国：从天朝帝国到帝制垮台

在波旁法国遇到其革命的复仇女神之前，它已经长期习惯于欧洲国家体系的冲突和喧嚣状态。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从这种冲突和喧嚣状态，转向另外一个遥远的、单一霸权中心支配下的自足世界。在19世纪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中心，其历史可上溯到二千多年以前——这一文明所包含的社会政治结构拥有持续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对这个横跨于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度之上的帝制国家而言，对外防御主要是在亚洲内陆边境上抵挡和控制相互竞争的各个民族；而对于来自海上的入侵，则要么是漠然视之，要么用武力扫除。在数个世纪里，传统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做得越来越成功。尽管异族可能攫取王朝统治的最高权力，但是中国的帝国体制则依旧持续运作。⁶⁴实际上，作为发源于满洲南部的汉化部族，满族人所建立的清王朝（1644—1911年）既达到了这一非凡体系的权力巅峰，又见证了这一体系的最终崩溃。

到乾隆统治（1736—1796年）结束时，中华帝国的疆界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广度：西至伊犁地区及俄罗斯土耳其斯坦边界，西南至喜马拉雅山和印度边境各国。西藏得到了平定和控制；安南处于藩属地位，东南亚其他国家则进献朝贡；朝鲜也再次成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⁶⁵

直到19世纪时，这个天朝帝国都和平有序、经济繁荣、文化精深。自那以后，处于侵略、扩张和工业化状态的欧洲迫使中国脱离了辉煌的自主状态，进入了一种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和帝国主义四处侵略的世界。但是，在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考察一番旧制度自身的逻辑吧。因为，正如波旁王朝一样，正是异乎寻常的外来压力和特殊的内在结构及其发展，才导致中国的旧制度陷入了革命性政治危机。

晚期帝制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最好被理解为两个“世界”的相互渗透：（1）以地方性市场网络为中心而相互牵连的村庄组成的农业经济和社会；以及（2）一套帝国的行政体系——它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科举制度的

认可,来录取和使用受过教育的人士。出于分析的目的,这两个世界可以分开来介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两个领域并不是相互孤立地在运作。实际上,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才创造和维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支配阶级——中国士绅。

农业经济与社会

在帝制时代的晚期,中国的农业绝不是“封建的”——因为这里不存在前资本主义欧洲的那种享有赋税和农奴使用特权的领主。中国的农业也没有表现出由主人亲自经营的大片土地。相反,土地几乎都是以很小的单位被占有、出租和买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至少有80%的人都是农民。他们生活在由几百个家庭组成的村庄里,各家各户都耕种自有的、租种的、或两者皆有的小块土地。⁶⁶

的确,中国经济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土地占有的差别上。⁶⁷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40%的农用耕地是由地主所出租的。大约有30%的农户是纯粹的佃户,另有20%的农户需要租用部分土地,剩余50%的农户拥有大小不等的小块土地。但是,各地的差异非常之大:在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租金较高;而在华北和西北的大部分地区,租金则非常之低。同时还存在各地内部的差异。总体而言,只有那些在交通条件、尤其是水路交通便于粮食市场向外延伸的地方,土地出租才有利可图。华北(其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小米)的交通一般都较为困难,而且其生产力也要大大低于华南和华中的稻米产区。

即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农业中国还基本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关系,但是,这个国家却事实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商业化了。交通困难意味着,贸易主要在社会底层进行,并以一种分散状态而形成了成千上万的地方性市场,农产品的销售局限在“方圆几十里以内的有限地区之内”⁶⁸。“长途贸易主要是将奢侈品运给中国的士绅阶级,或者为城市提供生活必需品。”⁶⁹只有7%至8%的农产品会进入长途贸易。但是,地方或地区之间的商业也非常重要。因为,尽管农民生产了自己所需的大多数食物,但是他们还是要依赖于定期的集市。施坚雅(William Skilling)将这种集市称作是“标准集镇”(standard market town),农民在这里出售五分之一至

五分之二的产品，以换取货币来交税、购买手工业品或用于娱乐和宗教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里，但是，这一世界却并不是村庄，而是标准的市场共同体”⁷⁰，这个共同体通常包括12至18个村庄。同时，富有的家庭常常住在集镇，⁷¹集镇的运作向他们提供了奢侈品，并在手工业、尤其是典当业和高利贷业等方面向他们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对于富有的家庭而言，这类投资为他们从土地出租中所获得的低回报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这些活动代表了晚期帝制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剩余价值占有机制。⁷²

国家

富有的家庭通常都渴望，通过为国家服务而进入与农民大众无缘的、带有普世性的中国式生活领域。由于中国庞大的农业经济具有地方化和分散性的特征，就只有帝制国家——其活动集中于维持通过军事威力而赢得并保持其地位的本土或外来的王朝的延续——从而将中国统一为一个社会。皇室是由大约四万名官员（清朝的数目）组成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式的半官僚机构的中枢所在⁷³：

皇帝是一位享有绝对权力并不受法律限制的君主，在各种皇亲国戚的簇拥下实施统治。在行政等级体系中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是内阁（Grand council）和军机处（Grand secretariat），在此之下则为六部（最终增加到十二部）或相当于部的院司。在中央政府之下是由总督和/或巡抚为首的省级行政机构。除了上述官员外，清朝还在十一个边疆省份设立了满人将军职位，将军“与总督同列，却位在其右”。

每一个省又分成了由道台主理的道。道下又分成由知府监管的府，依此类推，府以下又分为由知州掌握的州和由知县掌握的县。这些官员均由朝廷任命，委任状由皇帝颁发。⁷⁴

官员是从获得功名的文人学士中任命的，所有官员及其家庭人口总数还不到总人口的2%。尽管有少部分官员的功名是花钱捐纳的，多数被任命为官员的文人学士都通过了政府主持的、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考试。⁷⁵在帝制中国，各种社会背景的人都有可能追求官职，而且确有出身贫寒之辈有时甚至还获得了最高职位。⁷⁶但是所有这些人都不需要通过

自身的资源和他人的资助来获得生活保障和闲暇,以培养士人的“身份风度”并(往往是终身)投身于儒士的“科举生涯”。⁷⁷而与拥有地产的富裕家庭保持亲属关系,又是确保必要的生活保障和闲暇的可靠而适宜的途径。

帝国的官员完全是从高级士人中任命的——在这些人(约占所有士人的14%)中,有些通过省级或全国性的考试,有些则是在获得功名后再捐纳官衔。⁷⁸高级士人包括在职官员、退職官员和候补官员。在科举生涯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超越乡土的联系和眼界。高级士人一旦被授予官位,就要受制于一套设计出来的准则——这套准则甚至以行政的合理性为代价,以削弱士人们与家乡和家庭的紧密联系,并将他们锻造为一批以帝国的眼光来看待乡土社群的精英群体。诚然,中国的政权从来没有试图永久地将官员们割裂于家乡之外;定期解职回乡是官员任职生涯中的组成部分;即使对于最为成功的官员而言,与家庭的联系仍然存在,与地方富豪和社会贤达的联系也很重要。但是,帝制国家还要竭力确保在职官员的忠诚。根据“回辟原则”,被任命为督抚、知府等职位的士人,必须要在他出生和成长以外的省份去任职。没有官方的恩准,他们不得雇用家庭成员任职,也不得与当地妇女结婚。为了阻止他们与辖区官员和地方精英结成庇护关系或死党,官员们处于频繁调动的状态,而且官员群体中还被以各种方式进行掺和。最后,在省级行政结构中,还精心设置了双重的职权与职能,以使得朝廷能够有一种交叉的监督和命令链条。⁷⁹

低级士人——那些只通过了基层考试(府试)者(或者只是捐纳了低级功名者)——通常不会被任命到相对稀缺的帝国官职上去。但是,他们在地方上通常会与遵循儒家礼仪的富人一道,在当地享有重要的名望和权力。⁸⁰因为帝国的行政从来没有深入到每个村落和标准集镇。基层官员知县要负责管理包含有二十万人口的地区。⁸¹毋庸赘言,他只有通过与当地人的合作才能治理这一区域。⁸²所有知县都在采用的一套做法是雇用一些低级的职员和助手,这些人的收入部分由知县支付,部分则主要来自于从当地人那里榨取的贿赂。此外,当地的士人和富有的儒雅的地主通常会与知县们合作,他们能够被知县平等相待。作为自己及亲朋好友少交赋税的回报,这些地方权贵们会帮助知县征收田赋。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知县们通常会鼓励或允许当地的士人和富人来组织社区服务——

诸如灌溉工程、宗教或宗族活动、教育事业或民团——以作为当地农民所交费用的回报。尤其是对低级士人而言，这些费用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当然，帝国行政机构也会支持地主和债主收取租金和利息的权利。

士绅

因此，与法国革命前的支配阶级并无二致的是，帝制中国居统治地位的士绅阶级自然地建基于对官位、多余土地和流动财产的占有。在国家的支持下，向农民借贷和出租而获得的财富，支撑着儒家士人风度的培养。帝制国家通过科举体制鼓励儒家学说，并选出少量的儒家信徒为官。与纯粹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得的收入相比，官职收入与为组织和管理地方社区事务而征收的费用一样，提供了更多的回报。⁸³因此而获得的收入，基本上又会部分再投资于购置土地和放高利贷，从而完成了相互依赖的帝国与建基于分散而分层的私有产权及地方性商业的农业社会之间的循环。

不少争论都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即到底谁才是中国革命之前的士绅？有些人认为，士绅是那些获得了官职和/或功名的人，因此士绅就严格限定在我所说的士人的范围以内。⁸⁴其他人则认为，士绅基本上是指富有家庭，尤其是地主。⁸⁵由于这种争论不仅仅是一种纯粹语义学上的争论，所以，学者们的分歧，至少部分是来自于他们对旧制度结构的看法不同。旧制度到底基本上是一种带有儒家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帝制国家，还是一种阶级分层的农业社会？我的观点是，旧制度的中国是这二者相互绞缠的混合体。在农村居统治地位的阶级依赖于帝国的行政/军事支持，以及在帝制国家中获得职位的机会。而实施统治的朝廷则依赖于在地方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延伸对广阔而难以管理的农业区域(中国)的控制并榨取资源。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可以认为，士绅的核心就是家庭成员中已经有获得功名的现任官员的地主家庭。其他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特征的家庭——如家中没有获得功名者的富人家庭或贫穷的士人及官员——则应该被看成是支配阶级的边缘成员。因为他们分享了独特的儒家文化和核心士绅的财产资源，并且还分享了某一方面的士绅权力。⁸⁶作为支配阶级的士绅，其生存和延续依赖于这类“边缘”成员获取自己所缺乏的核心阶级的完整属性的期望与能力。实际上，在19世纪末期之前的几百年里，

中国的农业经济处于繁荣状态,因而使得普通家庭能够获得维持追求功名和官职者的期望所需的财富。而且,朝代的更替并不影响帝制国家结构的延续,因此为地方上的支配阶级提供了支持,也为官员们提供了额外收入的机会。在整个这一时段内,虽然个体的家庭沉浮不定,但是中国士绅作为建立在帝制国家与农业社会的接合部的一个支配阶级却繁荣不断。

外扰与内乱

然而,中华帝国毕竟是衰落并垮台了,从而为士绅的革命性毁灭打开了通道,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原因与方式。根本而言,是因为中国受到了国外帝国主义工业国家的非凡压力。而这一情势的发生,又正值孕育已久的内部发展破坏了系统的平衡,从而导致帝制国家不愿或不能对外来威胁做出有效的反应。

在 19 世纪期间,中国经受着前所未有且日益强大的外来压力。⁸⁷ 在 18 世纪中期以前,欧洲的商人曾经被看成是与中国的其他实际或象征性的藩属国类似的朝贡者。然后,在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中期之间,中国与外国商人之间有限的双边贸易由帝国当局通过有名的“广东体制”(Canton system)加以管制、监督和征税。但是,从 19 世纪初期开始,英国已经能够凭借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军事组织和技术,支持其臣民在中国各地扩展“自由贸易”的抱负。在 1839—1842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军力受到决定性的海上失败之后,英国取得了大量的贸易权利。其他的西方列强也很快加入要求中国“开放”的行列。贸易自由权、关税限制、在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基督教传教士在内地的司法豁免权——所有这些,都是在历次的外国入侵后,在条约中以武力强加给极其不愿与西方并按西方的方式打交道的中国的。到这个世纪末期,由于相互竞争的各工业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殖民地,并排挤了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人侵采用了更为险恶的方式。起初,中华帝国的附属国——包括印度支那、亚洲内陆地区和朝鲜——被法国、俄国和日本所攫取。后来,相互竞争的列强进而通过“贷款、铁路、租界、廉价土地税以及地方司法权、警察权和采矿权等权利”,分割了大片的“势力范围”。⁸⁸ 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生存,受到了全面的威胁。

本来,只有帝国政权的中央当局,才能着手实施相应的经济和军事规划,从而才有可能使中国能够抵御对其主权愈益深入的侵犯。⁸⁹然而,在传统中国的晚期,国家政权所处的情势却阻碍着中央任何成功实施主动创新的可能性。到18世纪晚期时,清王朝已经开始被削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削弱它的力量恰恰来自于这个王朝在其巅峰时期所创下的和平、繁荣和政治平衡所产生的种种后果。

首先,人口的增长正达到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自14世纪以来的五百年中,在稳定的制度框架内,传统中国的经济或多或少是在稳定地扩张——首先是在和平和政治稳定时期。⁹⁰由于不断开发新的可耕地,以及在应用传统技术时更为集中地投入劳动力,人均粮食产量还能够跟上大约每年0.4%的人口增长速度。1400年中国的人口大约在6500万到8000万之间,而18世纪中期则增加到四亿左右。商业和手工业也处于同步增长的状态,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一些超出。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当时只要有新的土地可以开发,中国的传统方法就能够防止人均食物消费量下降。但是,到了19世纪时,可耕地已基本用完。在没有创造出自发性产生的工业主义的条件,传统经济正接近其可能扩张的极限。⁹¹其结果是,尤其是在生产或贸易因某种原因而中断的那些地区,农村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加大。

其次,帝国当局的财政和行政也变得更为虚弱。财政方面的问题主要与土地税有关。自1712年以来,各省的土地税(直到19世纪晚期都是帝国最重要的岁入来源)额被“永久”固定下来。⁹²最初,在清朝的鼎盛时期,这种做法维持了名义上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平衡,这个帝国通过精心调节和抵消地区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得以存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北京却失去了农业经济增长所结出的果实。“从1712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政府所记载的法定收入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⁹³与此同时,地方和各省的收入却不成比例地增加,这是因为,除北京的固定需求外,非正式增加的赋税被全部拉进了地方的钱袋。

与财政停滞紧密相关的是,对整个国家的民政控制也走向虚弱。因此,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加,帝国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同步发展,而是让基层的地方官员来监管如此之大的地方人口。⁹⁴其结果是,地方官员们不得

不更多地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领导。这些人的收入,主要是靠收取越来越多的非正式费用和克扣税收,而所榨取的对象则是负担更为沉重且缺乏土地的农民。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清王朝从18世纪末起,就面临着以农民为基础的反叛。⁹⁵首先是1795—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然后,在经过几十年的内部骚乱之后,则迎来了三场大规模组织严密的起义: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1853—1868年捻军起义和19世纪50—70年代西北地区的回民分离主义暴动。在中国历史上,这类起义一直在间歇性地爆发。由于这类循环现象常常起因于官场腐败、军事无能和农村日渐增长的不平等,它们常常意味着一个王朝的衰落及其替代者的来临。这种传统的原因在1800年以后开始削弱清王朝,但是,由于前述的长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情势更加恶化和复杂。而且,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产生的副作用也进一步刺激了起义。因此,19世纪中期规模最大、革命性最为公开的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而这次起义就发源于在因鸦片战争的后果而严重加剧了经济混乱的东南沿海的中部。它的反儒意识形态部分地受到了基督教传教士布道的启发。⁹⁶

当然,19世纪的历次起义,已经对中华帝国的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镇压起义的活动耗尽了北京的资源,而大规模的内战所导致的经济和人口的严重损失,又造成了税收的下降。而且,这些对清王朝主权的公然挑战,也导致它无暇顾及日益增长的外来威胁。不过,清王朝还是经受住了起义的风吹雨打,而且还呈现出表面上“恢复”了充分健康的状态。⁹⁷然而,只是在以修改国内制度和重新分配权力为代价之后,满清统治者才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这又导致他们已经无法自如地应对外来挑战了。而且,这些制度和权力变化,最终也使得清王朝及其帝国体制很容易被士绅支配阶级从内部推翻。

实际上,从解释旧制度垮台的目的来看,这些起义所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它们被镇压下去的方式。清王朝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帝国常备军

* 应为1796—1805年。——译者注

** 应为1851—1864年。——译者注

来遏制或镇压这些起义。在经过 18 世纪几十年的和平之后，这些军队已经变得腐败无能；而且，它们又受制于帝国财政和行政的虚弱。随着帝国军队被证明无力担当镇压任务，对付起义的任务就径直落在各地士绅所领导的自卫组织身上，然后则落在由能够在广大地区获得乡村资源和兵源的汉族士绅团体所领导的地区性军队身上。⁹⁸ 士绅领导的军队在切断起义者从农村获得潜在兵源的同时，也通过激烈的战斗击败了起义军，并最终为清王朝恢复了秩序。然而，由于士绅们在镇压起义中的重大作用，朝廷不得不正式承认那些违背其长期确定的政策——控制官员、维护帝国行政机构高于士绅的地位——的政府活动。有些权力，包括征收新税、截留原有税收的更大份额以及维持秩序的权力，下放给了各省和地方官员，而这些官员往往不受任职和轮换的“回避”规定的限制。甚至在起义被镇压之后，那些有功的地区性士绅群体还保持着对他们家乡的大部分行政和军事控制。⁹⁹

权力天平向省和地方官员倾斜的一个决定性后果是，北京的财政更加虚弱。19 世纪中期之后，新的间接税使传统的土地税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帝国当局却总体上并没有从中获益。为了管理和征集外贸税收，帝国创设了海关机构并由外国势力加以管理。关税本身是由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但是征集到的税收还是大部分流向了北京。另一种税，即向生产、运输和（或）销售环节征收的厘金（likin），产生出了更多的收入。但是，却只有其中的 20% 被送往北京，其余部分留在地方和省级政府，是他们在负责征收厘金并将大部分截留。根据学者的统计，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中，中国政府的总收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5%。而北京政府只得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即大约国民生产总值的 3%。¹⁰⁰ 与此同时，无论北京当局的收入有多少，都要用来向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的战胜国支付赔款，偿还外债（最初借债时规定用于弥补战争花费、赔款和有限的铁路建设）。

更多的资源是由各省和地方当局及支配阶级在控制。但是，“从可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维持目前经济平衡的观点看，这些……资源几乎完全不起什么作用。”¹⁰¹ 相当一部分地方和省的收入直接进了收税人和官员的腰包；其余则以各种方式加以分配，同样是强化了士绅统治的秩序。在

这种秩序中,企业的创办仅仅是为了谋求短期暴利;军事力量稍有可能脱离士绅集团的控制便会受到怀疑。

于是,晚期帝制中国当局用于投资现代交通和工业,或者以各种方式用于可能强化中央控制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收入就非常之少。在19世纪中期,与陌生的外来威胁和紧迫的国内问题相伴的是,帝国的官员也迟迟不能承认根本性变革的需求,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北京缺乏真正的机会来采用主动的措施。实际上,最早试用现代工业和军事技术的,是那些与地区性权势团体有依附关系的官员。¹⁰²但是,这些尝试在范围上极其有限,太少协调,以至于不能成功准备好对列强的抵御。¹⁰³只有在强大的中央政府的直接指导下,才有可能成功地完成这一使命。

改革与“辛亥革命”

另一个东方社会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迅速地把自己的某些自身传统方式与西方工业和军事成就融为一体。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1895—1896年)遭到屈辱性的失败之后,才使中国人认识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即使是在某些中国的省级领导人已经在试用西式武器和试办西式兵工厂的情况下,中国却在中日战争中败给了一个被帝制中国长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以藩属相待的国家!战争的失败震撼了一些中国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由中央当局发动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国免于持久的国际屈辱地位或沦为殖民地。1895年之后,帝国主义普遍掀起了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更加使人们坚定了这一看法。由清朝改革官员推动帝国当局发动变革的最初尝试,在1898年经过“百日”之后,因嫪居的皇太后领导的保守派的政变而破产。但是,在1899—1901年的义和团乱之后的几年中,晚清政权最终明确走上了改革的历程。而且,上层阶级普遍地变成了民族主义改革的支持者。¹⁰⁴

在1901—1911年期间,各种各样的改革法令人眼花缭乱:科举制先是被修改,然后在1905年被废除;在地方、各省和北京都开办了各种设置西式课程、培养新式政府精英的现代学校。大学生获得了出国留学(最初大多到日本)的奖学金。为培养现代军官群体而开办了军事学校。北京还设立了分管内政、战争、教育、外交事务和商业的部,表面上是为了监管

和协调各省府的项目。一种真正的全国性的预算体制也得以建立。最后,从1908年开始,清政府着手设立了代表性的议会,它试图通过这一机构动员以谘议角色来支持帝国政府。地方性的谘议机构也在1908年很快建立起来,并计划在1909年选举产生各省的谘议局,在1910年选举产生全国性的谘政院,以为1917年设立国会做好准备。¹⁰⁵

但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¹⁰⁶因为新的措施进一步削弱了早已十分脆弱的中央权力,而且还加剧了士绅与清朝专制政权的紧张关系。在历次的起义之中和之后所采用的对抗当时局势发展的措施,已经使得改革措施只会强化地区性势力对抗中央的力量。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和军官们形成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观念,这些观念中还混杂有对本身的忠诚和对“外来的”清王朝的敌视。¹⁰⁷新式军官和新式武器被吸纳进了在起义时期存活下来的、以地区为基础的军队架构中;而且,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对清王朝和帝制体制只有极其微弱的忠诚。¹⁰⁸试图在省一级创设新的行政结构以抵消日益坐大的督抚权力的做法,也因新式官员和职能被原有的地方群体所同化而流产。¹⁰⁹而最为致命的是,新设的代表会议也很快就被地方和各省士绅和商人团体变成了正式的论坛,他们在那里鼓吹自由主义的、政治分权性改革的“立宪主义”纲领。¹¹⁰

正如杨(E. P. Young)早已指出过的:“士绅的政治化可能是(中国历史在)20世纪初的突出特征。”¹¹¹与欧洲的贵族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士绅从来没有拥有过在国家政权之内代表其阶级利益的社团组织。只有个体的参与才被允许,对群体利益的保障依赖于置入帝国官僚内部的人际关系。但是,在1900年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由士绅组织的地方性学会开始公开向中央当局请愿。然后,士绅通过新设的地方和省的代表会议而获得了正式的阶级性代表机会,而代表会议的产生则基于严格限制的、有利于士人和富人的选举权。士绅们在被帝国主义警醒、而又对清朝当局失去耐心的情况下,在情感上就转向了民族主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似乎与外国势力相关的“立宪主义”,开始被士绅们看作是一种将各省和各地的阶级利益与民族独立和进步结合起来的理想纲领。尽管清王朝的意图是将代表会议维持在咨询机构的地位,但是这些会议中的支配阶级成员和选民则设想去创建一种立宪性的议会君主制,并

在士绅的控制下实现地方和省政府的高度自主。到1910年时,一些有组织的士绅团体正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着手准备,以实现他们对抗清王朝的分权纲领。选举产生的谘政院的议员在北京开会时,原本是要商讨渐进式的未来变革,但是他们却要求立即建立议会制政府。可以预见的是,晚清当局拒绝了这一要求,从而使得失望的士绅代表回到了他们原来的省份,正是在这里,一些人很快就在推翻清王朝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直接加速“辛亥革命”爆发的,还有另一个中央政府试图进行的改革——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了各省士绅的财政利益。为了保障对正在全国范围内缓慢修建的铁路系统进行协调性计划和控制,北京决定在1911年出钱收购各省的团体所投资的铁路项目。其结果是:

爆发了一场四处蔓延的“保路”运动,尤其是在四川(一个西部省份*),不但召开了各种群众大会,而且还向北京递交了陈情的请愿书。但是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四川的保路运动越来越激烈:商店和学校关门、征税活动被停止、农民的支持也已经被动员起来。九月,政府调动军队,向示威者开枪,并抓获了士绅领袖。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些人都拥有功名,有地主-商人的家庭背景,还曾经留学日本,目前也是省谘议局中的头面人物,而且已经大量投资于铁路项目。他们打出了排外的口号“川人自保”,代表了该省支配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此时已经变得暴烈地反对清王朝。¹¹²

“四川起义……引发了不少本来与铁路问题毫无关联的普遍¹¹³骚乱。”为了镇压四川的骚乱,清政府从外省调来了军队,包括从武汉地区调来的一些军队。而武汉就是在10月10日演出下一幕戏剧的地方。10月9日,当由某些军官发起的反清密谋被发现之后,为了挽救可能受惩罚的军官,一些武昌的新军发动了起义。惊骇不已的清朝总督仓皇出逃,一位协统被推举出来领导这次地区性的革命。¹¹⁴武昌起义成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榜样。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领导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主要是两种人:统帅新军的军事长官和省谘议局的士绅-官员-商人领袖。”¹¹⁵

* 原著如此。——译者注

紧随于 1911 年起义之后的情况是，立宪派士绅和商人、旧官僚、新军军官和追随孙中山的（人数很少且总体上没有什么影响）革命同盟会的激进青年，都竞相规划新的全国性政治体系并替代清朝的统治者。因为，尽管有不少人支持政治分权，但是，人人都在表面上希望强化而不是弱化中国的国家统一。起初，他们宣布成立共和国；然后，袁世凯将军又试图恢复帝制并自己做皇帝。但是，不出五年，形势就已经变得明朗：“辛亥革命”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给了帝国的行政和政治制度致命一击，而这些东西本来就已经因各省官员、军官和在野士绅的内部篡权而腐朽不堪。同样日渐明朗的是，已经不可能立即产生出另外一种全国性的政治体系来替代四分五裂的帝国体制。¹¹⁶这是因为，为推翻清王朝而暂时联合起来的支配阶级集团，在忠诚对象上存在着内在的分裂，没有在用何种政治制度来取代专制君主制的问题上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在 1911 年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省和地方的士绅一以贯之的倾向是，在肯定文人控制政府的同时，自己却与军人督抚结成联盟。然而，在数年之内，权力却落入了以“现代化”的军事机器为基础的地方军阀之手；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军队及其领袖彼此争夺地盘和物质资源。直到 1949 年，这种状况至多只是得到了暂时的而且是不彻底的解决。从而导致中国陷入了无休止的骚乱之中。然而，正如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将要看到的，这种状况同样为巩固革命的努力提供了机会——形成了以下层阶级的支持和动员为基础的全国性权力。

法国和中国的类似性

此时，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反思一下，波旁法国和晚期帝制中国在革命爆发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类似之处。尽管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和地理上都相去甚远，尽管它们的旧制度是在不同的具体时间和环境中垮台的，但是，它们的旧制度仍然有着类似的结构模式，旧制度的崩溃也有着类似的因果过程。

在法国的旧制度和晚期帝制中国，相对繁盛的上层地主-商人阶级都在其中获得了与君主专制的行政机器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在 18 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个日渐上升且团结紧密的上层业主阶级，其财富因君主制所支持的租金上涨和巧取豪夺而日渐膨胀，他们能够通过高等法院和其他

与专制君主的行政机构相互缠绕的社团机构来表达政治抱负。在传统中国的晚期,由于士绅们在18世纪中期的起义之后,实际上控制了帝国行政机构的不少部门,他们的势力越发壮大,其租息也得到了可靠的保证。而后,清朝改革派于1908—1910年设立的谘议机构中获得了集体的代表权。

同样类似的是,法国和中国革命危机的出现都是因为旧制度受到了外部更为发达的国家的异乎寻常的压力,而且还因为,那些压力导致了国内的专制君主与支配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意外的战争失败(如七年战争和中日战争)所带来的屈辱,激发了专制当局的改革意图,他们认为,改革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协调国家的资源,以有效应对外来的危机。然而,如果中央当局成功地实现了理性的改革,上层地主-商人阶级就会在财富和权力方面受到威胁。而且,并非偶然的是,法国的特权阶级和中国的士绅阶级,都被与更为现代的国家有关的议会制度和全国性权力所吸引;他们既希望维持自己的阶级利益,又希望能够同时进一步促进国民福利。

最终,法国和中国的专制者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尤其是法国的税收改革和中国的铁路重组——的企图都触发了组织良好的支配阶级在政治上的一致反对。反过来,由于这些力量在君主制国家的集权机器中拥有正式的优势,他们当然会拒斥对这台机器的拆解。专制君主被废除了。而且既然支配阶级的形成是以各种制度和地理位置(如法国的高等法院、行省、代议机构和市政机构;中国的省、军队和谘议机构)为基础,这些都以各种制度和地域为基础而竞相规划各种政治安排,因此君主制的行政机构和军队也就无可挽回地分崩离析了。因此,法国和中国支配阶级对专制君主改革的成功反对,也就不可避免地打开了法国和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大门。

第三节 帝制俄国:一个落后的大国

在波旁法国和清帝国,革命危机之所以发生于表面上和平的时期,是

因为专制者试图改革和动员资源的企图受到了政治上强大的支配阶级的抵制。相反,在沙皇俄国,只是在战争失败的直接冲击下,革命危机才形成。在遭受最终垮台之前,俄罗斯的帝制国家不但经受住了欧洲国家体系中更为发达的国家所集中施加的竞争压力,而且实际上还发动了一系列相当程度上的现代化改革。因此,对革命前俄国的分析,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它与我们所描述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中国模式的相似和差异之处。

帝制国家与农奴经济

作为一个曾经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为生存和领主权而竞争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到19世纪时,俄国已经成了欧洲国家体系中居支配性地位的大国之一。其以令人畏惧的“欧洲宪兵”而闻名,同时也是扑灭中欧革命希望的凶手。帝俄肯定是比波旁法国和晚期帝制中国都更为军事化和官僚化的专制政权。¹¹⁷帝制俄国诞生于彼得大帝(1682—1725年)的非凡统治期间。通过对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在中世纪的莫斯科确立的个人专制的基础的开发,彼得突然把欧洲最新的陆海战术与“理性的”行政统治技术强加给他的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莫斯科没有受到西欧那种封建遗产的社会政治包袱的阻碍,这些措施很快就在俄国造就了比西欧任何地方都更有效率的国家权力。彼得“将从西欧借鉴的方法与……专制的东方政权结合起来。这种爆发性的混合……将俄罗斯的权力高度释放出来,直冲云霄”¹¹⁸。首先是,创设出来巨大的新式常备军。这些军队由被迫终身服役的农奴和贵族组成,由国家创办的矿山和工厂提供的武器进行装备,由沉重的直接或间税提供财政支持,其中包括对所有成年男性农民征收的面包税。反过来,这些税收又由新兴的文官组成的专职官员进行征收。在1700—1721年的北方大战中,新的俄国军队战胜了强大的瑞典军队之后,俄国随即建立起了一个由多元种族构成的帝国,从而成了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强国。尽管它的农业经济在当时和后来始终很落后;彼得的改革及其后继者们的活动,创造和利用了官僚国家的权力来平衡其缺陷。此外,俄国庞大军事机器在技术上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这种状况一直得以维持,直到19世纪,西欧通过工业化才实现了军事的复兴。¹¹⁹

至于帝国政权得以建立和维持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作为欧洲的一个支配性的强国的整个时期,俄国始终都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到19世纪中期时,在帝国的大约六千万人口中,大约只有8%—10%的居民住在城市。¹²⁰在广阔的农村中,数以百万计的农奴被束缚在自己的村庄或隶属于贵族或国家的庄园,他们主要生产粮食作物。当时盛行的两种地主/农奴关系体制,常常会在一个庄园中结合在一起,或者在某一地区混杂在一起,但是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地区性差异。在肥沃的黑土省份中,农奴为了抵债,每星期要用一半或更多的时间在主人的土地上服劳役。在土地不那么肥沃的省份,代役租就更为普遍。地主能够因此而分享农奴从手工业劳动中获得的非农业收入。¹²¹

有一部分土地比较贫瘠,恶劣的气候又常常变化不定,因而生产组织和技术就比较原始。农业技术主要以三圃制、分散的条地、共同耕作、数量极少的瘦弱耕畜及简单的工具为基础。“上述缺陷的后果是,低产量和经济歉收就不足为奇了。”¹²²事实上,“关于19世纪上半时期的……估计表明,农业生产基本上与上一个世纪相同,实际上类似于16世纪,甚至还可能类似于更早的时候。”¹²³

然而,这并不是—种停滞不前的经济。确实,技术和土地的单位产量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不变——南部和西南部某些新殖民地地区除外,在这些地方的土地上劳作的是工资劳动者,因而资本主义的农业较为发达。但是,在1719年至1858年期间,在人口几乎增加了三倍(从大约1600万增加到6000万)的情况下,农业产量的增长还能与人口的增加并驾齐驱。¹²⁴尽管有200万以上的土地是帝国吞并而来的,但是人口的增长还主要是原有地区的自然增长。黑土省份的可耕地得到了扩大,非黑土地地区的农民则通过手工生产或受雇于工商业而补充他们的收入。¹²⁵因此,在整个18世纪至19世纪,在农业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工场工业也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地方和地区间层次上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¹²⁶然而,尽管获得了这些发展,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建设铁路网之前,运输上的困难一直是这个幅员如此广阔的国家在通向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根本性突破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¹²⁷

克里米亚溃败与自上而下的改革

但是,在19世纪初期,工业化却正在改造着西欧的经济。这种改造的后果是,很快就使帝俄在重大战争和外交的国际舞台上处于防御地位。基于其地缘政治的情形,俄国的一个基本利益就是要控制黑海的出海口。¹²⁸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一系列的事件将帝俄从1848年革命之后在欧洲的支配性地位,拖向了1917年的瓦解和革命。而这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就是1854年至1855年克里米亚局部战争中不光彩的失败。在这场争夺黑海的舰艇控制权和对抗衰退的奥托曼帝国影响力的冲突中,俄国在失去其前任同盟奥地利支持的情况下,独自与英国和法国开战。战争最后发展到俄军被围困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俄罗斯港口。“由帆船组成”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抵挡不过由蒸汽所驱动的军舰所组成的强大的联合舰队”,¹²⁹不得不慌忙退守到塞瓦斯托波尔湾的入口。接下来,在场的军队经过数月的顽强抵抗和防御之后,塞瓦斯托波尔被7万英国-法国-奥托曼联合远征军攻陷。出奇制胜后签订的和平协定,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挡回近东,并剥夺了俄国在黑海驻扎海军的权利:

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1815年,俄国似乎还是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唯一大国……1848年以后,她似乎高高地凌驾于所有其他陆上大国之上:俄国的首要地位变成了俄国的支配地位。克里米亚战争则把俄国下降为只不过是几个强国之一……只要沙皇统治着圣彼得堡,俄国就不可能重新获得1815年那样的显赫地位。¹³⁰

而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战败对国内政治甚至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因为战败充分暴露了,建立在农奴制和前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帝制体系的不足之处。用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话来说:

克里米亚战争给俄国强大而稳定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打击。它显示出俄罗斯在不少重要方面的低劣之处。俄罗斯的战斗人员无法抗衡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他们唯一能在战斗中有效产生的作用就是变成海底的礁石;原始的俄罗斯步枪是关键性的阿尔玛(Alam)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向受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运输的人员和武器又受阻于落后的运输系统。在沙皇和高官们的印象中,战争的进程和后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个国家又一次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

国家。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对于再次获得强大的军事地位是必不可少的。¹³¹

正如俄罗斯以前的历史一样,对军事落后的感知,激发了帝国官员在沙皇的支持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明确的目标就是重塑——“解放”——俄国社会,但其程度则只是使之足以支撑国家的大国使命,同时又不引发任何在政治上危险的不稳定因素。第一轮的改革,由克里米亚战争的那一代人设计和执行,内容包括建立现代司法体系,引进普遍兵役制和扩大对职业军官的训练,创设地方自治性(zemstvo)的代表大会和市政杜马(duma),但同时又精心限制了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力。¹³²但是,在所有的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解放了千百万的俄国农奴。这一过程始于1861年沙皇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的第一个。

由于农奴解放是与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战败不久所推出的其他改革一起进行的,解放的目标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与维持帝国稳定和提高军事效率一道而释放社会能量,而不仅仅是为了直接推动经济发展。¹³³一方面,对农民实行司法平等是建立起由应征“公民”组成的现代军队的必要条件。而且,当时还有一种对农奴反叛的现实恐惧,农奴暴动的事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和之后都一直在增加。亚历山大沙皇宣称:“与其等待自下而上地废除农奴制,还不如现在就自上而下地废除它。”¹³⁴因此他不顾多数贵族庄园主的明确反对,而要求他们接受合法的农奴解放。他还要求地主们将相当一部分农用地的法定所有权授予农民,而大多数贵族则倾向于把这些土地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财产。

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在比较的视角下评估一下俄罗斯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在这种视角下可以看出,毫不奇怪的是,由于在军事上败给了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国家所造成的屈辱性后果,突然给俄罗斯的帝制国家带来了一场危机,从而刺激它去发动了一场现代化的改革。然而同样似乎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改革——尤其是解放农奴、直接侵犯了土地贵族所固有的经济利益——居然能够由帝国当局成功地实施。确实,支配阶级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他们既反对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改革内容,也反对改革者们制定和执行改革的专制和官僚的模式。¹³⁵但是,在1787—1789年的法国和1911年的中国,

支配阶级反对君主改革的努力却成功地废除了专制政体并瓦解了帝国体系。而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了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必须要观察俄国土地贵族的处境。

土地贵族的虚弱

俄国的土地贵族是夹在低度商业化的农奴制和帝制国家之间的一个阶级。与法国业主上层阶级和中国士绅一样,俄国这一支配阶级既从农民那里直接榨取剩余价值,又通过为国家服务的报酬而间接获得剩余价值。但是,与法国和中国的支配阶级形成显著差异的是,俄国的土地贵族在经济上很虚弱,在政治上面对帝国权威时也处于依附地位。

甚至在彼得大帝之前,俄国贵族的地位和每个家庭财产的代际传承就完全依赖于对沙皇的服务。¹³⁶俄国的农奴制并不是(像1400年以后的东欧那样)由商业化地主加以强化的,而是由沙皇来推动的。在危险的政治地理环境中,中央集权的沙皇出于防御和扩张的目的,决定从人民那里抽取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军事力量。¹³⁷如果要让传统上可以自由流动的俄国农民不断地工作以生产出可以征税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将他们拴在土地上;与此同时,为了装备对外进行战争和对国内社会实施控制的政权组织,沙皇也需要军官和文官。在几百年的时间内,独立贵族和王公的土地就被没收,这些土地被当成官员生涯的报酬而分配给一个新的服役贵族阶级。除了上述的做法外,沙皇还尽力确保没有任何新的独立的土地贵族产生。服役贵族被赋予拥有农奴“灵魂”和地产的权利。但是,典型的特征是,他们的地产并不集中于一个地方,甚至并不集中于一个省,而是分散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们就很难在地方和地区层面上团结在一起。

彼得大帝将这种情势推到逻辑上的极端:他将终身从军和担任文官的义务强制性地推向每一位成年贵族。被迫服役的贵族们在中央的命令之下,从一个职位被调向另一个职位,从一个地区被调往另一个地区,贵族们开始在总体上完全依赖于国家政权。与各省和家乡的地产的联系被进一步削弱。“他们自觉地或有同情感地被同化进了支配着俄国公共生活军国主义的、官僚式的和全球视角的观念。”¹³⁸服役成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基

本规范框架,而且……官阶等级成了贵族身份的唯一组织形式”¹³⁹。

在18世纪,俄国贵族最终从终身为国家政权服务的束缚之下释放出来,而且他们的私人财产权利也得到了官方的充分承认。新的从服役的职位上退出的自由,导致了各省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某种再生。然而,贵族们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¹⁴⁰在日益向往西欧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同时,俄国的贵族仍然倾向于被国家政权所雇用,将其看成是确保在城市定居和得到薪水与报酬的一种可靠机会。而这种薪水和报酬对他们来说又是一种必要的收入补充,因为他们的农奴制庄园在代际继承中越分越小,从中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即使贵族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会鼓励他们向农业经营做出投入,俄国的农业经济(在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也几乎没有为人们选择这种替代的生活方式提供多少激励。而且,俄国的农奴主几乎不对农业(或其他经济冒险事业)做任何投资,因为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他们实在太穷了。在他们之中大约有五分之四的农奴主(1777年占83%;1834年占84%;1858年占78%)所拥有的农奴(成年男性农奴)都不足100个——而这个数目被认为是维持有教养的生活方式的最低条件。¹⁴¹而且,在为了维持舒适的生活标准而奋斗时,农奴主们不仅成群结队地涌向国家职务,而且还将他们自己陷入了日益沉重的债务之中——部分是欠私人金融家的钱,但主要是欠国家的债。因此,到1860年时,66%的农奴都已经被其贵族主人“抵押”给了特定的国家信用机构。¹⁴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农奴主贵族一直依赖于帝制国家,但专制君主对土地贵族的依赖则越来越少。彼得大帝为那些在官僚机构中服务的、有文化的平民向上流进贵族行列开辟了一条明晰的通道。¹⁴³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从教士和城市家庭中录用非贵族成员,就会必然产生出一个脱离土地的服务贵族阶层,而与此同时,有教养的非贵族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庭数量的增加,又会供给更多的试图谋求官职的人员。其结果,新近的一项定量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

到18世纪末期,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僚机构,以及到19世纪50年代时的各省的官僚机构,基本成了一种自我维持和自我繁殖的团体。录用的人员来自于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土地的贵族阶层,以及

非贵族政府工作人员(军人、文职人员和教士)的子弟。¹⁴⁴

接受大学教育和投身于终身职业的意愿,是在国家政权的服务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土地财富似乎只是有利于促进这一事业,而且也绝不是唯一的方式。

在19世纪中期,没有农奴并不构成在官场上成功的障碍。(在我们抽出来加以研究的官员所构成的)整个贵族团体中,有近50%的成员在其家庭中根本就没有农奴……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农奴的贵族绝不仅限于低级官员。即使在高层,也有40%的服役贵族的家庭中根本就没有农奴。¹⁴⁵

将上述的情况结合到一起,就可以看出,俄国的贵族几乎形成了以独立的阶级或等级为基础的政治权力。那些长期居住在各省的贵族处于穷困和躁动状态,在官员面前毕恭毕敬。他们的自治机构只履行社会和文化职能。与此同时,在国家机构的部门中,守旧的贵族与那些新封的贵族和渴望成为服役贵族的人们处于竞争状态之中。职位的升迁则来自于皇室的批准或刻板地执行命令与章程。集体性的政策动议或抗议则既不会受到鼓励,也得不到什么帮助。与旧制度法国相反的是,在俄国并不存在比较成熟的代议机构、半政治性的自治机构或可以捐得官位,因而在帝制国家的结构中就没有为支配阶级提供一种发挥其影响的政治杠杆。在这一方面,俄罗斯更像是1908年之前的帝制中国。然而即使当中国的帝制体系达到其巅峰时,中国的士绅也比俄罗斯的贵族在地方上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独立地位。俄罗斯也并没有像1840年之后的中国那样,出现地方和各省的士绅权力增长的情况。无论是作为地主的贵族,作为官员的贵族,还是二者一道(这二者之间的交叠范围在收缩),几乎都不享有自主性和集体性的政治权力。相反,他们依附于他们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之间的个人联系,依赖于专制君主为维持现存秩序的稳定而承担的整体性责任。

我们可以在这种背景下结束对农奴解放所做的分析。很明显,俄国土地贵族的虚弱性,解释了为什么这一阶级不能阻止农奴的解放,更不用说以贵族的名义或自由的“立宪主义者”的规划去打倒专制——帝制政治体系。如果俄国的土地贵族像法国和中国的支配阶级那样,拥有对抗帝

制国家的经济力量和政治-行政杠杆,那么,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就非常有可能出现革命性政治危机。相反,实际上是沙皇专制政权在屈辱的克里米亚战败之后,通过发动改革而取得了成功——在改革措施中包含有严重损害拥有农奴的贵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¹⁴⁶

然而,如果得出结论说,由于俄国的土地贵族不能对实施改革的专制政权实施有效的政治抵制,因此他们对解放农奴的政策毫无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尤其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土地贵族最终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土地贵族毕竟是拥有农奴的支配阶级这一既存事实,还因为帝制国家与农村的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制度性的联系,从而对帝制国家的有效权力施加了内在的限制。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专制政权解放农奴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帝国统治。因此,沙皇及其官员们决定,不仅要赋予农民以法定的人身“自由”,而且要将他们所耕作的相当一部分土地授予他们。¹⁴⁷在他们看来,如果获得解放的农奴没有财产,就一定会走向反叛;他们同样担心出现突然的失序和大量的无产阶级。但是,由谁来决定将多少(和哪些)土地交给现存的农奴呢?要逐个地方和逐个地方地、逐个庄园和逐个庄园地在贵族与农民之间进行财产的分配,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政策实施机制。在历史上,由于帝国的管辖权止于贵族庄园的大门之外——是贵族及其代理人在庄园内维持秩序和征集税收——在许多地方,只有贵族及其代理人,才拥有对执行解放农奴的政策至关重要的、农奴制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状况的详细知识。因此,帝国当局不可避免地要委托贵族委员会去设计如何给他们的农奴分配土地。¹⁴⁸这种安排就自然而然地保证了,贵族们能够在整体性的解放法令的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在土地肥沃地区,农民只获得了最少量的土地;而在那些不那么肥沃的地区,他们也被迫要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土地而支付赎金。而且,各地农民获得水、牧场和森林等关键性资源的通路都被切断,随后他们就不得不向以前的主人租用这些资源。

因此,在既有的农村阶级关系的界限内执行解放农奴的改革,就不能——实际上也没有——为俄国农业的快速工业化扫清道路。¹⁴⁹因此农民所得到的,是数量并不充足而赎金却相当沉重的土地,他们不得不在数

十年内都向政府支付这种赎金。而且贵族们也几乎没有被刺激起来向农业现代化投资,因为他们已经合法地占有了相当于原有庄园 40% 的土地和方便的廉价劳动力,赎金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大笔横财(由国家支付给他们),可以用来偿还先前积累下的债务(大多数也是欠国家的)。农奴解放所取得的确定的成就是,帝国在控制农民和从农业中抽取税收方面,取得了更为直接和更具有排他性的地位。土地贵族被沙皇政权推到了一边。但是,尽管地主们因为农奴解放及随后的影响而遭受了重创,却仍然是庞大而停滞的农村经济中的支配阶级。因此,在帝国随后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时,这种经济仍然拖着后腿。而且土地贵族也仍然是农民反叛的潜在目标。

最后应该注意到的是,在 1860 年之后,俄国的在野贵族,包括那些仍然是地主的贵族,在专制政权面前仍然处于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地位。即使作为十年改革的一部分而设立地方的自治机构——地方和省的代议机构,贵族们享有比例不等的选举机会——之后,这些贵族的地位也仍然很软弱。地方自治机构最多只能设立一些分支机构来处理地方的社会和文化事务,而且根据规定,其提供教育、福利和经济咨询服务的财政基础非常有限。但是,这种由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所控制的服务部门却开始在社会政治权力的等级体系之外发展开来。因为,帝国当局垄断了行政机构和强制手段,并且通过税收而持续不断地抽走了大部分的农业剩余,只有在自治机构没有对中央的控制和政策制定特权发起挑战的程度以内,帝国的官僚机构才会容忍它的存在。¹⁵⁰

将俄国的情况与中国设立的由上层阶级支配的代表会议(1908—1910 年)时所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将很有意思且足以突出俄国的特点。在中国,士绅们已经在事实上拥有了很大的行政和军事影响力,因而帝国当局最终变得虚弱并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因此,新的代表会议就使得中国的支配阶级早已享有的权力获得了集体性的政治表达。但是,在旧制度俄国,专制政权是如此强大,使得它能够有效地创设出完全受到限定的代表机关。清当局虽然也想在中国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却最终失败了。在 1905 年俄国政权因战争失败而暂时动摇之前,俄国的自治机构(和城市的杜马)都没有成为在政治上威胁专制政权的力量。直到那时为

止(以及在1906年之后),帝制国家都保持着榨取并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俄国社会,甚至是进一步损害贵族利益的权力和主动权。

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

在克里米亚战后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之后,俄国政权的下一个重大举措,是用了相当大的努力来自上而下地刺激工业化——但是,这一改革也是在经过一些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政策的主动实验之后才开始的。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俄国向对外贸易和投资敞开了大门,其所根据的理论基础是,这种开放能够从国外获得现代工业、交通设施和技术,并以此换得农业出口的加速发展。¹⁵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内外的私人企业的推动,铁路的里程得到缓慢而稳定的增长。但是,铁路用钢却是由进口原料制成的,以至于“俄罗斯的采矿业和冶金业几乎没有受到鼓励”¹⁵²。与此同时,随着国际粮价的下跌,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从而其外债和进口需求也开始增长。战争(例如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军事准备(例如1886年的保加利亚危机)也一直在吞噬着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农民的付税能力被拉到了极致,导致1891年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¹⁵³很明显,俄国政权的荣耀需要另一种战略来维持。

19世纪90年代,在财政大臣塞哥·维特(Sergei Witte)的领导下产生了这一战略。维特坚信,“在世界上将实现伟大历史使命作为天职的大国,其政治实力”直接取决于相对的工业实力。“国际竞争势不可等”,维特在1900年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警告说:

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而果断的措施,以使我们的工业在今后几十年中能够满足俄罗斯和在我们影响之下——或即将在我们影响之下——的亚洲国家的需求,那么……我们工业的缓慢增长,就很可能危及君主实现伟大的抱负。我们的经济落后,也很可能会导致政治与文化落后。¹⁵⁴

维特同时还提出了一项紧急性的政府规划以推进全国性的工业化。在他于1892年至1903年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的政策“体系”得到了充分贯彻,内容包括增加政府用于铁路建设和运营的支出,为私有产业提供补助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和采矿业,因为这两大产业的

产品主要用于铁路建设和军事现代化)的保护性关税,扩大出口,稳定通货,鼓励外国投资。政府用于刺激工业化的支出来自于逐渐增加的大众消费品累退间接税和国外的贷款(这就要求必须要有可靠的偿债能力)。¹⁵⁵

就其本身而言,这一快速推进的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相当成功的。¹⁵⁶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为每年8%;在1892年至1902年期间,铁路里程在原有的坚实基础上增加了40%;欧俄的国内交流已经相当紧密,而且也与西伯利亚实现了贯通。在这种新形势的刺激下,接下来俄罗斯的重工业——采矿、钢铁和石油产业——迅速发展,而且是在大型工厂内用欧洲新近的技术来兴建。由于俄国的工业化并不建基于大众市场的需求,轻工业的发展就不那么蔚为壮观,但还是得到了扩张。与此同时,维特还设法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还通过引进金本位制度而稳定了通货。从农民那里榨取出来的“剩余”出售到了国外,以换取购买外国技术和维持收支平衡所需的资金。最后,所有的这些,都为1906年至1913年持续快速的工业增长(平均每年6%)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冲击下,国家主动进行投资的地位下降了。

然而,由于其本身的成就和局限,俄罗斯在世纪之交的快速工业化也为两场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其中一场是1905年基本上失败的革命,另一场是1917年成功的革命。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部分原因在于,它创造了新的阶级并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程度。亚瑟·门德尔(Arthur Mendel)很好地描绘了这一完整的画面:

除了危险地聚集起了一个无产阶级、一个专业人员阶级和一群反叛的学生团体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之外,工业化既激怒了这些新的力量,也惹火了传统的农村阶级。通过强制出口、垄断价格和实行累退性的税收——这些钱基本上用来支付现代化的费用——工业化彻底置换了身份意识强烈的士绅,并压迫着农民。它进一步在社会的所有领域中促成了旧有角色、旧有价值、旧有动机和旧有期望走向痛苦的崩溃……但是它没有留出足够的钱来改善糟糕的城市条件,而早已贫困潦倒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农民涌进这里之后,他们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¹⁵⁷

尤其是,就像未来的事件将会表明的那样,在旧制度的最后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国内变化就是快速形成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¹⁵⁸ 尽管工人的数量在俄罗斯的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少,然而这一阶级却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主要的工业中心,非常致命的是,他们主要集中于包括欧洲俄罗斯的两个首都——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内的大城市内。新兴无产阶级的成员都是新近才快速进入城市的,因而还没有完全断绝与农村的联系。或许,一开始,他们希望接触城市——工业环境的新鲜感,使得新加入无产阶级行列的成员很难提出抗议——尽管这些原来的农民也可能把家乡的集体团结和抵制传统带进工厂。无论如何,不久以后,产业工人的群集就使他们获得了工业世界中的经验和认同感。加上他们所面临的环境——经济贫困、缺少社会服务、沙皇政权(几乎一直是)禁止合法工会——已经为产业工人的下述倾向创造充足的理由,即他们倾向于罢工和接受激进政党的反专制、反资本主义思想,而他们在1890年之后也的确这样做了。因此,快速的工业化创造出了一支可怕的大众力量,他们既能反抗帝制国家,又能反抗帝国所大力扶持的工业资本巨头。

然而,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工业化所产生的国际意义。首先,由财政所推动的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将俄罗斯的政权和经济与西欧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弥补本国资产阶级虚弱的力量,官方鼓励外国私人投资者向受关税壁垒保护的产业投资。外国资本在俄罗斯投资兴建公司的资本(大多数是重工业)从1890年的2.15亿卢布增加到1900年的9.11亿卢布,1914年则增加到20亿以上。¹⁵⁹ “1900年,俄国有269家外国公司,其中只有16家是在1888年之前兴建的。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大多数集中于南部的冶金业和采矿业,英国的投资集中于石油产业,德国的资本则主要投向化学与电力工程。”¹⁶⁰ 与此同时,为了支付进口工业设备的费用并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稳定通货和树立投资信心都取决于这一平衡,俄国主要依靠的是向英国和德国输出农产品。¹⁶¹ 为了从财政上支持政府的产业投资(政府的投资甚至超过了数额巨大的外国投资),沙皇政权依赖于向德国、英国、首先是法国借到的贷款。¹⁶² 贷款的数量相当巨大:

全国性的债务……(的增长步伐)几乎等同于国民收入……到1913年时……俄罗斯的全国性债务居世界各国的第二位。但是,按每年偿付债务的数额计算,俄国则居第一位……俄国所借的外债数额已经略微超过了内债。¹⁶³

因此,俄国经济与欧洲的金融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1899年至1900年期间,西欧的货币市场紧缩时,在19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的俄罗斯工业也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其衰退的程度和时间比当时受罢工影响的西欧工业还要严重。¹⁶⁴这一倒退“在1905年革命之前5年左右的时间内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满”¹⁶⁵。

那么,晚期的帝俄是否就是西欧的半殖民地呢?有一个案例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一观点。毕竟,俄罗斯在进口西欧的技术与剩余资本,并以初级产品的出口来偿还利息。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被高度压缩,以维持贸易平衡和金本位制度。而且,俄罗斯的政治同盟也开始支持它的主要债权国英国和法国。另一方面,按人均资本计算,俄罗斯的外债数额又低于瑞典和美国。¹⁶⁶研究者们也没有发现外国公司或者投资者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寻求控制的证据,而且,也没有发现俄国或西欧的政府官员将沙皇政权看成是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依附性政权。¹⁶⁷无论如何,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也扩展到了德国。

勿宁说,更有意义的假定是,俄罗斯一直是作为一个欧洲政权体系内的一个竞争性大国而存在的。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十分合理地解释导致一战爆发的俄罗斯的同盟关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结成了松散的同盟关系,外交能够成为保护俄国利益的基础。接下来发生的是,帝制德国的统一和快速的工业化——这种情况扰乱了欧洲的外交并威胁到了俄罗斯(尤其在德国不知不觉地与奥地利结盟之后,威胁到了她在巴尔干的利益)。因此,正是在欧洲的“均势”逻辑的作用下,俄罗斯被“推向了……与西欧结盟,而这种结盟又将它西部边境的安全建立在军事而不是政治关系的基础之上”¹⁶⁸。

这种情况根本就不意味着,晚期帝俄的经济发展不包含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意义——而正好说明的是,最为重要的后果与俄罗斯应对国际军事竞争的能力密切相关。因为,尽管在1880年之后,俄国的工业发展,尤

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还是远远落后于它不得不在外交上、将来还有可能在军事上打交道的其他国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的人均实际收入仍然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的三分之一。¹⁶⁹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在1860年到1913年期间,尽管俄罗斯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大体上与整个欧洲的平均水平相当,但仍然低于美国的2.5%的增长率、德国2%的增长率和日本3%的增长率(1878—1912年)。¹⁷⁰很明显,俄国“没有能够在经济上赶上西方世界,而且甚至还远远落后于领先的国家”¹⁷¹。

决定性的问题是农业处于低水平的实际增长状态,而农业又一直是俄国经济的优势部门。甚至在1890年之后,重工业所取得的非凡的不成比例的扩张,也不能对落后的俄国农业提供补偿。因此,维特的强制工业化规划没有能够达到国际均势的战略目标,而正是出于这一目标,沙皇才在这一规划会在国内助长专制统治的敌对性社会倾向持续存在的背景下,一开始就支持这项规划。¹⁷²

战争的影响

然后,到20世纪之初,革命性危机的条件已经明显成熟,因为即使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帝俄仍然“作为其残酷命运的一部分,在欧洲与世界的权力政治中维持着一个大国的地位”¹⁷³。在战争中产生并锻造而成的俄罗斯政权,是与社会力量相隔绝并凌驾于其上的一支力量,只有在总体性战争中遭受大规模失败后,这一政权才会屈服。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将成为一个必要的原因——也是一个必要的机会——产生出革命性政治危机以推翻帝俄。

为了确切地观察事件发生的原因,最有启发性的做法就是将1917年的10月革命与1905年流产的革命进行比较。托洛茨基曾经将1905年称之为是为1917年所做的“演练”。实际上,参与这两场戏剧表演的,确实是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但是剧情则完全不同。伊萨克·多伊奇(Issac Deutscher)认为,1917年的革命“是在其1905年停下来的地方再次开始的……革命的‘立宪派’阶段实际上在1917年以前就演完了”¹⁷⁴。他的这种说法已经相当接近真实情况。

1905年的“革命”非常类似于1917年的革命，因为它也发生在一场失败的战争过程之中。为了将争夺远东的殖民地和转移国内的不满的做法结合起来，以形成内政大臣怀切斯拉夫·冯·普烈维(Viacheslav von Plehve)所设想的一场“胜利的短期战争”，沙皇政权于1904年与日本开战。但是，随着帝国的陆军和海军的节节败退，一场席卷所有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在国内聚集着能量。代表地主、专业人员和资产阶级的全俄罗斯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于1904年11月)要求实现公民自由、所有阶级和民族的法律平等，并且还要求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和立法大会——实际上就是要求建立自由的立宪君主政体。排山倒海的产业工人罢工提出了经济要求，并支持反对专制政权的政治运动。1905年6月爆发了著名的波特金号军舰起义事件。革命在1905年10月达到高潮，由铁路工人罢工转变为政治总罢工。面对所有的这些情况——实际上看起来像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革命——沙皇开始退缩：在10月宣言中，允诺将兑现公民自由，并召开基于广泛选举权的立法杜马。¹⁷⁵

然而，1905年革命被击退了，到1907年时则被击败了。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由于短期战争败局的明朗化和革命威胁的到来，沙皇政权立即结束了与日本的战争。朴次茅斯和约于1905年签订，使得帝国在满洲的军队能够得到整顿，并在随后经过挑选后投入了骚动的欧洲俄罗斯。¹⁷⁶很明显，1905年的革命以及持续到1906年的工人和农民骚乱，之所以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除了是因为战争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关系外，还是因为“欧洲俄罗斯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军队的驻防”¹⁷⁷。但是，由于俄日冲突的有限性和边缘性，沙皇政权很快就能调整这种暂时的局面。因此，当军队回到国内来镇压罢工和农村的反叛，并拘捕了惹麻烦的政治领导人之后，尼古拉二世就一个接一个地收回了他的立宪让步，直至专制主义在实质上完全恢复旧态。对他而言，1905年革命已经成了一场“逝去的风暴”¹⁷⁸。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情势。这场冲突将整个欧洲国家体系都卷了进来。一旦战争得以进行，俄国就既不能袖手旁观，又不能随意退出。“俄国在1914年的动员令是对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和德国支持奥地利而对俄罗斯的领土构成威胁的直接反应。”¹⁷⁹而一旦

法国和英国投入战争,他们就依赖于与盟国的合作。帝俄就注定要与强大的德国之间进行一场持久的对峙。

对帝制国家而言,军事失败和经济与行政的混乱是必然的结果。这些情况随后就产生出了革命性政治危机。客观条件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其他出路。从1914年到1917年,俄国动员了1500万人参军,但是国家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来支撑他们对抗德国的努力(只是在与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军队作战时才取得过一些实质性的胜利)。

在战争开始之时,俄国的步兵师所拥有的轻炮连数量只相当于德军的一半。重炮连的差距更大:俄国军队有60个重炮连,而德国的军队则有381个。至于弹药,国有工厂的年产量只有60万发,而战争期间的年度需求量很快就增长到生产量的70倍。私人产业的设备太差,很难转向军需品生产,即使要转产所花的时间也很长。早在战争开始的第5个月时,军队的弹药就十分短缺;不少前线的战士赤手空拳就投入了战斗。只是到1917年时,俄国才生产出足够的武器——尽管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是赶不上敌军。¹⁸⁰

然而,到此为止,俄国军队已经一再遭受德军的重创。死伤和被俘的人员高达数百万,而且相当一部分新式的职业军团也被消灭。现役军官又只能由那些受过教育的平民预备役军人来替代并逐级提升。更为致命的是,沙皇的军队不再是与社会隔离的、在忠实可靠的保守主义分子领导下的职业组织。¹⁸¹

运输系统是俄罗斯的另一束束缚。在没有良好公路和内陆水运不足的情况下,铁路就成了顶梁柱。尽管从1860年开始,俄国的铁路就获得快速和相当大的扩张,但是,直到1914年,德国铁路的密度(铁路里程除以领土的单位面积)都在俄国的10倍以上。此外,俄国的机车车辆在技术上陈旧过时。例如,由于没有汽刹,货运列车只能非常缓慢地行驶。¹⁸²这就意味着,前线军队的后勤服务(供给和撤退)受到了牵制。这还意味着,在后方,工业生产被迫缩减,城市臃肿不堪,其中挤满了不断增多的新兵、兵工厂的工人和辅助部门的人员——他们都得不到运输服务。“受铁路系统供不应求打击最大的是大城市,从1916年冬天到1917年冬天,大城市的食品、燃料和原材料都极端匮乏。”¹⁸³

1917 年的革命性政治危机

这些条件是如何转变成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呢？由于俄罗斯（从 1915 年春天开始）走向巨大军事失败的局势日渐明朗，支配阶级逐渐对沙皇和专制政权失去信心。由于无休止的战争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关系，深受重创的下层阶级开始厌倦战争并出现了反叛倾向。最后，这些社会不满——因为在战时条件下，政权组织与社会团体之间通常存在的屏障被打破，从而会产生出新的潜在力量——在俄罗斯的城市里聚集起来，引出了几乎是普遍性的否定专制政权的政治表达。

在战争开始时，所有政治表达团体（除布尔什维克和少许孟什维克外）都发誓要“热烈”支持对“祖国”的保卫。当战争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难浮出水面，特权阶层的最初反应是，创设各种委员会并扩展已有代议机构和地方组织，以为军事和行政机构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1914 年 8 月，各省的自治机构联合起来，组成了全俄救援伤病士兵自治联盟，各城市也联合起来，创设了全俄城镇联盟。这些组织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资源，帮助军事当局维持军队医院和救护列车，为军队提供食品和衣物。他们还帮助疏散难民，与战时产业委员会一起动员私有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并尽力满足平民的需求。到 1915 年，在这些地方/代议组织、杜马成员、部长和专制官僚机构的领导中建立起了关系紧密的、制度化的理事会。¹⁸⁴

这种国家政权与特权社会阶层之间的和睦亲善关系的重要意义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因为，虽然在供给和服务方面为满足军队的直接需求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即使在这种官僚机构与志愿组织结合的情况下，也不能克服基本的困难。前线的失败和“后方经济生活逐步瓦解”在持续蔓延。¹⁸⁵ 部分是为了应对这一现实，部分是为了应对沙皇尼古拉在危机中的古怪行为*和宫廷中以前曾亲德的顽固保守派小圈子，杜马中的多数派制定了一项改良主义的政治规划，并得到了省自治机构、城镇和各种委员会的支持。1915 年 8 月，杜马要求沙皇只能任命那些获得了“公众信任”并得到了立法机构支持的人为大臣，应该对少数民族和工会采取自由

* 因为他一方面继续重申自己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却仅限于接触自己的德国妻子和怪异的拉斯普廷(Rasputin, 时为沙皇的巫医)。——译者注

主义式的安抚措施。或许是因为战争在他们与“立宪自由派”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工作关系,许多大臣、官僚和军官都支持这些非常温和的要求。但是,尼古拉不愿意牺牲专制原则,因此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平民和官员们对他的厌恶感不断增加。特别是因为人们能够用民族主义词句来进行表达时,公众的批评到处可见。人们哀叹战争的管理失误,认为沙皇及其小圈子应该作为一种方便的替罪羊来承担责任。对于沙皇而言,更为不祥的预兆是,在由新近提拔或任命的官员所充斥的官场中,人们纷纷谈论可能会发生一场政变。

然而——由于惧怕民众暴动,而且或许认识到他们自己在事实上并不能比沙皇更好地应对战时困境——特权阶层退缩了。他们从来都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改变政权的措施。当沙皇将杜马休会时,他们遵命而行。与此相反的是,1917年2月,当坏天气恶化了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时,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则自下而上地推翻了垂死的专制政权。实际上:

罗曼罗夫专制政权在1917年3月的垮台是历史上最无领导的、自发性的、乌合之众的革命……甚至在革命领袖中,也无人认识到,3月8日彼得格勒暴发的罢工和面包骚乱,将会在四天之后发展到驻军兵变和推翻政府的高潮。¹⁸⁶

确实,彼得格勒的起义者们,最初得益于特权阶层和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对废除沙皇专制的默许。¹⁸⁷但是,工人和普通士兵之间正在形成的联系,将很快就会导致上层阶级的任何抵抗都归于无效。因为在后方城市的卫戍部队中——包括关键性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都充满了刚招的新兵,他们充分了解前线的进展,而且还非常熟悉普通工人因物价暴涨和基本设施短缺而受痛苦。¹⁸⁸因此,当一家工厂停工和国际妇女节游行同时在彼得格勒发生,并导致在推翻专制政权的号召影响下的抗议活动大面积出现时,示威者们说服警察和军队不要向他们开枪就并不困难。一旦最初的反叛出现,就会无法抑制地从一个部队扩散到另一个部队,从工厂的工人扩散到铁路工人,从首都彼得格勒扩散到莫斯科和其他各省的城市。¹⁸⁹

突然之间,沙皇专制政权没有了,国家政权也迅速土崩瓦解了。1917年2月之后,在首都和其他城市中,有组织的力量通过并围绕着新建的“临时政府”行动起来,设法确定和控制统一的机构——自由民主的全

国性政府——以替代不复存在的专制政权。但是，在沙皇刚刚退位之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协调反叛的武装卫戍部队。而且，当苏维埃和其他群众性政治组织为赢得支配各种机构和职能的权威而与杜马、省自治机构和临时政府相互竞争时，帝国的行政机构很快就走向了瘫痪和解体。各个城市的党派竞争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加剧了日益扩散的混乱并使之政治化，而正在进行的无情战争，也恶化了这种局势。¹⁹⁰

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反抗也正在积聚力量——城市、前线和广大的农村莫不如此。而且，由于失去了他们曾经全面依赖的帝国行政和军事机构的保护，城市特权阶级和地主贵族在自下而上的攻击面前也脆弱不堪。正如我们将会第三章和第六章中看到的，这种局面的后果是，在现代革命史上导致了最为快速和自发地推翻了既存政权和支配阶级的现象。

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波旁法国、晚清中国和罗曼诺夫俄国的情况。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尝试性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所有这三个旧制度下，之所以会出现革命性政治危机，是因为，在一个受资本主义所驱动的、正处于不均衡转型的世界中，与专制性、原生型官僚政权组织紧密相关的土地所有制，阻碍或束缚了君主应对日益高涨的国际军事竞争的主动性。在法国和中国，富裕而政治上有权的地主上层阶级，阻碍了甚至是现代化改革过程的最初尝试。在俄国，软弱的地主贵族虽然不能阻止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却成了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的障碍，从而使沙皇俄国无法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它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主要敌人——德意志帝国。而且，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国家发动的改革受阻所产生的最终影响是，君主专制政权的垮台，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组织走向瓦解。在支配阶级不再求助于专制政权的支持时，自下而上的反抗就有可能会出现和扩散。社会革命也就即将到来。

第四节 作为反例的日本与普鲁士

这里所提出的关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危机的特殊原因的观点

是否成立,首先要看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三个历史案例。然而,根据比较历史分析的逻辑,如果能够证明,正是这些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特别重要的原因,使得它们的社会发展和危机模式,不同于那些具有可比性,却并没有经历社会革命转型的国家所具有相当类似的模式的危机,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肯定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将这三个国家的情况与1868—1873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和1807—1815年普鲁士改革运动进行比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危机没有导致原生型社会革命(proto-social revolution),反而是作为自上而下发动的有效的结构改革的前奏而存在的?通过对比有关社会革命性政治危机的特殊原因,将会进一步确认我们的观点。将普鲁士和日本与法国和中国来进行比较尤为恰当,下面的讨论将强调二者之间的这种对比。但是,在每一部分的结尾处,也要与俄罗斯进行相关的比较。

日本的明治维新

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政体的一次突然而根本性的重组。在德川幕府所支配下的、以地区为基础的贵族政府所构成的幕府体制,被改造成了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的、充分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¹⁹¹明治维新为明治寡头执政集团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自上而下发动的根本性现代化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改革又在随后为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日本跻身于主要的现代军事强国之列。

与波旁法国和(尤其是)晚清中国的革命性政治危机相似的是,导致明治维新的危机是由外国的军事压力引起的。在舰队司令佩里(Admiral Perry)于1853年抵达日本之后,工业化的西方列强一再侵犯日本德川幕府的政治主权,逼迫它向外国使者和商人开放港口。而当西方列强进入之时,正值幕府相对衰弱,而许多名义是江户时代将军封臣的大名所治理的藩(省级领地)则相对强盛起来。外国人的入侵不但引发了排外运动,而且也引发了日本政治精英的内部斗争。然而,与法国和中国在国际局势的大潮中引出危机的政治发展截然相反,在日本出现了另外的结果。德

川幕府政府结构远远比不上波旁法国和晚清中国的中央集权程度，因此，即将到来的反对中央的运动似乎取得成功的条件十分理想。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并不是（像法国和中国那样）一场反对君主试图推行理性化改革的抵制运动，而基本上是来自外围、享有更少特权的藩阀政治贵族于1868年从中央发动的一场政变，用天皇取代幕府将军成为国家元首。然后，他们再利用本藩的军事力量和新建中央政府的资源及威望，一步一步地推进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与行政变革。贵族身份和特权被废除，以使所有臣民享有形式上平等的权利。而且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和高高度官僚化的全国性政府来替代先前分散化和碎片化的行政管辖权。全国性政府随即进一步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国家推动的工业化。

日本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答案的一个关键性部分是，幕府时代的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我们已经指出，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中国，经济上富有的地主上层阶级在未充分官僚化的帝国国家组织体系内，获得了集体性的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吸干了本来应该由中央控制的国家税收，并据此而能够阻止有可能伤害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现代化改革的实施。在德川时代的日本，也有地主——大致类似于中国地主士绅和富裕农民的家族，因为这些家族也在经济上富足，并支配着地方性乡村集镇。¹⁹²然而，像商人一样，这些地主也被排除在地方之上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之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形成了私人经济财富和将军、大名及其众多武士等级代理人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分化。诸如地主贵族和商人等财富的拥有者，被禁止携带武器，只有在地方层次上才能担任政府职务，其活动在社区之内受到了武士长官的严格监督。¹⁹³与此相伴的是，幕府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是作为一个前工业化的贵族政权，却实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官僚式理性化。从16世纪起，在所有的各个藩阀的领地内，领主的武士代理人就与直接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相脱离，他们也不直接管理农村社区，而是被聚集在城市要塞和行政中心。武士们因此而被排除了对土地的控制，其生活只能依靠中央国库定期发放的薪金和津贴。他们逐渐发现的一个无情事实是，他们已经从粗鲁的战士被改造成了受过正规教育的、常常是专业化的官员。在作为将军或大名领地内的官员而承担职责时，他们要

受到严密的、而且越来越没有人情味的精英纪律的约束。¹⁹⁴

在地主——商业财富与官僚政治权力之间的这一重要分殊，是幕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日本在对西方的压力做出反应时，为什么能够出现明治维新的这种变化。领导维新的是武士阶层。¹⁹⁵他们在“外围”的长洲和萨摩掌握了行政和军事权力，从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用来反对幕府将军的独立资源。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是地主或与地主并没有紧密的联系，这些人就能够毫无阻碍地通过政治集权化的纲领来追求民族救亡事业。“由于他们不是土地贵族，因此其抱负只能通过为政府服务中取得成功来满足。”¹⁹⁶在德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其他成员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要么参与明治维新运动，要么则默许改革，以换取他们能够在新的国家职位中取代被废除的官员。

同样重要的是，维新危机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在既有官僚统治阶层内部进行，是因为没有牵涉任何拥有政治权力而拒斥国家集权化的地主上层阶级。这种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上层阶级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与法国和中国地主阶级的抵抗所造成的后果不同的是，在日本，地主阶级的抵抗不可能破坏专制政治的权威，不可能对既存国家职能形成挑战，不会瓦解国家对下层社会的控制。相反，在日本的整个维新危机期间，政治与行政阶层始终一致坚持维护常规性财政与政治职能的延续。¹⁹⁷明治改革者们与既存的结构与人员一道，一步一步地变革政治体制的整体结构。“尽管幕府与藩阀体制已经被废除，不过许多旧的权威渠道和既存的行政机器也可能被利用起来，因此就可以用微小的渐变来满足现代的需求。”¹⁹⁸

在明治维新期间，先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阶级和集团，也就因此而没有获得任何新的介入机会，明治维新也就一直被恰当地描述为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¹⁹⁹。最为关键的是，尽管地方性的“农民暴动”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就相当普遍，而且此后也一再发生——甚至在维新期间和之后变得更为频繁，但是却并没有发生对明治转型有推动作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正如波顿(Hugh Borton)所指出的：

明治维新的形成与农民无关。维新直接反对的是外来压力造成日本半殖民化的危险，它同时也反对德川政权，因为后者已经无力进

行有效的统治。它是由帝国宫廷内的政变促成的，农民则发现，他们自己成了武士支配阶级成员所发动和推行的变革的牺牲品……统治权力已经从一个主要的武士集团（德川幕府）转向了天皇和支持天皇的西南藩阀手中。没有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的情况，没有出现农民要求掌权，并根本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局面。²⁰⁰

只是精心控制的军事动员中，才允许非武士阶层的成员参与维新。而且，当暴力冲突实际发生之时，也往往是在他们抗拒变革的企图出现之后才有的事，并且他们也只是参与了德川政治精英中少数心怀不满的派别。从一开始，忠于天皇的军事力量就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他们在1868年之后还稳步成长、更为强大。²⁰¹

明治维新——作为一场中央集权化的全国性革命，并没有遇到地主上层阶级的阻碍，也没有遇到以阶级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反抗——之所以可能成为面对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反应，正是因为德川政权尽管没有实现充分的中央集权，但早已变得非常官僚化了。一旦外来威胁促使日本为维护主权的延续而实施国家的中央集权，德川统治精英中的一些派别，就能够很快在内部自上而下地完成政治改造。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无需摧毁既存的行政制度，也无需打乱对底层的控制——而波旁法国和清中国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君主政权中的官员和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相互缠绕关系。

最后，将日本与沙俄比较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与波旁法国和清中国不同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专制政治当局都在设法安全渡过由国际局势引发的危机，并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相对于沙皇政权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通过改革和国家指导的工业化应对俄罗斯的局势危机而言，在君主复辟之后，由明治政权推动或鼓励的经济变革，更为成功地满足了应对国际紧急局势的需要。全面分析1880年之后日本快速发展的所有原因，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范围；然而，注意到日本所拥有的优势和俄罗斯在先前的相对劣势，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并没有受到落后的农业部门的阻碍。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时代的农业部门就已经定型，从而能够在1870—1920

年期间快速提高其生产力,而俄罗斯的农业则不能如此。为了充分解释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深入研究水稻耕作和面包类粮食耕作的不同潜力和需求。因为事实是,无论在德川时代还是明治时代,日本的农业发展都没有获得“现代化”的投入,而是通过劳动密集程度的加大和传统技术的扩展而进行的。与晚期帝制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德川时代的人口增长没有赶上生产力的增长,这就为1870年以后一段时间内同样情况的更快增长留下了空间。²⁰²其结果是,日本的农业不但能够提供出口(就像俄国一样,农业处于国家的持续压榨之下),而且还在日本第一阶段的工业化过程中,贡献出了投资性资源(通过国家政权进行抽取)、食品和人力,并为小型工业提供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依赖于农业贡献的能力(而且甚至是一般性的传统经济部门),使得明治政府能够避免像沙皇那样过度依赖于外国投资,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靠国家的投资来促进基础设施或重工业的发展。²⁰³

其次,日本还拥有另一优势。在明治维新时期,在成功地巩固了全国性政权的自主性之后,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并没有像沙皇俄国那样,面临着几乎是令人沮丧或危险的国际军事环境。在世纪之交,日本打了两场有限战争,一场对中国,另一场对俄国。作为两场冲突的胜利者,它避免了像沙皇当局那样在1905—1906年因战败而面临的混乱。然而,关键性的差异当然是,早期工业化的日本并没有充分卷入欧洲国家体系,而且在随后也根本没有经受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持久的总体性现代战争的可怕打击。因此,明治时期的日本和农奴解放之后的沙俄在这两个方面的差异都说明,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日本卷入国际体系的程度较浅,否则就会损害到它的自主性和稳定性。相反,沙俄的早期工业化,则只是将它更深地卷入了国际体系之中,从而导致帝制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解体。

普鲁士的改革运动

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进行的政治改造相比,1807—1814年普鲁士的改革运动所进行的改造实际上要微小得多。霍亨索伦王朝绝对君主的总体结构基本上都维持不变:唯一的重大修改“是反复无常的皇室规则被

更少人情味的官僚绝对主义体制所取代……”²⁰⁴也就是说,君主直接的、个人化的、独裁性地垄断所有政策动议权,并监管行政和军事事务的体制,被一种更有灵活性和更加职业化的体制所替代。这一体制实际上是由“受法律调整的官僚贵族集体专制的统治,他们在一小群部长和部长评议会所构成的精英们的领导下,只对他们的良心和……强势首相负责”²⁰⁵。这一政治修改的原因是,普鲁士国王的军队1806年在耶拿和奥斯塔德惨败于拿破仑之手后,他连续任命了一系列改革派大臣,并赋予他们非同寻常的完全行动自由。改革派大臣在绝对君主体制内强化他们自己的正式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军事改革措施,试图复兴普鲁士体制:废除了从事职业和拥有地产权的身份限制制度;解除了农奴的人身限制;建立了普遍兵役制。²⁰⁶

普鲁士的改革运动有几件值得关注的事项:第一,普鲁士的政权通过实施改革而从根本上得以存续;第二,其中所涉及的冲突仍然完全是支配阶级内部的派系政治阴谋,是“一万上层人士的内部事务”²⁰⁷,除非作为被操纵的对象,底层并没有卷入;第三,土地贵族的抵制极其有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精心的抑制;第四,仅仅是有限的一系列变革,就在相当程度上足以使普鲁士政权得以复兴,从而有助于其在1814年之后击败拿破仑,并因此而一直在工业化德国的统一过程中起带头作用。

1806年,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军队被拿破仑大军所击败,导致德意志的不少领土被占(一度还包括东普鲁士的部分领土),导致普鲁士正式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领土,并被迫接受法国开出的巨额赔款。但是,与俄罗斯的罗曼诺夫政权在1917年的命运不同的是,霍亨索伦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战斗和战败都来得快去得快,而且,法国与俄国之间在1806年之后基于权力均势的考虑,也决定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应该保持和平,并维持名义上的独立地位。²⁰⁸因此,1806年施加于普鲁士头上的国际压力虽然很大,却并不像一战期间俄罗斯所受的压力那么沉重和持久。

就像我们在研究明治维新时那样,再次将普鲁士与法国和中国进行比较,将具有直接意义。为什么普鲁士的官僚们所发动的改革只引起了有限的抵抗,而1787—1788年波旁王朝的大臣和1905—1911年清王朝所做的类似努力却突然引发了革命性政治危机?答案并不像日本的案例

中那么简单,因为普鲁士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地主上层阶级,即容克,其不少成员都是军队和文职官僚机构中的官员。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容克地主中出现了抵抗许多改革措施的情况,甚至还在政治上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呼声——这让人想起 1787—1788 年的法国贵族——要求建立起等级议会以分享君主的统治权。但是,容克抵制的效果非常有限(就像俄罗斯的贵族反对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改革那样),仅限于修改农奴解放法令的实施方案。对废除从事职业和地产所有权的身份限制的任何反对声音,与要求重新建立等级制政府(君主受制于权力分散的贵族代表大会)的要求一道,都被改革派大臣轻易压制或置之不理。²⁰⁹显然,法国特权阶层拥有大得多的力量来反对波旁君主制,就像中国士绅在 1911 年反对清王朝一样。那么,在普鲁士政权也是以地主上层阶级和专制君主在政治结盟为基础的背景下,是什么因素导致普鲁士的结局不同于这两个国家呢?

“普鲁士的独特性、其非凡的力量……来自于贵族的经济和军事权力与官僚机构的秩序、体制和效率的融合。”²¹⁰普鲁士是一个农业国家,地主贵族在政治上维持着对地方的完全控制,但是他们只是作为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的个人而加入到国王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之中,从而将各省编织进王国之中。而在法国和中国的体制下,富有的上层阶级个人和群体被允许进入王室行政机构的中上层;而且他们获得了正式的被认可的权利去阻止中央的协调性行政职能。但是,在普鲁士这个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这种现象没有也不可能出现。²¹¹

有句老话说,普鲁士并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这话表明了普鲁士没有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从 17 世纪中期到整个 18 世纪,霍亨索伦国王都在持续追求使这个王朝成为被欧洲政治所认可的强权。从而打造了一支拥有非凡纪律和效能的行政机器。这部机器的全部使命就是,统一并为朝廷从财政上榨取分散的世袭领地,首先是易北河以东相对贫困的地区。²¹²17 世纪 50 年代和 17 世纪 60 年代,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威廉(Frederick William)采取了第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他在当时建立了常备军,并利用它来削弱受贵族支配的等级议会的权力。而等级议会先前则管理着霍亨索伦王朝分散的领地,并控制着向国

王交纳财产的同意权。大选帝侯的后继者们以军事组织原则为模型，而建立起了一套行政机器，以榨取可能获得的每一分钱，“以用三流国家的资源来支持一流强国的军队……”²¹³

与法国不同的是，在普鲁士的行政机构中，官员的数量一直维持在最低水平上，重要的官职均不出售。税收不是“承包”给独立的包税商，而是由官员进行征收。在一套极其现代的年度预算控制体系的监督下，官员们负有严格的责任。官员们不能做出个人判断或提出动议，而是受到同事和上级严格的、多样化的和持续记录的控制，相关信息和动议的渠道则完全汇集到国王那里。²¹⁴ 尽管普鲁士的官僚机构主要雇用的是具有地主上层阶级背景的贵族，但是，在其行政机构中并没有类似于法国高等法院那样的自治团体，而且官员也不能从职务中得到财产。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职务保障：国王只要对某一官员稍有腐败或不服从的怀疑，就能够、而且常常会罢免、监禁甚至处决这些被怀疑有问题的官员。“官僚们是给国家做苦力的奴隶……整个官僚机构的运作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在上级敏锐的视觉范围之外，不存在可以信任的官员。”²¹⁵

然后，到 1740 年时，“普鲁士的国王已经将各省贵族残存的政治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²¹⁶ 而法国的波旁王朝和中国的满洲帝国，则都没有成功剥夺特权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力。普鲁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仅仅是因为霍亨索伦王朝能够强制容克服役，而且还因为容克作为一个拥有农奴劳作的商业化庄园的地主阶级，其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补充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霸权。除了在自己的庄园和农村享有政治统治权外，容克们管束农奴，让其提供税收和成为兵源。反过来，由于容克们拥有这种绝对的地方控制权，他们在交出省和王国范围内的领导权时损失很少，作为补偿，他们得到了免于邻近强国掠夺性军事权力侵扰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由于 18 世纪普鲁士的农村经济并不繁荣，容克们在为国王服役时，还为其家庭成员争取到了受雇用的机会。²¹⁷ 这种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结盟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兴盛时期的体制；然而，中国的政权却不那么中央集权和军国主义化，中国的社会更容易出现农民的反叛，而且，1840 年之后，正是清王朝的内外军事失败，才为士绅侵蚀省级政权开辟了道路。至于与法国的比较，对比就更为明显：法国的君主成

功地从地方权力体系中排挤了领主。然而,这种做法的代价是,王室的中上层行政机构受到了分散但却日益走向联合的业主财富所有者的渗透——官僚机构因而丧失了对支配阶级社会经济利益的潜在能力。而普鲁士的君主则并没有面临这一困难。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6年),普鲁士的体制成功地七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从而使得普鲁士在那场战争之后突然变成一个大国。²¹⁸直到18世纪末,官僚机构都一直有效地提供着税收。但是,一旦普鲁士的领土扩大,腓特烈大帝决定性的协调和领导消失之后,普鲁士的行政机构和官僚团体就必然变得笨拙而僵化——这是鼓励官员放弃主动性而盲目服从规则所必然产生的恶果。当突然要被迫面对由全民投票产生的、迅速而灵活的拿破仑独裁体制时,霍亨索伦王朝的专制机器就显得力不从心。

然而,一旦遇到外来威胁时,这一体制还是保持了迅速恢复的潜能。²¹⁹诸如史坦因(Karl von Stein)和哈登堡(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这样的职业行政官,以及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和格内森劳(August Neithardt von Gneisenau)这样的军事改革家都能够走到前台,将已经削弱的个人控制的霍亨索伦专制推到一边,并利用仍在发挥作用的现存政权组织来实施有限的措施,以使经济和社会能够更加灵活地支持军事专制。虽然贵族的头衔和特权并没有被废除,但是,也让一些能够购买地产或获得了在官僚机构中晋身所需的教育和庇护的平民出身的人,拥有这些头衔和特权的合法机会。农奴也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也开始实施普遍兵役制,这项措施使得普鲁士的军队突然膨胀。由于从新近的改革中获益,或者是由于法国的数年干预和财政勒索所引起的敌意的上升,军队受益于公民高涨的热情。所有的这些改革之所以都能够自上而下地顺利推行,是因为普鲁士的政权早已在社会中变得非常强大,也因为容克们再也没有从制度上阻止国家的具体政策动议的能力——尽管他们的现有经济和特权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改革相矛盾。

因此,将普鲁士和波旁法国及晚期的帝制中国相比较,就能阐明普鲁士的国家政权为什么能够在1807—1814年成功地实施满足当时需要的

现代化改革。但是,有关普鲁士改革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还需要通过与俄国农奴解放的比较才能有效揭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俄国的农奴解放是在原有的农村阶级结构之内实施的。而且,那种结构也就决定了1870年之后,俄国的农业增长率非常缓慢(没有取得向现代技术的突破)。1870年之后,普鲁士在解放农奴时,也通过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和产权调整。这种改革和调整也以各种方式强化了地主与农民之间先前存在的阶级关系。然而,普鲁士农奴制的废除,却有助于推进其农业在19世纪前六、七十年代的现代化和繁荣。²²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克里米亚战争后,沙俄的改革后果与1806年后普鲁士的改革后果之间的这一重大差异?

答案就在于,在废除农奴制之前和之后,这两个国家之间在农业生产关系上的差异。在俄国,农业生产的实际过程主要由农奴(后来是小农)村社所控制,地主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捐税和劳役,或通过租金来而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但是,在普鲁士,无论是在农奴制之下还是之后,农业生产却集中于由地主或其代理人所拥有并加以管理的大型、商业取向的庄园之中。与俄罗斯一样,当普鲁士废除农奴制时,地主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改革过程,从而维持他们在新生产方式中的传统支配地位。普鲁士的农民被迫把农奴制时期容克所有而自己耕种的份地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割让给容克的大庄园,以获得剩余土地的产权。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还得在容克的庄园里耕作,并因此而成为工资劳动者。

因此,一旦普鲁士的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并为贵族阶层开辟了成为富有投资者的通道,普鲁士的地主——统一经营下的大型完整领地的所有者——就能够开始采用需要“自由”劳动力的新型技术。他们就能够在德国国内外根据对市场的反应而出售谷物。其结果是,农业的繁荣(一直延续到1870年左右),在经济上支持普鲁士的政权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直至成为统一的、迅速工业化的、在国际上强有力的德意志帝国的核心。²²¹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奴解放之后,俄国农业的停滞束缚了帝俄的手脚,使其难以适应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体系的紧急情况。

总结

我们对导致明治维新和普鲁士改革运动的政治危机的基本条件做了简要考察。这种考察有助于通过比较来强化对本章的核心观点,即有关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原因所在。波旁法国、霍亨索伦普鲁士、明治日本、满洲帝国和罗曼诺夫俄国——所有这些国家都受到了经济上更为发达的外国的军事压力,都经历了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危机。然而,只有法国、俄国和中国曾坠入了社会政治危机的剧变,相对而言,普鲁士和日本则通过专制政治当局自上而下的改革,快速而顺利地渡过了国际性的紧急事件。为了适应国际性紧急事件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农业君主政权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能够通过观察农业生产关系,以及地主支配阶级侵蚀国家政权组织的各种方式,来解释这种差异性。当然,同样重要的是,要评估每一政权必须要应对外来压力的严峻程度。

在俄国,专制统治和支配阶级的特权所面临的革命性政治危机,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难以抵抗的重压,施加到了一个受制于落后农业部门的、早期工业化的经济体之上。在受到克里米亚战争的冲击之后,帝制国家仍然十分强大,因而能够压制支配阶级的利益,并推行现代化的改革。但是,这个政权不能重组农村的阶级关系,而这种阶级关系又有损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即使在国家推动的工业化取得非凡成就的情况下,也不足以促使沙皇俄国改革其落后的经济状况并赶上西方。它一直深深地卷入了欧洲国家体系并与这些国家一道冲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反,对于日本和普鲁士而言,无论是作为在农业落后时期,还是在早期工业化时期所面临的国际压力,都没有沙皇俄国那么大。

波旁法国和晚清中国都有相当繁荣的农业经济,而且他们所面临的外来压力也没有明治日本和霍亨索伦普鲁士那么大。这里存在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因果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是否存在或缺乏一个拥有相当程度的制度性政治影响力的地主上层阶级;这种影响力是否影响到了按照集权原则组织起来的王室行政机构的财政和军事/政治职能。如果这种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在行政上受到保护的地主上层阶级存在,就像在法国和中国的情形那样,那么,这些阶级反对专制君主试图发动现代化改革的活

动,就会导致推翻君主统治,并导致行政和军事组织猛然崩溃的局面。这种现象表明,由外因诱发的政治危机,发展成了潜在的社会革命的形势。但是,像日本和普鲁士那样,如果没有在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旧制度下的政权机器就会更加官僚化,那么,由外因诱发的危机就能够通过对政治冲突的约束而加以克服,广泛而言,是在既存的统治精英和行政制度内部克服危机。而且这种结果也就排除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本章一直要证明的观点是,法国、俄国和中国之所以会发生社会革命,是因为危机汇集于旧制度国家机器的结构和情势的中心而引起的。而且,这三个国家社会革命的实际发生,不仅取决于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还取决于旧制度的农业社会结构易于导致农民反叛这一事实。因此,为了继续进行这一分析,我们必须要在相反的视角下,重新考察革命前的社会,即不再是自上而下地强调国家政权、支配阶级和国际环境,而是自下而上地强调,农民在农业经济、地方政治和阶级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这将是第三章要完成的任务。

注 释

1. 关于作为一种国家类型的“帝制国家”的概念,我所依据的是 Frances V. Moulder, *Jan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5。然而,与 Moulder 相反的是,我坚持认为帝制国家是一种部分官僚制而不是非官僚制的政权。

2. 当然,这里所使用的官僚制的标准来自于 Mar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3 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chap. 11, esp. pp. 956—963。

3. (有关这个问题和其他初步讨论的)深入讨论和具体证据将在下面的案例分析中显示出来。包括法国、俄国和中国在内的五个前现代农业国家的城市网络的比较,可参见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Russia, 1750—1800, and Premodern Periodiz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5。

4. 我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前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虽然同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途径,但是,并没有完全接受他们任何一家的理论倾向。就马克思主义这一边而言,我的理论非常类似于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一书中所描述的早期现代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概念。但是有两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安德森在欧洲绝对主义和非欧洲农业帝国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线,而我则认为,在晚期帝制中国和大陆欧洲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农业绝对主义国家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包括废除乡镇自治)方面有重大的相似之处(我当然也没有否认,欧洲和东亚的整个大陆背景差异极大)。更为重要的是,我也不能同意安德森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这里所讨论的政权组织的特定形式——原生型官僚制——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在“封建”的欧洲,在农奴制或地主控制和剥削农民的其他形式与政权形式的变化和多样性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

显然,我观察国家/社会关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韦伯的影响(参见 *Economy and Society*, chap. 9—13)。但是我与他之间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差异。首先,韦伯倾向于根据支配性的观念类型——传统的、卡理斯玛的、合理合法的规范——来对重要的政治冲突形式进行理论总结。在他那里,统治权威及其职员组织依据这些规范而得以合法化。而我则更为强调国家权力的物质资源基础和组织化形式。其次,尽管韦伯喜欢将社会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论概括,但是他倾向于脱离社会经济结构来孤立地使用以政治形式为基础的范畴,而且他在分析政治动力时,首先是通过考察统治者及其职员体系之间的冲突来进行的。相反,我的有关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前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则强调,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军事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强调所要表明的是,这些社会的基本的、潜在的矛盾性紧张关系内在于生产阶级和支配阶级,以及这两个阶级分别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之中。

5. Stefan T. Possony, ed., *The Lenin Reader* (Chicago: Henry Regnery, 1966), p. 358. 引文出自于列宁 1915 年撰写的《第二国际的破产》。

6. 关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新近有益评论,参见 Alfred Cobba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0); Francois Fure, *Le Catéchisme Révolutionnaire*, *Annales: Economiew, Sociétés, Civilisation* 26: 2 (March-April 1971): 255—89; and Gerald J. Cavanaugh, *The Present Stat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Alfred Cobban and Beyond*,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 4 (Fall 1972): 587—606。

7. 例如,可参见: Georges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Elizabeth Moss Eva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vol. 1; and George Rudé,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3—181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8. 在这一方向上的开创性研究,参见 C. B. A. Behrens in *The Ancien Régime* (London: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7)。

9. 有关这一段和下一段论述(以及有关法国绝对主义的论述)的一般性背景,主要依据下列著作: Pierre Goubert, *Louis XIV and Twenty Million Frenchmen*, trans. Anne Car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ierre Goubert,

L'Ancien Régime 2: Les Pouvoirs (Paris: Armand Colin, 1973); W. H. Lewis, *The Splendid Centur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7); Menna Prestwich, *The Making of Absolute Monarchy (1559—1683)*, in *Franc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eds. J. M. Wallace-Hadrill and J. McManners (London: Methuen, 1957), pp. 105—133; and G. R. R. Treasure,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Rivingtons, 1966)。

10. Leo Gershoj,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1933; reprint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4), p. 6.

11. Nora Temple, *The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of French Towns during the Ancient Régime*, *History* 51:171 (February 1966): 16—34.

12.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trans. Charles Fril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chap. 2.

13. Treasure,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chaps. 19—21.

14. Behrens, *Ancien Régime*, p. 25. Behrens 对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的估计可能包括了较大的范围, 不仅考虑到拥有或租种土地的人, 而且也考虑到乡间的贫苦农民。

15. Jan Marczewski, *Som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France, 1660—195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9:3 (1961), 379.

16. 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及其局限的总体性精彩评述, 参见 Jan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7. 这一段和下一段相关论述的依据, 参见: Paul Bairoch,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Carlo M. Cipolla,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Collins/Fontana, 1973), vol. 3, pp. 452—506; Marc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trans. Janet Sondhei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Ralph Davis,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s. 17 and 18; F. Crouzet,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conomic Growths*, in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ed. R. M. Hartwell (London: Methuen, 1967), chap. 7; Behrens, *Ancien Régime*, pp. 25—46; and George V.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2 (January 1967), pp. 472—476.

18. Davis, *Atlantic Economies*, p. 313. 这一段的材料主要来源于 Davis, 但同时也依据了 Crouzet, *England and France*。

19. 我的有关 18 世纪法国支配阶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这部著作的启发: Pierre Goubert, *The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1600—1750*, trans. Steve

Cox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esp. chap. 6.

20. 例如,可参见佩里·安德森对封建主义的讨论: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and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21. Furet, *Le Catéchisme Révolutionnaire*, p.272. 在 Jerry Karabel 的热心帮助下,我将引用的段落从法语翻译成了英语。

22. 这一段和下一段的有关论述建基于:J. McManners, France, in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Albert Goodw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p.22—42; Behrens, *Ancien Régime*, pp.64—84; Colin Lucas,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 60 (August 1973): 84—126; William Doyle, Was There and Aristocratic Reac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57 (November 1972): 97—122; D. D. Bien, La Réaction Aristocratique avant 1789; l'Exemple de l'Armé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9:1 (January-February 1974): 23—48; Jean Egret, L'Aristocratie Parlementair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Révue Historique* no.208 (July-September 1952): 1—14; Robert Forster,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0); Robert Forster, The Noble Wine Producers of the Bordelai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14:1 (August 1961): 18—33; and Behrens, *Ancien Régime*, pp.64—84。

23. 正如 George V. Taylor 指出的,“反抗贵族的斗争……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产物,而这种危机却不由反抗所引起。”(*Noncapitalist Wealth*, p.491)。

24. George V. Taylor, 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9: 312 (July 1964): 478—497; and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也可参见 Guy Chaussinand-Nogaret, Capital et Structure Soc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5: 2 (March-April 1970): 463—476.

25.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p.471.

26. 同上,p.472。

27. 同上,pp.477 and 478—489。

28. 同上,pp.479 and 481。

29. 同上,pp.487—488。

30. Louise Tilly, The Food Rio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1 (Summer, 1971): 23—57.

31. 就“特权”的独特性或某些特定的个人和集团所享有的法定豁免权而言,绝不仅仅限于贵族和教士等级。在“*Ancien Régime*”(pp.46 ff.)一书中,C. B. A. Behrens 曾经非常精彩地讨论过这一问题。她注意到,“在许多特权集团中,贵族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他们所拥有的(物质)特权甚至还没有资产阶级多”(p.59)。

32. Walter L. 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esp. chaps. 6—8.
33. 同上, p. 114.
34. Behrens, *Ancien Régime*, p. 153.
35. Betty Behrens, Nobles, Privileges and Taxes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Ancien Régime, *Economy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15: 3 (April 1963): 451—475.
36. “与其他事情一道,它(永久年金)造成了旧制度时期特有的对外债漫不经心的特征……只有当偿付长期债务的利息过多,因而造成赤字时,财务总监才不得不考虑偿还本金,但是,到那时他当然会发现已经无钱可支了。这正是……北美战争之后的困境所在”(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pp. 481—482)。
37. J. F. Boshier,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From Business to Bureau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George T. Matthews,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38. Behrens, *Ancien Régime*, p. 149.
39. Behrens, Nobles, Privileges, and Taxes.
40. Franklin L. Ford, *Robe and Sw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 248.
41. Alfred Cobban,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57), vol. 1, *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1715—1799*, p. 155.
42. Ford, *Robe and Sword*; Forster, *Nobility of Toulouse*; J. H. Shennan, *The Parlement of Pari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and Egred, *L'Aristocratique Parlementaire*.
43. Georges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History, in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ed. Lawrence Kapl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 164.
44. William Doyle, The Parlements of France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88,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6:4 (Fall 1970): 415—458.
45. Shennan, *Parlement of Paris*; Ford, *Robe and Sword*; and Cobban,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 1.
46. Cobban,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 1, p. 122.
47. Pierre Goubert, *L'Ancien Régime, 2: Les Pouvoirs* (Paris: Armand Colin, 1973), pp. 136—137.
48. Matthews,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p. 258.
49. 同上, p. 257.
50. Boshier, *French Finances*, pp. 183—196 and p. 308.
51. 同上, p. 304。

52. 同上, pp. 304—305.

53. 这一段的资料来源于: Norman Hamps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chap. 2; and A. Goodwin, Calonne, the Assembly of French Notables of 1787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volte Nobiliar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61: 240 (May 1946): 202—234 and 61 (241) (September 1946): 329—377.

54. Hampson, *Social History*, chap. 2; Jean Egret, The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in Brittany (1788—1789) and The Pre-Revolution in Provence (1787—1789),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Jeffrey Kaplow (New York: Wiley, 1965), pp. 136—170; and Jean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55. 有关旧制度末期法国军队的情况,可参见: Bien, Réaction Aristocratique: l'Exemple de l'Armée; Emile G. Léonard, La Question Social dans l'Armé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 2 (April-June 1948): 135—149; Louis Hartmann, Les Officiers de l'Armée Royal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Révue Historique* 100 (January-April 1909): 241—268, and 101 (May-August 1909): 38—79; P. Chalmin, La Désintégration de l'Armée Royale en Franc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Rèvue Historique de l'Armée* 20:1 (1964): 75—90; and S. F. Scot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in *On Military Ideology*, eds. M. Janowitz and J. Van Doorn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8ff.

56. Katherine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p. 138—139.

57. 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论述,可参见 Georges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R. R. Palm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pt. II.

58. 确实,在旧制度晚期,支配阶级的各个部分基于希望为特权等级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所表现出的团结程度,要高于各种贵族和官员集团在 1648—1653 年的福隆德运动中的参与状况。到 18 世纪时,统一的、全国性的法国政权的存在完全被视为是当然之事,而参加福隆德运动的特权集团在拥护还是反抗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59. J. Murphy and P. Higonnet, Les Députés de la Noblesse aux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Ré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0 (April-June 1973): 230—247.

60. Elizabeth L. Eisenstein, Who Intervened in 1788? A Commentary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1 (October 1965): 77—103.

61. 关于市政革命的著作,可重点参阅: Lynn A. Hunt, *Committees and*

Communes: Loc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178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3 (July 1976): 321—346; and George Rudé, *The Fall of the Bastille*, in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pp. 82—95.

62. 有关 1788—1789 年法国经济危机的性质,将在第三章中讨论。

63.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apters 4, 12 and 13.

64. 关于一般性背景的论述,参见: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3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65. Frederic Wakeman, Jr., High Ch'ing: 1683—1839,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 James B. Crowl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pp. 4—5.

66. 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5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9), p. 15. 实际上,1911 年以前农民占总人口 80% 的估计可能是最保守的估计。

67. 有关前一段和这一段的材料来自于: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John Lossing Buch, *Chinese Farm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and 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1932; reprint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68.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 115. 这一段有关贸易的报道引自于 Perkins 著作的第 6 章。

69. 同上, p. 172。

70.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November 1964), p. 32.

71.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82.

72.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 184.

73. Franz Michael, Stat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Modern China*, ed. Albert Feuerwerk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4), p. 58.

74. 引自 Robert C. North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in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eds. Harold D. Lasswell and Daniel Lern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p. 320.

75.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pt. 2.

76.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77. Wakeman, High Ch'ing, in *Modern East Asia*, ed. Crowley, pp. 12—15; and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pt. 3.

78.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pt. 1. 富有的中国人与富有的法国人一样,能够花钱捐纳官职。在中国,捐纳的对象既包括充做名誉的儒家身份,又包括政府的实际职位。但是,即使在这种“捐纳体制”膨胀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当时朝廷面临压力,财政收入也陷入绝境),也从来没有像绝对主义的法国那样,成为进入政府的支配性模式(参见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pt. 2, esp. pp. 138—141)。

79. Michael,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ed. Feuerwerker, p. 66.

80.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pt. 1.

81. Michael,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ed. Feuerwerker, p. 58.

82. 除注释 80 和 81 的引著之外,还可参见:T'ung-tsu Ch'ü,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 10; and Yuji Muramatsu,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9:3 (1966): 566—599.

83. Chang,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Michael,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ed. Feuerwerker; and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erkins 注意到:“由于土地回报率很低,大多数地主都在农业之外谋求财富,而将土地当作是便于交易的资产和保有威望的来源。”(p. 184)拥有官员和商业才是获得财富的主要基础。

84. 基本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Chang Chung-li (张仲礼) Franz Michael, and Mary C. Wright (芮玛丽)。

85. 基本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孔飞力(Philip Kuhn)、费孝通(Fei Hsiao-tung)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86. 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很好地概括了处于边缘地位的精英如何能够分享核心士绅的权力。参见其论文:High Ch'ing, in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pp. 12—15。

87. 这一段的有关背景资料来源于: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chaps. 9, 16, and 19—21; and Frederic 7—9. 同时参见 Frances V. Moulder, *Ja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 4。

88. 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East Asia*, p. 625.

89. 关于这一方面的比较历史分析的证据,可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David S. Landes, *Japan and Europe: Contrasts in Industri-*

alization, in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Carlo M. Cipolla,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3 (London: Collins/Fontana, 1973), pp. 301—357.

90.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91. 同上; Elvin,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chap. 17; and 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chap. 5.

92. 这一段的论述所根据的材料是: Yeh-chien Wang,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chap. 5.

93. 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p. 64.

94. Wakeman, *Fall of Imperial China*, pp. 105—106.

95. 对此所做的精彩而简要的概括,可参见: Albert Feuerwerker, *Rebell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1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

96.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著作,可重点参见: Yu-wen J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Vincent Y. C. 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 Its Sources,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and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97.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98.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especially pts. III and IV.

99. 同上, pt. VI. B.; Feuerwerker, *Rebellion*, chap. 5; and Stanley Spector,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100. 所有这些数据及这一段的内容都来自于: 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pp. 64—72。

101. 同上, p. 63。

102.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pp. 12—16; and 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chaps. 1 and 2.

103. 例如,可参见: John L. Rawlinson, *Chian's Failure to Coordinate her Modern Flee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ds.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105—132。

104. Wakeman, *Fall of Imperial China*, chap. 10.

105. 同上; 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East Asia*, pp. 726—737; and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intro 同上。
106.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p. 50.
107. 例如, 可参见: Mary Backus Rankin,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08. Yoshihiro Hatano, The New Armie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Wright, pp. 365—382; and Powell, *Rise of Military Power*.
109. John Fincher, Political Provin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Wright, pp. 185—226.
110. P'eng-yüan Chang, "The Constitutionalist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Wright, pp. 143—184.
111. Ernest P. Young, Nationalism, Reform, 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 James B. Crowl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p. 166. 这一段的背景资料引自于: 同上; Chang, The Constitutionalist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Wright; Chuzo Ichik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Wright, pp. 297—318; and Edward J.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esp. chaps. 6—9。
112. 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East Asia*, pp. 738—739.
113.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p. 50.
114. 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East Asia*, p. 748; and Vidya Prakash Dutt, The First Week of Revolution: the Wuchang Uprising,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 Wright, pp. 383—416.
115.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r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92.
116. 关于 1911 年的结果, 参见: Young, Nationalism, Reform, 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Modern East*, ed. Crowley, pp. 171—175; Wakeman, *Fall of Imperial China*, pp. 248—255; and C. Martin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 in *China in Crisis*, eds.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 1bk. 1, pp. 203—263. 这一章的有关观点还将在第 7 章进一步阐述。
117. 关于帝俄的背景, 主要参考了: Marc Raeff, *Imperial Russia, 1682—182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 chaps. 1—3. 关于旧制度迅速毁灭的历史, 可参见: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Scrib-

ner, 1974)。

118.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trans. Charles Full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p.96.

119. Thomas Esper, Military Self-Sufficiency and Weapons Technology in Muscovite Russia, *Slavic Review* 28:2 (June 1969), p.208.

120. 我对城市人口比例的估计主要是依据下述著作中的有关内容推算: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326。但是我将这个数据调高,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下一著作中的总人口数:Gi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Russia, 1750—18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98—99。我之所以要使用罗兹曼的数据,是因为这些数据似乎建立在更为新近的资料基础之上,并是经过仔细推导而出的。

121. 参见:Blum, *Lord and Peasant*, chap.20; Geroid Tanquary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1932; reprint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chaps.3 and 4; and Peter I. Lyashchenko,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rans. L.M. Herman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chap.17。

122. Blum, *Lord and Peasant*, p.329。

123. 同上, p.330。

124.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Russia*, pp.98—99;也请参见我在脚注120所做的评论。

125. Blum, *Lord and Peasant*, chap.15。

126. Cyril E. Black, et al.,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76。也可参见:Lyashchenko, *History of National Economy*, chaps.15—20。

127. Alexander Baykov,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Russi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7:2 (1954): 137—49。

128. Roderick E. McGrew, Some Imperative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 Under the Last Tsar*, ed.Theofanis George Stavrou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9), pp.202—229。

129. Sergei Pushkarev,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Russia, 1801—1917*, trans.Robert H.McNeal and Tova yedli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 p.121。

130. Hugh 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31。

131. Alexander Gerschenkron, Russia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1861—1917,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43.

132. 关于改革的总体情况,参见: Seton-Watson, *Russian Empire*, chap. 10. 关于地方政府的改革及其局限,参见: S. Frederick Starr, *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in Russia, 1830—1870*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ts. III—VI.

133. 参见格申克隆在《历史的延续性》(Continuity in history)一书中关于“土地政策”的观点。我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这篇论文。

134. 引自亚历山大二世在 1856 年的一次讲话,参见: Lazar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0.

135. Terence Emmons, *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36. 这一段材料主要来自于: Pipes, *Old Regime*, chaps 2—4 and 7.

137. Blum, *Lord and Peasant*, chaps. 8—14; and Richard Hellie, *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38. Raeff, *Origins*, p. 50.

139. 同上, p. 119.

140. 我对帝俄贵族所处情势的解释主要取材于: Marc Raeff, *Imperial Russia*, chaps. 3—5, and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6). 与其他作者(如 Blum)不同的是, Raeff 并不相信贵族阶级对抗专制君主的权力在 18 世纪得到了重大扩张。

141. Raeff, *Imperial Russia*, p. 96; and blum, *Lord and Peasant*, pp. 368—369, and chap. 19 generally.

142. Blum, *Lord and Peasant*, p. 380.

143. Raeff, *Imperial Russia*, chap. 3.

144. Walter M. Pintner,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bureaucracy, *Slavic Review* 29:3 (September 1970), p. 442.

145. 同上, pp. 438—439.

146. 在《俄罗斯地主士绅与 1861 年农民解放》一书中, Terence 强调了士绅们在 19 世纪 60 年代实际上行使的集体政治影响力的程度。但是,即使是在 Emmons 自己的解释体系中,最初的推动力,无论是改革的推动力还是鼓励士绅参与的推动力,都来自于沙皇政权。而且,最终,自由和反动的士绅群体在实现与沙皇的利益或纲领有分歧的政治纲领的任何方面,似乎都走向了失败。我相信, Emmons 提供的所有证据与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相符合;我之所以解释重点方面有所不同,是因为是从一种比较的视角来讨论俄国。

147.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pp. 140—147 and 159—165.

148. 同上, pp. 165—174。

149. 关于解放的期限及其后果, 参见: 同上; Volin, *Century*, chaps. 2—3; and Robinson, *Rural Russia*, chaps. 5—8。

150. 参见注释 132 所引内容; 以及 Alexander Vucinich,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 Cyril E. Black, pp. 191—20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51. George Barr Carson, Jr.,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ussia, 1890—1939*, i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ed. Hugh S. J. Aitken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9), p. 117。

152. Seton-Watson, *Russian Empire*, p. 407; 关于铁路, 参见 pp. 405—406。

153. Carso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ed. Aitken, pp. 117—118; and Theodore H. von Laue, *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ap. 1。

154. Von Laue, *Sergei Witte*, pp. 2—3。

155. 同上, chap. 3。

156. 这一段所陈述的事实和评估取材于: Von Laue, *Sergei Witte*, chap. 8; Carso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ed. Aitken, pp. 118—127; and Alexander Gerschenkron, *Problems and Patterns of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 Cyril E. Blac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7—61。

157. Arthur Mendel, on Interpreting the Fate of Imperial Russia, in *Russia Under the Last Tsar*, ed. Theofanis George Stavrou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9), pp. 20—21。

158. 关于帝俄晚期无产阶级的状况, 有一篇优秀的评论性论文: Reginald Zelnick, *Russian worker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6 (Winter 1971—1972): 214—234。其他关于无产阶级的资料包括: Leopold Haims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917*, *Slavic Review* 23:4 (December 1964): 619—642 and 24:1 (March 1965): 1—21; Arthur P. Mendel, *Peasant and Worker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lavic Review* 24:1 (March 1965): 23—33; Gaston W. Rimlinger, *Autocracy and the Factory Order in Early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1 (March 1960): 67—92; Theodore H. von Laue, *Russian Labor Between Field and Factory, 1892—1903*,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3(1964): 33—65; and Allan K. Wildman, *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1891—190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159. John P. Sontag, *Tsarist Debts and Tsarist Foreign Policy*, *Slavic Review* 27:4 (December 1968): pp. 530—531。

160. Seton-Watson, *Russian Empire*, p. 531.
161. 同上, p. 530.
162. Sontag, *Tsarist Debts*, p. 533.
163. Carso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ed. Aitken, pp. 130—131.
164. Lyashchenko, *History of National Economy*, pp. 647—661.
165. Mendel, *Interpreting the Fate*, in *Russia Under Last Tsar*, ed. Stavrou, p. 21.
166. Sontag, *Tsarist Debts*, p. 534.
167. 同上; and McGrew, *Some Imperatives*, in *Russia Under Last Tsar*, ed. Stavrou.
168. McGrew, *Some Imperatives*, in *Russia Under Last Tsar*, ed. Stavrou, p. 228.
169. Raymond W. Goldsmi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sarist Russia, 1860—191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3 (April 1961), p. 443.
170. 同上, pp. 474—475.
171. 同上, p. 443.
172. Theodore H. Von Laue,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 Cyril E. Blac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09—223.
173. Theodore H. Von Laue, *Why Lenin? Why Stalin?* 2nd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1), p. 60. Von Laue 注意到:“在这一方面,俄国在现代世界史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落后国家中——19 世纪的日本、中国或印度,更不用说那些现在因苏联和美国的对峙而受到保护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它那样要承受这种极端暴露之苦。”(第 60 页注释)
174. Isaac Deutsch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vol. 12, p. 403.
175. 我对 1905 年革命所做解释的主要依据是: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2 vols. (1935; paperbound reprint ed.,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5), vol. 1, chap. 3.
176. Katherine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p. 118—119, and chap. 6 generally.
177.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p. 51.
178. Von Laue, *Why Lenin? Why Stalin?*, p. 51.
179. McGrew, *Some Imperatives*, in *Russia Under Last Tsar*, ed. Stavrou, p. 218.

180. Nicholas N. Golovine,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32, 39, 126, 160.

181. Chorley, *Armies*, chap.6.

182. Golovine, *Russian Army*, pp.34—36.

183. Pushkarev, *Emergence of Modern Russia*, p.393.

184. 同上, pp.394—403. 这一段和下面几段关于中上层阶级在1914—1916年期间的角色, 主要依据的是 Pushkarev 精彩而细致的描述。

185. 同上, p.400.

186.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1, p.73.

187. Marcel Liebma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 Arnold J. Pome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p.107. Liebman 写道:“2月28日……沙皇制度已经彻底死亡, 但沙皇却仍然留恋他的王冠……当他最终认识到无望的情形时, 他命令将一些前线的部队调到彼得格勒。不幸的是, 军队再也不服从他的命令, 甚至最高指挥官也抛弃了他。”但是, 军官们也许只反对尼古拉斯, 而愿意保留由另外的沙皇执政的君主制度。而且, 即使在他们试图进攻首都时, 他们也不能充分确定造反的铁路工人和士兵会不会阻挡他们。这种情形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188. Chorley, *Armies*, p.113.

189.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il.1, chap.4; and Liebman, *Russian Revolution*, chap.4.

190. Deutscher, *Russian Revolution in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2nd ed., vol.12; and Paul P. Gronsky and Nicholas J. Astrov,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chaps.4—8, and pp.122—127.

191. 对明治维新的相关描述, 参见: W. G. Beasley,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New York: Praeger, 1963), chaps.5—8;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chaps.17—18; and John Whitney Hall, *Japan: 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s* (New York: Dell, 1970), chaps.11—13. 相关的解释性观点, 我主要依据的是 Hall 的著作。

192. Thomas C. Smith,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ap.11; and Thomas C. Smith, *The Japanese Villa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2:1 (Winter 1952):1—20.

193. Hall, *Japan*, chap.10; John Whitney Hall, *The Castle town and Japan's Modern Urbaniz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5:1 (November 1955):37—56; and Harumi Befu, *Village Autonomy and Articulation with the Sta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1 (November 1965):19—32. 两篇论文都得到了重

印,参见:John W. Hall, and Marius B. Jansen, eds., *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194. 参见:Hall, *Castle Town*; John Whitney Hall,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Japanese Daimy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3 (May 1961): 317—329; Thomas C. Smith, 'Merit' as Ideology in the tokugawa Period, in *Aspects of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Japan*, ed. R. P. Dor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71—90; Thomas C. Smith, Japan's Aristocratic Revolution, *The Yale Review* 50 (1960—1961): 370—383; Marius B. Jansen, Tokugawa P. Dore, Talent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okugawa Japan, *past and Present* no. and Pansen, eds.,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

195. Hall, *Japan*, pp. 266—268.

196. 同上, p. 269.

197. Hall 评论道:“在整个废藩的政治调整时期,设法有效维持住了高层的权威,以致税收都从未间断过。”(*Japan*, p. 276.)

198. Hall, 同上, p. 273.

199. 参见:Ellen Kay Trimberger,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78)。

200. Hugh Borton, *Peasant Uprising in Tokugawa Japan* (1938; reprint ed.,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oration 1968), intro., p. 2. 波顿在此概述了一位名叫 Aokikoji 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201. Hall, *Japan*, pp. 279—281. 也可参见 Roger F. Hackett, *The Military: A. Japan i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 eds. R. E. Ward and D. A. Rustow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28—338.

202. Cyril E. Black et al.,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p. 81, 179—180, 184—185; and Smith, *Agrarian Origins*, pp. 208—211.

203. David S. Landes, Japan and Europe: contrasts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ed. William W. Lockwood (Princeton, J.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96—97, 163; and Thomas C. Smith, Pre-Modern Economic growth: Japan and the West, *past and Present* no. 60 (August 1973): 127—160.

204. 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paperback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208.

205. 同上, p. 209.

206. 对改革运动的描述,参见:Rosenberg, *bureaucracy*, chap. 9; Gordon a.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chap. 2;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chap. 13; and Walter M. Simon, *The Failure of the Prussian Reform Movement, 1807—1819*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对于有争议的观点,我通常采用的是 Rosenberg 的说法。

207. Rosenberg, *bureaucracy*, p. 204.

208. Holborn, *History*, pp. 382—385.

209. 参见 Rosenberg, *bureaucracy*, chap. 9。

210. Walter L.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6(1931), p. 403.

211. 同上, p. 408。

212. 参见: Rosenberg, *bureaucracy*, chap. 1; F. L. Carsten, *The Origins of Prus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t. III; A. Goodwin, Prussia, in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Albert Goodwin, Paperback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pp. 83—101; and Sidney B. Fay and Klaus Epstein, *The Rise of Brandenburg-Prussia to 1786*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4)。

213. Dorn, *Prussian Bureaucracy*, 46(1931), p. 404.

214. 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6(1931): 403—423, 47(1932): 77—94, and 47(1932): series 40(February and June 1955): 42—67.

215. Dorn, *Prussian Bureaucracy*, 47(1932), p. 94.

216. 同上, p. 262。

217. Rosenberg, *Bureaucracy*, chap. 1; Dorn, *Prussian Bureaucracy*; and Goodwin, Prussia, in *European Nobility*, ed. Goodwin.

218. Walter L. 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全书各处。

219. 可重点参见: Rosenberg, *Bureaucracy*, pp. 218—28; and Craig, *Prussian Army*, chap. 2。

220. 参见: 同上; Landes, Japan and Europe, in *State and Enterprise*, ed. Lockwood, pp. 157—163; and Tom Kemp, *Industrial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Longman, 1969), pp. 85—89, and chap. 4 generally。

221. 当然,仅仅通过普鲁士的农业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帝制德国到一战爆发为止都领先于俄国。勿宁说,本章的观点是要用共同的分析性术语来强调,俄罗斯和普鲁士虽然都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是却出现了不同的后果。

第三章

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

当农民以外的社会力量之间产生冲突之时，当统治者内部发生分裂或外国入侵之时，农民的态度和行动的的决定性作用就会充分表现出来。这种潜能是否会变成现实，主要取决于农民是否能够协调一致地行动，而不管其是否建立了正式的组织。

——特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

尽管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规模极其巨大，但是，仅靠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社会革命的情势。是专制政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的崩溃，为社会革命改革开辟了道路——而不是，例如说，精英内部冲突造成的政权中断时期，导致了现存政权的崩溃，或者是多少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类似政权的重组。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在政府的监管和法令出现裂口时，农民也趁势利用这一机会而发动了广泛的农民造反。巴林顿·摩尔将其生动地表述为：“农民……提供了炸毁旧建筑的炸药。”¹他们的造反破坏了旧有的农村阶级关系，损毁了自由主义或反革命的政治和军事支柱。他们为边缘的政治精英——或许还受到了城市平民运动支持——开辟了道路，以中央集权、大众参与的政权组织为基础的革命也因此而得到了巩固。

事实上，在革命运动中，农民造反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关注程度，要远逊于城市下层阶级的行动——即使是对于我们在这里论述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关注程度也还不够。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城市工人,无论前工业化的工人还是产业工人,常常在革命活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中发挥着极为显眼的作用。而且,他们的目标和成就也与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领导的目标和成就联系在一起。因此,相对于只是在农村“造反”、而且还远离民族政治意识和决策的农民而言,起义的城市工人似乎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实际发生(成功)的社会革命中,农民造反才真正构成关键性的起义因素,²而且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也确实如此。这一点实际上毫不奇怪,因为社会革命发生在农业国家中,农民才是这些国家中的主要生产阶级。在农业占主导的国家中,如果没有农民的造反,城市的激进主义最终就不可能实现社会革命的改造。英国和德国(1848年)革命(下面将会讨论)的例子也有助于阐明这一论断。在这两个作为反例的国家中,都曾经出现过强劲的城市——平民革命运动。但是,作为社会革命他们都失败了,部分原因就在于缺少反对地主上层阶级的农民起义。

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所讨论的革命,尤其是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城市工人的造反就毫无意义。法国的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和俄国产业工人的行动就促进了法国和俄国所特有的革命冲突和后果。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城市工人的造反构成了革命过程中的干预性力量,而法国和俄国的旧制度,正是被这种干预性力量所破坏(尽管根本的原因是,已经深入讨论过的国际压力和支配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而且,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将会看到的,城市的造反对通过政治冲突而在法国和俄国所建立起的新型的、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政权产生过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这里,在本章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类似原因。在所有这三场革命中,农民反对地主的造反是必要的因素,而城市工人的成功造反则不是。因此,出于眼下的解释性目的,对于农民起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关注,就比通常情况下对城市造反的关注重要得多。

那么,应如何解释农民对重大革命的促进作用呢?在开始之时,就很有必要识别出农民在革命戏剧中参与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些方面对社会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农民造反非常值得注

意,因为他们马上就广泛传播,而且明显地被导向了反对地主的活动。他们的革命影响取决于下述两个因素。因为它们横扫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广大地区,其影响就超出了农民组织所固有的地方性。通过对地主支配阶级的打击,尤其是对其财产与权力的冲击,造反运动削弱了旧制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支柱。由于同时具有规模的广泛性和集中反地主性的特征,革命农民的造反就在社会层面上,为竞取全国性权力的精英们所做的政治选择设定了决定性的限制。

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法国、俄国和中国历史上的新因素。在历史上,在这些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边缘性地区大规模反抗中央集权君主的税收和官员的造反运动。在中国,这些造反最终(如果不是在开始)会被置于士绅的领导之下,以致实际或潜在的反地主行动从根本上受到压制或被迫转向。³在法国,某些地区造反自始至终就是由贵族在领导;还有一些造反运动以这种方式开始,后来才产生出农民反领主的造反运动,因而有利于君主政权的镇压,而农民则一无所获。⁴在俄国,传统农民的造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攻击地主。但是这种现象之所以会成为事实,仅仅是因为,为大规模起义提供军事动力和保护的是定居边疆的哥萨克,而不是在地区层面上拥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地主。⁵在传统时代,这三个国家的农民凭借自己的力量——没有地区性造反的帮助——当然也卷入了地方性和零星的暴力抵制地主的活动。但是,农民从来没有成功、广泛和直接攻击过地主的财产和土地。

然而,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革命中,农民造反恰恰从根本上转向了对地主的广泛而直接的攻击。因此,我们要为一种农民行动模式寻找解释,这种农民行为超出了零星和分散的地方性动荡的范围,而且还实现了某种与先前的以农民行动为基础的起义不同的东西。我们的解释性假设将不太关注在其他的解释途径中居中心地位的一些因素,如革命意识形态、单纯的剥削现象或相对剥夺的尖锐化。

我们无需详细解释这一命题,即将“农民革命”归结为是由新的目标、价值或系统性超越意识形态所激发的农民觉醒。很难过分地强调说,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农民的目标与先前的农民在起义或暴动中的目标有什么内在的差异。参与这些革命的农民,并没有转向追求建立希望

得到的全国性新社会的激进愿望,而且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自为的阶级。相反,他们所奋斗的是一些具体的目标——通常都涉及获得更多的土地,或者是摆脱那些索取其剩余产品的特权。农民是在既有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来认识自身的,因此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法国和俄国,农民是通过传统的村社组织而被动员起来展开行动的。在中国,农民最初是作为传统“绿林好汉”(social bandits)参与进去,然后才最后直接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然而,即使到那时候,中国的农民所追求的还是具体的、直接的目标,⁶这些目标与他们在历史上的暴动和起义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并无二致。

至于农民在反剥削斗争中成为革命者的可能性,⁷持这种说法的人其实是试图将农民状况的一个恒常性特征变成了一个解释性变量。按照他们的界定,农民一直在经受着征收其产品的单向特权的压制。农民基本上是农业耕作者,由于在政治和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而且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对固定,他们必须要承担起包括捐税、租金、强制性劳役、高利贷和歧视性价格在内的各种重负。⁸农民存在着通过起义来反抗剥削他们的主、政权代理人 and 商人的理由。但是,存在着争议的问题是,以理由充足的不满为基础的起义在客观可能性上是否足够充分。但是,这些长期存在的不满,在发展程度上还没有明显地显现出来,以能够被整个农民集体所意识到,并由此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出现。

特定的不满在短期内从主观上被激怒——其影响因素已经被相对剥夺理论家们所强调——很可能起到一种猛然加速的作用,从而成为在某一时刻出现特定起义行动的原因。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相对剥夺是一种聚集性的心理状态,对于这一点,几乎不可能找到真正直接的历史证据。严格而言,如果要证明这一观点,就应该在这三场革命爆发之时和进行期间,对分散在许多地方的农民分别进行采访。但是,即使能够得到这种类型的证据,甚至是更为常用的对相对剥夺状况的间接测量,⁹也仍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即某种事物是如何和为什么——具体而言是什么事物——导致聚集起来的个人感到不满。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把农民——即使是在地方层次上——转变成了一种能够打击其压迫者的力量。

正如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曾经指出过的:“从根本上说,使农民起义成为可能的决定性因素,位于农民与周围的权力场之间的关系之中。起义不可能始于虚弱无力的情形之中……”¹⁰如果他们将要采取行动,而不是默默地忍受普遍存在的不满,农民就必须要有“内在的力量”——某种采取集体行动反对高高在上的剥削者的组织能力。在我看来,农民拥有这种内在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尤其是在农业国家处于历史性政治危机的时期,应该用结构与局势的条件来解释。这种条件影响到:(1)农民村社的团结程度与类型;(2)农民摆脱地主及其代理人直接的日常监督和控制的自主性程度;(3)国家政权制裁农民起义的强制性程度的松弛。前面两个因素——农民的团结与自主——只能通过分析革命前旧制度下的农村结构,才能得以详查。阶级结构和地方性政治结构都很重要,而且还须说明的是,为什么这两种因素都很重要,应该如何去调查这两种因素。

在考察农村的阶级关系时,抽象地脱离制度背景,仅仅识别出财产占有者的各个阶层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广泛采用的研究方式,¹¹会使人误解地主上层阶级的权力基础,并在一些实例中低估这种权力基础。而正是凭借这种权力基础,地主上层阶级(如中国的绅士)得以从纯粹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剩余价值占有的补充形式中补充其收入。类似的是,当一些分析家仅仅关注个体的财产占有及富有农民和贫困农民之间的经济差异之时,他们就误导了农民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程度。他们忽视了对具有集体经济功能的亲缘关系和村社制度的考察,而这两种因素则可以将富有和贫穷的农民相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利益所表明的那种关系。¹²

勿宁说,研究阶级结构意味着要去探究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定制度安排,正是通过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社会关系中的这两种分析性的基本类型才同时建立起来: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之间“与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工具和土地之间”关系;另一方面,是“非生产阶级无偿地从直接生产者那里直接榨取一部分产品”所凭借的关系。¹³农民的团结和自主是否会成为农村阶级结构的构成部分,取决于这些关系得以形成的具体制度形式。

先前对制度化的阶级关系对农民起义能力的影响的研究,似乎已经产生了一些尝试性的发现。¹⁴以农奴或无地农民加以耕作的大规模庄园为特征的农业体制,似乎不利于自发的、自我组织的农民起义。这一点之所以是事实,不仅仅是因为农奴与雇工都很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被彼此分开,并处于地主及其监工严密而经常的监督和训导之下。在租佃农业体制中,小农家庭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耕作,在这种体制下更容易出现农民起义¹⁵——我将会具体论证,以社会经济联系为基础的村社关系将单个的家庭联结在一起,会共同反对地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法国和俄国的阶级关系就属于这种租佃/村社模式。

然而,即使在没有大庄园农业的地方,如果地主直接控制了地方的行政和军事制裁机器(如民兵和济贫机构),农村秩序仍然可以避免出现自主性的农民起义。如果我们要充分地综合有利和不利于农民起义的条件,就必须超越单纯的阶级分析。我们必须分析农村秩序的政治结构,尤其要关注地方政府的性质及其与中央政治权威、君主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是农民、官僚,还是地主在控制着地方政治决策的制定?地主是否充当或替代了君主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很明显,在那些最容易出现突发性的、自主性的农民起义的农村秩序中,存在着有利于农民的团结和自主的阶级关系。在这些易受攻击的农村秩序中,也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官僚控制制裁机器,即使农民村社享有相当程度地方政治自治。

然而,最后还需强调的是,孤立地集中考察农民在地方阶级和政治结构中的结构性情势,既不足以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遍布的反地主的起义的发生,也不足以解释其具体的模式。因为,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专制政权的革命性政治危机——其自身是由与农民完全无关的国家和国际发展所引起的——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这一政治因素与既定结构之下农民的起义潜能相互作用,才产生出成熟的社会革命情势。这种成熟的社会革命情势是任何单独的因素都不可能产生出来的。正是由于原本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的协调性镇压能力的崩溃,才最终产生出了直接或最终有利于广泛而不可逆转的农民反地主的起义活动的条件。如果说类似的农村阶级结构和地方政治结构在先前并没有产生出同样的农民起义模式,那是因为缺少在支配阶级事务方面的世界历史的发

展这一因素。一旦——而且只有当——处于现代世界国际压力之下的这一阶级撞上了革命性政治危机,农民就能够实现其长期向往的起义目标。两个因素接合(conjunctural)的后果就是社会革命。¹⁶

对社会革命中农民起义的事态分析,完全不应该停留于对农民起义的原因的讨论。而且,农民起义的直接后果,对处于革命危机之中的全国性政治进程有强烈的“反馈性”影响。这种影响为我们理解关于社会革命的动力和后果的共同模式和差异模式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钥匙。然而,关于这方面的原因,读者必须要到第二部分中才能看到。本章的必要假定是,农民起义对于社会革命的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要寻求理解其结构和情势条件,以解释其发生的原因。

前面已经讨论了关于这些条件的一些观点,但是还必须要结合每一场革命的案例和适当的反例(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国家),从细节上清楚地说明这些条件的出现情况。我们将先从法国开始,然后讨论俄国,接下来则要考察作为反例的17世纪的英国和1848—1850年的德国。最后,我们将以所有这些案例分析为背景,讨论在中国出现的特殊问题。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

法国革命中最为著名的一天是1789年8月4日。在那个著名日子的傍晚,制宪会议的成员竞相谴责并正式宣布废除法国社会和政治的“封建”结构。领主捐、买卖司法职务、免税权、狩猎权、宫廷津贴、领主司法权——“当一个接一个的发言人宣布放弃他自己或邻居的特权之时”,所有这一切都被废除了。¹⁷具有象征意味的是,相关的变化为革命赢得了社会革命资格——这场革命超出了政治变迁的范围而进入了改造社会的程度——就是从这天晚上开始的。但是,如果没有在农村普遍发生的农民反领主制的起义迫使他们不情愿地施以援手,聚集在凡尔赛宫的自由派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就绝不会发起召开这次全面改革的会议。由于农民抵制缴纳捐税和什一税的活动日益强化,并发起了暴力攻击城堡和

人身，坐在凡尔赛宫开会的有产者和特权者们，在震动和惊恐之下，草率地做出了事先没有计划的让步。如果没有农民革命——伟大的革命史家乔治·列菲弗尔(George Lefebvre)将其称之为“自发的”和“自主的”革命——“我们就能够确信，制宪会议将不会给封建制度以如此沉重的打击……”¹⁸ 革命也许就不会发展到超出宪制改革的范围。¹⁹

结构性条件

1789年所爆发的农民起义的潜在可能性，根植于18世纪欧洲背景下法国(以及分裂的德国西部地区)所特有的农村社会结构。法国农民所受到的压迫并不是最严重的——尽管确实存在着真正的不满。勿宁说，是法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相对有利于增强农民反抗领主剥削的能力。

与东欧的农奴和英国日益被剥夺的下层阶级相反，法国的农民实际上拥有相当多的土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甚至更高比例的可耕地——由数百万个体小农所占有。这些土地被分成了小块，以便于管理、买卖和传给继承人，只是会受到各种领主特权的束缚。此外，由于只有极少数大土地所有者直接耕种他们的土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分成小块租给了佃农和分成制小佃农。因此，农民控制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大多数土地的使用。²⁰

然而，他们的农产品却承受着非常沉重的租金。“地租——王室的、领主的、什一税和业主的——……是这个王国及其社会制度的驱动性力量。承租人是被统治者，收租人及其代理人是统治者。”²¹ 什一税——在收获季节用以货代款的形式缴纳——平均占8%，而且大部分落入了富有的主教、教士和教区以外的世俗领主手中。领主捐(落入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教堂和贵族手中)则因地区和地方而差异相当之大。总体而言，在布列塔尼和东法兰西较重，而在卢瓦尔河以南地区则较轻(但是这里的什一税却很重)。税收——贵族土地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免除——大约占税区(pays d'élection)总产值的5%至10%；在省区(pays d'état)则少一些。业主地租常常是最沉重的负担：在分佃耕作(métayage)为主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分成制小佃农不得不将一半的收成交给地主；其他地方的租金则至少占收成的五分之一。总体上，各种索取农民收成的租金，要占他

们总收成的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三(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收成要留做种子,加上维持劳动者生存和生产成本的开支之后,剩余部分才构成总收入),具体缴纳的数目则因时因地而有很大的差别。通常情况下,租金是最为沉重的负担;在生产或销售出现危机时,对处于维持生计边缘的农民来说,租金就成了一种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

农民的福利取决于一个家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能够承受最少地租的土地,以及有多少包括农具和牲畜在内的耕作土地的生产资料。但是,在18世纪法国的所有地区,那些能够有保障地靠自己的土地或出租土地维持生计的农民,只占农民总数的一小部分。²²确实,每个村社都可能有一两户作为领主代理人的富裕户(*coqs de village*),或者,如果没有富裕户的话,至少也有一些较为富有的中农(*laboureurs*, 独立的中等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但是,大多数农民则处于穷困和朝不保夕的状态。他们要么作为佃农,通过缴纳沉重的地租而换得小块土地的耕种;要么则除住房和庭园之外一无所有,不得不通过做农业临时工、工业临时工或季节性离家外出而获得补充收入。处于社会经济最底层的是流浪汉,他们甚至连保有住宅和居住在社区的最低财产都没有。由于人口增长率快于经济增长率所能提供的新就业机会,这些赤贫的流浪汉——他们有时乞讨、有时打零工、有时抢劫——的数量在旧制度晚期大量增加。而且,有不少定居家庭的处境也与流浪汉们相去不远。日益升高的土地和粮食价格对他们毫无帮助,因为他们的希望——与问题——仅仅是保有足够的土地和工作,以缴纳地租并竭力维持生计。

然而,旧制度下的法国农民在总体上并不面临着仅仅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当时,他们也并不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适当描述的那样,是一条麻袋里面的许多马铃薯。确实,农民等级内部所出现的经济分化已经十分严重,而且,“农业个人主义”(agrarian individualism)在农村已经获得了坚实的据点。²³然而,经过数世纪以来在争取经济保障和行政自治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农民村社,却实际上仍然存在。村社的根本基础是经济。村社组织的核心是“社地”(terroir),即“由一群人所耕种或开垦的所有类型的土地总和,这些土地要么集中于一个大村庄,要么则环绕于数个小村庄,或者是零散地分布于分散性的份地之间”²⁴。农民村社有权

“集体拥有和使用……公社的物品”或“为了群体居民的利益而对私人财产施加集体性限制……”²⁵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林荫区”(pays of bocage),散布着农庄,农民村社共同拥有公共土地,包括树林在内,都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并防止外人占有和侵犯。在北部和东部,农民村社所持有的土地非常之少,但是耕作本身则受到了集体规定的限制,包括轮作、收获日期、休耕地的放牧权、对圈地的限制等等。这些习俗不仅仅适用于本村社成员,而且也被用来对付外人。在大多数地方,领主——其领地上附属着农民的租地,与农民村社的土地相互交叠——是土地权利的主要竞争者。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使用树林或牧场的权利,或者决定土地如何耕作的特权等重要权利。尽管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是农民村社在上述权利事务上反对领主的斗争才是首要的,而且在反对领主的斗争中也维持着某种残余的一致和自觉。

而且,直到18世纪,农民村社都还享有相当程度上的自治。王室的行政机构渗入了地方,并逐步将领主排挤到边缘地位,使其仅仅成为“教区的第一臣民”。领主——当他不在的时候是其代理人(他本人常常不在)——实际上还维持着对领主司法权的控制;但是这种权利带有更多的经济色彩而几乎没有政治意义。此外,农民在地方牧师的帮助下处理地方性事务——通过监督官(intendant)的副代表(subdelegate)而对其负责。“社地”常常与教区重合在一起,使得在礼拜天做完弥撒之后,家长大会就可以处理范围广泛的村社事务,如“出售、购买、交换或出租公共财产;维修教堂、公共建筑、道路、桥梁;选举村社的代理人、学校校长、村社牧羊人、教区看门人、什一税征收人、租税评估和征收人”²⁶。

尽管村民大会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很难不受富裕农民所支配,但它们仍然潜在地作为所有家长共同讨论当地事务的场所而运用;而且,他们的决定也控制着村庄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²⁷

1789年政治危机的影响

但是,这些结构性条件又是如何具体导致旧制度在农村的衰亡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要注意革命期间的各种趋势与事件。我们将首先考察有助于引发1788—1789年民众骚乱的一些经济趋势,然后则集中

关注农村的结构性和全国性政治事件的结合,以确证 1789 年的民众起义具有革命性质。

令人敬畏的经济史家恩斯特·拉布鲁塞(Labrousse)经过对价格和工资趋势的艰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旧制度末期,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民众起义的爆发。²⁸大约从 1733 年至 1770 年,法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这是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经济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和工业生产、殖民地和国内贸易都在扩张。物价和地租比工资增长得快,使得增长不成比例地有利于企业主和大土地所有者。但是,只要这种扩张能够持续,穷困的人们也能设法维持生存。然而,1770 年以后,“开始……进入一个经济萧条和紧缩时期……最迟到 1778 年底,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各地的物价都极度下跌。”²⁹农业收入降低,工业疲软,失业增加。

吃饭这个老问题,在该世纪的头六十年代就已经因为死亡率的下降而变得更加严重,此时已经进入一个尖锐阶段,而且导致冲突的局面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为明晰……民众的革命情绪高涨与经济紧缩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极其明显。³⁰

到 18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济开始复苏。然而,在 1788 年出现了一场“周期性发生的严重事件”³¹。谷物收成下降。农业收入大减(尽管价格很高,但几乎没有出售的粮食),农业失业率上升。工业产品的市场收缩,如此之多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面包价格暴涨(1789—1790 年),数百万穷困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及工人不得不购买全部或部分的食品,但突然之间却面临着食品紧缺的局面。

民众在 1789 年应对面包价格上涨的方式,因袭了传统的既定模式。³²在 18 世纪一再出现的现象是,每当面包价格突然上涨时,农村与城市的穷人就以“面包骚乱”(bread riot)予以应对。农民村社拦截运往村外出售的谷物,以“公平的价格”出售给当地的消费者们。城市的消费者们应对短缺和高价的方式是,夺取面包坊,并以类似于农村的方式予以处理。王室政府也断断续续地试图推进全国谷物的自由贸易,但是人们仍然相信固定的价格,并希望保证每个人都得到有保障的供应。在革命前不久的 1775 年,大规模的面包骚乱(guerre de farines)迫使王室放弃革新

政策,并通过向穷人供应粮食和镇压示威而恢复秩序。1789年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反复出现的民众不满的一次次重演。

然而,在1789年,结果却非同寻常。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的面包骚乱正好与特权精英内部关于政治代表方案的争吵同时发生,从而才导致了市政革命。³³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各种事件已经在农村导向了充分发育的社会革命。早在市政革命之前的春季,农民就开始越出面包骚乱的界限,攻击领主体制。“农村起义的第一波……主要针对的是什一税、封建权利以及接受这些东西的人……”³⁴攻击的目标常常是当地领主的封建文件,但同时也夺取了“囤积”的粮食。即使是这些早期爆发的骚乱,其范围也是非常广泛地出现在安茹(Anjou)、多非内(Dauphiné)、巴黎地区(paris region)、皮卡第(Picardy)、埃诺(Hainault)以及南方(Midi)。随着夏天的来临,部分是由于对“大恐慌”所引出的可怕后果的担心,动荡局面越发激化,几乎遍及全国。³⁵这是一场集体恐慌,原因是人们相信“强盗们”将会抢劫即将成熟的谷类作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贵族们密谋”饿死老百姓的计划正在准备之中;农民们开始组织起来应对这种模糊不清的威胁。敌对情绪与由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引出的变革希望“熔合”在一起,加剧了对抗上层阶级的起义:

三级会议现在虽然召开了,但是迟迟不能对……自由的期望做出回应,农民大众就做出一个简单的、本能的决定。庄稼已经收获。他们将停止向什一税征收人、领主甚至是王室的征税员支付税收。少数愤怒的农民手持干草叉和火把,袭击存放租约的档案室和城堡。多数人则采用了更加安全和更加有效的消极抵制方式,拒绝偿清债务。³⁶

这样,旧制度在农村的基础支柱就被拆除掉了,以城市为基础的改革家们就面临着他们本想避免出现的意外的财产和秩序危机。

为什么农民的起义始于1789年——为什么他们总体上首先出现在反领主体制斗争的最前沿?其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与1789年政治事件的交互作用,在强化了集体反领主斗争的既有能力的同时,还创造出了新的机会。

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王于1789年1月29日决定召开三级会

议所引发的进程。第三等级的代表要由各司法区(bailiage)的城市和农村村社的代表选举产生。在每个农村村社中,凡年满25岁的纳税男子都有资格参加会议,这个会议既要选举出席司法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又要起草一份表达当地苦情的“陈情书”(cahier de doléances)。无论如何,非同寻常的地方在于,每个农村村社都在国王命令的邀请之列,都可以集体反复思考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总体而言,这种安排的结果,确实增加了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尤其增加了反领主和非本地的什一税征收人的可能性。陈情书并没清晰列举这些目标;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对各种限于本地的不满。³⁷而且,任何带有普遍的变革要求,都不能归结为是农民提出来的,因为各地的代表大会都常常是由教士、资产阶级和当地领主的代表所主导或受其影响的。³⁸但是,比陈情书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陈情书的起草过程。正是这一起草过程,产生出了变革的希望,并且将农民一起带上了村社舞台,正是在这里,反领主的斗争历来就是一项共同的事业。

在起草陈情书的过程中,集体意识和组织联系的增强为1789年农民的起义行动更好地做好准备。事实上,有些起义就发生在地方性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很明显,这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农民相信,仅仅是通过陈情书来表达不满这一行动,就意味着某些特定的捐税或做法就从此被废除了。列非弗尔报道了王室官员对此所表达出的痛惜之情:

索米尔(Saumur)司法区副区长迪斯米·德·迪米松(Desmé de Dubuisson)在选举期间写道,“真正令人烦心的是,这些代表大会一经召开,人们便普遍认为他们被赋予了某种主权者的权威;而当会议结束之后,农民回到家中时,就认为他们从此摆脱了什一税、狩猎禁令和领主捐”……在王国的另一端,不来梅的基层代表在1789年7月4日发出了令人惊恐的呼声:“……我所在的地区及周围的农民普遍准备拒绝向什一征收人缴纳定额的麦捆,而且还十分公开地说要誓死抗税。其愚蠢的理由是,废除这些什一税的要求已经写进了陈情书……这种废除活动现在已经生效了。”³⁹

而且,即使是陈情书起草结束以后很久才出现的起义,其源头也是通常召开这种村社会议的同舞台:

直到 1792 年,同样类型的(反领主)的起义了也常常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一般会在星期天出现轻微的骚动:在整个期间,这一天都像纪念当地圣徒和新年的节日一样,总是极为关键的一天;农民们将会一起做弥撒,然后就无事可做,迷迷糊糊地流向当地的小餐馆: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容易引出一场骚乱了。⁴⁰

从 1789 年起,另一个促使起义扩散的重要条件是,上层阶级(包括那些掌握警察和军队的人)的瓦解和分化。尤其是在 7 月的市政革命之后,有产阶级处于镇压农村骚乱的不利地位。许多地方的监督官被人们驱离了职位。城市的民兵夺取了武器和弹药。军队的逃兵不断增多。而且,农民士兵像往常一样在夏天获准回家帮助收割,而且他们还带回了有关城镇政治事变的新闻。⁴¹

也许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是,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像许多人本来希望的那样)使用民兵或号召王室军队来保护农村的财产权利,就有可能是在为专制政权的反扑提供方便。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准备采用的做法。⁴²只是在少数地方,城市的军队才镇压了农民。总体上,镇压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协调统一的部署,因而鼓励了农民的起义和抵制向全国扩散。

最后,城市的力量正在吵吵嚷嚷地攻击他们所称的“专制政权的反扑”。这或许鼓励了农民集中攻击剥削行为,他们尤其将这种行为与贵族们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其与领主捐、免税权和什一税(大多数的什一税都没有得到教会的监管并用于当地教会的开支)。通过司法区代表大会,农民的代表与城市的领袖取得了固定的联系。而且,基本而言,制宪会议的改革法令,也使得农民在整个 1793 年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反抗什一税和封建权利,而不是正当的地租和税收。

1789 年政治危机所特有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这一事实,即始于 1789 年春季的农民村社尤其是反抗领主制的起义为什么会如此普遍。确实,如果不是法国农村结构对反领主制的农民起义所起的这些助益性作用,单靠这些接合性因素就并不能生效。尽管存在着程度的差异,但是无论在哪里,领主以及那些帮助不在当地常住的特权受益者征收什一税的人,普遍使那些拥有相当财产和村社自治权、并且在反领主制的

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农民感到恼怒不堪。简言之,先前就存在着反领主斗争的潜在能力。而1789年的政治事件,又提高了农民的团结程度,增强了他们的觉悟,并削弱了支配阶级(尤其是领主)防范这种潜力释放的适当手段。

村社结构、土地所有制模式、租金提取方式和18世纪的社会经济趋势,在各地都有不同的组合方式,但是,在决定1789年农民起义普遍性和时机之时,这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显然并不是十分重要(当然,这种差异对于各地农民村社申诉哪些疾苦、攻击哪些具体目标可能会产生很大作用)。1788年之后,受全国性政治危机的刺激,各地的农民——怀着潜在和实际不满——几乎同时被诸如起草陈情书和市政革命等遍及全王国范围内的事件拉到了一起。农民的起义实际上是自主性和自发性的——但是只有在这种全国性的背景之下才是这样的。因此,农民在1789年的行动,不能被仅仅理解成是在地方层面上展开的、贯穿18世纪的“底层”斗争的延续。法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勒·拉迪里(Emmanuel Le Ladurie)依据对农村社会关系的详细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从1675年到1788年(没有重大农民起义)的这段时期,农民斗争的形式、范围和激烈程度都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⁴³“反领主”斗争只是在北部和东北部才显得比较突出,因为现代化的地主正在不顾农民村社的反抗,使用“封建”机制来扩展商业性农场。在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地主势力则没有那么强大,也没有那么活跃;农民的斗争也因此而比较温和,反领主的性质也不那么显著。然而,正如拉迪里自己所指出的,在1789年,即使是下奥弗涅(Basse-Auvergne)和布列塔尼这些在1675年至1788年间十分消极的地方,农民也非常迅速地加入了1789年反领主起义的行动之中。而且,朗格多克(Languedoc)地区长期抗拒什一税的农民,也把他们的斗争汇入了普遍的革命骚动之中。

上述事实所表明的是,如果我们要解释始于1789年的农民革命,就必须同时要强调两个方面:(1)整个法国农村社会关系普遍相似的结构特征;(2)1789年全国性政治的变化,而不是在整个主题之下强调各个地方和地区的差异。如果能够收集到各个地方和地区在社会结构模式和政治动员过程上的详细资料,我们非常乐意这样做。但是,在我们未能做到

这一点之前,我们则应该——而且也能够——继续对整个革命提出一些概括性的结论。因为,从性质上讲,整个革命并不仅仅是各个地方和地区性事件和过程的聚积。正如蒂利所恰当指出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社会的每一孤立部分的状态”。⁴⁴

法国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要充分讨论法国革命在农村所产生的后果,需要分析城市政治和革命性国家权力是如何与农村的情况在相互影响(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具体分析)。但是,我们在这一章还需要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革命之前,简单而直接的业主地租或许是农民在整体上所受的最重的负担。它们确实比领主捐和什一税更为沉重。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18世纪的法国,日渐增长的人口使得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匮乏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有的农民自己根本就没有土地或租赁不到土地,或者只凭农业产品已经不足以养家糊口。但是,有关法国革命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农民起义对于法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却几乎没有出现土地的再分配。在革命过程中,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土地,才从教会和某些流亡者手中没收出来,改变了所有权。其中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分给了农民。⁴⁵此外,没收土地的受益者还必须要花钱从财政窘迫的革命政府手中购买这些土地,这种要求实际上使得比较贫困的农民无法获得新土地。有关农民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果说多数农民都需要土地,那么为什么起义的农民会突然停止夺取领主、教会以及城市收租人等所占有的土地呢?

答案就在于村社团结关系所固有的局限。⁴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法国农民在拥有土地、牲畜和农具方面已经发生了内在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村社的习俗尽管限制着个人财产的使用,却并没有涉及对个人所有权的任何侵害,例如,并没有反对私人买卖或定期重新分配个人小块土地的规定。相反,村社习俗只不过是各个耕作者联合起来反对那些拥有损害他们全体人权利的外人。因此,习惯性的传统和普遍性的个人利益能够将整个村庄联合起来,反对什一税、领主捐和贵族的免税权,以及领主占有规定公地的图谋。但是,任何对个人土地所有权的攻击,都会威胁

到许多拥有小块土地的富农和中农，而他们又是地方性村社的领袖。而且，只有谋求完全非传统目标的农民集体行动时，才会发动上述的这种攻击。

农民革命突然停止进行任何反财产权的起义行动。当涉及领主捐和什一税时，农民村社拒绝缴纳这些税捐——或者是按照 1789 年制宪会议最初的法令进行赎买——的集体抵制活动一直在进行。正是由于其明确性和持续性，这种抵制活动得到了根本而持久回报，上述权利在 1793 年被成功地无偿地废除了。总体上，大约占农民收入 10% 的榨取被免除了（尽管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好处要多得多）。尤其是随着革命的逐渐展开，农民村社依然不断地抗拒革命当局征税和征募人力的要求。但是这种传统的反抗形式只要胆敢出现，就注定会失败，因为（我们将会看到）革命只不过是强化了法国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至于其余表面上“合乎逻辑”的农民起义目标——如更多的私有土地——激进的均分土地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形成。许多（实际上是大多数）较贫困的农民也意识到了他们的需要。然而，农村的社会模式在促成并影响了最初的反领主制的集体造反的同时，也阻碍了这种造反扩展为总体上反对土地财产权的斗争。

实际上，法国农民革命最适得其反的后果是，它的成功反而损坏了最初造就革命的残存的村社团结。因为领主——是传统的地方性对手，农民村社正是通过反对他们才被铸造为联合体——已经制度性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革命的法律变革强化了私有产权，因此促成了公社所控制的农业走向分裂。确实，有不少集体习俗都长期幸免于革命，直到 19 世纪中期，以公社为基础的农民骚动在法国仍然还时有发生。⁴⁷然而，1789—1793 年的农民革命，却导致法国农民内部的经济利益分化更加明显，他们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采取反对非农民群体的联合行动。帕尔默（R. R. Palmer）写道：“革命时期所出现的农民联盟、公共村社和农村的团结都一致崩溃了。再也不会出现 1789 年那样普遍农村大动乱了。”⁴⁸

总而言之，法国革命中的农村起义，是由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共同完成的。但是结构却极不公平，主要的成果，是对那些已经具备经济保障、并在地方政治中成为领袖的农民有利。

第二节 村社革命：俄国农民的激进主义

将目光从革命时期的法国转向俄国，就会看到，同样的因素——租佃农业、农民村社结构，以及镇压机器的崩溃——说明了农民起义的起源和性质。实际上，俄国事态发展的逻辑才更加明确，因为俄国的画面是由浓墨重彩所勾画的。

作为俄国专制统治的基础，农奴制之所以在历史上得以巩固“并不是因为没有遇到反抗，而是它没有因为反抗而停顿”⁴⁹。村社农民被束缚在庄园土地上，集体向服役贵族承担贡赋和劳役；服役贵族几乎拥有农民的绝对司法权（除非农民直接属于沙皇）。随着帝国政权的建立，农奴村社的头上还增加了沉重的税收和兵役义务。农民的抵制形式要么是逃到空旷的西伯利亚大草原，要么是零星的地方性暴动。当农民能够在城镇和边疆的哥萨克那里找到同盟时，这些冲突偶尔也会爆发成致命的攻击（尤其是针对贵族）。但是，到18世纪末，俄国政权平息了西伯利亚大草原的边疆，将哥萨克变成了帝国的宪兵。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The Pugachev Rebellion）是1905年以前规模最大的一次造反。面对着统一的镇压机器，又没有任何能够与之对抗的军事力量，农民只能用零星的、地方性的反抗来进行表达——而且总是很快就遭到无情的粉碎。⁵⁰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1861年的农奴“解放”来自于沙皇及其官僚的主动性，而且其目的也是为提高社会的稳定和帝国体系的潜在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放活动本身为1917年根除革命前社会秩序的农村革命创造了条件。因为，这次改革的实际后果是，不但强化了那些容易促使俄国农村产生起义的结构模式，而且也没有刺激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削弱起义的潜在可能性。

农奴解放之后的农村条件

农奴解放是在帝国当局的坚决主张之下发起的，但是具体的实施则

交给了各地的贵族。部分是由于地主的干预,部分是由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的要求,农民在获得解放之时,所承担的义务比农奴制下还要多。⁵¹在贫瘠的北部森林省份,贵族把多余的土地割让给农民,但由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赎金。获得解放的农奴只有通过从事季节性的工业劳动,才能支付这些赎金。在黑土地带和南方草原省份,地主们“割让”了以前由农奴耕种的土地的五分之一,使得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赁土地或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以前的国家农奴和附属于波兰地主的农奴,在其定居点上获得了更好的条件。但是,以前的家庭农奴则没有被授予土地。而且,所有分配到土地的农民,在四十九年中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以付清国家向失去农奴的贵族所预付的赎金。总体上,从农奴制之下解放出来的农奴一无所获,只是得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后果。尽管解放运动分配给了农民一半以上的土地,但却在经济上将他们置于了更加窘迫的地位。他们仍然希望摆脱那些剥削性的义务,希望得到贵族的其余土地。农民相信,这些土地本来应该归他们所有,他们应该在这些土地上为自己耕种。

比解放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更为重要的,是解放的制度基础。因为以前的农奴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是根据传统的模式进行的,这就意味着,村社(obshchina)的集体所有权仍然是俄国欧洲部分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⁵²村社是一种农村公社,它控制着土地并向各农户分配土地的使用权。这些农户常常是由家长制的大家庭所组成,各个家庭分别经营着耕作和收获。根据规模的大小,每个农户都有公认的平等权利分配到一块可耕地,使用草地、公共牧场和森林。公社的土地要定期“重新分配”,以随着家庭人口的变化而重新确认平等原则。

在历史上,村社一直被贵族和国家政权所强化,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农民的义务从集体上得到了保障,而且确保了最大数量的农奴“灵魂”的维持。⁵³解放运动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了这一传统,因为只有在校社的所有农户共同承担在四十九年的期限内偿清赎金责任的情况下,国家才能成为赎买的中间人。⁵⁴双方一旦接受这一条款,单个农民实际上就不可能挣脱他与村社之间的纽带。为了获得解放,他必须要付清自己的所有赎金份额,或者找到其他人来把自己赎买出来。而且,个人主义式

的农业耕作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凡是合并土地或不遵守由集体强制实行的三圃制的行为，都必须得到村民大会三分之二的人的赞同。最后，公社自身要出售他们所分配到的土地，也必须要经过政府的允许，其结果，必然是把大量的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按照传统的方式耕作。

确实，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俄国的农业和生产关系存在着重大的地区性差异，因为解放运动强化了俄国欧洲边缘地区农业原来就有的商业化趋势，而核心地区则仍然没有得到改造。⁵⁵在波罗的海沿岸省份，早在 1817 年就解放了农奴，但是没有给他们分配土地，而且也没授予他们迁移的权利；因此，能够接近西方谷物市场的地主，就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庄园，并由工资劳动者们加以耕种。在乌克兰西部，农民将分配来的土地出租给先前已成形的资本主义式的甜菜种植加工商，然后则自己在这些“田野工厂”(factories in the fields)中找活干，并伴随着季节性的流动。在东南部地区，铁路的建设使得许多先前的国家农奴——他们在解放运动中分到了相对较多的土地——转向经营商业性的小农场。与此类似，在 1890 年之后，随着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国家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定居。那些能够利用这一机会的小贵族和富有的农民，不顾传统的村社和耕作形式，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小农场。最后，在北部森林省份(包括滨海区、中心工业区和北方区)，除了靠近大城市的地主外，农业生产在商业上无利可图，因此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贵族都迫不及待地出售自己余下的土地。正是在这一地区，农民村社被迫接受了大片的份地，反而是加速了解放前的趋势——季节工流向城市里做工。随着 1880 年之后的工厂的增多，这一趋势尤其强劲。而且，当 1906 年斯托雷平(Stolypin)改革允许农民摆脱村社束缚时，许多北方的农民工人利用了这一机会，永久地迁移到了城市地区。

然而，俄国的广大核心农业区域——包括许多中部黑土地带以及毗邻的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草原地带的许多省份——却基本上没有商业化，传统的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了稍许的修改而得以保存下来。⁵⁶正是在这一地区，解放运动使贵族掌握了大片“被分割开来”(cut-off)的土地；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村社对农民财产和耕作的控制是最牢固的，几乎无所不在。有些穷困的贵族出售了自己的土地。(实际上，到 1905 年为止，俄国农民

在所占有的土地几乎上升到了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二)。⁵⁷但是,许多地主坚持要将自己的庄园分成小块加以出租,以换取劳役或实物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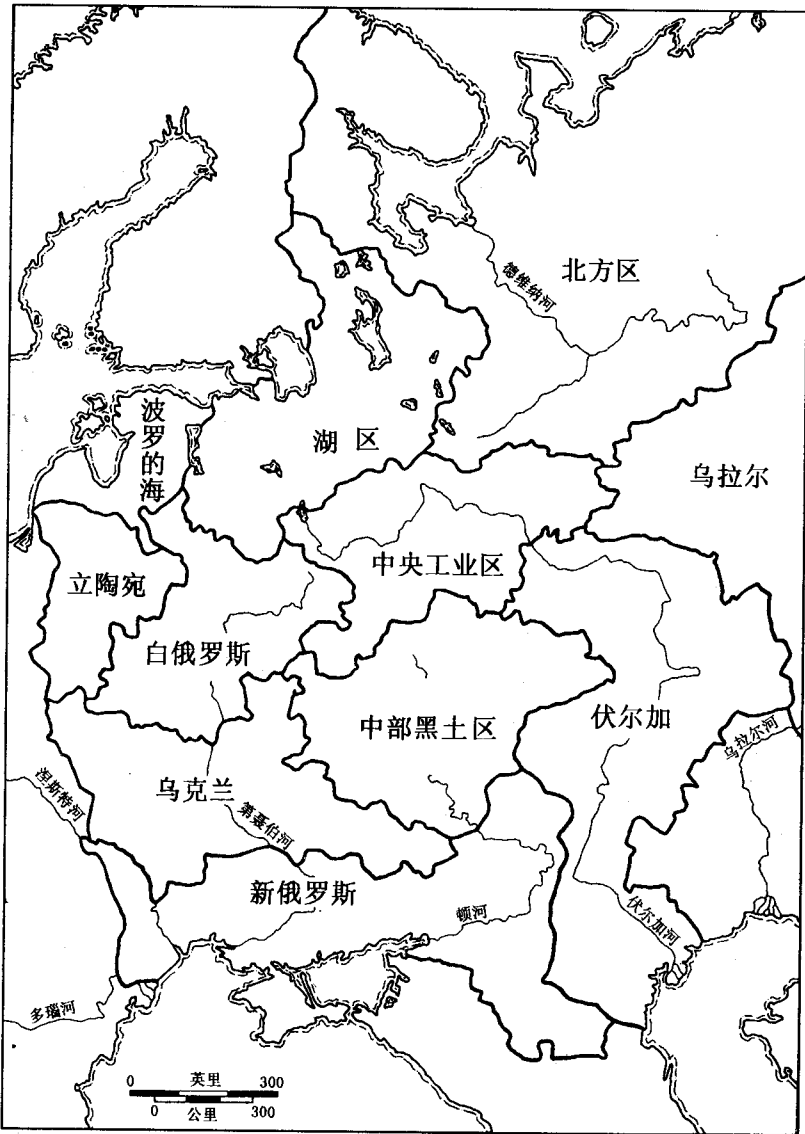


图2 欧俄的主要区域

资料来源: Hugh Seton 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70.

由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长,贵族就很容易将自己的庄园分成小块,并以极高租息出租,远离劳动过程而靠租金过活。租佃关系就很容易替代传统的(贵族—农奴)生计农业的关系。这就使得贵族能够从庄园土地中获得收入,但却将繁琐的管理耕作和添置农具、牲畜的大量责任留给农民。⁵⁸

佃户常常就是整个农民村社。其他出租的土地似乎基本上直接落到了那些需要更多土地维持生计农民家庭之中(他们也依附于村社)。尤其是在核心省份,土地出售和租佃并没有造就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这种出售和租佃“只不过是向那些只有最低限度耕作资本的农民提供了一种维持生计的依靠”⁵⁹。

在1917年革命前夕,俄国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农户基本上依然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⁶⁰这些人主要集中在中部租佃农业的核心区,份地持有者和佃户混杂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传统的村社框架之中。由于技术停滞,缺少市场机会,人口增长,再加上地主和国家对农民所施加的沉重压榨,由此而使他们面临着日渐加深的贫困,一直陷于生存斗争之中。

尽管解放运动及其后果导致农民的经济生存越来越成问题,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农民村社却明显摆脱了贵族及其庄园管家的大多数政治控制。农民获得了在帝国官僚机构监督之下自治的权利。⁶¹米尔(mir)或全体家长所组成的村民大会,成为正式的政治权威中心。除了分配土地和管理种植周期的基本经济职能外,米尔现在还负责完成村社缴纳捐税和赎金的义务,同时还管理农民离开村庄的通行制度。选举产生的长老——在传统上是集体自治的米尔的非正式的领袖——要对当地的地产巨头、警察和乡村事务督察官员负责,并且可以被他们随时撤换。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受到了官僚机构的限制。而且,解放运动之后的一些措施,在总体效果上是促进了农民集体处理自己的地方政治事务的能力,从而使得乡村在对付外人时更加自主和团结。

那么,一系列更容易导致农村革命的诱导性条件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贵族阶级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上走向衰落,但是在农村仍然保留有根基——通过赤裸裸的剥削、不劳而获和租佃关系而与农民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虽然农民村社的集体习俗和政治独立性得到了加强,但是要用

毫无变化的生产方式来满足外界更沉重的要求。实际上,由于威特*的工业化规划所要求的税收,与使农民状况急剧恶化的大危机恰好重合,甚至在明知会被镇压的情况下,1890年之后所发生的地方性骚动也越来越频繁。⁶²强制性控制的失败,其后果必然是引发一场总爆发。先是1905年的暂时总爆发,然后则在1917年不可逆转地再次爆发了。这两次爆发的时机,都正值战争和帝国军事失败。

1905年和1917年政治危机的影响

1905年革命始于城市,但是很快就传遍了农村。由于军队在前景悲观的对日战争中陷入困境,政府又忙于应付城市动乱,农民们在1905年春天就已经卷入了冲突之中。⁶³农民一度避开了强有力的镇压。正如格申克隆所指出的:

长久以来,政府形成了一种对付农民暴动或反抗的简单技术。将一支特遣队派到发生骚乱的村庄,驱散人群,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使用枪炮,逮捕首恶,五花大绑,当众鞭打,然后则在恢复和平和秩序后撤离。只要骚乱很少而且分散,这些方法就非常有效。当骚乱变成一种几乎普遍存在的大规模现象,而政府的主要军队又被远东的战争拖住时,当农民起义与交通、通讯和制造业的普遍罢工运动重叠在一起时,革命就迫在眉睫了。⁶⁴

农民运动的节奏会因季节原因而不时被打断。这次运动在1905年秋季达到顶峰,然后则逐渐变弱,只是到了1906年春季和夏季又振作起来。然而,在1906年的下半年,政府——在1905年秋季匆忙结束了日俄战争后,重新把军队调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已经有能力一步一步地残酷镇压农民造反了。

在流产的1905年革命期间,农民的行动所遵循的模式,使得某些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接近事实的真相。1907年由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向俄国欧洲部分50个省中的47个省的应答者发出的问卷,就所发生的事实收

* Witte, 威特,即谢尔盖·尤列维奇:[1849—1915年]俄国政治家。他曾任财政部长(1892—1903年),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一任首相[1905—1906年]。

集到了有关的数据。G. T. 罗宾逊(G. T. Robinson)在他的著作《旧制度下的俄国农村》、莫林·佩里(Maureen Perrie)在其论文《1905—1907年俄国农民运动》中对这些数据做了分析。⁶⁵

在1905年革命中,农民的直接目标主要是经济而非政治上的。他们的斗争主要针对的是地主,与警察和其他政府代表的冲突也主要是与地主冲突的副产品。在佩里看来:

各地农民运动所采取的反抗地主的形式,基本上取决于土地的租佃体制和农村关系。农民运动在下述地区最为强烈,如中部黑土区、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等地,因为在这些地方,农民佃户受到绅士地主的剥削最为沉重,或者由从租佃农业向大型资本主义农场转变时引起了严峻的苦难。在这些地方,农民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攻击地主的庄园。这种攻击常常涉及破坏庄园中的住房和仓库,以确保“主人”再也不可能回来;农民同时还夺取庄园中的土地和财产。在某些地区,如西部,在庄园中劳作的主要是农业无产阶级,他们在斗争中的普遍要求,就主要是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⁶⁶

1907年问卷的应答者对革命性政党在农民中的鼓动作用评价较低,但是他们强调,各地的领导权往往落在那些与外界有联系和外出经历的农民,如在城镇做工的和当过兵的农民身上。然而,罗宾逊指出:

在森林草原边界以北的村庄中,时时外出到城市寻找工资劳动的做法更加普遍,因此,这种特殊的机会,使得农民大众接触城市观念的机会也比南部的农民更为普遍;在沿着森林和草原交界地带的广大南部省份,农民的经济形势普遍更加艰难;而且……除个别情况之外……在这次革命期间,农村骚乱最为严重的不是在交界地带以北的地区,而是在交界地带以南的地区。⁶⁷

而且,罗宾逊提出:“1905年秋季动乱时,在地主遭受损失最大的20个省中,有16个省普遍实行各家农户重新划分原有土地使用权的做法。这可能并不是纯粹的巧合。”⁶⁸最后,佩里坚持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整个村庄或公社的农民在参加运动……”⁶⁹而且,在所有耕作土地的家庭都有权平等使用土地的传统“劳动原则”的名义之下,农民村社常常既攻击贵族的庄园,又攻击各个富农的农场。⁷⁰

从上述所有材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意义的：即1905—1907年农村造反的最深层动力，来自于俄国欧洲核心省份日益贫困的农民村社。造反的基本“理由”是经济困苦，而日俄战争又提供了一种短暂的机会。相当传统的村社观念和形式决定了这种斗争：“可以说，农民革命的组织基础在乡村中‘早就准备好了’。”⁷¹

这也正是沙皇当局所得出的结论。在1905年革命中侥幸脱险的沙皇政权，放弃了支持农民村社的政策。在所谓的斯托雷平改革中，沙皇政权提倡将村社土地分割成私人财产，以有利于贫农出售和富农购买土地。在1906—1917年期间，与普遍的经济发展一道，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缓农业停滞的状况，推动农民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区，并加剧了农村的经济分化和个人主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到1917年时，尽管农户正式占有可继承的份地与村社集体占有的土地相比，从不到四分之一增加到一半以上，但是，自1905年以来，也只有十分之一的农民家庭，凭借着坚实的私人财产而重新定居下来。⁷²人们必然会考虑到，“仅仅是在名义上分开以后，旧有的土地联系仍然会在许多方面保存下来，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明确的物质合并，也不能切断公共财产的最后联系。”因此，人们只能赞成罗宾逊的意见，即“原有的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的机制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下来了……”⁷³甚至在新措施最为成功地促成了贫农持续流动和富农独立的地方，或许也只是强化了落在后面的中农变得极端团结，并加强了他们对村民大会的控制。而且，斯托雷平改革“对于农民问题最尖锐的中部省份几乎毫无影响”⁷⁴。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17年的农村革命在形式和节奏上都非常类似于1905年的农村革命。⁷⁵紧随于城市反对沙皇专制的二月革命之后，春季就开始出现了反对地方性庄园的农民运动，他们同时还侵占地主的财产，拒绝缴纳地租和服劳役。接下来，冲突逐渐加速，深化为暴力攻击庄园，夺取地主的土地，并在农民当中重新分配。农民运动在1917年秋季达到了高潮，在十月布尔什维克掌握全国城市政权后，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正如在1905年一样，在“莫斯科以南和东南各省，即中部农业区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农民的行动最为暴烈，也最为极端。⁷⁶在这些地区，收租的地主和分配土地使用权的村社占优势。确实，其他地方的地主也

先后被驱逐——要么是通过农民和农业工人更少暴力色彩的直接行动，要么是通过行政机构来贯彻革命政策，或者是双管齐下。但是，核心省份的农民运动已经设定了步调和风格。

在1917年和1905年之间，所存在的真正重要的差异在于军队所发生的情况。尽管帝国军队在1906年基本上保持稳定，能够被用来镇压农村的造反，但是在1917年的夏天和秋天，被动员去参加欧洲总体战争的庞大军队已经分崩离析。六月份进攻奥地利的决定性失败，最终将前线的军队变成了失败主义者。⁷⁷在那之后，军队的瓦解和农民造反运动的深入开始相互交织在一起。先前的士兵返回到乡村加入造反运动，并常常领导着夺取土地的斗争。临时政府尽管从不接受和认同这种针对财产的自发性的暴力运动，但却没有可靠的军队来实施镇压。当农民感觉到没有任何官方的军队可用来对付他们之时，他们就越来越胆大；再加上回乡士兵为他们提供的装备，农民集体团结的社会力量就得到了强化。“除了对政府无效镇压企图的愤恨，以及时间流逝的自然动力之外，农民运动在1917年秋季的高涨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退伍或‘逃离部队’（self-demobilized）的士兵回到了乡村。”⁷⁸最为重要的是，士兵的到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官方镇压的失败，决定了1917年农民革命的成功。与之相反，1906—1907年的农民革命则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俄国平均主义的后果

俄国农民在革命中最想得到的，以及他们立即就想实现的目标是，拥有土地并得到耕作工具。⁷⁹事实上，各地贵族的土地庄园都被夺取或征用，他们的可耕地、森林、水源、牲畜、房屋和工具都被农民瓜分。在一些（尽管不是所有）地方，业主本人受到了暴力攻击，庄园的建筑被焚烧，目的是确保土地的转移成为不可挽回之事：“有人曾用离奇而有趣的语言来解释这一目的：‘农民们正在摧毁乡绅的鸟巢，以使小鸟儿永远不能回家’——这里的‘鸟儿’是对一般大地产主的委婉说法。”⁸⁰除了地主的庄园外，农民，尤其是核心省份的农民，还夺取庄园主的农场。这些庄园主也只不过是殷实的个人财产，而且他们的财产独立于村社（可能是响应斯托雷平改革）。与此类似的是，他们还迫使那些在乡村中拥有圈

起来的个人农场的农民，再次接受重新分配土地和协作耕种的集体纪律。

总的说来，俄国农民获得了以前由地主所掌握的土地和资源所有权，摆脱了向先前的庄园主缴纳租金的义务。当然，他们有得也有失，因为在他们所夺取的土地中，大多数先前已经出租给了农民，而且工资劳动的机会也随着庄园的消失而消失了。当时的一项统计性的估计表明，平均每个农户持有的土地增加了大约三到五英亩。⁸¹但是，各省和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大，因为农民土地的增加量，取决于各个地方夺取的贵族和沙皇的地产所处的确切位置。此外，并不是所有获得的土地都同样有用。而且，即使在有用的情况下，也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因为土地的新主人常常缺乏必要的农具和种子。总之，有些农民家庭从土地革命中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⁸²

比总体后果更值得关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之中分配土地的效果。到1919年，实际上俄国所有农业都已经变成了小农的活动。正如钱伯林(Chamberlin)所指出的，“1917年农民大规模夺取土地的总体后果是，农民在农业上的彻底平均化。”⁸³富裕农业户所占的比例更小，平均拥有更少的土地和牛马。以前处于中等富裕的农户似乎保住了自己的财产或者得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农民革命当然使得中间阶层在比例上扩大了。因为最大的获益者是以以前缺少土地的农民，在瓜分庄园时，他们尤其获益不浅。同样，不少(尽管不是全部)无地的农业工人、以及其他在危机时回到乡村的无地者，也分到了有限的财产。⁸⁴

显然，1917年俄国农民革命的成就，在一些重要方面与1789年法国农民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对照。在法国，领主的权利和控制被起义的农民所废除。但是，私有财产，包括大地产和富农的农场，则受到了尊重而没有被攻击。在法国农民内部，最大的赢家是那些自己已经拥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工具)的富农和中农。然而，在俄国，农民革命不但废除地主的土地租权利，而且还夺取和重新分配了大多数的私有土地财产。这就给不那么富有且缺少土地的农民带来了过多的好处。同样真实的是，法国和俄国农民革命的过程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从分析角度讲，他们的类似性和差异性都能够用比较的观点来解释。

首先,在俄国,与法国一样,农民的村民大会在外界的控制面前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从而为自发的、独立的造反提供了组织基础。正如特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所谈到的俄国农民造反一样:“其组织方式非常值得注意。各地的村民大会决定如何分割非农民的财产。然后则采取行动,所有的家庭都被迫参与,以确保成功——而且在随后可能出现的报复性后果中承担平等的责任。”⁸⁵长官们尽管会试图控制和引导地方性的农民造反,但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⁸⁶作为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临时政府所设立的土地委员会试图缓解土地革命,但却受到自下而上的渗透,转而支持农民自己夺取土地和地方自治的目标。在1917—1918年期间,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社会革命党的机关和布尔什维克所激发的苏维埃之中。其结果是,没有人(包括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能够维持大地产制在经济上的完整性。财产再分配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各村、区、至多是县的邻近村庄之间的基层合作程度。可能与期望的意图相反的后果是,某些省或县的农民比其他地区的农民得到了更多可分割的土地,而高层权威却无法推动更大范围的再分配。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土地革命首先是由地方性村民大会自主控制的,所有的事件就都可以得到理解了。

从另一个角度与法国革命进行比较,则表明两个国家的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两场农民革命中,由地方所控制的农民造反,都受到了其所以发生的社会范围内的政治危机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危机首先是一种国内政治发展。尽管王室行政机构和军队最终被削弱到不能有效对付农民,但绝不像俄国那样,被动员起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庞大军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军队的崩溃不但对俄国农民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而且还影响到了农民成功的速度和形式。因为在1917年俄国农村大多数村庄内部,政治是由年轻人所主导的,他们持有由战时军事经历所提供的枪支和观念,向年长的米尔传统首领——常常也是大家族的家长——发出挑战和警告。其结果当然常常是以更为快速、更具暴力性的手段推动着土地革命的完成。而且,1917—1918年期间,富有农户之所以会减少,部分原因在于,在危机期间,大家族往往分裂,出现了更多的拥有较小平均规模和更少财富的农户。⁸⁷某些小农户的出现,肯定是由于年轻

人坚持自己权利的副产品。依此类推,这一现象也可归因于这一事实,即俄国的革命性政治危机发生在(也导源于)国家在大规模现代战争中的失败期间。相反,在法国,当国王号召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时,革命性政治危机首先冲击乡村。尽管冲击的形式很激进,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村民大会不是(像俄国那样)由富有战斗性的(青年土耳其人),而是由通常的(富有而年长)村社权威人士召集和主持的。

最后,我们以一个共同的分析性因素来理解两国农民革命的主要差异:正如法国农民村社的社会经济基础可以解释法国农民革命的成就和局限一样,性质不同的俄国村社的基础,也提供了理解俄国农民胜利内容的钥匙。法国的农民村社所建立的基础仅仅是为了协调农业周期和管理剩余公用土地,他们支持 1789 年反领主的造反。但是随后,在面临富有农民和贫苦农民围绕私有财产权发生利益冲突时,村社就瓦解了。相反,俄国的村社虽然承认并使得各个农户分别占有土地和耕作,但并不使私有土地产权合法化。他们坚持“所有的土地都属于上帝”,农民村社作为整体,尽可能地竭力占有土地,然后把土地大体平等地分配给各农户(要么根据成年男性劳动力的人数,要么根据“吃饭者”的数量,要么是同时两用两个标准)。而且,每一次的土地分配都只是暂时性的,等到下一次重新分配时,各个农户将会根据自己的相对规模的大小而得到或失去土地。显然,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农民村社,绝不会要求俄国农民尊重私有财产(尤其是那些剥削他们的地主的财产)。此外,村社的再分配的特征,也给俄国乡村平均主义的鼓吹者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 1917 年的俄国,农民革命的步伐是由村社最强大的地方决定的。即使在那些公共占有和再分配已经废弃的地区,这些习俗往往趁革命之机而再次生效。当时的观察者们写道:“土地公社,以非同寻常的力量活跃起来,它无疑是社会机制的基本意识形态的核心,也确实在农民自身之中传播着农村革命。”⁸⁸ 确实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因为村社是农民有效地打击他们的主要敌人——地主的最好和最熟悉的工具。而且,正是由于村社的集体利益在于扩张土地占有权和贬低私有财产的传统,才使得俄国农民革命取得了如此广泛而平均的成果。

第三节 两个反例：没有农民造反的英国和德国革命

对法国和俄国社会革命起着必要推动作用的农村剧变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旧制度，在结构上都容易产生农民反对地主的反叛。一旦革命性政治危机废除了绝对君主制，瓦解了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构，法国和俄国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地主政治结构就为农民村社提供了有效的团结和自主，以攻击地主的财产和特权。如此能够诱导农民反叛的条件绝对不会在每个国家都出现。这些条件的缺乏，能够解释即使在发生社会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会发生成功的社会革命。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考察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原因时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与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以再次证实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社会革命的正面原因的假设。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48—1850年的德国革命就是两个反例。虽然他们各自的特征和后果都非常不同——英国革命是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而德国革命则是一场失败的社会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实现成功的社会革命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和德国（易北河以东）旧制度下的农村阶级和政治结构，给了地主而不是农民以支配性的权力。英国和易北河以东的地主上层阶级的全国性政治能力和利益并不相同；因此，这两场革命在总体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出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重要的一点是，与法国和俄国相反，即使在革命性政治危机期间，英国和德国的地主也没有受到自下而上的成功挑战。为了更为详细地阐明个中原因，还是让我们依次简要考察这两个案例吧。

英国的议会革命

尽管大多数相关的行动都发生在1640—1660年期间，但是英国革命的重大事件还是涵盖了17世纪的一半，从1640年长期议会的召开，一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⁸⁹在许多方面，英国革命的动态过程都

类似于法国革命。面对战争所引起的财政危机，查理一世召开了由上层阶级所支配的议会。这次议会很快就转向反对他的政策，并要求通过制度变革来限制王室的权力。议会得益于民众的游行（尤其是熟练工人、工匠和其他小业主所参与的游行）⁹⁰和伦敦的市政革命。⁹¹这一剧变使其获得了必要的行政和军事资源，使其先是阻止了王室发动政变的企图，后来又在内战战场上战胜了保皇党人。接连不断的危机，使得最初的革命支持者出现了分裂并走向两极分化。而且，在17世纪50年代和17世纪60年代革命最终发生逆转之前，革命的激进化达到了顶点，逮捕并处死了国王，宣布建立共和国，民众提出的民主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在紧急情况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和军事独裁。所有这些都确实非常类似于150年之后法国革命的发展轨迹。

部分是由于这种类似性，部分是由于两个发生革命的国家都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国家，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常常被贴上类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签。不管这一标签是否适合这两场革命中的任何一场，⁹²我们都不能盲目地忽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重大差异，尽管英国革命确实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但是它并不是一场像法国那样的社会革命。它并不是通过阶级斗争，而是通过地主支配阶级不同集团之间（每一方都在所有其他阶级和阶层中吸收盟友和支持者）的内战而实现的。而且，法国革命明显地改造了阶级和社会结构，而英国革命则没有。英国革命所做的，是革新的英国的政治结构。它废除了国王干预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事务的权利（和制度性能力），并且总体上迫使他只有在得到议会的信任和立法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统治。⁹³自此之后，议会依法定期召开，成为英国全国性政治的中心舞台，直到19世纪都由支配阶级稳定地独占。确实，这一政治革命有助于推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它突然让一个新阶级掌权，而是因为它强化和确认了一个支配阶级的直接政治控制，这个阶级早已有许多成员（他们散处各地而又在社会上联成一体）在从事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商业。

实际上，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英国革命，就必须观察那个发动革命、始终领导革命并最终从中获益的阶级。那个阶级虽然包括有商人在内，但基本上是一个地主上层阶级，由一小群司法贵族和大量的乡绅（他们被

社会视为绅士,但并没有法定的贵族封号)所组成。与法国 1789 年之后的贵族、领主以其他特权阶层形成尖锐对比的是,英国的这个地主上层阶级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在结构上)被革命所废黜。确实,他们的支配性也受到过挑战,尤其是来自于平等派——有些类似于(但没那么重要)法国革命中的无套裤汉的平民民主派——的挑战。⁹⁴但是,在英国所没有出现的是——本来会成为对支配阶级权力基础的直接攻击,并为城市激进派创造机会——广泛存在的农民反叛攻击地主的现象。如果我们观察了当时英国所存在的农村阶级和地方政治结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这种反叛?

到 17 世纪时,英国农民尽管绝对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最终被排挤到边缘,但是维持大约一半以上的农业土地的控制方面已经落败,而在中世纪时,他们本来持有隶属于领主的这些土地。⁹⁵这里存在着某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像法国农民一样,英国农民在 14 和 15 世纪从农奴制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是与法国农民不同的是,获得解放的英国农奴最终未能获得对自己传统占有土地的可靠权利。最初,他们似乎在这方面比法国农民还好一些,因为他们被免掉了领主捐,而且开始建立起了明确的自由保有自己地产的权利。但是,英国的地主成功地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并把许多农民变成了“根据官册享有土地的人(copyholder)”,这就意味着这些农民只有在向领主缴纳罚金之后,才能出售或让后代继承自己的土地。而且,正如经济史专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所写的那样:“最后,土地变动的罚金,往往给地主提供了他们所需的驱除传统农民佃户的依据。”⁹⁶这样,就为地主占有和圈用大片土地(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出租给租地的商业性承租人打开了通路,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16 世纪以后羊毛和谷物生产者扩大的鼓励。其结果是,到 17 世纪时,英国的地主似乎已经拥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土地,(与法国不同的是)这些土地不仅被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而且往往还出租给商业性承租人。⁹⁷

同样,在整个这一时期(从 16 世纪开始),许多地方的农民村社内部也发生了两极分化:一方面,商业取向的自耕农农场主蓬勃兴起(有些人成为大地主的承租人,另外一些则成为富有的地产所有人);另一方面,少地的农民则陷入贫困或生活拮据的境地。⁹⁸后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成为依靠雇用工作,或者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变成工资劳动者。法国虽然也出现了这种经济上的分化,但与法国的情形不同的是,英国的富农和贫农不可能联合起来反对影响到全体农户利益的领主捐和领主控制,因为英国根本就不存在领主捐和领主的控制。

如果说这种社会经济的障碍还不够的话,英国 17 世纪的地方政治结构,甚至还在更大程度上阻碍着广泛而一致的农民反领主的斗争;而且,这种结构还影响到了每个地方的农民,即使在那些圈地不那么有控制力的一些地方,都同样如此。英国没有部分隶属于王室官僚机构、部分独立于地主借助于同样的官僚机构所支配而由农民所主导的村民大会。因为英国国王(或女王)没有豢养(哪怕是在名义上)渗入地方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相反,从亨利八世时代开始,国王对地方的统治(如果不是根本上的话)都是通过在各郡乡绅中任命不付报酬的授权者来实施统治。⁹⁹乡绅充当了领主的代理人、副代理人、治安法官和郡长。与他们有紧密联系的自耕农,常常充当治安官一类的重要的从属性职位。¹⁰⁰教区的牧师也远远不同于法国的牧师,不像法国那样是农民的潜在盟友或保护人,他们由地主任命并忠于地主。这些由乡间地主所建立的组织机构,就像他们被贴上的恰如其分的标签所显示的那样,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司法事务。他们主持司法、管理民兵、执行济贫法,并执行那些他们所喜好的王室决策。面对这些乡间的组织,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任何团结和自主。因为自耕农被有效地吸收为隶属性的官员,劳动者和仆役通常都与他们的地主主人有着强有力固定的联系。即使在地方上可能发生诸如抗拒圈地之类的骚乱时,也能得到有效处理,因为,受到威胁的地主也可以方便地动用收买和镇压的制裁手段。

实际上,正是以这种郡一级的政治权力为基础,英国的地主上层阶级才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而在 1640—1641 年走到一起,以维持上层阶级的自由的名义,挑战试图成为绝对君主的查理一世。而且,在整个内战期间,甚至在全国性的政治争端导致“天生的统治者”发生分裂时,郡一级的政治机器也一直在持续运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器仍然维持在居支配地位的地主家庭的领导之下;与此同时,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仍然将地方上的地主阶级联系在一起。¹⁰¹只是在革命处于最激烈的高潮

时,统治着每个地方的郡委员会才偶尔被置于自耕农一类的非支配阶级的民众的领导之下。然而,即使是自耕农,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情在所有经济独立的居民中实行政治民主的平等观念,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兴趣去领导(或允许)农民反抗地主。

此外,由于革命的激进阶段(在地主上层阶级看来)对政治集权和社会平等构成了双重威胁,因此很快就过去了。地主上层阶级以自己的妥协方式,退回到了复辟的君主制,但这时的君主政府,也不得不尊重郡的统治者及其议会对于军队、征税、教会事务和经济管理的根本控制权。当另一个斯图亚特君主开始在17世纪80年代忘记这一点时,他很快就受到了提醒(而且被替代),而这一次还基本没有什么纷扰。与此同时,当英国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时,前工业时代的下层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守势。他们——尤其是农民——并不拥有能够成功挑战地主上层阶级的集体力量,即使是在英国革命期间,地主上层阶级与君主政府发生争端时,或者是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争端之时也是这样。因此,这次革命始终是一场由上层阶级支配的政治革命,而未能发展成为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

现在我们将历史的目光跨过两百年,来简要观察另一场革命。这次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流产的社会革命,在这里没有出现农民反对强大的地主阶级的暴动,也是一个紧要之处。

1848—1850年失败的德国革命

1848—1850年的德国革命,实际上是由主要发生在松散的德意志邦联中相互分离的各个君主国和公国的首府的一系列造反事件所组成。这些事件也只不过是横扫整个欧洲类似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累积成了一种协调一致的努力,通过法兰克福议会的运作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自由民主的德意志国家,并以前普鲁士国王作为选举产生的立宪君主。¹⁰²

由聚集在法兰克福的德国自由派制定的社会政治纲领——所有国民享有自由民权;代议制政府以及清除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经济自由的社会和政治障碍——与1789—1790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宪君主派的立法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似乎并不奇怪,因为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1848年的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并没有太大的进步。而且,法兰克福议会的社会构成(大多数是在政府内外工作的律师)也非常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立法机构的构成。¹⁰³

德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动态过程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类似性。在这两个案例中,当君主在民众的起义,尤其是因经济衰退而饥寒交迫的城市工匠、小店主和熟练工人起义面前被迫采取守势时,自由主义政治家们都获得了官方的权力。在解释德国革命时,人们常常强调,这些民间造反者的目标——更低的食物价格、更高的工资、基尔特组织(或)就业的政治保障——与自由主义政治家们的政治目标毫不相干,而且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经济观念相抵触。实际上,这一点常常被说成是德国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¹⁰⁴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民众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目标当然也是相互抵触的,¹⁰⁵但革命却成功了。

真正将德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区别开来,并且对1848—1850年的失败产生关键作用的因素,是普鲁士国王在经过一年的革命政治后,坚决制止整个事态的能力。他能够不顾辛辛苦苦制定出来的法兰克福宪法,解散议会,用武力粉碎整个德国的任何抵制。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想到,到1790年为止,法国的路易十六还受到爱戴,本来也应该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他做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部分的原因是,法国支配阶级在1787—1788年的行为与普鲁士容克在1848年的行为相反。我们已经指出过,法国的特权阶层,在发动法国大革命时,已经使得王室的军队不再是镇压最初民众示威的可靠工具,他们在军队内外的活动促进了军事纪律的最终崩溃。相反,德国革命并不是由贵族反君主的斗争所引起的。而是由巴黎反对路易·菲利普的斗争突然成功的消息而引发的,这一事件既壮大了德国主要都市的城市骚乱者们的胆量,也使得德意志的君主们担心,如果向自由派做出政治妥协,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保有权力的能力。具体而言,在普鲁士,全欧洲的“革命性事件”与奥地利的梅特涅垮台的消息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士兵与民众抗议者在柏林发生暴力冲突,导致了戏剧性的变化。此时又正好是怯懦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在位,他不顾军事顾问的激烈意见,将他的军队

撤出了柏林，授权创立城市民兵，并将组阁的权力交给自由派。

因此，当自由派掌权时，普鲁士的君主（就像其他的德意志君主一样）或许还并不像 1789 年之前的波旁君主那样虚弱。然而，就像 1789 年夏天的法国一样，1848 年春天的普鲁士确实曾经出现过潜在的社会革命情势。在这两种情形下，君主在面临市政革命时都处于守势，其军事垄断和权威都曾被削弱。当路易十六于 1789 年 7 月 14 日以后从巴黎撤出军队时，他本人或他的某些支持者肯定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使用这些军队。但是，路易十六最初的犹豫发展成了他本人以及君主政权和贵族整体的溃败，而同样犹豫不决和胆小怯懦的威廉四世，在一年以后却有能力改变他的主意。

确实，造成这两种相反的事件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的失败，尤其是农民在 1848—1849 年的造反在促成军队瓦解方面走向了失败。相反，到 1790 年时，在经过整个法国为时一年半的城市和农村的民众造反之后，法国的王室军队出现了大量的开小差现象，而且还受到了政治宣传的影响，因而纪律涣散，还有数以千计的贵族军官主要因民众造反而流亡¹⁰⁶（此外，如果与 1917 年的俄国比较，我们就会注意到，即使革命性政治危机最初还没有被支配阶级反抗君主的行动引发出来，农民造反就已经加速了常备军的瓦解）。

1848 年的德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农民造反。事实上，密集的反领主的造反——在目标、形式和结果上都与法国革命时期的农民造反很相似——出现在德国西南的一些小邦，而且也同样较为广泛地出现在德意志中部（萨克森和汉诺威）。但是，在易北河以东，除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西里西亚曾爆发过某些造反外，并没有形成重大的农民起义。然而，在容克的中心地带，即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征集军官和士兵的基地，本来十分难以控制的农民却并没有造反。¹⁰⁷实际上，1848 年德国农民造反在出现范围上的差异，正好对应于德国西部地区与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我们根据关于农民造反条件的一般性假设，也能对此做出对这一界线的预测。

一般而言，德国易北河以西地区的农村结构与法国很相似。土地被分割成许多很小的、分散的单位，在很大程度上被个体农民所保有或租

种,但是土地的使用模式仍然受起重要作用的村社所控制。农民已经在人身上已经获得了自由,并拥有保有和转移土地的可靠权利。残存的领主封建特权主要体现在租金、费用和捐税的形式上,同时在使用和转移先前的领主土地的影响方面还有微弱的权利。地方政治管辖权大都已经转交给了君主的代理人,君主也希望给予农民纳税人的村社以独立的地位,并保护他们免受不纳税的贵族的侵扰。¹⁰⁸

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比西部的贵族要强大得多。正如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所描述的那样:

贵族的庄园(Rittergüter)常常很大,而且领地的经营也被当成了一项商业性的事业;领主的大量收入都来自于国内外的经济作物尤其是谷类作物的销售。甚至是农民的宅地也常常被分开,不受村社的露地耕作制*的约束。¹⁰⁹

在整个18世纪,容克的庄园都是由农奴制劳工在耕种。领主实际上对农奴的人身和劳动时间都有无限的支配权利。这些权利很容易实现,因为容克们不仅仅是庄园的领主,而且还是普鲁士政权在地方的代理人。就像英国的乡绅一样,容克地主们按照自己的目标而控制着司法和军事部门。在改革运动之后,许多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由于容克继续垄断着地方行政统治权,再加上东部农民只占有极少的土地且生活极不稳定,从而导致先前的农奴仍然是在庄园中劳作的劳动力。¹¹⁰在19世纪,农奴制的废除实际上并没有给易北河以东的农民提供比15到18世纪时的农奴更为有利的集体反抗压迫的条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西部生活条件更好的农民在1848年反抗领主权力的残余时,东部的农民却相对平静。

然而,这种现象却对德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后果。不仅使容克的阶级权力仍然完好无损,而且,反革命的军事能力反而还在1848年得到了增强。由于普鲁士的军队基本上完全是从农村地区招募来的,如果1848年在普鲁士发生普遍而持久的农民造反,那么,它的军官集团就会出现分

* open-field system, 中世纪将条形露地分给村民耕种的一种制度。——译者注

裂,它的普通士兵“也将会接受革命宣传。而正是普鲁士的军队才是国王手中的可靠工具”¹¹¹。所以,威廉四世在 1848—1850 年利用它扑灭了整个德国的自由主义的社会革命。容克贵族与普鲁士官僚君主制的紧密联盟始终完好无损,而且还更加紧密,不久就在权威主义的基础上统一了德国。

第四节 中国农民的软弱与士绅的脆弱

最后,是回头考察第三个复杂的社会革命的正面案例的时候了。公认的看法是,中国革命是本书中所论及的三场社会革命中,最为明显地表现出是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似乎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尽管旧制度中国的农村阶级和地方政治结构有些类似于法国和俄国,但是,其主要方面却类似于英国和普鲁士。通过比较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农村结构,我们就能够理解 1911—1949 年这段国家无正常统治时期,中国革命的节奏和模式。就像法国和俄国一样,在中国最终发生了一场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但是中国农民缺少预先就存在的团结和自治结构,而正是这种团结和自治结构,才使得法国和俄国的农村革命在旧制度的中央政府崩溃之时,迅速而相对自发地发生。相反,中国的农村革命则更为漫长。而且,为了获得成功,需要通过建立“根据地”来进行军事征服,只有在根据地中,才能创造出使农民摆脱地主的直接控制而建立起集体组织并获得自由。

结构性条件

正如 18 世纪的法国和解放农奴之后的沙皇俄国一样,虽然中国土地占有不平等的程度不那么悬殊,但中国的农村生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租佃关系所决定的。大约有 40% 的土地被用于出租——相对而言,南方用于出租的土地多于北方。20% 至 30% 的农户完全是租种土地,其他的一些农户则除了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外,还租种一

些土地作为补充。地主并不劳作,也不居住在乡村(尽管他们常常住在当地的城镇中);在租出的土地中,地主所拥有的出租土地占四分之三。这就意味着,他们大约拥有 30%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给他们带来的地租则高达农业收成的 50%。¹¹² 仅仅根据这些有关土地占有的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说,相对于法国和俄国的地主和农民,中国的地主脆弱得多,而中国的农民则强大得多。

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政治方面都是这样。很重要的要记住,中国的士绅并不仅仅是通过地租来占有剩余价值。他们还通过向农民发放高利贷收取利息、分享帝国的税收和地方的附加税、收取组织和领导地方组织和公益设施(如宗族、儒家社团、水利工程、学校和民兵)的费用而获得收入。¹¹³ 虽然帝国税收也同样是法国和俄国支配阶级的一种收入来源,但高利贷和各种地方性捐税则是更突出的中国士绅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依此类推,这一特征反映并依赖于这一事实,即与法国领主和俄国庄园主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士绅在地方性社区中拥有压倒性的组织地位。他们的这种地位,尤其是在对农民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英国地主阶级和普鲁士容克在地方上的统治地位。中国农民并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而用于反对地主的村社共同体组织。而且,尽管他们也是像法国和俄国农民那样的小业主(而且还拥有更多的可耕地),但是,他们与不幸的英国和普鲁士农民一样,彼此之间缺乏那种能够支持他们形成村社——阶级团结以反抗士绅的纽带。相反,中国士绅倒是既能够自然而然地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仅仅通过占有土地就能做到这一点),又把内部分裂的农民置于稳固的社会政治控制之下,从而支配着地方的农村社区。

要充分理解这种情势,尤其是中国所特有的形式,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在传统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不是单个的村庄(即农民住宅和/或私人地产的群落),而是由村庄群落所组成的集镇社会。正如施坚雅所描述的:

中国社会的基本平面图或许可以说基本上是细胞状的。除了一些偏远的、人烟稀少的定居点外,中国农村的画面中布满了近似于六边形的细胞装置。每个细胞的内核是一个大约有四万五千人的集镇

(19世纪中期的情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集镇贸易区域的细胞质。细胞体——即直接依附于集镇的地区——通常包括十五到二十五个村庄,它们通常,但不一定必然是聚集在一起。¹¹⁴

尽管农民们在各个村庄中居住和劳作,但是集市社会才是对他们意义重大的地方世界。他们在这个周期性开放的市场上买进和卖出,获得工匠服务,得到贷款,参与宗教仪式,并找到结婚对象。

当地的士绅,而不是农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集市上的组织性社会活动的领导,并代表当地去与更大的社会进行接触。宗族(在宗族势力发达的地方)以及各种招收农民参加者的会社——各地都有这种出于宗教、教育、福利或经济目的的组织——都常常扎根于集市社会并由士绅管理。尤其是在那些较为富庶、内部分层较大的地方,士绅们还组织和控制着民兵和其他履行着控制民众和济贫功能的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却意味着在租金最高的地区,相对富有的士绅却最不容易受到当地以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反对士绅特权的造反的伤害。但是,在整个中国也普遍出现了一种同样的情况:士绅们通过建立和领导吸收农民参加的地方组织,从而也提高了地方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实力,并且能够将潜在的动乱从他们身上转开。¹¹⁵

由于会社、庇护网络,以及扩展开的半血缘关系跨越了传统中国的农民与士绅地主之间的阶级分野,乡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孤立、彼此竞争。正如费孝通曾经指出过的:“就农民方面而言,社会组织仅仅停留在松散的邻里组织上。在传统结构下,农民生活在小细胞,也就是家庭里面,而细胞之间则没有强大的纽带。”¹¹⁶除了那些士绅主导的组织发挥作用的地方(例如建设和维护水利工作)外,农业生产是由个人,基本上是由原子式家庭来经营的。¹¹⁷这些家庭必须要拥有或租赁自己耕种的土地,拥有或购买自己的农具,(必要时)还得雇用补充劳力。在一种生产要素可以买卖的体制下,在一种穷困者可能根本无法维持生计的体制下,各个家庭都在设法获得比邻居更多的财富。这里没有由农民加以管理的公用土地;如果宗族或会社拥有土地,这些土地也常常是由士绅或会员来加以管理。农民很少会通过合作而完成农活,除非存在着一种商业-契约关系。简言之,除非在士绅的主持下组织起来,中国农民常常是处于一种相

互竞争的孤立状态之中。

农村动荡的模式

由于地方性共同体的这些特征,看到下述情况就毫不奇怪:在帝制时代晚期,农村动荡几乎很少表现为农民齐心协力地反对本地地主的形式。因为抗议在饥荒时期囤积居奇的地主或者是与官府勾结贪污捐税的士绅,有时也会发生农民攻击个别地主的现象。但是,更为普遍、组织得更好的农村造反形式,则主要是反对帝国政权的官员。这些造反的形式包括:经常发生在县衙门的骚乱、坚决抗税或要求救灾的骚乱以及偶尔发生的大规模的起义——这些起义建立起了包括整片地区的对抗性政权,有时还成功地推翻、甚至是取代了统治王朝。¹¹⁸

当然,骚乱和起义总是依赖于农民的参与。而且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总是会涉及农民冤情——尤其是反对官场腐败、囤积居奇、过分抬高价格和租金等“罪恶的做法”。然后,非儒教的秘密会社则极力招收贫苦农民,并常常会精心制作实现政治公正、平均地权等带有乌托邦梦想性质的千禧年式的意识形态。¹¹⁹作为一种极端的案例,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设想了一个在农业共同体中没有士绅、经济平等和男女平等的社会世界。¹²⁰

在组织方面,所有持续时间较长的、以农民为基础的造反,迟早都会置于非农民分子的领导之下或有非农民渗透进来。以地区或地方为基础的、具有异教目标或政治目标的秘密会社,常常为造反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它们往往是由商人或在帝国科举中落第的士人——即士绅边缘分子(和想加入士绅阶层的分子)所领导。¹²¹而抗税或反官吏的骚动则往往由地方士绅亲自领导。¹²²而且,只要起义发展到相当程度时,通常都会吸引正统的儒家士绅卷入,成为活跃的支持者和领导人,并因此而最终影响到运动的目标和实践。在历史上,即使是那些成功地领导起义并登上皇帝宝座的农民强盗领袖,也要转而依靠士绅来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士绅才具有沟通行政城市与广大乡村的种种联系和兴趣。19世纪中期,当太平天国起义处于巅峰之际,它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尽管它没有如此成功地赢得士绅的支持——这一失败也有助于解释它为什么最终被击

败。¹²³在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上，正是农民的怨愤点燃了起义——但即使是成功的起义，也只不过是使现存制度获得新生。由于农民不具有以地方村社为基础的自治权，从而使他们的反抗甚至不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质。

是否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的士绅能够像英国和普鲁士的地主上层阶级那样，不会受到普遍的农民起义的伤害呢？在许多方面，他们都处于同样强大的地位，因为他们也有类似的统治农民的地方性权力。但是，一些重要的方面又使得他们的地位不那么可靠。首先，因为17世纪的英国地主和19世纪的普鲁土地主都是农业部门的主宰，而他们的农业又正在成功地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中国的士绅尽管也是意义重大的商业化过程中的支配阶级，他们自身却逐渐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阻碍。其次，中国的士绅高居于顶端，在他们之下的阶层不是自耕农和/或农业工人，而是大量的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如果重新分配士绅的土地、废除他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大多数的农民小土地所有者都肯定会从中获利。因此，仅仅从这些经济方面看，中国士绅的地位很类似于法国领主和俄国庄园主。

此外，尽管中国士绅在地方上的社会政治支配地位类似于英国和普鲁士的地主，但是，他们与中央政治权力，即与君主政权的关系，却并不同于英国和普鲁士。一方面，与普鲁士的容克相反的是，中国的士绅（尤其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发现他们逐渐与君主政权及其官僚机构发生了矛盾。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安坐于各个地方和各个省份的士绅，于1911年及稍后一段时间，在推翻清王朝和瓦解整个帝制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与英国地主上层阶级不同的是，中国士绅在历史上依赖于中央集权的、相当官僚化的帝制政权。中国没有一个全国性议会将来自各集市社会的支配阶级的代表联结在一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国家，历史上竟然没有发展出这样一种地方权力和全国权力的简单结合，而是在北京和各个地方之间形成了多个层次的行政干预。相反，以家乡为根基的中国士绅，只有通过参与儒教帝国的官僚机构并与之合作，才能在地区和全国的基础上联系在一起。同样地，只有帝国政权统一的行政和强制权力，才能给士绅和支配阶级地位提供某

种长久的后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直到1911年时,中国士绅既有能力、也有兴趣颠覆帝制政权,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就很容易受到任何高于地方的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伤害,这些政治势力可能会对他们在农村秩序中的地位发起决定性的攻击。

为了向地主士绅发起斗争,这些反地主的势力也能够吸收农民支持者。确实,安居乐业的农民起初并不会参加。但是,在动态的王朝衰落、起义和复兴的长期循环周期中,总是会牵涉更大的农民造反者的自治,而不是定居的社区中所发生的情况。在中国社会中,当中央政府虚弱无力、经济衰退和遭受重大灾害之时——这些现象往往同时发生——“社会性盗匪”¹²⁴就常常会蜂拥而起。正是因为中国的农村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业化,农民才常常不能通过村社共同体的纽带来反对并免受经济混乱之苦。在经济衰落期间,尤其是在没有富有的本地精英雇用他们的地方,贫苦农民很可能丧失财产、生计乃至家庭,为免于饿死而被迫背井离乡。赤贫的流民常常会聚众为匪或走私贩私,出没于帝国的边陲或各省交界的“边区”,无论是地方士绅还是帝国政权——在不是处于最强盛的时候——的势力触及不到他们。为了生存或发财,这些匪寇袭击居民区,尤其是在可能的时候会攻击其中的富人,因为抢劫富人能够使它们获得最大的收入,并能提高避开被当局捕获的机会。因此,在这种社会性盗匪身上,阶级斗争得到了体现,即使仅仅是间接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总是暂时的。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王朝衰落和政权统治的空位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困难、农民穷困、社会性盗匪蜂起,地方民团、匪帮、军阀和(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军队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些特征贯穿于整个时期,并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由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这一时期中央政权的衰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然而,尽管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打乱了支配阶级和全国性政治,并使之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农民和农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情形。¹²⁵除了靠近条约口岸、主要航道和(19世纪80年代以后修建的)稀疏的铁路网络外,传统的标准集市网络、交易机构和交易

方式都没有被现代经济的发展所取代。农民依然使用传统技术耕作土地，主要靠种植粮食作物维持生活，出售粮食换取货币来交纳租税（除非要求交纳实物）。在有些地方或地区——或许甚至是全国（现在的证据不够充分）——农民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其原因并不是现代经济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关系。而是由于各地普遍出现了政治混乱，从而引出了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和掠夺式的“捐税”，另外，反复出现的自然灾害（大旱或大涝），再加上没有稳定的政府帮助赈灾和恢复生产，结果就造成更大的苦难。有时农民能够勉强度日，但在实在无法承受之时，就会群起暴动、流亡逃荒，参加军队或落草为寇。20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但是其程度和压力并没有超过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情况。基本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农民自身在对付苦难时所能采取的办法基本上也没有发生变化。¹²⁶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将会看到的，在政治—军事分裂的背景下，一种新型的全国性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发现，必须努力与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性盗匪势力结合起来，建立一支能够夺取和维持行政区域的红军。然后，在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保护伞下，地方政治最终得以重组，使得农民拥有历史上所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正如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北方所发生的那样——农民就会暴烈地攻击残余的士绅，摧毁其阶级和权力地位。因此，中国农民对革命的贡献就与法国和俄国农民的作用不同，更像是被动员起来的响应革命精英号召的力量。这种大众动员型特征的原因几乎与革命意识形态无关，而种种情况都与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与欧洲相比）有关。这种结构使得定居的中国农民不能在制度上形成与地主相对立的自治和团结。但是，在政治—经济危机时期却形成了这种自治和团结，并产生出了被遗弃的贫苦农民边缘阶层，而这些社会边缘分子的活动又加重了危机，他们的存在为反对派精英领导的造反——包括20世纪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潜在的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以后的活动和1949年的最终胜利，就是既直接依赖于这种起义的潜能，又依赖于将自发的农民造反纳入既有的中国农会秩序的阻碍因素。¹²⁷

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详细地论述中国共产党这个最初是以城市为基础和导向的党,最终是如何转入农村;开始是盗匪及其他流离失所的农民,然后是定居的农业耕作者,是如何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做出贡献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农民革命和革命精英巩固全国性权力的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

总结

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做了一种比较历史分析。我认为:(1)在受到更发达国家的外来强烈压力时,易于陷入行政和军事崩溃的政权组织;和(2)有利于普遍的农民反地主暴动的农村社会政治结构,二者结合起来,是造成 1789 年法国、1917 年俄国和 1911 年中国社会革命情势的充分而独特的原因。表 1 总结了有关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原因方面的论据,并对作为反例的普鲁士/德国、日本和英国的情况作了简要论述。

然而,之所以把它们称作是“社会革命”,仅仅是因为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新的社会政治安排的出现。因此,我们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因上。还必须进一步论证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我们已经追根溯源的社会革命情势合乎逻辑地产生这些变化。这将是我们在第二部分中要完成的任务。

表 1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A 政治危机的条件

	君主/支配阶级	农业经济	国际压力
法国	地主-商业支配阶级在半官僚化绝对君主政权中占有优势。	持续增长,但是没有向资本主义农业突破。	适度。在战争中一再失败,尤其是受到英国的竞争时。
俄国	高度官僚化的绝对主义国家;地主贵族几乎没有政治权力。	粗放式增长;核心区域几乎没有发展。	极为激烈。19 世纪 50 年代和 1905 年均战败。长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战败。

续表

	君主/支配阶级	农业经济	国际压力
中国	地主-商业支配阶级在 半官僚化的绝对君主政 权中占有优势。	没有发展型突破； 由于人口和可耕 地的限制，增长几 近极限。	强大。在战争和 帝国主义入侵面 前一再失败。
反例			
普鲁士/ 德国	高度官僚化的绝对主义 国家；地主贵族几乎没 有超越地方之上的政治 优势。	向资本主义农业 转型。	1806年强大；1848 年时较轻。
日本	高度官僚化的（尽管还 未充分中央集权化）国 家，没有真正的地主上 层阶级。	生产力在传统结 构内增长。	强大；帝国主义的 入侵。
英国	没有官僚化的国家政权。 地主阶级支配政治。	向资本主义农业 转型。	较轻。

B 农民起义的条件

	农村阶级结构	地方政治
法国	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占有 30%—40% 的土地；耕作 80% 以上的土地，再加上若干小块土地。个体私有财产确立，但农民村社反抗征收捐税的领主。	在王室官员的监督下， 村社享有相对的自治。
俄国	农民占有 60% 的土地，再加上租种的土地；小块土地的生产过程受到控制；支付地租和赎金。以集体所有为基础的村社很强大。	在沙皇官僚机构的控制 下，村社享有自治权。
中国	农民占有 50% 以上的土地，而且还实际上耕作所有的小块土地。向士绅交纳地租。没有农民村社。	士绅地主、高利贷者和 士人支配着当地的组 织化生活；与帝国官员 合作。
反例		
普鲁士/ 德国	易北河以西：类似于法国。 易北河以东：工人耕作的大庄园和拥有 少量土地的农民，没有强大的村社。	容克地主是官僚政权 在地方的代理人；支配 着地方行政和治安。

续表

	农村阶级结构	地方政治
日本	富裕农民支配着村社。	强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着地方村社。
英国	地主阶级占有 70% 以上的土地。农民两极分化：自耕农和农业工人。没有强大的村社。	地主是君主政权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支配着行政和治安。

C 社会改造

A 和 B 相加导致的后果

法国	1787—1789 年：绝对主义国家崩溃；普遍发生农民反对领主权利的造反。
俄国	19 世纪 60 年代—19 世纪 90 年代：官僚机构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1905 年：未能成功的革命爆发 1917 年：国家政权崩溃；普遍发生反对一切私有地产的农民暴动。
中国	1911 年：帝制政权垮台；农村混乱日益扩大，但没有发生农民反对地主的自发暴动。
反例	
普鲁士/ 德国	1807—1814 年：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发起改革
日本	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中央集权化的政权；接着由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
英国	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议会在非官僚机构化的君主制中的支配地位。

注 释

1.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480.

2. 像古巴和南斯拉夫这类案例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在这两个国家，农民的确为军事化革命运动提供了后勤支持，但农民的参与是否形成“自下而上的阶级造反”，则尚有争议。然而，城市工人的造反也不是十分重要。

3. 中国农民造反的情况将在下面深入讨论。

4. 这一措辞斟酌的句子反映了我（出于当前的所限定的目标）对待法国历史学家有关 17 世纪造反的生动争论的态度。这场争论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

作有: Boris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Oeuvres Etrangères, no. 4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VI Section, Centres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1963), versus Roland Mousnier, *Peasant Uprising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trans. Brian Pear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and Recherches sur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avant la Fronde, *Ré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no. 5 (1958): 81—113。也可参见 Leon Bernard, French Society and Popular Uprisings under Louis XIV,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4 (Fall 1964): 454—474。

5. 参见 Paul Avrich, *Russian Rebels, 1600—180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6. 一个认为中国农民主要是为了具体目标而不是意识形态目标而行动的精彩观点,见之于 Joel Migda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 10。我不同意用米格达尔的整个论点来解释中国农民革命的具体原因(其部分理由参见下面的注 126)。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北方农民之间交往过程的分析在我看来是非常精彩的。我在第七章中做了类似的论证。

7. 这类观点的要素可见之于:“Peasants and Revolution” of Moore, *Social Origins*, Chapter 9, especially pp. 470—471。

8. 参见 Eric Wolf,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6), chap. 1; and Teodor Shanin, ed.,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1), p. 15, and passim。

9. 有些学者曾用间接衡量相对剥夺的政治和/或经济指标,例如, Teodor Robert Gurr, 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7 (1968: 1104—1124); and David Snyder and Charles Tilly,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1830 to 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5 (October 1972): 520—532。后者的研究为了更准确地把握相对剥夺观点的逻辑,而对这些标准进行了历时的观察,结果发现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法国历史上集体暴力的方式。

10. Eric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 290。

11. 可参见两个例子: Hamza Alavi,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64), pp. 241—277; and Jeffer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Alavi 是一场历时很长的有关“贫农”和“中农”是否天生带有较多革命性的争论的重要参与者。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组织和背景之外的因素。Paige 所精心写作的著作将纯粹的经济研究方法做了更深的推进。它试图从各阶级的财产占有和收入来源入手,推导出农民和非农民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倾向。在详细阐明其理论时,甚至在历史案例分析中,Paige 实际上重新引入了所有重要的社会-

结构和政治—组织要素——这些要素是理解农村政治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他的理论主张却是一种狭窄的经济决定论——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12. 以这种方式犯错误的最为著名的分析家，就是对俄国农民提出看法的列宁：他在实际上是相当平均主义的农民村社中看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我将在下面有关俄国农民的那一部分中阐明我的观点）。同时，Paige在《农村革命》一书中认为，农民小土地所有者天生就倾向于反对共同行动。实际上，这取决于村社财产是否存在及其功能的类型，也取决于农民村社是否卷入反对地主争夺资源的竞争。

13. 这些概括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观点的短语，来自于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no. 70 (February 1976), p. 31.

14. 尤其有用的是：同上；Arthur L. Stinchcomb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Rural Class Relations*, in *Class, Status, and Power*, 2nd ed., eds. Reinhard Bendix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pp. 182—190; Wolf, *Peasant Wars*; and Moore, *Social Origins*. 更为折衷，但也更为详细的是 Henry A. Landsberger, *The Role of Peasant Movements and Revolts in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 Peasant Movements*, ed. Landsberge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1; and Landsberger, ed., *Rural Protest: 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3)。

15. Stinchcombe 在他的论文“*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Agrarian Class Relations*”中尤其强调这一点。Paige 在“*Agrarian Revolution*”中极为不同意这种观点。部分原因在于他所提出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即小土地所有者可能相互分割且彼此竞争。但是 Paige 所没有认识到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与地主相对立的）村社模式克服了小土地所有者内部的分歧。参见我在前面注释 12 所做的评论。

16. 我所能说的是，社会—科学对革命的分析，从未对有种自起因的进程后来的汇合并逐渐展开的相互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革命的原因和发展可能都不得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分析解释都必须要以历史为基础。

17. Norman Hamps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p. 82.

18. Georges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asants*, i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Ralph W. Greenlaw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Company, 1958), p. 76.

19.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革命性结构变迁的推动力只是来自于农民。确实，国民议会的自由派领袖也考虑着根本性的政治改造，这也必然具有社会意义。但是，农民造反提供了农村反对领主制度的主要推动力。而且还造成了危机情势，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才得以迅速实施，至少在原则上是

这样。

20. Georges Lefebvre, Répartition de la Propriété et de l'Exploitation Foncières a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in *Etudes sur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pp. 279—306; and Ernest Labrousse, The Evolution of Peasant Society in France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n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 Since the Old Regime*, eds. E. M. Acomb and M. L. Brown, J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pp. 44—46.

21. Pierre, Goubert, *The Ancient Régime: French Society, 1600—1750*, trans. Steve Cox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102. 这一段的细节取材于第六章, Landed Income and Ground Rentiers, 尤其可参见 pp. 122—134.

22. 这一段的资料来源包括: Goubert, *Ancien Régime: Society*, chaps. 2, 5; Alun Davies,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Peasant Revolution of 1789, *history*, new series 49: 165 (February 1964): 24—41; and Georges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trans. Joan Whi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pt. 1.

23. “Agrarian individualism”是指这样一种情势,其中个体财产所有者拥有经营一份稳定财产的、不受阻碍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免受公共放牧或公共拾穗权等习惯性做法的束缚。参见 Marc Bloch, La Lutte pour l'Individualisme Agraire dans la France du XVIII-Siècle, *Annales d'Histor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11:7 (July 1930): 329—381 and 11:8 (October 1930): 511—556.

24. Goubert, *Ancien Régime: Society*, p. 78.

25. Albert Soboul, The French Rural Commu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no. 10 (November 1956), p. 82. 这一段的余下部分和下一段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 Goubert and Soboul.

26. Soboul, *Rural Community*, p. 81.

27. 在旧制度末期,国王试图以有利于富人的方式来促使地方政府更为有效地运作。1787年的敕令在所有选举区的社区建立了地方管理委员会,当地领主和教士必须出席,另外还加上由教区大会秘密投票产生的3—9名农民。但这些农民代表必须是缴纳十个里弗尔以上捐税的人。因此,这些全体社区成员大会的功能就减少了。然而,当1789年召开这些大会起草陈情书和选举地区代表时,所有年满25岁的纳税人都有资格出席。因此,在革命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国王的政策未能持续破坏农民村社的团结。

28. C. E. Labrousse, *La Crise de l'E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3).

29. C. E. Labrousse, The Crisis in the French Economy at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i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Ralph W. Greenlaw (Lexington, Mass.: Heath, 1958), p. 64. 这一部分材料译自前面注释

所引著作导论部分的一个部分。

30. 同上, p. 66.
31. 同上, pp. 66—67.
32. 参见: Louise A. Tilly, *The Food Rio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 1 (Summer 1971): 23—57; and George Rudé, *The Outbrea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pp. 63—81.
33. 关于市政革命, 参见第二章论述法国一部分最后的论述及有关参考文献。
34. Goubert, *Ancien Régime: Society*, p. 14. 根据 Georges Lefebvre 的著作, Goubert 识别出了发生在 1788—1793 年间的三次农民起义浪潮。
35. 参见 Lefebvre, *Great Fear*, 这是一本经典著作。
36. Goubert, *Ancien Régime: Society*, p. 14.
37. 参见 George V. Taylor, *Revolutionary and Nonrevolutionary Content in the Cahiers of 1789: An Interim Report*,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 4 (Fall 1972), pp. 489—491.
38. 关于这一点, 参见 Charles Tilly, *The Vendée*, paperback ed. (New York: Wiley, 1967), pp. 164—165, 177.
39. Lefebvre, *Great Fear*, pp. 39—40.
40. 同上, p. 43.
41. Katherine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 141.
42. Hampson, *Social History*, pp. 76 ff.
43.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Révoltes et Contestations Rurales en France de 1675 à 1788*,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9: 1 (January-February 1974): 6—22.
44. Tilly, *Vendée*, p. 159.
45. Hampson, *Social History*, pp. 251—255.
46. 这一段和下面两段的论述主要依据: Soboul, *Rural Community*, pp. 85ff.; and Davis, *Origins of Peasant Revolution*, (January-February 1974): 6—22.
47. 参见 Soboul, *Rural Community*, pp. 91—93; and Albert Soboul, *The Persistence of "Feudalism" in the Rural Society of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rans. Elborg Forster, in *Rural Society in France: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eds. Robert Forster and Orest Ranu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50—71.
48. R. R. Palmer, Georges Lefebvre: *The Peasan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1: 4 (1959), p. 337.
49. Geroid Tanquary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1932;

reprint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 33.

50. 参见 Robinson, *Rural Russia*, chaps. 1—2; and Paul Avrich, *Russian Rebels, 1600—180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51. 这一段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 Lazar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ap. 2; Terence Emons, *The Peasant and the Emancipation*, in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ed. Wayne S. Vucini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1—71; and Alexander Gerschenkron, *Russia: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1861—1917*,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40—248。

52. “在帝国各地主要盛行的是这种农民耕作方式;就整个俄国的欧洲部分而言,几乎四分之三的男性农民都使用公有的土地,大约五分之四的份地也受到这种控制。”只是在乌克兰和其他西部地区盛行着世袭的私人土地所有权。Francis M. Watters, *The Peasant and the Village Commune*, in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ed. Wayne S. Vucinic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46—147。

53. 同上, pp. 137—138; and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chap. 24。

54. 同上, pp. 138—141, 151—157; and Robinson, *Rural Russia*, chaps. 6—7。

55. 有关地区差异的情况,我尤其依赖于 Craig Jenkins 在一篇未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所做的非常出色的综合: Craig Jenkins,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Peasant Revolution—Russia 1917*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974), pp. 47—54.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也提供了类似的画面。

56. 这一段主要依据的是: Jenkins,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pp. 55—76; Volin, *Century*, chap. 3; Robinson, *Rural Russia*, chaps. 6—8; and Watters, *Peasant and Commune*, in *Peasant in Russia*, ed. Vucinich, pp. 147—151。

57. Volin, *Century*, p. 70。

58. Jenkins,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p. 52。

59. 同上, p. 71。

60. 这是 Jenkins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估计。Jenkins 主要依据的是 Teodor Shanin 的详细研究,参见 Teodor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t. II。Shanin 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农民村社中的经济分化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富农阶级。他的研究表明,这种观念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诸如列宁这样的研究者,没有考虑到农户规模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家庭占有土地的情况是与家庭规模的变动相同的,那么,农民内部经济分化的很大一部分也就很容易理解了。Jenkins 认为,其他方面的分化基本上不是由于

富农阶层的壮大,而是由于有些人极端贫困,不能维持生计,只得出租自己的份地,到工厂谋生。

61. Jenkins,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s*, pp. 131—132; and Alexander Vucinich,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 Cyril E. Blac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91—194.

62. Volin, *Century*, chap. 3 and p. 95.

63. 从“农民的角度”对1905年革命所做的一般性解释,参见Robinson, *Rural Russia*, chaps. 9—10。

64.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p. 230.

65. Robinson, *Rural Russia*, pp. 151—153; and Maureen Perrie,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of 1905—1907: Its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57 (November 1972): 123—155.

66. Perrie, 1905—1907, p. 127.

67. Robinson, *Rural Russia*, p. 155.

68. 同上, p. 153。

69. Perrie, 1905—1907, p. 138.

70. 同上, p. 143。

71. Jenkins,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p. 158.

72. Robinson, *Rural Russia*, pp. 225—226.

73. 同上, p. 227。

74. W. E. Mosse, *Stolypin's Villages*,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3:101 (June 1965), p. 273.

75. 关于1917年农民造反的概述,参见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2 vols. (1935; reprint ed.,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5), vol. 1, chap. 11; and John L. H. Keep,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Study in Mass Mob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pt. III, *The Countryside in Revolt*.

76.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p. 252.

77. 关于军队内部的发展,参见Marc Ferro, *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 Undisciplined,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 *Slavic Review* 30: 3 (September 1971): 483—512; and Allan Wildma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Army*, *Soviet Studies* 22:1 (July 1970): 3—23。

78.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pp. 252—253.

79. 关于1917年—1918年农民造反的整体成就,参见(再加上Chamberlin): Volin, *Century*, chap. 6; Shanin, *Awkward Class*, chap. 8; and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chaps. 15, 16, 29, 30。

80.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p. 213.

81. 同上, p. 44。
82. Shanin 在这一点上尤其悲观。
83.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p. 256.
84.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pp. 412—413, 报道了 1919 年苏维埃的统计, 显示了分配效应的总体画面。
85. Shanin, *Awkward Class*, p. 150.
86.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chaps. 17—19, 28, 对地方农民政治和行政组织, 以及全国政治和行政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 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解释。
87. 参见 Shanin, *Awkward Class*, pp. 153ff。
88. 引注同上, p. 151。
89. 令人满意的历史性概述, 可见之于 G. E. Aylmer,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 2nd. (London: Blandford Press, 1968); and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New York: Norton, 1966)。
90. 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解释, 但 Brian Manning 对民众动员的情况却提供了生动的解释, 参见: *The Nobbles, the People,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ed. Trevor Asto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7), pp. 261—284;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and After*, ed. R. H. Par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1—21。
91. 参见 Valerie Pearl, *Lond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92. 在第 5 章中, 我将讨论“资产阶级革命”的标签是否适用于法国大革命。对于英国革命, 如果它的意义仅仅限于指由带有重要资本主义利益的阶级进行的政治革命, 这个标签可能是适用的。但是, 这个标签通常还带有其他的涵义, 指革命是通过阶级斗争进行, 而且改造了阶级结构, 而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没有这些特征。
93. 按照这种思路对英国革命所做的解释, 尤其可参见: Perez Zagori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3 (September 1950): 376—401; and Lawrence Stone, *The Caus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94. 对平等派做出最充分描述的是: H. N. Brailsford, *The 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ed. Christopher Hi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95. 这一大约一半的估计来自于: F. M. L. Thompson,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ed Property in English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19:3 (1966), p. 513。
96.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no. 70 (February 1976), p. 62. 这一整段

的内容建立在 Brenner 所做综合的基础之上, pp. 61ff. 当然, 经典的论述是 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2; reprint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97. Thompson, *Social Distribution*, pp. 513—517.

98. 同上; 以及参见 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2nd ed. (New York: Scribner, 1971), chaps. 2—3。

99. 这一段的背景主要来自于: Aylmer, *Struggle*, pp. 20—22; Christopher Hill,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pt. 2; Ivan Roo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00—1660*, ed. E. W. 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36—47; and Laslett, *World Lost*, chap. 8。

100. Mildred Campbell, *The English Yeome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2), chap. 9。

101. 参见: Alan Everitt, *The County Community*, and D. H. Pennington, *The County Community at War*,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00—1660* ed. E. W. 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p. 48—63 and 64—75。对一个县的详细研究, 参见: Alan M. Everitt, *The Community of Kent and the Great Rebellion, 1640—1660* (Bristol, English: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6)。

102. 对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解释, 参见: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40—194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9), chaps. 2 and 3; and Theodore S. 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我在这一部分所用的材料都来源于这些著作。

103. Hamerow, *Restoration*, pp. 124—125。可将其与这一著作进行比较: Norman Hamps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pp. 60—61, 132—133。

104. 这个问题是 Hamerow 所关注的核心。也可参见: Holborn, *History*, pp. 99—100。

105. 研究法国革命的重要史学家无不强调这一点。这些史学家包括: Albert Soboul, Georges Lefebvre, Norman Hampson, and Alfred Cobban。

106. S. F. Scott,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3 (September 1970): 307—330; and S. F. Scot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1789—1793*, in *On Military Ideology*, eds. Morris Janowitz and Jacques Van Doorn (Rotterdam, Holland: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8—28。

107. Hamerow, *Restoration*, pp. 101—110, and chap. 9; and Holborn, *History*, pp. 58—59。

108. David S. Landes, *Japan and Europe: Contrasts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ed. William W. Lockwoo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21—127; J. H. Clapha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1936; reprint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chap. 2; and Hamerow, *Restoration*, chap. 3.

109. Landers, *Japan and Europe*, in *State and Enterprise*, ed. Lockwood, p. 121.

110. 参见注释 108 的参考资料。

111. Holborn, *History*, p. 100.

112.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chap. 5.

113. 参见第 2 章中讨论中国士绅时所引用的参考资料。

114.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3 (July 1971), p. 272. 也可参见: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November 1964): 3—43.

115. 除 Skinner, “Chinese Peasants” and “Marketing”外, 还可参见: Hsiao-tung Fei,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1 (July 1946): 1—17; 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s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5); Morton H. Fried, *The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53); and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16. Fei, “Peasantry and Gentry,” p. 3.

117. 同上; 以及参见 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1932; reprin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chaps. 2—3. Ramon H. Myers on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eam Farm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Dwight H. Perk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6—78. 这部著作并没有像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揭示农民合作的总体情况。在革命前的中国, 农民之间的这种“合作”要么是由地主组织的, 要么是基于农民户之间的商业契约交换关系。

118. Jean Chesneaux, *Peasant Revolt in China, 1840—1949* (New York: Norton, 1973), chap. 1;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chaps. 9 and 10; Wolfgang Frank,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trans. Stanley Rud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chap. 1; and C. K. Yang,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74—210.

119. 参见 Yuji Muramatsu, Some Themes in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41—267; Vincent Y. C. Shih, Some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 *T'oung Pao* 44 (1956): 150—226; and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chap. 9.

120. 参见 Vincent Y. C. 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121. Chesneaux, Peasant Revolts, pp. 16—18. 也可参见: Jean Chesneaux,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22. Hsiao, *Rural China*, pp. 433—453; and Yang,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eds. Wakeman and Grant, pp. 198—204.

123. 关于造反运动中的士绅, 参见 Franke, *Century*, chap. 1; Etienne Balazs,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trans. H. M.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典型的案例, 可参见: Romeyn Taylor, Social Origins of the Ming Dynasty, 1351—1360, *Monumenta Serica* 22 (1963): 1—78. 在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书中, Philip Kuhn 讨论了为什么太平天国不能战胜数量庞大的士绅从而丧失了巩固新王朝的机会。

124. 对“社会性盗匪”概念的阐释, 参见 E. J. Hobsbawm in his *Primitive Rebels* (New York: Norton, 1965), chap. 2; 一篇关于“社会性盗匪”的有价值的论文, 见之于 Rural Protest: *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ed. Henry A. Landsberger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3), pp. 142—157. 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 Hobsbawm 认为, 某种类型的农业社会, 包括中国在内, 造就出了一种相对持久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性盗匪”, Hobsbawm 将其称之为黑盗客 (Haidukry): “黑盗客通常占山为王……成为潜在不满公认的核心。与要么闻名天下, 要么默默无闻的罗宾汉不同的是, 黑盗客们是以集体而整体存在的……” (p. 154)。“黑盗客或许是社会性盗匪中最接近有组织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潜在造反运动……”(p. 155)。

125. 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Marie-Claire Bergère, De la Chine Classique à la Chine Actuelle: Fluctuations Economiques et Révolution,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4:4 (July-August 1969): 860—875;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2 (February 1965): 195—228; and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rots and China's Modernizatoin, 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s.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7—72.

126. 在我看来,对革命中的农民进行比较分析的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20世纪中国农民实际上的经济困苦归因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突然入侵。Eric Wolf在*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per & Row, 1969)和Joel S. Migdal在*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中都试图以这种方式把中国的经济等同于先前沦为殖民地的第三世界的经济。这是由于这些研究者们错误地把晚期帝制中国村庄早已具备的“传统”商业开放当作某种新事物。他们还错误地把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政治结构长期存在的动荡和造反模式,当作是农村旧秩序前所未有的崩溃。比较学者一直比较容易犯这些错误,因为他们很自然地依赖于对帝国主义经济力量渗透最厉害的地方的乡村个案研究——因为接近大城市和现代交通,社会科学家们最容易去研究它们!但是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正如上一个注释中的参考文献所述,它的大部分地区没有被帝国主义(或其他现代经济发展的力量)所改造。最重要的是,共产党最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地区,就没有受到过这种改造。

127. 参见 Lucien Bianco, *Les Paysans et la Révolution Chine, 1919—1949*, *Politique Etrangère* no. 2(1968): 117—141; and Chesneaux, *Peasant Revolts*, chaps.5—8。也可参见第7章中有关“共产党和农民”这一部分的讨论及其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第四章

变革的内容与路径：聚焦国家建设

历次重大革命都摧毁了它所遭遇到的国家机器。经过多次的摇摆与实验，革命最终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以取代旧式的国家机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政权明显具有被摧毁的旧政权所不具有的特征；革命所导致的国家秩序的变革与社会秩序的变迁同等重要。

——弗朗兹·博克诺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危机，以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形式展开，而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结构发生了持续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场革命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变化模式：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改造了农村阶级关系。专制的和原生型官僚体制的君主政权让位于官僚制的、大众参与的民族国家。革命前的地主上层阶级不再垄断社会与政治的特权。他们丧失了通过地方性或者地区性的准政治制度来控制农民、分配农业剩余的特殊身份地位。¹在旧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特权及其制度性的权力基础，一直是国家彻底官僚化和直接的大众政治参与的绊脚石。而革命斗争所引发的政治冲突与阶级剧变扫清了这些障碍。与此同时，新兴政权的领导集团在建设新的国家组织以巩固革命成果时，受到了国内分裂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以及国外侵略者的内外夹击。由于能够放手发动原先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等下层群众，革命领导集团就能胜任巩固政权的重任。因此，在这三个国家的革命中，下层阶级与新政权中的国家干部获得了相当的利益，而地主阶级等上层阶级则至少是输

掉了。在三个国家的新制度中,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国家调控的民族事务中来。并且,与旧制度相比,革命期间形成的国家组织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化。因此,这些国家就更有能力控制社会,也更能独立自主地抗击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

当然,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后果的差异也非常突出。这些差异需要与三国革命的共同模式一道考虑。首先,与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中国相比,法国革命的后果在某些方面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俄国与中国革命诞生了政党领导下的国家组织,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并且发动民众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法国就没有发生这种现象。相反,法国革命的后果是出现了职业化官僚的国家,与之相伴的是统一市场的完全出现与资本私有产权的兴起,并且得到有效的保障。1793年以后,民主化的民众运动不是受到压制,就是被转化为军队招募活动或程式化的、象征性的政治诉求。并且,尽管在法国社会中,政府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网络无所不在,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依然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

与法国不一样的地方是,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中国都产生了发展导向型的政党-国家。但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两者又有所不同,俄国政权表现出与法国的相近性。与法国革命相类似,俄国产生了职业化的、等级结构的国家组织来实施对社会团体的强硬的行政监控。这一点特别适合解释,以城市利益的名义来统治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

当然,法国与俄国之间也有差别:除了苏维埃国家对于经济与民族发展具有更强的指导作用之外,尽管俄国行政机关拥有特权并支配着社会的其他成员,但是,跟大多数民众一样,其本身也受共产党领导集团及其警察机构(即克格勃)的操纵与强制。简言之,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一种混合型政体:一方面是以政党的名义实施的独裁与强制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又拥有职业化官僚的、等级关系严格的行政架构,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去不远。实际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928年以后,苏维埃社会中极端突出的几个重要方面,就包括严格命令与控制的等级结构和级别、报酬的不平等。

中国革命缔造的国家无疑是高度集权、彻底官僚化的,但同时又能发

动广泛的而深入的民众动员。中国的政党或军事组织不单单同法俄两国一样，是控制国家与管理社会的工具；而且还是大众动员的机构——尤其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面。与法国和俄国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农民动员与农村发展方面。自然地，与法俄两国相比，中国的新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避免，但终究没有充分地职业化，没有完全强调程式化调控所导致的严格控制 and 单一化的等级结构。²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一再地削减国家与社会中的身份与报酬的差异，以遏制不平等的无限增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整个第二部分的任务：需要全面地分析革命在后果方面的特征。为了解释当初的社会革命危机所引发的结果之间的大体的相似之处与突出的不同点，就需要分析对比革命运动中的实际斗争。这些任务很明确，讨论的关键在于，究竟要采用何种路径来进行研究？对于革命进程与后果的研究，将主要侧重于社会革命背景下围绕新型国家组织的创立而展开的斗争，还要考察这些国家自身的特征及其与新制度中的社会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对于每次革命的研究，都要从旧制度的最初危机开始，一直追踪到新制度建立的独特社会政治模式为止。我们所遵循的整个路线，将是新型国家组织是如何出现、如何巩固以及革命后社会中国家的权力又如何部署。为什么这种路径有意义，它还牵涉哪些方面？本章的后面部分着重回答这些问题。

聚焦于国家建设的一个原因是由定义所限定的，亨廷顿曾经写道：“一场完整的革命，包括新政治秩序的创立与制度化。”³也就是说，本书的观点是，一旦旧制度崩溃，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结果就必然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当然，只有在革命冲突的斗争中建立起新型的国家组织，在此国家中，以革命象征的名义行使统治权力的行政主体调控行政机构与军队，革命才算是最终完成。三场革命斗争中，政治领导集团及其政权——法国的雅各宾派和拿破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及中国共产党——都竭力重塑国家秩序，巩固自下而上的阶级剧变所引发的社会经济转型，并提升国家的权力，加强国家自主权以抗争国际竞争者。如果上述事件没有发生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是成功或彻底的社会革命。他们顶多只能被当作是流产的事例，就像1848年的德国或1905年俄国那样。

除定义方面的考虑之外,聚焦于国家建设的缘由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弗朗兹·博克诺曾经断言:“革命所导致的国家秩序的变革与社会秩序的变迁同等重要。”⁴当然,社会革命完成了阶级关系的重要变化;并且影响到了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基本领域,如家庭、宗教、教育等。但是,社会革命所引发的国家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政府领导阶层相对于社会集团的政治与行政过程革新,以及国家在国内外所胜任的任务的转换,显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为显著的话。在上述“国家秩序”的变革中,没有一项是纯粹的社会秩序变迁的副产品。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问题恰恰相反:社会革命中发生的国家结构的变革,通常不仅仅会巩固社会经济变迁,而且本身就囊括了社会经济变迁的内涵。因此,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不仅仅像法国那样支持下层民众对现存统治阶级的斗争。而且,随着政党-国家逐步掌握原先由私有财产阶级所控制的经济功能,他们本身还会完善、加深这种阶级转换的变革。与此类似的是,法国私有产权和国民市场经济的强化,大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国家结构的革命。因为政治巩固与国家结构对于决定革命的后果,具有明确的重要性,因此,强调对国家建设的研究有着充分的理由。

第一节 政治领导集团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强调国家建设,或许是一条有利于分析社会革命的线索。但是,对于国家建设的侧重研究所指涉的内容是什么,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一方面,这意味着要把参与革命的政治领导集团看作是,要求并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行动者。这一点听起来不言自明,但是,对于政治斗争中的领导集团的研究,却并不总是这样做的。典型的做法是,将领导集团看作是阶级或者社会团体的代表,他们为实现其经济或社会地位的利益而斗争;并且/或者是贯彻某种理想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奋斗的角色。与这种分析路径相对应,政治领导的独特背景,就往往成为寻求他们所代表的所谓的阶级或团体的渊源与联系。并且,如果适宜的

渊源与联系明显不存在的话,研究者就会强调,政治领导集团的意识导向及其行动与相应的社会利益是如何地合拍。所有这些研究所遗漏的是,在革命危机关头,政治领导集团首先关注的是采取斗争以获得并保持国家权力。在革命高潮中,政治领导集团的命运取决于,以何种方式成功地创造和运用政治安排来应对面临的危机环境。围绕着政治与国家形式等最根本的话题所展开的斗争一直不会停息,直到新国家政权获得相对的稳定与巩固;之后的政治斗争就延续为,在广泛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形式的基础上如何行使国家权力。

把政治领导集团看作是未来的国家建设者意味着,要更为严肃地关注他们的行动而不是社会背景。确切无疑的是,从三次大革命中最终成功地巩固了新政权组织的政治领导集团的背景与事业导向可以看出,这些领导团体首先应该是国家的建设者而非阶级的代表。这与我们前面的观点是相呼应的。例如在法国、俄国以及中国,相关的政治领导成员大都由相对受过高等教育、并旨在参与国家事务的人员转化而来,但相对于旧制度中确立了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与精英而言,他们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纵观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革命领导集团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一系列民选的国民议会来运作的,包括1789年到1791年的国民/制宪会议、1791年到1792年的立法议会以及1792年到1794年的国民公会。所有这些机构主要来自于第三等级的行政和专业人员充任。从1788年直到1790年,革命初期最著名的领袖都被称作“名流”(notable),就是说,他们是第三等级当中有名望或者富裕的特权成员。但是,国民/制宪会议的第三等级成员中,43%完全是捐钱做官的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于外省,还有另外30%是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员。⁵之后的立法议会更是由地方上的官员和政客所垄断和把持。⁶国民公会所吸收的官员占到其总成员的25%,还有高达44%的成员是律师和专业人员。⁷此外,1792年到1794年期间,当革命进入最激进的阶段时,雅各宾山岳派(Montagnard Jacobins)掌握了全国的实际领导权。特别是与国民公会中比较温和的吉伦特派(Girondin)相比,他们的比例极其失衡,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行政专业人员而非商人出身,主要来自于各省份的中小城镇,

而非大都市、富庶而有特权的地区首府或者商业港口。⁸当然，(我们后面将要详细探讨)法国革命最激进的领袖们最终都失去了权力，而拿破仑及其行政和军事官员篡夺了国家的权力。但是，这些人中有许多原先是雅各宾派的，还包括旧政权中的事务性官员，特别是那些具有第三等级背景、出身于没落贵族和平民家庭的中等层次的文官和武官⁹——也就是说，革命的后果是，那些以前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精英们，在革命期间利用国家权力改换了门庭。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领导集团原先都是“边缘化”的，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于次要的、地方城镇中心和/或处于王朝统治的底层。然而，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领袖们不仅包括一些由于社会出身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员，还包括那些虽然出身于社会特权家庭，但是因受过中学或大学教育而倾向于激进政治观念的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从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中吸纳人员。但是，在这两个政党的中层和高层领导成员中，大多数出身于支配阶级或者出身于边缘性的特权阶级家庭(尤其是俄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和中国的富农家庭)。¹⁰另外，两党的领导成员中，有相当高比例的成员接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国内或国外)。¹¹在沙皇俄国和清朝中国，其传统都是学而优则仕。而且，当俄国和中国社会中确立现代的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时候，其初衷也是为国家输送官员(1900年以后，中国大量的青年被送到国外留学，也是出于这种目的)。但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方式，反而促使学生们不论出身而组织起来，开始追求批判观念，号召改造旧制度。¹²结果，许多人并没有走向仕途，而是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很容易从政治组织和宣传而转向建构国家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领导人与国民党的领导人在出身背景、职业方向等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与其对手孟什维克之间的社会特点也十分相近。¹³但是，有意思的是，两场革命的最终胜利者(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积累)一种普遍的民族与地区特征，这使得他们比对手更加具备传统的背景特征，类似于封建旧王朝中精英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地位。这样，与那些大致出身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孟什维克相比，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更接

近处于帝国核心省份的大俄罗斯民族。¹⁴同样，与主要出身于华南以及西方化的口岸城市的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大都来自于华中（后来还有华北）地区，多数属于内陆省份。¹⁵请注意，俄中两国这种模式类似于与法国国民公会内部山岳派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对比：山岳派大都来自于构成绝对君主制基础的行政中心，而吉伦特派则主要从商业港口城市吸收人员，这些地区历史上就一直与君主政权心存芥蒂，还一度脱离其控制。¹⁶

问题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社会革命中，政治领导集团都主要来自于那些一度有志于参与国家服务的、被边缘化的、知识精英的行列？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就可以解释上述事实：首先，法国的波旁王朝、中国的清政府以及俄国的沙皇都奉行“国家至上主义”（Statist）。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世界历史时代到来之前，谋取官职既是上述社会中寻求社会流动的重要路径，又是确立传统身份、增加已经获得的财富的手段。所有如法国（确立了绝对君主专制之后）¹⁷、沙皇俄国和清朝中国（还有普鲁士/德国、日本）这样的农业国家，一直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渴望获取官职的人员。而且，在危机关头，其中的一些人就会参与到反叛或者革命政治斗争中去。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来临，先前的农业国家被迫作出调整以适应国外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所从事的活动就比以往具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尖锐而急剧并不断加速的军事竞争或者威胁，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对国家活动范围的一种影响形式，而这种影响又难以摆脱。与之相伴的是，外部发展的文化效应首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农业官僚——也就是，对于那些或者为国家服务，或者是与国家有联系的人——产生了冲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农业国家面临国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时，事实上，所有政治觉醒团体，从保守的改革者到激进分子和革命者，都把国家政权看作是实现国内改革，并在国际环境中提高国家地位的可供选择的工具。这一点在俄国和中国比较明显。同时，由于革命前法国的有教养的官员与普通人士都痴迷于英国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全国民众广泛要求君主实施改革。福克斯（Edward Fox）曾经指出法国在18世纪经历过的相互矛盾的历史事实：

在被称为“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整整一代的才华横溢的社会批评家和政治评论家，都众口一词地要求君主推行各种各样的改革项

目。在当时的理论研究和慷慨陈词当中，“绝对”君主遭到了批评，因为它没有能够行使独裁专断的权力。对于旧制度之下的法国人而言，君主制才代表现代化与进步；而“自由”好像是过时的……实际上，所有法国大陆的居民都认为，财政和司法改革要比政治自由发展更为紧迫；君主就是贯彻上述改革的当然代表。只是在国王未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之时，才驱使臣民起来干预。¹⁸

同俄国和中国一样，法国制度中觉醒的具有市民社会意识的批判者，当然还包括产生出未来的革命领导者的行政-专业人士团体，在引导着走向国家彻底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总之，在法国、俄国以及中国革命期间，走向前台的革命领导团体的背景，是与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者所具有的超前观念相一致的。正是他们创建了行政和军事组织，确立了政治制度，取代了革命前的君主制。然而，了解革命领导者一般的背景特点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革命会有那样的结果（既有相同又有区别）。为什么革命领导人最终会创建那些官僚化的、中央集权的特定政权结构（与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维持着不同的关系，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履行着不同的功能）。

第二节 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那些在事实上把革命领导集团当作政治家看待的学者，往往采用一种特殊的解释方法。这些研究者通常主张或者暗示，革命领导集团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例如“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对革命后果的性质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还认为，意识形态显示出了革命领导人在推动革命后果形成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实践战略。¹⁹那些强调用革命先锋队的意识形态趋向来分析革命的进程及其结果的学者，一般会以某种观念的预设为研究前提。以此种观念来看：尽管旧制度所蕴涵的矛盾和内在冲突也会引发社会危机，并可能导致革命性变迁，但是，革命性变迁的实际发展——特别是某些特殊的变迁——则依赖于有毅力的、有

组织的革命先锋队的意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革命的后果必须首先依据革命领导集团的意识形态观念加以解释。否则，其他任何理由怎么能够解释，在没有预期目标的社会危机中，某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而另外的可能性却不会实现？这一推理的线路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我们还是考察一下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吧。

诸如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这类革命意识形态，看起来确实能够凝结革命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得他们在社会革命的条件下，竭力建立并巩固国家权力。²⁰同样，意识形态的武装为革命政治家们指明了适宜的斗争方式。在此，我们简要考察一下日本的明治维新，以为研究提供参照系。明治维新的激进力量夺取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与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以及中共完全不同。他们通过藩属内部和藩属之间的地方性联系聚集起来，并且保持着高度的凝聚力（因为明治维新的大多数首领都来自于萨摩和长州这两个外藩）。他们通过派系斗争并操纵现存制度机构，以获得国家权力，并推行广泛的改革。而且，他们通过扶植早已大权旁落但始终是合法权力的传统象征——天皇——从而使自己及其他精英带有普世主义色彩的变革行为具有了正当理由。明治维新的激进改革者之所以能够利用传统的制度、联系和象征，是因为他们具备独特的灵活性和潜力，能够很快适应孕育他们的德川幕府所面临的现代环境。²¹正如我们在第二章里看到的那样，波旁王朝、晚清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就缺乏这些特点。处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革命之下，对于革命领导而言，新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所起的作用，就类似于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所拥有的几件法宝：天皇的象征作用、各藩之间的联系，以及现存政治制度中可供操纵的派系。

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之类的革命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帮助信奉它的政治精英们，在社会革命的情形中夺取、建设以及掌握国家权力，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在当时的历史和民族背景下）这些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普世主义的特点，能够允许和鼓励不同背景的人们，以同志或者公民的身份协力合作。这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三个国家并不是像在日本那样，通过原先的派系精英接管政权并加以巩固就可以革命成功。此外，原有的君主制作为社会上广泛的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在社会

革命中丧失了信用。于是，革命意识形态就走向前台，并为国家权力的重建和行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其次，这些意识形态也迫使革命精英们积极宣传，发动民众参与政治斗争活动。这一导向即便不能促使众多的人群真正皈依意识形态的信仰，也足以使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同反革命展开政治-军事斗争时获得其他关键性的资源，因为，反革命势力的理念和物质利益，使它们不情愿发动大众的主动性，或者是无法从中受益。第三，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具有世俗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外观，这就给信仰者提供了运用各种手段在世界上实现最终政治目的合法依据——这些目的包括“实现公意”和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等等。此外，正如贝特纳（Egon Bittner）指出的那样，如果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长久地成为某些团体的排他性信仰，那么，建立某种组织机制就非常有必要。其中包括比如说控制和鼓励干部对组织的专一，对突出某些领导或者某种特殊标志的权威等级结构保持忠诚。²² 尽管从政治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机制没有吸引力，但是，事实上，在标志革命内战的无限制的政治斗争之中，上述机制却可能为武装起来的少数力量提供巨大的优势。

因此，在本书所研究的案例中，革命意识形态及其追随者，无疑是重大社会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意识形态的认知内容在任何意义上都相当关键，成为引导革命结果或指导那些创建国家组织以巩固成果的革命者行为的钥匙。从雅各宾主义和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如何随着法俄中三国的社会革命形势的展开而发挥作用的历史事实来看，任何把革命意识形态当作革命者的行动及其革命结果的蓝图来看待的逻辑主线，都经不起考验。²³ 雅各宾派的意识形态在法国革命期间占据主导地位也不过一年左右，之后“美德的统治”就彻底崩溃了。而雅各宾派所完成的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世俗任务——国家建设和保卫革命——反而吞噬了他们自己。²⁴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企图以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名义夺取并保持国家权力，但是，面对因遭受战争失败而四分五裂的农业国家这一严酷现实，他们饱受打击。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实施那些直接违背自己意识形态的措施与任务。最后，斯大林主义的胜利，事实上已经扭曲和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想，也粗暴地违背了列宁在 1917 年试

图摧毁官僚机构与常备军队的构想。²⁵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以马列主义的方式发动革命，试图通过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而获得国家权力。但是，直到他们遭到残酷镇压，而新型的以农民为主导的运动在广大农村根据地生根发芽之后，“毛泽东思想”才开始不断发展，并赋予以往的做法经典化、神圣化的色彩。此后，对于在夺取国家权力过程中的任何曲折，只需要赋予其正当性，就穿凿附会地往基本模式上面靠。²⁶

总之，用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领导者们，在革命关头一直都受到现存结构条件的限制，并为急剧变换的革命浪潮严重阻碍。因此，典型的情形是，他们最终完成的任务以及为加强新政权的稳固所做的努力，往往与意识形态最初所设想的（如果有的话）差距很大。一旦我们认识、考虑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之后，这就不足为奇：革命危机并不与历史完全割裂，不是说，只要革命者能够想得到，任何可能都会突然变为现实！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革命性危机有其具体的形式，包含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具体发展要看最初引发危机的特定政权和具体环境而定。此外，尽管革命性危机的确意味着制度崩溃和阶级斗争，能够迅速改变特定社会的参数变量，但是，许多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必须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这些条件同样造成的特定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革命者要想巩固新制度就必须面对现实。而且，整个革命改造所处的特定的世界历史与国际环境的背景也同样会起作用。

内容概述

第二部分接下来的内容，可以体现我们以前介绍过的解释方法的特色。我们将按照从最初的革命性危机开始，直到根本的革命后果最终定型这一国家建设的线索展开论述。而且，我们将要把革命领导集团当作是为巩固和运用国家权力而斗争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不从意识形态世界观或纲领的视角来解读或者分析革命的发展进程。反之，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革命危机的形势和旧制度的遗产是如何限制、塑造革命者建构国家的效果和成就的。在每个案例中，都将具体分析多重环境因素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并为革命间的相互对照提供研究基础。

首先，我们要仔细关注每一次社会革命危机的具体特征，这样就要参

照第一部分中关于每次革命的研究成果。分析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一旧制度特定的政治崩溃方式（第2章已经讨论过）具有重要的后果。它决定了革命高潮期间政治斗争的最初模式，也影响着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是否可能（或者不可能）获得暂时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决定着当群众动员的领导力量从革命形势中出现之时，会面临着何种行政和军事任务。

其次，将着重考察革命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反叛或农村动乱的发展顺序与本质，并且运用第三章讨论过的农村社会结构等术语，才可以解释许多事物。法国、俄国所爆发的突然的、自发的农民革命，对全国-城市政治斗争具有直接的、无法控制的影响。而中国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一直被耽搁了，直到他们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政治动员并参与到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后，才得以实现。这使得中国农民在塑造新制度时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但是，在法国和俄国，尽管建设国家的革命者发动了针对城市工人的政治动员而非农民，他们也不得不忍受农民和革命之后的农村秩序。考察他们如何对付这种局面，就可以深刻理解每一场革命的进程与结果。

案例分析还要提到旧制度的社会经济遗产，特别是为了解释三场革命的差异的时候。我们要重点考察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布局等等的具体类型。还要考察他们是否具有现代工业？如果具备的话，属于何种类型？分布在何处？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助于说明，历次革命中出现的城市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何种类型？城市力量对建设国家的革命者的支持，所带来的可能基础和限制是什么？以及巩固并运用国家权力，在国家调控之下促进民族工业（不论何种形式）化的机遇是否明显地存在？

最后，我们当然要考虑世界历史环境和国际背景对新兴革命政权的影响。世界历史环境所设定的历次革命时序和发展步骤，影响了政党的组织模式，也影响着获得胜利的革命领导人运用国家权力的方式。此外，在革命期间，国外的军事入侵以及国家政权确立之初的国家军事环境，都深刻影响到革命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法国、俄国和中国都十分相像。他们所受到的具体的国家影响不同，但都对三个国家的革命结果影响巨大。

在第二部分余下的篇幅中，我们将要探讨某些观点，以解释三次革命

的共有模式以及在共有模式的背景下各次革命的主要差异。因此，我将首先表明，运用大体相似的紧急形势以及机遇与挑战等角度，就可以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为什么会产生集权化的、大众参与的、官僚结构的国家。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三个案例中，伴随着旧制度的崩溃，农民普遍骚动不安，国家建设的革命者最初都面临这种局面。与此同时，我将通过对三个国家的对比，具体分析在既定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每次革命的具体特征。还要分析上述特征是如何与旧制度遗留下来的特定条件一起，塑造着每次革命的独特斗争经历及其结果的。

第五章将考察从1789年到拿破仑政权的确立这段时期的法国革命的进程与结果。第六章研究俄国，时间从1917年直到30年代斯大林制度的胜利。第七章分析1911年之后到1949年直至60年代中国革命的发展。

注 释

1. 这些准政治制度包括：法国的高等法院，各省的三级会议，领主法庭和领主权利；俄罗斯的地方自治机构(zemstvos)和地主庄园；中国地方性宗族和协会，乡、县和省府。

2. 我对革命后果的这方面的差异性的概括，主要依据的资料是：Martin King Whyte,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2 (April 1973): 149—163。更多的细节将留待有关中国的章节中展开。

3.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66.

4. Franz Borkenau,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ociological Review* 29:41 (1937), p. 41.

5. Alfred Cobba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0), pp. 110—111.

6. Norman Hamps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pp. 132—133.

7. Cobban, *Aspects*, p. 111.

8. Patrice L. R. Higonnet, *Montagne, Gironde et Planine: Bourgeoisie Provinciale, Bourgeoisie Urbaine, Bourgeoisie Rurale*, unpublished paper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n. d.), pp. 14—16.

9. 参见：Cobban, *Aspects*, p. 111; Crane Brinton, *The Jacobins* (1930; re-

print ed.,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1), p. 231; and S. F. Scot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in *On Military Ideology*, eds. Morris Janowitz and Jacques Van Doorn (Rotterdam, Holland;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8—50.

10. 关于布尔什维克, 可参见: David Lane, *The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1—24, 32; and Jerome Davis, *A Study of One Hundred and Sixty-three Outstanding Communist Lead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vol. 24, *Studies in Quantitative and Cultural Sociology* (1929), p. 48. 关于中国共产党, 可参见: Robert C. North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 in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eds. Harold D. Lasswell and Daniel Lern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pp. 376—379.

11. Lane, *Roots*, p. 27; Davis, *Study*, pp. 48—49; North and Pool, “Elite,” in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eds. Lasswell and Lerner, pp. 381—382.

12. 关于学生转向批判立场和激进政治的背景, 参见: George Fischer, *The Intelligentsia and Russia*,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 Cyril E. Blac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63—267; Martin Malia, *What Is the Intelligentsia?* Richard Pip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and Benjamin Schwartz, *The Intelligentsia in Communist China: A Tentative Comparison*, all in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ed. Richard Pip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and John Israel,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Daedalus* (Winter, 1968): 229—253.

13. 参见: Lane, *Roots*, pp. 20—32; and North and Pool, *Elites*, in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eds. Lasswell and Lerner, pp. 376—382.

14. Lane, *Roots*, pp. 32, 39—46.

15. North and Pool, “Elites,” in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Lasswell and Lerner, eds., pp. 393—404.

16. Higonnet, *Montagne, Gironde, et Plaine*, pp. 14—16. 法国商业港口城市与绝对君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是这一著作的重要主题: Edward Whiting Fox, *History in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e other France* (New York: Norton, 1972).

17. 关于(17世纪波旁绝对主义得到巩固之后)18世纪一代多有抱负者的情况, 参见: Colin Lucas,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 60 (August 1973): 84—126.

18. Fox, *Other France*, p. 90. 也可参见 C. B. A. Behrens, *The Ancien Regime* (London: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7), pts. III—IV.

19. 关于俄国革命的无数历史分析, 主要关注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Franz Schurman's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该书从中共意识形态的角度, 详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后果。在法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中, 一些分析家总是强调激进政治精英的启蒙理想, 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当然, 在更为一般的革命理论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对意识形态取向的重视, 例如系统/价值共识理论以及葛兰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20. 关于作为一种革命运动的“雅各宾主义”, 参见 Brinton, Jacobins, 尤其是第二、四、五一七章。

21. 参见第二章有关日本一节的论述和参考文献。

22. Egon Bittner, “Radical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Radic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1963): 928—940.

23. 当然, 普遍性的观念体系——即启蒙思想, 包括卢梭的哲学、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在历史上是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所能接触到的。问题在于, 这些思想体系提供的必然是普遍性的取向——例如, 针对诸如“人民”或“无产阶级”这类普遍民主参与团体的、无所不包的社会或历史终极状态。在革命性危机期间, 这种广泛的取向会与更适应具体变动的政治环境的特殊目标、模式、战略和策略结合起来。革命精英为了建设新的革命国家组织不得不这样做。从这种角度看, 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的普遍性思想体系的影响问题,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即革命领导团体是如何改造这些普遍性思想体系并使之具体化。因此, 我们需要研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 因为这些领导人正是在对这些环境做出反应时创造和改造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关于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的出色研究, 可参见: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73)。

24. 参见: M. J. Sydenham,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chaps. 7—8.

25. 参见: Barrington Moore, Jr., *Soviet Politics—The Dilemma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Arthur Rosenberg,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Robert Vincent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6. 参见: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9), 特别是前言部分, 以及 Roland Lew, *Maoism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5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115—159。

第五章

法国“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础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

——卡尔·马克思

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社会革命危机关头,自由稳定的局面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催生了集权化的、官僚化的国家组织。同俄国和中国革命一样,在国内外战争的背景下,上述国家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巩固革命。我们对法国革命的动力与结果的研究重点,主要是这些基本因素。作为分析的前奏,我们先回溯到历史文献中,对多年以来有关法国革命的整体特征如何定位的争论作一个考察。

第一节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在法国革命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反复争论的主题。在这些争论中,目前依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解释”观点受到了明显的攻击与批评。这类观点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认为法国革命属于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主义与贵族统治的、并力图建立资本主义的一场革命。¹相比之下,其他任何相反的解释都没有获得同等范围和效度的认可。²也许,造成上述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对于法国革命的重新解释是否可行的论争,依然建立在早已确立的社会经济参照框架之中。虽然,资产阶级的中心地位以及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转换这些马克思主义论点早就遭到过质疑,但是,究竟运用什么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大家众说纷纭,争论得不亦乐乎。结果,除了最初的论点稍微加以修正之外,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有的研究者试图发掘出资产阶级之外的新团体,并把他们与革命后果中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相互结合起来。³或者从一个更加间接的、慎重的角度来重新回应马克思主义社会层面的解释,同时抛弃其经济层面的解释。⁴结果,人们往往把分析重点放在了革命后果的某些片段上面。这样,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崛起,及其与法国革命的实际政治事件和斗争之间的任何联系,都被越来越淡化,而实际上似乎确实存在某些本质的联系——并且能够真正地“解释”整体的革命进程。

同时,当代的解释者们力图探求革命的整体意义之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法国革命对国家结构和功能的变迁所施加的影响。⁵然而,在解释革命的论文或综述当中,尤其是在对革命期间军队和行政机构的发展进程做经验性研究之时,会不时地显露出某些线索。上述情况表明,革命斗争与后果的整体逻辑,可能就隐含在社会、政治以及司法体系的变革当

中——即官僚化、民主化、以及适宜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框架的出现。这些变革都是通过围绕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以及农民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而实现的，而不是由资本家的阶级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变迁。⁶的确，这里所指涉及的差别，只是研究角度与侧重点的不同，但是，这种差别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可能会让我们在解释革命的进程与后果时另辟蹊径。

革命与经济发展

认为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者们，也能够找到似乎可以支持他们立场的证据。当然，革命中显现出来的政治精英，并没有直接控制经济命脉以刺激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相反，革命强化了私有产权基础之上的阶级地位。阻碍全国性市场形成的地域差别、身份等级、行会约束等等因素都被革命一扫而尽。而且，法国终于及时地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然而，很多同样重要的事实，明显与“资产阶级革命”这类着眼于经济基础的观点相抵触。大革命之前，法国只有小型的非机械化工业；根深蒂固并且声誉良好的各种形式的财产权利（土地、贪污、年金）与商业和金融业友好共存，甚至可以说是共栖而生的。革命期间，政治领导团体主要出身于专业人士（尤其是律师）、官员以及知识分子。革命后主导法国的人也并不是工厂主或资本主义企业家，而主要是官僚、军人以及不动产业主。⁷而且，革命期间颁布的有关经济改革的法令，不是由下层暴动促成的，就是“……100年来废除国家内部关税运动……彻底、最终胜利”的结果，“……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法国国家官员中的改革派，而并不是工商业利益集团的代表。”⁸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革命起到了促进与阻碍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双重作用。任何革命时期的骚乱都是经济发展的直接路障。因此：

巨变和战争随着革命的爆发而产生，随着滑铁卢的失败而告终，……带来的结果是：资本和人力资源遭到破坏；政治不稳定和社会的普遍不安；富裕的实业家阶层大批消失，所有形式的贸易中断；通货急剧膨胀，币值极度不稳定。⁹

在上述后果中,比较突出的是外贸问题。大革命之前,法国的众多新兴工业由于从事广泛的海外贸易而获利。¹⁰但是,革命及之后的战争造成了此类贸易的萧条,结果是,尽管“……从1716年到1789年,法国的对外贸易额翻了四番……”但在1815年之前,此类贸易的额度始终没有能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¹¹

法国革命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还体现在其他更为根本的层面。革命巨变所催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以非工业资产阶级和享有确定产业的农民为特征的。¹²诚然,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更加富足而且雄心勃勃,还享有完全的私有产权。但是,

……资产阶级的基础并不是工业,而是贸易、职业技能以及土地。在社会巨变创造的机遇中涌现出的新人尽管具有进取精神……却没有把从事工业投资与生产看作是利用新近赢得的自由的主要渠道。从事土地和商品投机更容易迅速获得财富。也许以后他们会把工业作为自己的出路,但也只是在机遇降临到他们身上之后才有可能。¹³

然而,(尤其是与英国相比)法国工业投资的机遇直到19世纪之后才逐渐出现。革命后的经济依然以农业为主导,农民的耕作方式实际上并没有改变。通过废除封建领主特权、实施土地转让以及通过加强平分遗产的法律,革命强化了小农经济。正如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早已指出的那样:

毫无疑问,在遏制法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之中,法国的家庭农场占有突出地位。

首先,法国农场的存在显然是城市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原因。农场主都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此同时,……购置额外的土地一直是法国农民首选的经济考虑策略。因此,这种众所周知的节俭就意味着不会购买额外的消费品;更不会从积蓄中拿出很多的钱来添置农具与肥料之类的资本商品。……结果,法国农民不仅不可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更不会形成巨大的、不断扩展的工业产品市场。¹⁴

1814年以后,法国的工业远远落后于英国的工业水平,并转而强化

国家的权力，“并在法国永久性地确立了一种温室效应，运用很高的成本来保护那些过时的、效率低下的产业，而新兴产业既缺乏竞争的激励，又由于渠道不通畅，无法跟国外建立联系，从而无法引进资本商品和先进技术。”¹⁵直到铁路时代到来之后，强化了的国家权力，才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即便是在那个时期，法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见得比1789年超出多远，而且，总体上来看，发展运行的社会环境也并不比旧制度时期更为顺畅。经济史学家对于究竟什么时期是法国“工业起飞”的阶段，一直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这也表明，法国的个案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说明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锁链被突然打碎，因此也无法维持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¹⁶

政治成就

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调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一观点把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从侧重于社会经济层面，简单地转化为严格的政治分析层面，从而认为，法国革命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胜利，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并由阶级冲突推动的政治斗争。¹⁷法国革命的政治斗争，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或者其代表所领导的。法国革命为政治结构带来的关键性变革，强化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导权，而非代议制议会体系。同时，增加了威权型统治的可能性，但牺牲了公民的自由。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试图弄清楚影响政治斗争和革命结果的条件，研究者就要特别关注参与1792年到1814年间的欧洲战争，给法国带来的各种效应。与社会集团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相比，如何应对战争以及处理国内反应之类的事务更为紧迫，从而对革命后法国国家建设进程的影响，也就更加深刻、更为直接。

本章开篇所引用的那段基调性的话语，出自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有意思的是，这段论述对于法国革命突出成就的宏观把握，迄今为止无人能及。¹⁸这段著名的论述，以恰当的视角界定了旧制度中的“中世纪垃圾”，指出它们与君主专制的国家机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在法国革命前夕，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具有流动性、越来越带有现代色彩，但是，各种制度化的、并且具备政治保障的地方

性、省份性、行业性以及等级性权利和各类团体，却强加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上述特权有些带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形式和标签，但它们早就由于绝对君主制的扩张和商业化的推行，而改变了功能。这些“中世纪垃圾”既依赖君主国家的以维持生存，又同时限制了君主专制的有效发挥，而革命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巨变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荡涤了这些“中世纪的垃圾”。封建领主的特权被清除干净之后，拥有绝对私有产权的中小农民就占据了农村经济的主导位置。一个由取消了等级财产差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民族，取代了君权神授的世袭制度，成为合法性政治主权的象征性源泉。如地图3所示，旧制度时期，法国是由35个省、33个财政区、175个大法官辖区、13个高等法院、38个军区以及142个主教区组成的行政区划的大杂烩，而革命后取而代之的是由80—90个省份（department）统一合理安排形成的政治辖区（本身还包括各个地区和公社）。¹⁹全国统一的司法、税收、关税系统，取代了革命前夕各种地方性壁垒和地区性差别。在国家行政和军队方面，先前的政权实施的捐钱买官、行政承包、突出贵族地位以及承认团体特权等等政策，损害了君主国家的效力和团结；而革命后的政权废除了先前的做法，完全秉承官僚化的原则来奖励、招纳、监督官员。中央政府的职权扩大，功能增强。而且，新兴的国家政体变得更加“民主化”，不仅仅是因为权利平等的民族取代君主贵族成为合法性的基础，还在于国家更加公正地介入到社会当中。国家力图不按照社会地位来分配服务和机遇，要求更多的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并且为实现民族的目标贡献出更多的资金、时间、以及人力资源。

总之，法国革命把革命前杂乱的产权体系简化为单一的、绝对的个体私有产权形式，之后又把这种现代的产权形式巩固下来，仅仅在这一特定的意义上，这场革命才能够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且，法国革命扫清了阻碍竞争性的、统一的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所有团体和地方性障碍，在此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是“资本主义革命”。当然，上述变革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意味着准封建社会的那种剩余价值占有方式的消失，代表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司法条件的确立——尽管并不是最理想的社会经济条件。²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上述变革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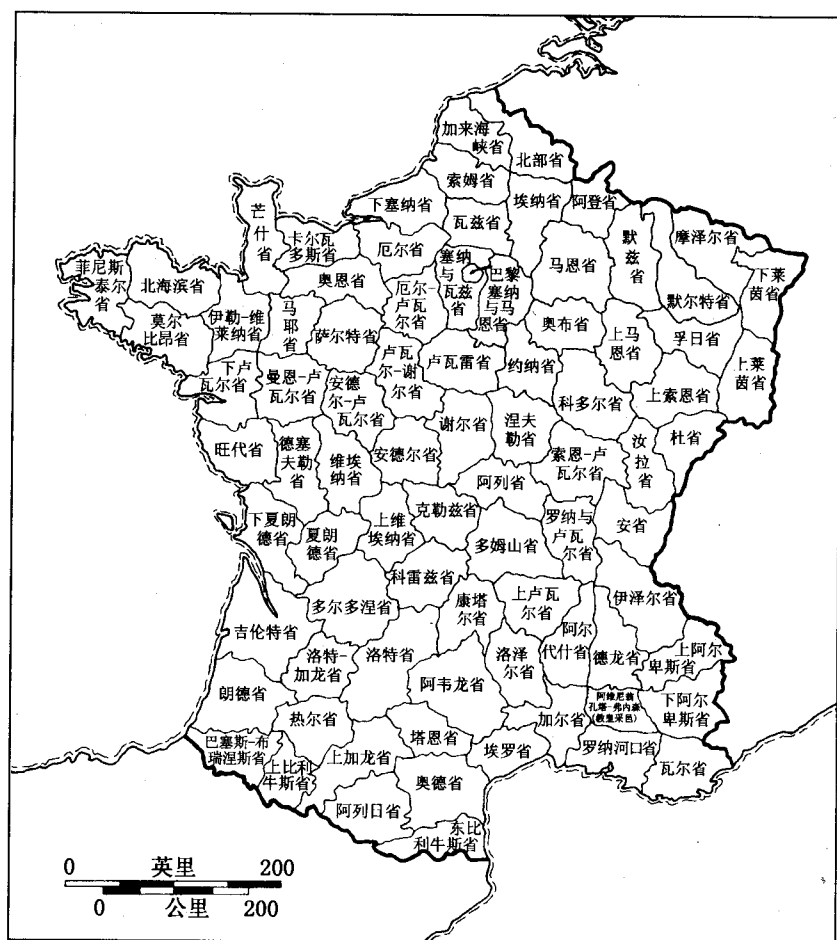


图3 法国的各省份(不包括科西嘉):1790年之后

注释:巴黎变成了塞纳一部分;罗纳-卢瓦尔省被分成两个部分:罗纳和卢瓦尔。首次合并的结果,勃朗峰(萨瓦和上萨瓦省等)来自于萨伏伊;阿尔卑斯省来自尼斯和摩纳哥;特黑伯乐(贝尔福地区)来自于博行特护区;沃克吕兹来自于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到1799年,总共有90个部分。资料来源:M. J. Sydenham,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p. 70。

仅是故事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法国国家权力和民族政体所发生的更为突出、更为深远的变革来说,上述变革不过是补充部分。那些政治性的变革即便具备“自由主义”的性质,也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由资产阶级活动的直接领导,或者由阶级利益直接推动。相反,民众暴动和政治

领导团体持续不断地巩固行政军事的效应这两股相互交织的力量,才是政治变革的原因。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果来看,(正如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这场革命中的官僚化程度、大众参与规模、国家权力强化力度等方面,与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相比,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节 1789 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如果说法国革命主要是把“中世纪垃圾”包围下的君主制度,改造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化的、大众参与式的政权,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法国革命的政治后果,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得到了完全强化,但并不是法国的经济支配集团所希望看到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就具体的制度形式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大多数富裕的有产阶级,可能会希望革命带来的是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这种制度由各级地方政府和受过教育的富裕阶层代表主导的国民议会组成,其中,全国性代议机构享有立法权和对行政机构实施财政控制的权力。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类型的政治结果,并没有出现在法国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也同样没有出现在俄国和中国革命当中。从一开始起,即从 1789 年开始,社会革命性危机——表现为,支配阶级所倚重的君主专制陷于瘫痪以及农民暴动无法控制——就包含着与运用自由主义形式来巩固革命这一路径相背离的种子。要想了解上述现象为何产生和如何产生,就必须将法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革命轨迹,与英国 17 世纪的议会革命进行简单的对比。

支配阶级的政治能力

从一开始起,法国支配阶级就不具备英国支配阶级所具有的、实行自由政治革命和反对君主专政那样的能力。英国革命之前,英国议会是一个起作用的全国性议会,它包括代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名门望族(实际上在下议院中,许多乡绅组成的郡县派别仅仅拥有代表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城市团体的权利)。此外,议会代表与控制着国家主要的行政和强制手段

的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良好的联系。²¹因此,当英国的支配阶级开始削弱君主权力的时候,它就可以声称是为了保卫早已存在的国民议会的权力。而且,当围绕着军队控制权问题展开争论之时,内战也就随之爆发,支持议会的支配阶级派别就能够利用他们跟地方政府(伦敦和其他郡县)的联系,以获取至少与国王及其支持者相当的军事与财政来源。

法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从一开始起,支配阶级内部就在建立何种制度以制衡国王的问题上产生了分化。三级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先例;如果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议会,以取代各省三级会议、国民议会以及分等级投票制度,那么,现存的相关政治特权就要受到威胁。到1789年春末,第三等级与贵族之中的自由派名人,已经赢得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但是,与英国议会不同的是,这一新生的法国国家机构与强大的地方政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联系。在面对以国王为首的反对力量的时候,它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只是因为1789年夏天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自发性的地方市政革命。

尽管国民议会(后改为制宪会议)明显得益于地方市政革命,但却根本没有领导这次革命。而它之后所做的,也不过是从宪法上支持分权化的结果。新兴的市政委员会的确强烈地倾向于全国性的政治,也迫切地支持革命。²²但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市政革命的结果不仅仅瓦解了忠于国王的政府,而且还预先阻碍高效型革命政府的建立。科班(Alfred Cobban)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论述说:“基本的事实是,1789年之前,……法国根本就不存在单纯的真正选举产生的议会,而只有政府官员;而到了1790年,法国没有单纯的官员,只有选举产生的各类团体。”²³革命早期阶段,人们对任何集权化的执行机构极端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建立一个可行的体系来取代君主制。这样,地域性就成为事实上的自治机构的合法性依据,尽管并不具备任何手段来征收赋税。²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却发现,在协调的基础上去贯彻某项政策,或者通过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都变得日益艰难。为了统治国家,议会成员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说服地方当局来服从中央的领导。

英国内战期间,议会的领导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但至少他们能够运用公认的社会控制能力,来对付那些互相熟悉、羽翼丰满的地方当局

以及地方政府的控制者。法国的地方当局是在 1789 年之后才出现的,并不具备足够的手段来履行赋予它们的职能。法国的行省设置属于高于地方市政层次的政府机构,由于这两套地方机构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所以从 1790 年设立开始,彼此之间矛盾冲突就持续不断。而且,不断更迭的国家领导集团或争权夺利的全国性派别,对两套地方机构也大献殷勤。²⁵在上述情形之外,农村地区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却相当微弱——在农民与市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期与地方,一体化进程完全崩溃。因为,在新兴的全国性体系当中,最积极的地方当局都是以城镇为基础的,所以,整体上看来,1789 年至 1790 年法国的自由主义革命政府的基础,要比英国议会政府的基础薄弱得多。从法国自由主义政权的起源来看,这就不足为怪。因为,只有在革命前支配阶级所倚重的王朝行政机构解体之后,才能造成权力的分散化,从而使得自由主义政权在革命的最初阶段成型。

农民造反的影响

更为糟糕的是,与英国议会式的革命相比,法国的自由主义革命直接并且连续地遭遇到极为可怕的威胁——包括难以控制的下层民众造反以及支配阶级在社会与政治等根本问题上的对立日益加深。其中,农民造反的因素越来越突出。鉴于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的原因,英国革命过程中并没有爆发普遍的农民反对地主支配阶级的斗争。英国的上层阶级可以自由地争论政治形式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比法国人更具有潜在的统一性),从来不会遭遇到来自于下层的社会革命的挑战。但是,1789 年春夏两季,法国爆发了直接针对支配阶级内部领主特权阶层的农民造反,其后果对于法国革命影响巨大。当然,农民造反的直接成果就是打击了现存的阶级结构,消除了当时那种占有剩余价值和控制农业生产与财产的方式,这才是更为根本的方面。但是,农民造反对全国的革命政治进程产生的“反馈”效应,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至少也具有相同的分量。因为农民造反影响到了制宪会议的活动(1789 年 8 月是直接影响,以后是间接作用),从而不仅加速了领主制的废除,也导致了旧制度其他方面的解体。1790 年之后,具备现代法国特色的统一与理性的行政司法体系得以形成,农民造反所产生的促进效应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农民造反及

其在全国政治中的反应也加剧了支配阶级内部的分化。所以说,农民对自由式君主立宪政权的保障本身就是海市蜃楼,一旦温和的革命领导者试图接近之时,它却消散开来。

1789年夏天,农村的骚乱局面像滚雪球一样愈演愈烈,这让新确立的制宪议会手足无措,也给议员的心理蒙上了危机的阴影。与6月份发生的城市暴动相比,农民的反叛既无法控制,又不接受任何权力机构的领导。由于那时君主独裁的行政机关在很多城镇中都已经解体甚至被取代,一时无法恢复,也就无法全面地镇压农民的反叛。议会中的一些军队代表把这种危机看作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保证迅速地废除损害国民团结和公民平等的某些特权。因此,在那个著名的“8月4日之夜”,领主特权就被“废除”了(实际上是通过相应的补偿获得的)。此外,一系列特权、产权、以及免税权——包括属于市镇、省份、法院、地方贵族、捐纳官员以及教会等的权利——也半自愿、半被动地遭到了废除。议会经过表决决定,诸如领主权利、捐纳官员以及教会的什一税等由于废除特权而遭受的巨大损失,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不管怎样,一堆“中世纪的垃圾”总算被迅速地清扫干净了。²⁶

同贵族和教会一样,第三等级的特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对那些极其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剥夺政治特权本身尚可接受,而特权消失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是如此巨大,简直难以承受。此外,几个月内,议会又不得不没收教会的土地,以救助不断恶化的国家财政收支;因为,作为8月改革的一个结果,新兴国家的义务就落在了教会和买卖官职者的身上。农村的骚乱仍在继续,时而沉寂酝酿,时而激情爆发,农民不仅拒绝缴纳领主的地租,而且拒不缴纳领主的补偿金,有时甚至还用暴力来攻击领主及其庄园。²⁷军队的纪律持续涣散,普通士兵不是溜号开小差,就是违抗命令甚至起来反对贵族军官。²⁸而贵族也越来越容易遭受到攻击或蒙受损失。因为大部分的行政管理和强制手段都已经落到了地方当局手里。这样,贵族——特别是乡村贵族——既不能直接控制,又无法获得行政和军事手段的保护,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与地位。于是,从1789年秋季开始,大量激增的乡村贵族以及那些惧怕民众骚乱和国家政治发展的保守分子开始移居国外。²⁹他们

经常会加入由国王的兄弟阿多瓦(Artois)组织的反革命军队,而阿多瓦伯爵一直呼吁其他欧洲君主干涉法国革命。

此时,在国内,国王和其他保守分子一直表示厌恶革命,拒绝诚心诚意地与那些竭力巩固统一的立宪君主制国家政权的温和派合作。国王及其好友手里没有可以随意支配的行政与军事手段来颠覆革命。但是,他们的不合作态度,特别是在国外反革命宣传日益激烈的情形下,足以刺激议会内部以及在巴黎和全国范围内关注革命进程的人们,倒向激进的政治途径——而最终成为了共和派和民主派。

这样,从1789年8月开始,两极分化的进程就持续扩展开来。一方面,贵族君主制度全面复辟势力的要求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对国王的厌恶和对反革命的恐惧也日益加强,最终导致激进共和主义的成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分歧之间的张力日益硬化,最终导致(在战争状态下)1789年—1792年期间勉强团结在一起的自由主义政府分崩离析。相应地,这也为激进的政治精英发动城市民众提供了突破口,与原先的地主商人支配阶级相比,这些政治精英处于边缘性地位,但他们试图通过国家建设提高自身地位,强化民族力量。相反,英国革命期间根本没有出现上述机会,权力的重心——包括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那些乡绅手中,他们属于拥有议会和地方当局可靠政治基础的支配阶级。但是,法国支配阶级就没有这种政治权力的纽带。所以,当1789年革命危机一旦爆发,不仅封建领主难于应付无法无天的农民暴动,连支配阶级中的自由派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根本无法建立基础牢固的议会政府来取代绝对君主专制,也就难以重新组织有产阶层并保障他们的统治,最终无法抵御那些官僚化与大众参与的政治威胁。

第三节 战争、雅各宾派与拿破仑

1792年4月,法国向奥地利宣战,这次战争最终结束了1789—1791年期间的自由主义统治,而且使法国卷入了席卷欧洲的一系列国际冲突

之中,直到1815年才告结束。法国的宣战推动了政府集权化和民众政治动员的进程,从而导致了1793—1794年期间山岳派的高压恐怖专政,之后又催生了拿破仑独裁政权。对此,莱因哈德(Marcel Reinhard)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促使大革命革命化。”³⁰1791年之后,法国革命领导者面临着双重压力:在欧洲大陆上要发动战争,在国内要打击反革命势力,这种压力为法国革命产生集权化的后果设定了相关的条件。这种情形与1789年的状况不相上下。这样,法国与英国的另一个不同点是,英国的革命者没有面临外国军事入侵的压力。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场战争是一次“打破了革命进程”的偶然性历史事件。³¹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承认这种观点,就得假设,革命进程的逐步发展,无论其是否急剧爆发,就足以使法国突然奇迹般地从它所处的欧洲国家体系中分裂出去。对法国革命这部戏剧而言,无论是其中的国内演员、还是国外的观众,国王和民众,都从来没有沉迷于这种幻觉。从1792年法奥战争的最初爆发,到随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反复,贯穿始终的根本因素,一直都是欧洲国家体系内部长期的不和与均势的变化——现在又与革命引发的不确定因素和急剧变化相互交织在一起。³²法国革命期间,各个相互对立的团体(比如说旧制度下的宫廷派)也一再地试图利用准备战争、预期战争胜利或者利用实际的胜利果实,来为自身的派系目标服务。同样,其他欧洲列强也找出法国君主制衰弱、共和派势力强大以及拿破仑法国的威胁性等诸多理由,不断地发动战争。最终,法国革命直接催生了一种军事制度,而这正是路易十六梦想用来控制整个欧洲大陆的工具。结果,这一梦想最终破灭了,因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的君主腹背受敌:一方面是英国日益崛起的工商业霸权难以抵挡,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幅员辽阔,无法征服。³³法国没能能够获得国际主导地位,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法国革命遗产的独特推动力就消耗殆尽。然而,在动荡的国内政治条件下,借助参与战争、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宣传,法国最终确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国家,并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的遗产。因此,战争绝对不是法国革命进程和结果的外在因素;相反,它是革命的核心构成性因素。了解到引发革命的旧制度的本质和困境,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民众的不满与通向革命独裁的动员

1792年4月,当布里索派(Brissotins)引导法国向奥地利宣战之时,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爱国、革命的民族团结起来,推动法国轻而易举地获胜。但是,事实上,法国国内的政治分歧更加严重了。由于许多军官逃到国外或者心怀不满,下级士兵则不服从命令或者缺乏训练,所以军队的表现极其不佳。而法国军队的接连失败,又刺激了国内的失望和恐惧情绪,让反革命分子和激进势力抬头。与此同时,战争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通货膨胀,纸币(assignnat)急剧贬值。此时,激进政治家散布鼓吹共和的口号,日益恶化的政治和军事危机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抬升,这一切都催生了城市民众(menu peuple)的普遍不满。

那么,这些城市民众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在革命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基础又是什么?他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尤其不是资产阶级)力量,因为他们的身份阶层比较模糊,主要包括:店主、工匠、小商人等有产者,熟练工人、农场雇工等最初的雇佣工人以及低收入者和技术人员。³⁴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话,那就是:他们是为谋生而工作;如果他们拥有财产的话,也仅仅是与其工作相关,因此,他们都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富裕特权阶层的“高贵生活”心怀不满。同样,城市民众对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及其价格特别关注。在这些没有特权的城市居民所生活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天气恶劣、运输困难、以及市场运作“不完善”等原因,城市的面包等必需品的供应经常会出现问题,因此,他们是否能够养活家庭就毫无保障。的确,正如乔治·鲁德(George Rude)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生活必需品供给问题给城市民众带来的忧虑,从根本上决定着1788年到1795年间革命的每一转折关头大众的政治参与。³⁵

不过,还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有选择地、逐步地加深的政治意识。³⁶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城市民众都会去支持那些政治信念最坚定的精英,包括最初的(1788—1789年)“自由主义”信奉者以及1791年以后推崇政治权利和生存权利“平等”的人。而且,当反革命武装的威胁日益临近之时,那些具有政治积极性的城市民众,自觉成为提倡共和原则、反对贵族、主张道德平等的无套裤汉,而巴黎市民则首当其冲。他们要求废除1790年宪法所设立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在巴黎各个居民

区、各个城市公社、各个监督委员会以及各个革命新军(为保卫革命而自己组织的武装,后来逐渐承担起确保城镇基本生活品的供应任务)中,这些城市民众自发地组织起自己的军事政治团体。³⁷

到1792年底,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无套裤汉对关键性的政治游行和武装行动的积极干预,不仅布里索派,而且君主制度和立法议会的残余都被彻底清扫,从而创造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共和国的条件。起初,国民政府的结构与往常一样,并不是中央集权的,据称是由民选的国民公会统一协调运作,并致力于起草一部新宪法。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这种体制并不足以对付当时的危机局势。局势的发展很快就让国民公会难以应付,粉碎了由自由主义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政府分权形式。尽管共和军最初侥幸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到了1793年初,外国军队重新兵临法国。与此同时,国内还发生了叛乱:三月份,因为害怕国民政府征兵,旺代地区的农民发动了反抗革命政府的暴动。此外,巴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五月底吉伦特派被清除出国民公会)远远超出外省的政治发展,并把更多心怀不满的政治家驱赶到对立阵营,各地纷纷爆发以省市政府为基础的叛乱,严重地挑战着巴黎的政权。到初夏,法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份都参与到此类反革命叛乱或“联邦党人”(federalist)暴动中。这在某种情况下为外国的武装干涉提供了有利时机。

为了应对危机,并保卫革命免遭国内外敌人的侵害,独裁专断政府应运而生。政权的领导者都是富有献身精神的雅各宾少数派的山岳党人,他们鼓动、操纵、并且引导无套裤汉自发的愤懑和激情。³⁸在巴黎,罗伯斯庇尔以及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代表掌握了公安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和国防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的权力,并且与巴黎公社的无套裤汉代表保持紧密联系。通过国民公会派出的“特派代表”和“国民代表”,通过各地区监督委员会以及通过雅各宾俱乐部在法国的网络,公安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逐步控制了全国政治的中央协调工作。“选举事务被搁置,地方行政机构的更新转由全国‘代表’在民众团体的支持下实行……与实行极端分权原则的制宪议会相比,国民公会时期推行的是法国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³⁹严酷而草率的司法措施被用来监禁和处决革命的敌人,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恐怖”手段。在其民

众支持者的要求之下,山岳党人政府通常运用上述手段来惩治贵族、顽固不化的教士以及富有的资产阶级(相对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言)。但是,从绝对数字来看,农民和城市贫民才是更大的受害者,而且他们大多数处于爆发叛乱的地区。从大恐怖时期总体上的处决方式可以看出,推行恐怖的首要功能不是阶级战争,而是政治自卫,用格瑞尔(Donald Greer)的话说就是,“恐怖手段是共和派或山岳党人用来镇压反叛、铲除革命的敌对势力的……”⁴⁰如果没有上述措施,很难想象任何类似的中央集权政府能够如此迅速地确立。借助于恐怖措施(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于自身的蛮横专断),起先出现的制度根本没有成型的规则。相反,在此制度下,各个特派代表、各个地方团体肆意妄为、甚至相互矛盾,但都打着保卫革命(以及山岳派)的旗号。⁴¹只是到了后来,更加标准化的控制措施才走向了制度化。

山岳派专政的主要目的和最持久的成就,就是扩展、激励以及供给了法国军队。1793年8月公安委员会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著名的《总动员令》,该法令宣布:

所有法国人都要随时应征入伍。年轻人要上前线战斗;已婚男人要制造武器、运送给养;妇女要制作帐篷和军服,并在医院服务;儿童则要拆洗旧衣服;老人要被送到公共场合去鼓舞士气,煽动对旧王朝的仇恨,宣扬共和国的团结。⁴²

法国的军队急剧膨胀,以“胜利的组织者”卡尔诺(Lazare Carnot)为首的公安委员会的委员都忙着为军队挑选新将领,并向这些将领提供策划建议,还忙着向军队宣传,并力图运用政府的所有权力来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当山岳派政府在鼓吹民众进行武装动员的同时,还为军队和城市征用、购买食品和其他补给品组织军火生产,限定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和工资水平。这种“对经济的调控,在当时的官僚机构和强制权力的支持下迅速地扩展开来”。⁴³问题不单像许多革命的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山岳派是由于受到了无套裤党的持续压力,才力图减轻民众经济疾苦的。原因还在于,也只有通过这种严格的控制,革命军队的物资给养才能得到保障。

然而,革命独裁者的军事成就中,还有一点应该予以说明。山岳派并

不是白手起家,更没有废弃正规军而简单地用类似于革命初期的民兵那样的志愿武装人员自治团体来代替。斯科特(S. F. Scott)近期的研究表明,⁴⁴尽管在1789到1790年间,下级士兵经常开小差而严重削弱了法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从1789年到1792年,又由于贵族军官大批叛逃而影响了军队的稳定,但是,1793年山岳派接管军队的时候,军队的组织编制基本上是完整的。此外,到了1791年和1792年,军队下级士兵的编制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过提拔1789年以前入伍的人员(1792年初期,这些新军官占军官总数的一半以上),各级军官也得到了补充。1793年到1794年,山岳派将志愿队伍和新动员的预备役士兵同原有的正规军合并在一起。与此同时,公安委员会的特派代表还提拔了那些政治忠诚、战绩显著的军官。当然,军队规模迅速扩展并充满了新兴的爱国主义热情;此外,(我们后面将要讨论到)士气高昂的公民队伍使得某些新型战术的应用成为可能。但是,这些队伍——以其所有的政治热忱和全面参与——被合并到1789至1792年间没有解体的军队编制中来。尽管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始终是欧洲大陆战争背景下法国建设革命国家的坚实基础。

山岳派的倒台

在公安委员会的专制统治下,法国革命军从失败和低落中走向了胜利。到1794年初期,他们已经把国内外危机和共和国的所有威胁都控制住了。然而,从那时起,山岳派先前的支持者中却开始滋长了一种不满情绪。而且,到1794年夏天,国民公会撤除了对委员会专政的支持,罗伯斯庇尔及其主要助手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独裁专政的垮台有其经济和政治的原因。我们先考察经济困境问题。山岳派试图控制价格和工资水平,实际上,在分散化的前工业经济国家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⁴⁵国家的紧急需求得到满足,但社会团体却怨声载道。在中心城市,店主、商人和小老板都抱怨物价太低而工资太高。但是,当1794年山岳派试图降低最高工资水平时,又遭到无套裤汉中最穷困人员的抱怨,因为,当时简直无法买到价格公道的面包。

这时候,农村中的有产农民也对越来越不满意,面对人为压低的产品

价格,或者面对政府代表以及城市革命者武装团体的横征暴敛,他们不情愿从事生产和销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农民正是那些在革命所引发的农村变革中受益最多的人。在下层农民集体反抗领主特权和什一税斗争中,农民受益良多,而且,在革命面临战争的危机关头,国民公会中的激进派为寻求农民支持,而颁布的许多法令都让农民更加受益匪浅。通过废除(无法实施的)那些农民赔偿封建领主特权的法令,山岳派在1789年到1792年间积极支持农民的胜利。山岳派还采取某些措施,让农民以较小规模的形式购买从教会和逃亡贵族那里没收的土地。然而,同法国革命中的其他政治领导集团一样,山岳派始终力图强化个人产权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对山岳派来说,这也是唯一明智的政治策略,因为他们的“党”在农村并没有深厚的组织基础,而且法国的穷苦农民也没有自己的集体组织,来推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或者要求对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特殊集体权利赋予法律保障,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山岳派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就是通过对既得利益的法律确认以及通过让更多的农民个体购买到国家的土地,尽可能多地把小农生产者与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上述措施强化了农民私有者对农业经济的控制权,但是,在1793年至1794年山岳派独裁期间,紧急限制价格和强行征收粮食等措施,也必然地损害到这些农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山岳派还面临着政治矛盾,与他们自身政策的逻辑结果相冲突。⁴⁶也许是意识到了自身地位并不稳固,山岳派在获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之后,实际上加强了政府的高压恐怖统治。他们不仅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失败的反革命分子,还用来打击异己派别,如独裁集团中的右翼势力(丹东集团,Dantonists)和左翼势力(埃贝尔集团,Hebertists)。这让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深感不安,并促使他们取消了对委员会的支持。另外,恐怖措施也切断了委员会与巴黎民众最强有力的联系。失去了埃贝尔左翼势力的支持,使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因为正是无套裤汉干预革命,才让山岳派掌权。但是,到了1794年春季,无套裤汉已经不再是自发的革命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裁专政的一个主要成就,竟然是驯服民众运动,恢复日常秩序。推行直接民主期间的那些大众性集会和团体,不是受到压制而很少召集,就是由于其领导成为国家的薪金官员而被改造为下

属的独裁机关。此外,为了应对全面战争,众多民众开赴前线,后方民众的能量也被固定在日常的后勤工作中,使得最初那些无套裤汉的热情消耗殆尽,人员也逐渐减少。除了上述情况外,无套裤汉还常常因为经济窘迫而对山岳派政府日益不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罗伯斯庇尔在热月被推翻之时,为什么下层民众并没有开展有效的反抗。

历史学家常常把这些政治和经济矛盾综合起来考虑,以充分解释为什么山岳派的独裁会被终止,为什么法国革命的极端化会在 1794 年结束。实际上,前面所提到的矛盾之所以充分,仅仅是因为它们 在 18 世纪晚期法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世界历史环境下才起作用。正如我们在本篇的下一章将要看到的,1921 年布尔什维克在取得内战胜利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假如布尔什维克最终垮台,历史学家也会轻易地把他们的失败归因于工人农民的不满,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控制经济所带来的矛盾——当时上述矛盾都相当尖锐。但问题是,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实施了经济政策的转变(包括向市场力量和小农生产者让步),把握住了国家权力。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而 1794 年的山岳派就无法办到呢?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处在 20 世纪的大规模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拥有两方面的优势:他们拥有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还有实现政治任务的现实的组织基础。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他们对国家权力的掌握超越了武装保卫革命的使命。因此,布尔什维克就能够“回复”到国家控制的工业中来,并且在 1921 年之后,运用国家权力来设法推动工业发展、提高工人数量。相反,即便是法国的山岳派,在主观上也始终乐意把自己看作是“无套裤汉的政党”,他们在客观上也无法承担发展经济的使命,因此,在 1793 年到 1794 年的军事胜利之后,他们自然就没有继续掌权的理由。无套裤汉本身也是一个混合体,即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小有产者,又有抗拒经济发展潮流的无产者。更重要的是,法国经济本身,就是由众多的小型农业和商业(以及一些非商业化的工业企业)单位组成,无法由一个中央政党统一指挥。法国国家的管理不存在“制高点”;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下,国外也没有大规模工业可供借鉴。

因此,在革命时期的法国,迫在眉睫的反革命威胁一旦变小时,雅各宾激进派对民族权力和经济发展的潜在的实践贡献也就结束了。从那时

起，雅各宾激进派继续运用暴力措施来惩处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并力图推行“美德共和国”，试图以对“最高主宰的崇拜”来彻底取代天主教，除此之外，他们的任务所剩无几。⁴⁷山岳派的政治凝聚力逐渐减弱，而国民公会和全国范围内潜在的反对派却放开了手脚。最后，从1794年春天起，即便是公安委员会中的“十二统治者”也不能团结一致，也不能以坚定的目标采取行动——这与1921年布尔什维克领导们所走的道路大相径庭。

寻求社会的稳定

罗伯斯庇尔垮台之后，热月党国民公会即刻解散了恐怖时期的司法工具以及临时革命政府的集权控制。由于突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而导致物价上涨，巴黎的城市民众痛苦不堪，于是，在1795年再一次爆发骚乱。⁴⁸但是，由于没有激进的政治精英愿意、并且能够领导他们，这些城市民众就不再是革命的裁判者了。事实上，国民公会调集军队来对付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积极行动受到了无情地镇压，其领导集团也遭到了彻底清除。到1795年底，一个叫督政府的政权（因为其特点是由5名督政官掌握行政权力），根据新的共和国宪法建立起来了。这次新宪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让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掌权（按照法律规定，他们中间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人被选举为或任命为督政府议会议员），而且使富裕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地方行政权力和全国立法权力。这是自由主义革命试图巩固自身的又一次努力。但是，自由共和国的督政府与1792年以前的立宪君主制同样走向了失败，因为它同样无能，处于同样的困境。

督政府把它所继承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保留了大多数公务员，还扩大了中央行政机构。“中央官僚结构重新获得了稳定性，这就为它以后在拿破仑缔造的国家中将要扮演的角色铺平了道路，而且还通过拿破仑一直影响到未来几代人。”⁴⁹然而，执行机构缺乏权威。督政府的代表名义上负责监督各省份的政府机构，但实际上，地方政府都是各个地区有影响的人物，并且是在通过立法议会中当地代表的授意而任命的。面对难以承受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795年到1797年间），持续的对外战争与财政危机，白色恐怖的散布，以及对反天主教政策的抗争，督政

府深感没有合法有效的手段，去影响全国立法议会和地方政府的组成和政策。“中央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去推行自己的法令。它无法说服选举者去投票；无法强迫那些顽固的地方当局去强行摊派国债（一种减轻政府财政危机的方法）、去追剿那些牧师顽固分子、去回答政府的调查问卷；也无法阻止地方政府对军队中大量开小差者的宽恕。”⁵⁰督政府的困难不仅反映在自身制度结构的效能低下，还在于它薄弱的社会基础。⁵¹虽然它的结构和政策都是为了有产阶层的利益（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但是，并没有换来后者全心全意的支持。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尽管督政府实行的是反雅各宾派的政策，但是许多有产者认为，就其人员组成和推行的反王党、反教会政策而言，督政府依然过于激进。另外，因为到了1795年，法国的经济统治集团的政治倾向比以往更加分裂，保皇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阵营分明，针锋相对。1793年至1794年间的民众运动威胁到了财产权利和社会等级秩序；与1793年以前相比，法国的有产者阶层在分权化、自由化的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更难以达成妥协，至于运作更是奢谈。督政府所体现的是热月党国民公会中的共和派政治家的意图，即在有产者的支持下维持国家权力，并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但是，上述企图并未成功，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督政府本身的制度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有产阶层不情愿——或者是不能够——与前者进行政治合作。

由于它既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又不具备实施威权统治的行政手段——当然，也不愿意诉诸民众的政治运动——根基不稳的督政府转而寻求法国的军队来支持其统治，不仅要直接镇压武装反叛分子，还要一等地清洗经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同时，国民武装也逐步发展成为高度职业化的、自我控制的组织实体：昔日的革命志愿者“逐渐变得对国内的政治争论漠不关心，开始热衷于军人的技能与利益交换问题”⁵²。各级军官以前都是依赖文官政府提升官职，现在只听命于将军。“到督政府末期，军官晋升的捷径是投靠有权势的将军。”⁵³这样，当政府领导们习惯性地依赖军队之时，军队的领导则越来越不愿意服从文职官员的管辖。

可以预见，不久以后就会有一位敢于冒险的将军（1799年应督政官的邀请实行干政）显然会利用军队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去发动政变、攫取权力。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以军队为基础，（逐

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先是事实上的独裁者,然后是终身第一执政,在羽翼丰满之后则成为皇帝。

不过,拿破仑时期的制度发展更为重要。拿破仑认可了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就的法律地位,并重新确立了中央行政集权,成功地结束了革命时期国内的暴力冲突。他的措施之所以得力,主要是因为,他为了确立政权,毫无个人偏见地借用从前政权中幸存下来的政治态度灵活的人士。正如戈德肖(Godechot)指出的那样:

这一政权对行政机构做了极其巨大调整,其中包含了国家任命的大批薪金优厚的官职,这为拿破仑提供了一个实现和解的渠道。督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政治基础过于狭窄。波拿巴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左右两方面都寻求同盟,他赢得好感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起用各派人士担当官职,而且这些官职都是完全开放的……其中的一个完美安排是:在第一批省长中,有15人是原制宪议会的代表,16人是原立法议会代表,19人是原国民公会代表,26人是原督政府议会成员。其中有些曾经是恐怖主义者,有些还是贵族。⁵⁴

为了使这一折衷调和的体系运转起来,拿破仑明智地摆脱了非常规的民众运动,避免一切意识形态的显露。通过推行相当抽象的法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仪式和宣传,拿破仑把实质上属于威权主义官僚制度的政权,打扮成了一个吸取各种派别特征的混合体:用贫民爱国主义来对付激进派;用选举限制严格的参议院来对付自由派;通过与天主教订立和解条约来对付保守派。⁵⁵

经过1802—1803年的间歇,拿破仑国内安定的代价是,继续推动法国参加欧洲大战。拿破仑在驾驭法国人的热情和资源进行军事冒险方面的能力前所未有的,并且极大地使欧洲改观。但是,拿破仑试图征服整个欧洲的企图最终破灭。法国的侵略很快就激起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以至于使欧洲国家间长期的竞争模式和权力制衡以新的政治形式展开。此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拿破仑立足内陆的“大陆体系”,也难以与英国立足海权的工商业帝国相媲美。⁵⁶

然而,不论穷兵黩武给法国的资源造成多大的负担,只要战争胜利发

展,拿破仑就始终不会放松对国内的控制。假如说,强化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迅速直接地得到应用的话——也就是说,为了稳定国内形式,并通过军事征服在欧洲确立法国的霸权——拿破仑为革命权力斗争开出的政治“药方”,要比雅各宾派所追求的那种美德共和国要高明得多。直到军事失败之后,拿破仑才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被迫下台。即便如此,拿破仑政权基本的制度成果依然保留下来,因为,随后的政权既不推翻革命的成就,又不能摆脱拿破仑遗留给他们的行政权力。

第四节 新 制 度

拿破仑的军事独裁究竟巩固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体系?为了解法国革命结果中基本而持久的特征,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我们的步伐。当然,为了系统地考察革命斗争所引发的法国国家本身及其社会功能的突出变化,对法国革命的发展动力进行一番回溯就尤为重要。

军队的变革

官僚化、“民主化”的革命成就在法国军队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就欧洲军事发展的两条路线——军官的职业化和国民军队的出现——而言,法国革命是一条真正的分水岭。⁵⁷

在旧制度之下,一系列既荣耀又实用的职位充斥而成了军官阶层。充任高级军官的人员,实际上要么是贵族,要么与宫廷有裙带关系,要么就是那些通过贿赂而得到任命与升迁的有钱人。在封建传统中,军官被看作是一种荣誉性的“服务”,军官们并不能得到全职岗位应该获取的薪金。此外,为了应付与身份相符的开销,大多数军官不得不身兼其他赚钱的职业。⁵⁸

法国革命根本上改变了军官团的功能与组织结构。⁵⁹ 贵族等级的废除和机会均等的推行,使得军官职位正式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随着军官职位由荣誉性向功用性转变,官员职位的数目受到严格限制。出于同

样的原因,技术先进的炮兵部队从最低等级跃升到最高等级。⁶⁰买官鬻爵的传统被废除,而且,军官开始领取足够的薪金,从而成为全职的职业性技术人员。最后,军阶晋升在国内纷争与革命战争年代里相当频繁,但现在依照教育程度、技术水平以及特别是军事经验,包括服役年限(当然,政治亲疏因素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对那些提升到最高级别的人而言)等为基础来考评的。

上述组织上的变化,以及革命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巨变,保证了一大批非贵族出身的人员(特别是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得以进入军官团,而1789年之前,军官中的90%以上都是贵族。然而,在新制度中,许多贵族身份的军官都生存下来,而且还异乎寻常地飞黄腾达。实际上,在革命期间,许多穷困的外省贵族在军队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而在旧制度下,他们根本无法指望跟富裕的、与宫廷联系密切的贵族相竞争,⁶¹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说明,革命引发的变迁既针对组织本身,又存在于社会当中。拿破仑·波拿巴本人就是外省贵族在革命期间获得升迁的一个鲜明例证。拿破仑本人出生在法国科西嘉岛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在旧制度时期曾进入一所省属军事院校,后来被授予少尉军衔。本来属于死路一条的职业,却因为革命的到来而改头换面。因为拿破仑与雅各宾派有联系,结果,他在平息土伦(Tulon)叛乱的战斗中被提升到炮兵指挥官的职位。针对王党分子的斗争胜利之后,拿破仑被提拔为准将。热月革命后,他的职位暂时降低,但不久以后,由于1795年协助镇压了王党分子反对政权的示威,拿破仑一跃成为督政府中的司令员,先是统领内防军,而后又指挥意大利远征军。革命期间,即便是那些出身于政治地位低下的贵族家庭的军人,只要有才华,而且头脑聪明,就有可能遇到类似机会。

革命还同时引发了下层士兵的变化。1789年以前,参军入伍属于自愿行为,但是,对于那些过着体面生活的人没有吸引力。军队的纪律相当粗暴专横,薪水津贴低微还没有保障。法国的常备军有20万,与当时两千五百万的全国人口相比,并不算多;比如说,普鲁士军队所占的人口比重就要相对高些。而且法国军队中有六分之一是外国人。⁶²随着革命的发展,民众开始把参与军队事务看作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城市国民卫队建立之后,逐渐扩大并吸收了城市贫民,到1793年著名的《动员法令》颁

布之时达到顶峰。1794年法国军队膨胀到了77万人。⁶³由于战争连绵不断，督政府在1798年通过了《征兵法》(*Law of Conscription*)，从而为永久性的国民常备军设定了框架。该法令宣布：“所有法国人都是士兵，都负有保卫祖国的责任。”⁶⁴拿破仑把该项法令付诸实践，并运用法令进一步扩充军队。“从1804年到1813年，拿破仑在十年间征兵240万。”⁶⁵经历了1792年到1794年间的惨痛战争之后，拿破仑拓展了作战和调动系统，所以每次战役中他都可以自由地用兵。上述战役中，那些生活中受到礼遇、政治上受到鼓动的公民士兵们，不用军官督阵就蜂拥而上、猛攻敌人；而且，他们响应号召，依靠夺取的土地生存，奋勇杀敌，直到其军队被击败为止。总之，克雷格(Gordon Craig)写道：

旧制度垮台之后，所有公民都被赋予了基本的权利，这对法国的军队建设产生了直接效应。创立真正的国民军队就成为可能，而且，由于下层士兵是由那些献身民族事业的公民所组成，从而摆脱了18世纪那些苛刻的桎梏。法国军队不必在战场上排兵布阵，就可以灵活机动作战，因为原先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士兵临阵逃脱。法国的狙击兵就以散兵形式推进，单兵作战，分散隐蔽，结果军队的灵活机动性就大为提高。此外，各个部队还可以放心地自给自足，这样，法国军队就可以与笨重的供给军车分离开来，不必依赖限制军队行动的旧式仓库。后勤的自由化，加上新型战术和各个兵种的完美组合，使欧洲战争的形式焕然一新——1800年拿破仑在征服意大利的战役中展示的，就是这种闪电战术。⁶⁶

公民国家的变化

与军队中发生的变化相类似，法国革命催生的公民国家，是“官僚行政与民主政府的结合体”，此后的法国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政体的变种。⁶⁷首先应该注意到，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革命期间法国行政机器在规模上的急剧扩展。学术权威丘吉(Clive H. Church)在报告中曾经估计，革命期间“官僚的规模从5万人增加到25万人；其中，中央各部委的职员从1788年的420人增加到1796年的5000人以上”⁶⁸。实际上，按照科布(Richard Cobb)的看法，仅仅在恐怖政策期间，估计就任命了15万新官

员。他不无讽刺地说,革命创造了“高效率的法国”。⁶⁹

仅仅从官员数目扩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显然是恰当的;一旦弄清楚革命催生的官僚化所蕴涵的社会和组织意义,我们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博舍尔(J. F. Boshier)在国家财政领域对上述意义做了精彩的分析。他的著作《法国财政状况,1770—1795年》(*French Finances, 1770—1795*)的副标题“从商业化走向官僚化”道破了天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政府财政领域,法国革命结束了私人资本主义时期,开辟了公共行政管理时代。”⁷⁰因为“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政治统治,而引入行政管理的武器,这件事情要比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更为深刻”⁷¹。

旧制度没有统一的王国国库,没有中央财政预算,无法核算和控制政府的收支问题。国家财政的管理都掌握在捐纳官员——还有贵族和谋利商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包税人、收税官、财务主管、租金支付人以及其他高级会计师。

高级职位成为会计师的私有财产,并且很快成为贵族家庭的世袭家产。这些高级财会人员只对会计事务所负责,并不是行政机构中的一部分,也不受大臣的指挥与监督。作为王室银行家,他们大部分的收入不是靠薪金,而是从诸如财政税收的征收与开销、向政府借贷、从事自己的商业等活动中谋取利润。这些人组成松散的专业团体或公司,并设立审查委员会监管团体利益。在当时的制度下,他们垄断着王室财税的征收与开销,垄断着短期商业信贷,并从中得利。⁷²

旧制度中只有一些零星的官署才真正具有官僚化的成分。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为独立的高级官员或各部委的首脑服务的大批职员。作为领取薪金的雇员,他们“可能会被当作具有官僚地位,实际上他们更像是服务对象的家仆”⁷³,因为他们不仅帮助王朝的财政,还负责管理个人事务,并且可以任意雇佣和撤换。

革命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公会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财政制度,用他们的话说,原因就在于上述制度是被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掌握着”⁷⁴,所以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财政管理系统。

国民公会计划通过官僚组织来监督公共财政。本着对机构效率

和透明度的考虑，……那些革命的设计者希望防止腐败，相信组织的美德可以战胜个体的邪恶。这种设想是财政革命的核心内容。通过废除由独立的、唯利是图的会计师和包税人控制的成百上千的分散钱库，法国将建成一个坚实的中央国库，并由完全官僚化的财政部掌握，其中的官员都领取薪金，按部就班地履行职责。革命期间国库日益充实，接连合并了各个分散的钱库。国民公会控制雇员的任免、薪金和运行开支，还安排全面的年度核算，这是原先的君主制从来没有实现过的。⁷⁵

国家官员政策的变化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应，倍受恩宠的独立承包人和拥有特权的等级制度被取代，普遍推行的是一种上级官员对下级实行非个性化严格监督的行政等级制度。另外，从此以后，国家官员就可以与私人事务相脱离，从事由执行机构界定的公共职责。捐纳官员和贵族代理人的相关事务一概被废除。原先的部门领导都是一些地位独立、待遇优厚、谋求高官厚爵的野心家，此时已经改换为纯粹的事务官员，其薪金并不比下属高出多少。而且，这些官员的办事人员也变成具有固定工资的公务员，摆脱了“对主人的身份依附关系，从而成为纯粹的上下级关系”⁷⁶。这样，一个完全由中央权力机构监督、控制并支付薪金的公务员队伍就得以成型了。

就涵盖国家管理机构且日益官僚化的职员的行政控制模式而言，法国革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经历了一个成功的阶段。一个合法性主题始终贯穿着所有阶段：行政职能的行使是为了贯彻人民或民族的意志。所以，即使是拿破仑在推进自己的事业之时，也是用民主-民族专政的旗号来伪装自己。拿破仑自诩为“民族的第一代表”，曾经四次动用全民公决来认可自己的统治。⁷⁷但是，拿破仑在国家制度方面的成就绝对不是民主的（或自由的）。⁷⁸本质上，他把从国民公会期间和督政府时期所继承下来的官署和职员加以重组，并增加了一套中央任命的行政总长和司法官员的体系。这个体系的顶端是国务院（Council of State），它是由拿破仑任命的、拥有广泛实权的专家组成。政府的部长并不组成内阁，而是单独向国务院（还有拿破仑）汇报工作。国务院的法律部门定期颁布和商议新的法律，其他部门（如战争、海军、内务以及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相应的政

府部门。从这种技术官僚机构的顶端，向下延伸出了一整套等级体系，包括各级由国家任命的法官和行政官员，直到区长和市长。上述等级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省长，其职位类似于王朝时期的监督官，但是，由于他的权限比较小，所以更容易为中央控制——但同时不受特权团体的牵制，也因此而更有权力。

当然，拿破仑的独裁倒台之后，法国还建立过许多政权——实际上，拿破仑自己的统治只维持到 1814 年，之后又经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政权的更迭，直到 20 世纪。这些政权大都进行过一些更为重要的尝试（与拿破仑一世相比），力图引入自由主义式（或多或少有点民主意味）的议会政治制度。但是，正如勒斯（Hebert Leuthy）所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关注宪法形式的频繁变化，就无法理解法国政府的真正基础和持久的权力。

如果只翻阅一本宪法手册，人们就不会发现有关国家永久依赖的重大制度的任何暗示，最多偶尔有个相关的注释。……文中也根本不会谈及一旦部长离职，各个部委依然存在。也根本不会涉及国务院，因为它的权限在行政机构之上，是国家权力工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行政机构执行意志所赖以存在的组织；它可以按照自己的原则来解释议会通过的法律，或者偷偷地把这些法律埋葬掉；此外，作为所有政府事务的监督者，它可以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灌输自己的意志，因为它有权威而且是永久性的，而政府却不具备这些条件。财政管理部门的有关组成情况也不会宪法中提到，而实际上它能够像国务院修改和解释法律一样，修改和解释议会通过的预算；因为它掌握着国家的收入与开支。所以，对政府的命运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所有这些机构没有一个是“源自于人民的。”它们就是绝对君主制时期的国家机器，而在第一帝国时期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完善。当国王的头颅落地之后，实际的主权就转移到了国家机器之中。只不过，它躲避在幕后进行操纵，从不显山露水，而是远离大众，悄无声息……与其说它是国中之国，不如说是隐藏在民主国家旗号之后的真正国家。⁷⁹

因此，如何在结束革命并巩固成果的进程中培育、定型这一“真实国

家”，不仅仅是拿破仑最重要的任务，也显然是一项持久的功绩。

国家在社会中

与先前的君主政权相比，法国的国家功能在革命之后更加宽泛，权力抓得更紧。政府控制着大学和中等教育，并形成了一种中央集权的、严格筛选的精英培养体系，从而为国家输送行政官员和技术专家。⁸⁰拿破仑对天主教会做出了一些妥协（包括允许教会控制大部分初等教育），达成了和解。但是，由于教会已经失去了许多财产，而且牧师也领取国家薪金，因此，教会已经不再是旧制度时期那种独立自治的权力实体。同样突出的是国家的财政系统的变化：由于税收不再是由包税人或选举产生的地方当局来征收，而是永久地改为国家委派官员来负责，因此，财政收入就有了保障，在银行家的合作下，创立了法兰西银行，“通过以钞票形式来预付基金，为国家提供了重要服务。”⁸¹的确，拿破仑政权时期，法国的公共财政从来没有达到完全稳定。但是，新制度能够摆脱财政危机，与旧制度时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拿破仑能够没收金融家的财产，无视经济统治集团的抗议，而君主制国家则无法渡过1787年到1789年的财政危机，最终走向了崩溃。⁸²即便是面对最强有力的公民，现在的国家也具有潜在的优势。

此外，革命后的法国国家比以往更加直接地侵入到所有公民的生活中去，根本不考虑公民的意志。借用麦克耐尔(William McNeill)的话说：

法国革命者所做的一切，就是扫清那些影响单一国家控制中心调控人力物力的所有障碍。地方的特殊习惯和豁免特权被全面铲除……革命立法被编撰成法典并在全法国生效之后，公民个体所面对的是法兰西民族庄严的化身，就好像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不再有团体身份与角色的伪装保护……而事实上，公民所面对的只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不管他是特派代表、县长、收税官员还是征兵官员——他们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命令公民提供物资和服务，其规模要远远超出以前国王的代理人的要求。⁸³

国家领域的扩展效应给农村社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勒高夫(Le Goff)和萨瑟兰(Sutherland)研究了布列塔尼(Brittany)地区农民社区与

革命前后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出结论说：“革命前所未有地侵入到农民的生活中，而且往往不受欢迎。……1790年之后，中央政府要求公民关心国家大事、付出行动，并对国家忠诚，远远超过了旧制度下即将解体的行政机构的要求。”⁸⁴ 革命以前，只要缴纳赋税，而且没有发生重大的反叛事件，布列塔尼的农民就可以不受干扰，自己解决争端、维持秩序，自行处理社区关注的事情以及牧师关心的事务。牧师和国王的官员经常非正式地合作，上传下达，成为国家与社区之间的阶梯。革命时期，当地牧师先是被省、地区和社区当局搁置在一边，后来又正式成为国家雇员。政府希望当地民众能够拿出更多的资源与关注，投向那些由立足乡镇、胸怀城市的官员所领导的乡村之上的行政区划。此外，在革命最激进的时期，革命支持者为了获取粮食供应，强制征兵以及贯彻相应措施以惩处顽固教士、取缔天主教仪式，就公然地强制农民。

在法国的部分地区，包括布列塔尼和西部的其他区域，1789年之后的变化迫使农民采取行动，从组织当地的抵制行动，到开展游击战争，以至于参与大范围的起义，来反抗革命当局。如果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对革命的反应，目前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确立的地区，有产农民和当地城镇居民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就更有可能顺服革命带来的变化。在市场关系处于萌芽状态，或者农民自给自足的地区，农民非常积极，但在革命期间买卖土地的竞争中处于下风，那么，这些农民就不会顺从——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进行抵抗。⁸⁵ 最后，所有的反抗都被镇压下去，正是在我们所追溯的发展进程中，“革命把主动权从社区转移到政府中去，并同时把旧制度从来不曾享有的强制权力赋予了政府。”⁸⁶

革命期间，各式各样的经济强制政策以及极端的反对天主教的措施，导致全体农民社区以及农村地区反对革命。然而，拿破仑的解决方式却是放弃上述政策。新近巩固的国家管理机构，在加强税收和征兵工作的同时，在每个地区都努力与有产者实行和解。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包括富裕农民、城镇的出租人以及先前的贵族等，都经过有条件的选举而进入地方政府，与中央任命的行政和司法官员合作共事。⁸⁷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这就相当于从政治上软化了反抗领主起义的成就——破坏了残存着的富农与贫农之间以农村为基础的一致性。在这个过程中，富农的寡

头集团正式与贫苦的邻居们决裂，并凌驾于其上，而后与城镇居民和中央行政机构的关系日益紧密。也许更引人注目的是，这是以牺牲乡村的政治自治为代价的。谢波德(Thomas Sheppard)在追踪了普罗旺斯省(Provence)的卢尔马兰(Lourmarin)村在革命期间的变化之后，得出了完善的结论。他写道：整个19世纪，

如果说乡村会议没有实施任何计划的话，它也没有完全屈服于外在的权威。卢尔马兰的政治活力、乡村事务的广泛参与性以及公社对居民的持续关心，这一切都是卢尔马兰原始制度的特征。革命之后，一切活力都消失了，卢尔马兰成为19世纪……中央政府行政机器的一个齿轮。地方议会只讨论委派给它的事情，本身很少做出决议，它的作用仅仅是监督省长下达的法令的执行情况。卢尔马兰已经官僚化和集权化，但是这个村子为了现代化而付出了太多的代价。⁸⁸

然而，尽管法国农民——实际上所有法国人——不得不与革命后形成的一个更为强大、更富侵略性国家相抗争，这个国家显然不是像俄国和中国革命建立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无所不包而且强劲有力。法国革命结果的总体特色是，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国家，与相对较大的私有产业主和中小型私有产业主共同主导的社会互栖共存。在这种法国的新制度中，国家的目的并不是推进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反，它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运作，并保障建立在职业或官僚地位、私有产权与市场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此外，正如得到强化的国家现在能够更加自主地发展那样，私有的富裕产权阶级现在(至少是边缘性地)就更可能通过市场来追求经济利益，而不用通过购买国家官员或直接使用政治——司法机器去压榨剩余价值。

因此，尽管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革命的原因，也没有因为革命而急剧发展，但是，在革命所催生的相对适宜的法律和行政框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能够逐渐而稳步地扩展开来。1789年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法国变成了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即便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法国依然具有自己的社会和制度特色：经过几代人的现代经济发展，大量法国农民一直依附在土地上当雇农或者是小土地所有者；法国

的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动力,掌握着私有投资者经济机遇的生杀大权,并深刻地塑造了工业发展的地区布局。所以说,不仅是适宜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且那些使法国相对独立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模式,都可以从法国革命的主要成就当中追根溯源。事实上,法国革命就是一把“大扫帚”,扫清了领主制度与特惠权利等“中世纪的垃圾”——从而把农民、私有产权者甚至国家都从旧制度的桎梏之中解放出来。

注 释

1. 有关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简明解释,尤其可参见 Albert Soboul, *Classes and Class Struggl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17: 5 (Summer 1950): 238—257。对于这类解释的尖锐(而且是迄今最为著名的)批评,参见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and Cobban, *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0), pp. 90—111。

2. 参见 Gerald J. Cavanaugh, *The Present Stat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Alfred Cobban and Beyond*,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4 (Fall 1972): 587—606。

3. 例如, Norman Hampson 曾尖锐地指出, Alfred Cobban 的结论表明了“一种关于革命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解释”。请考虑 Cobban 在 *Social Interpretation* 中的这段文字:“革命在总体上并不有利于新生的资本主义渗透法国社会,而且基本上是阻碍了这种渗透。在这一点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目的。农村中的农民所有者,城市的律师、获利者和业主们,成功地抵制了新的经济潮流。特别是后者,借助于拿破仑的独裁控制了革命,从而巩固了他们的政权”(p. 172)。

4. 也许采用这种思路的最为重要的例子及其顶峰之作,就是: Norman Hamps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但是,这一趋势则始于 George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2 vols., trans. Elizabeth Moss Evanson (vol. 1) and John Hall Stewart and James Friguglietti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64)。

5. 当然,法国革命的经典阐释者之一。Alexis de Tocqueville, 就曾在下面这部著作中将国家置于分析的中心地位: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5)。

6. 参见: Cavanaugh, *Present State*, pp. 599—606; and M. J. Sydenham's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在这本书中,作者“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应该重新肯定政治发展……尤其是……新的民族主义信仰的兴起和试图把宪政权威与民众对权力的控制协调起来的努力……的重要性”

(p.5)。甚至 Albert Soboul, 尤其是在他的解释性论文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trans. Geoffrey Symcox,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中, 一再引用托克维尔的观点, 而且也关注国家的发展情况——尽管他的基本理论仍然是, 法国革命“标志着法国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p.1)。有关的实证研究, 参见本章最后一节论述旧制度时所引用的著作。

7. Cobban, *Social Interpretation*, chaps. 6, 8, 12—14.

8. 同上, p. 70.

9.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42—143.

10. Walter L. 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pp. 252—253; and F. Crouzet,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conomic Growths, chapter 7 of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ed. R. M. Hartwell (London: Methuen, 1967).

11. Henri Sé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Franc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 Edwin H. Zeydel (New York: F. S. Crofts & Co., 1931), p. 154.

12. Tom Kemp, *Economic Forces in French History* (London: Dobson Books, 1971), chaps. 5—6.

13. 同上, p. 12.

14. Alexander Gerschenkron, Reflections on Economic Aspects of Revolutions, in *Internal War*, ed. Harry Eckste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p. 188—189.

15. 同上, p. 190. 也可参见: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p. 142—150; and Kemp, *Economic Forces*, chap. 6.

16. 参见: Kemp, *Economic Forces*; Jan Marczewski, Som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France, 1660—195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2 (1961): 369—86; Jan Marczewski, The Take-Off Hypothesis and French Experience, in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ed. W. W. Rostow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3), pp. 119—138; Claude Fohlen, France 1700—1914, in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1), ed. Carlo M. Cipolla,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London: Collins/Fontana, 1973) pp. 7—75; and Barry Supple,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 Carlo M. Cipolla,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3 (London: Collins, 1973), esp. pp. 327—333.

17. 例如, 可参见: Soboul, *Short History*. 还可参见: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有关法国的部分。Moore 贬低那种认出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的观点(甚至还甚于 Soboul, Soboul 一直强调,从 1789 年到 1794 年,革命实际上是由民众造反推动的。)但是,Moore 却认为,革命的总体后果和意义在于,消除了自由主义和民主的障碍。他没有致力于探索革命同进也造成或强化了这些政治形式的障碍。

18. 引自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reprinted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p. 289.

19. Hampson, *Social History*, pp. 112—113.

20. 法律规定所有的子女都有平等的继承权。这一规定尤其是促成了农民的财产逐渐分割。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障碍。参见: Kemp, *Economic Forces*, pp. 103—104.

21. 参见: G. E. Aylme,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 2nd ed. (London: Blandford Press, 1968), esp. chaps. 1—2; D. Brunton and D. H. Pennington, *Members of the Long Parliam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 and Ivan Roo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00—1660*, ed. E. W. 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22. 特别强调这一观点的是 Lynn A. Hunt in *Committees and Communes: Loc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178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3 (July 1976): 321—346.

23. Alfred Cobban,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0), p. 118.

24. 同上, pp. 118—120.

25. 同上, pp. 121ff.

26. 有关对八月四日的解释,参见 Hampson, *Social History*, pp. 78—85; and Sydenham, *French Revolution*, pp. 51ff.

27. 有关在 1791—1792 年持续存在的农民动乱的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件尤其引人注目的事件,参见 Georges Lefebvre, *The Murder of the Comte de Dampierr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Jeffrey Kaplow (New York: Wiley, 1965), pp. 277—286.

28. 有关 1789—1790 年期间军队不稳的状况,参见: S. F. Scott,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3 (September 1970): 307—318; and Katherine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e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chap. 8.

29. Donal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21—31.

30. 此处引自 Hampson's *Social History* 第六章的注释部分, p. 132.

31. 参见 Francois Furet and Denis Richet,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Stephen Hardman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chap. 5.

32. 参见 Geoffrey Bruun, *The Balance of Power During the Wars, 1793—1814*,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 9: 250—274。而一位非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期间的欧洲国际政治也进行了尝试性地分析, 参见 Kyung-won Kim,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0)。

33. 参见 Ludwig Dehil, *The Precarious Balance*, trans. Charles Full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chap. 3。

34. 参见 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特别是 chap. 12。

35. 同上, 特别是 chap. 13。

36. 这一点由 Gwyn A. Williams 特别出色地发展了, 参见 Gwyn A. Williams, *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New York: Norton, 1969), chap. 2。

37. 参见上书, chap. 2, 3, 5; Rude, *Crowd*; and Albert Soboul, *The Sans-Culottes: The Popular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1793—1794*, trans. Remy Inglis Hall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72)。

38. 有关山岳党人独裁的概况, 除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通史之外, 参见: Soboul, *Sans-Culottes*; Richard Cobb, *Les Armees Revolutionnaires*, 2 vols. (Paris: Mouton, 1961—1963); and R. R. Palmer, *Twelve Who Rule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我将在下面的讨论中运用到这些资源。

39. 参见 Jacques Godechot,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rd ed.,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vol. 2, p. 34。

40. 参见 Donal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 124。

41. 参见 Colin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42. 引用自 John Ellis, *Armies i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97。

43. Sydenham, *French Revolution*, p. 187。

44. Scott, *Regeneration of Line Army*。

45. 参见 Rude, *Crowd*, chaps. 6—9; Moore, *Social Origins*, pp. 86—92; Soboul, *Sans-Culottes*, 特别是 pt. II 及结论。Moore 特别强调了山岳党派经济困境的农业方面。

46. 参见 Palmer, *Twelve Who Ruled*, chaps. 11—13; and Soboul, *Sans-Culottes*, pts. III—V 以及结论。Soboul 在民众运动与山岳派的政治矛盾方面特别擅长。

47. 参见 Sydenham, *French Revolution*, chap. 8, *The Republic of Virtue*。

48. Rude, *Crowd*, chap. 10.

49. Clive H. Church,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French Central Bureaucracy under the Directory 1795—1799*, *Past and Present* no. 36 (April 1967), p. 60.

50. Martyn Lyons, *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73. 在这一段论述中我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第 11 章。

51. 参见 C. H. Church, *In Search of the Directory*, in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500—1850*, ed. J. F. Bosher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3), Church 对督政府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指出了督政府的政治家们与权贵之间的紧张关系, 前者试图寻求后者的支持, 但并未获得大的成功。Church 的研究特别注意到了督政府的政治框架和困境, 我发现这一强调既令人信服又有用。

52. Lyons, *Directory*, p. 155. 同时也参见第 10 章全部。

53. 同上, p. 154.

54. Jacques Godechot,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France During the Wars, 1793—1814*,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 9, p. 298.

55. 关于拿破仑的政体参见 Leo Gersho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1933; reprint ed.,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4), pp. 375—381; 451—467; F. M. H. Markham, *Napoleonic France*, in *Franc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eds. J. M. Wallace-Hadrill and John McManners (London: Methuen, 1957), pp. 188—206; and Franklin L. Ford, *Europe 1780—1830* (London: Longman, 1970), chap. 8.

56. 关于大陆体系的困境参见 Kemp, *Economic Forces*, pp. 96—104; Gershoy,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chap. 17; and Dehio, *Precarious Balance*, pp. 132—180.

57. 我对这些军事发展的讨论来自于对大量资源的综合, 包括最重要的: S. F. Scot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1789—1793*, in *On Military Ideology*, eds. Morris Janowitz and Jacques Van Doorn (Rotterdam: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56; S. F. Scott,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3 (September 1970): 307—330; Ernest Barke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chap. 2; Theodore Ropp,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rev. ed.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chap. 4; 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59), chap. 4; and John Ellis, *Armies i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 4.

58. Scott, *Professionalization*, pp. 8—18.

59. 关于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法国官员队伍的总体变化参见 Scott, *Profession-*

alization, pp. 18ff.

60. 这一点具体请参见 Vagts, *History of Militarism*, p. 109.

61. Scott, *Professionalization*, pp. 45—47.

62. Barker,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pp. 42—43.

63. Vagts, *History of Militarism*, p. 111.

64. 转引自 Ropp, *War*, p. 116.

65. Vagts, *History of Militarism*, p. 126.

66. Gordon A.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27. 同时参见 Vagts, *History of Militarism*, chap. 4. 很明显(参见 Vagts, p. 128)在拿破仑统治末期,他在一些战术创新上后退了,但这并没改变这一事实,即是战争使得他们成为可能。

67. Barker,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p. 14.

68. In *Social Mobility* (Summary of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in *Past and Present* no. 32 (December 1965), p. 8.

69. 同上。

70. J. F. Boshier, *French Finances, 1790—17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02.

71. 同上, p. 313.

72. 同上, p. 305.

73. 同上, p. 287.

74. 同上, p. 309.

75. 同上, pp. 310—311.

76. 同上, p. 288.

77. Barker,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p. 14.

78. 拿破仑政府在如下这些书中有很好地描述: Godechot, *French Revolu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 2, pp. 47—51; Gershoy,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pp. 348—359, 451—467; and Ford, *Europe 1780—1830*, pp. 170—188.

79. Herbert Luethy, *France Against Herself*, trans. Eric Mosbacher (New York: Praeger, 1955), pp. 18—20.

80. 参见 Joseph Ben-David and Awraham Zloczower,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Systems in Modern Societies*, *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3: 1 (1962), 特别是 pp. 76—80。这里法国与苏俄一起归为一类,与英国和美国形成对比,是基于从法国和俄国革命中涌现出的高等教育体系所具有的高度集中化,培养技术官僚和国家导向的性质。

81. Godechot, *French Revolu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 2, p. 48.

82. Ford, *Europe 1780—1830*, p. 174

83. William McNeil, *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54.

84. T. J. A. LeGoff and D. M. G. Sutherland,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tany*, *Past and Present* no. 62 (February 1974), p. 96. 本段全都依据这篇文章。

85. 特别参见 Paul Bois, *Paysans de l'Quest* (Le Mans: Imprimerie M. Vilaire, 1960); Marcel Faucheux, *L'Insurrection Vendéenne de 179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64); and Charles Tilly, *The Vende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同时参见 Harvey Mitchell, *The Vendee and Counter-revolution: A Review Essa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5: 4 (Fall 1968): 405—429; and Claude Mazauric, *Vendee et Chouannerie*, *La Pensée* no. 124 (November-December 1965): 54—85。

86. Le Goff and Sutherland, *Revolution and Rural Community*, p. 109.

87. 因而革命的结果类似于旧政权试图在 1788 年建立的那种地方政府方案。参见第三章注 27。

88. Thomas F. Sheppard, *Loumar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a French Villa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p. 217—218. 我对引文的使用有一点诗化。严格来说, Loumarin 也许并不是一个“农民村庄”, 而是一个地方集镇。而且由于它位于 Provence, 在革命前它就已经有一个降低全体大会重要性的寡头政府。[参见 Loumarin, chap. 3; Albert Soboul, *The French Rural Commu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no. 10 (November 1956), p. 81.] 但是, 这只是强调 Sheppard 所说的革命带来的变化意义, 而且它表明: 相比之下, 法国其他村社的地方团结和自主性丧失得更多。

第六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

布尔什维克的伟大功绩并不是发动了革命，而是使革命缓和下来，并引导其走向共产主义。……其惊人之处是，布尔什维克成功地遏制了俄国大众走向混乱的乌托邦的基本动力。

——保罗·亚夫里奇(Paul Avrich)

俄国的社会革命是当代社会革命中最为彻底的一次。从1917年到1918年的短短几个月内，产业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群众性暴动就动摇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基，决定了沙皇政权国家机器的瓦解。此外，组织起来的革命者在革命危机中获得了领导权，并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俄国革命很快就催生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政党国家，并最终运用高压和恐怖等手段来推动民族工业化的迅速实现。为了理解出现这些后果的原因及方式，我们将要分析1917年3月以后，俄国革命的形势给相互冲突的各种力量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创造的可能性、紧迫性以及非现实性。与法国革命一样，革命形势中产生的两股基本力量相互交错，塑造着革命过程。这两股力量是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暴动和立足城市并力图建立新型国家组织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斗争。但是，与法国相比，俄国革命的危机更加急剧和混乱。在俄国，革命的国家建设者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更为危险，所以面临着更为紧迫的任务——首先要绝对地保卫革命，然后再实施国家推动的工业化。结果，俄国的新政权在政治集权化和城市官僚基础等方面大体上类似于法国，

但是,俄国政权是一党专政,在国家的控制下实现民族的工业化,这种动力导向与法国的新政权存在着质的差别。

让我们首先从1917年的革命局势开始,分析一下俄国革命的进程。

第一节 1917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俄国革命研究的历史文献中相当大部分(通常是褒贬不一)都是在争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能够摧毁(或者战胜)自由主义的“二月党人”的革命?从比较的阶段来看,此类争论似乎具有误导性。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法国革命中,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也难以胜利。当然,类似的制度也会存在几年。法国革命时期,自由主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阶段。而在俄国,几乎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自由主义制度等待其他人去推翻。原因在于,两次革命危机的渊源不同。1789年法国的革命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内存在着反对君主专制的基础广泛的政治力量。当君主专制陷入困境之后,自由派担当了全国和地方性革命团体的领导,并得到了民众真诚的拥护,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发动民众前所未有地参与政治,建立了自己的地位。¹与1789年的法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屡战屡败,最终拖垮了沙皇政权,因为这样——并且只有这时——俄国革命才会爆发。俄国杜马(Dumas)和自治局(Zemstvos)特别懦弱,不敢首先发动革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既没有经过任何全国性选举,又没有民众政治参与的基础。此外,法国国民议会在1789—1791年期间享有和平的有利条件,而羽翼未丰的俄国政权却不得不忙于战事,还要应付战争的消耗和失败等后果。毫不奇怪的是,既然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是这样发展的,骚乱和根本冲突就成为潜在因素,并很快就取代了暂时性的自由稳定的局面。

临时政府的困境

从1917年的2月到10月期间,从君主立宪党人到温和的社会主义

者,各式各样的政党领袖都试图以自由民主的形式来稳定俄国革命。由先前的杜马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任命的临时政府宣布他们自己为政府的首脑并接管革命,直到选举出制宪会议制定出新宪法。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和全国涌现出许多苏维埃(soviet),由产业工人、士兵以及农民(偶尔)团体选举组成代表委员会并周期性地改选。这些苏维埃声称拥有权力,可以监督临时政府的行为,还可以监督上层阶级统治的地区、各省自治局、地方杜马等与临时政府很快建立正式联系的机构。这样,沙皇的独裁统治就突然被两张由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取代了。²一张网络以临时政府的领导集团为中心,代表了大多数的特权人士、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专业人士。另外一张网络的中心在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代表着(主要通过社会主义政党的知识分子)一直被完全排斥在国家政治事务之外的人员。一开始,临时政府拥有着正式的权威并统治着俄国,领导临时政府的是非社会主义政治家;4月以后,领导团体就成为一个包括负责领导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等革命领袖在内的联盟。但是,不管是不是联盟,临时政府一直依靠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支持,以便在实施各种政策的时候获得工人和士兵的合作。这些人的合作至关重要,包括最重要的掌管着铁路的电报系统的工人以及守卫着首都和其他重要城市的士兵。

起初,几乎所有俄国政治上觉醒的民众都推崇自由主义的目标,为推翻独裁统治而欢欣鼓舞。³如果这一目标实现的话,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就不得不一起合作,致力于抚慰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战争创伤。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当问题本身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人们很快就发现,新生的自由主义体系在处理问题的能力上还远远比不上原先的独裁政权。

引发二月革命的那些问题仍然存在并且不断恶化。例如,铁路系统仍然不能同时满足供给前线、运送伤员、为城市运输食品以及为工厂输送原材料等多方需求。此外,二月之后,铁路工人经常性的罢工,地方上和垄断集团不断高涨的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铁路的资产和功效。上述行动增加了当局的困难,使他们难以利用铁路命脉来管理国家。⁴

而且,战争还没有结束。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前,历届俄国政府都不愿完全停止参与战争。自由主义的领导人赞同俄国同西方强国结盟,

他们以前之所以厌恶沙皇,大部分原因在于沙皇本人似乎不情愿发动战争。现在既然掌权了,他们就希望通过革命的民族主义诉求,使革命形势获得转机并赢得战争,从而既可以确保同西方的结盟,又能够在国内稳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热情不高,他们迫使自由主义者公开宣布放弃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目标。然而,他们不情愿放弃他们认为是相当合理的、反对中欧列强的自卫战争。此外,不管临时政府领导人的态度如何,由于全面战争的消耗以及长时间缺乏正常的对外贸易,到1917年俄国政府就已经破产了。俄国的西方盟国愿意为新政权提供经济援助,其条件是,俄国必须继续参战。

正当临时政府的继任领导集团竭力参与战事并保持国家的运转之时,俄国大众越来越对二月革命表示出不满。通过他们自身的基层集体性制度,民众开始增加手中的权力,削弱了现存统治阶级的利益。⁵前面我们注意到,在俄国广阔的内地,农民村社侵蚀了乡绅的权利,之后又开始侵占他们的土地。⁶与此同时,城市和前线也不断发生大众的暴动。工人的工厂委员会起初只是提出工资和工时的要求,之后又开始监督工厂的管理,设法为保障工厂的运作而获取原材料,最后完全接管了整个工厂。⁷士兵委员会最初的组织目的只是确保士兵的权利,实施人道主义标准以约束官员。这些委员会在实践中逐渐地篡夺了权力,可以否决所有长官的命令和决定,特别是那些可能会带来政治后果,或有可能涉及战场上生死存亡的问题。⁸这样,由群众组织定期改选的各种苏维埃,在经过一段时间温和的停滞之后,开始反映和支持下层民众的行动。同时,他们自身也更加直接地参与到原先由临时政府、自治局和杜马管辖的行政事务中去。⁹

临时政府完全没有权威和权力来阻止对特权集团的进攻,无法控制革命朝着无政府状态发展。二月革命之后,封建王朝的大部分行政机构,包括警察部门在内,都彻底瓦解了。试图通过自治局和杜马来重新建立行政机构的努力,因分散化的地方和区域性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而面临着巨大的困难。¹⁰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自由主义的代表机关缺乏真正的权威,因为农民和无产阶级等俄国大众以前一直受到他们直接的独裁压迫而与他们水火不容。现在,农民、工人以及士兵突然获得了自由,他们重新焕发了生机并形成了他们自身的基层集体身份。而且,这些集体

组织更容易诉诸直接的大众政治行动，而不愿意成为自由主义政府的下属臣民——特别是政府正处于危急关头，没有能力也不会倾听普通民众的疾苦与愿望。¹¹

临时政府也不会寻求诉诸于武力。因战争而不断膨胀的军队是官方实施强制唯一可以考虑的方式，但也越来越不可靠。¹²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会去镇压农民造反；城市里的形势是，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主要中心城市的卫戍部队就与工人们同仇敌忾。不论是面对假想的还是真实的反革命的威胁，只有在苏维埃的同意之下，才可以向军队发布命令。一段时期，前线部队比卫戍部队更愿意听命于临时政府。但是，到了7月，俄国入侵奥地利的企图遭到重创，农民革命在士兵的家乡如火如荼地展开，官员开始被怀疑具有反革命的倾向（不久被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发动政变的事情证实）。面对这一系列事态，前线部队也开始无法控制，士兵普遍开小差，军队开始解体。

总之，二月革命之后民众的暴动无情地扩展开来并不断加深，最终使得苏维埃对于临时政府的政策措施和行政管理的那种名义上的政治支持也消除殆尽，然后，持续不断地动摇了统治阶层和临时政府的根基。由于临时政府不情愿也不能够放弃战争，转而支持或制止农民反叛，所以，当社会冲突深入发展，骚乱在城市、前线以及农村蔓延开来的时候，它就没有逃脱使自己脆弱的统治基础最终瓦解的命运。

全国性政治秩序基础的有限性

实际上，如果我们透过政治形式的表面，从本质上来分析社会革命的根本动力的话，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从1917年夏天开始，俄国革命的真正困境并不在于应该由谁来领导。革命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能够担当领导？是否能够根本重建全国秩序？在某种程度上，重建秩序的社会和组织基础可以说是相当有限的。旧政权下的行政和军事基本结构已经解体，简单地复辟或者发动军事政变都不太可能成功（因此，科尔尼洛夫将军企图发动的政变几乎一发动就被忠于苏维埃的铁路工人、赤卫队以及士兵轻而易举地控制住了）。¹³相反，全国秩序复现的唯一希望就落在那些开始对于临时政府产生不满，并竞相发动群众以寻求支持的各个政党

身上。

对于潜在的民众支持力量而言,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是最不可能成为全国新秩序的有纪律的后盾。究其原因,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由于事实上村社(obshchina)的广泛存在,农民在1917年能自发地相互协调自身的、地方性暴动,以反抗地主、富农以及帝国官僚的残余势力。农民不能依靠城市革命力量的直接支持或者领导。并且,在没收了非农业土地和资源并重新分配给村社内部的小农生产者之后,农民就特别希望不受干预地管理自己的地方性事务,维持自己的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生产。农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关注纯粹是消极性和被动式的,如果某些政府的上台可能会恢复地主阶级的权益和/或会带来苛捐杂税和强制兵役,他们才会竭力阻止。

任何新型的全国性政治秩序的确立,都必须从城镇开始。城市中的产业工人阶级最容易被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的群众基础。的确,在整个1917年中,卫戍部队的士兵也是革命暴动的一个持续的源泉,因为他们不想被送到战争前线。但是,当他们造反的时候,军队各个单位就四分五裂,变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逃兵,因此并不足以成为重建新秩序的最初的基础。¹⁴产业工人也参与了造反,破坏了工厂既存的权威模式和城市中既存的政治制度。但是,产业工人由于生计问题需要维持工厂的运转,需要维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至少是最低程度上的可靠的经济流通。这样,当骚乱扩展开来的时候,他们也就越来越愿意与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合作,以遏制骚乱。

由于革命前的俄国已经经历了迅速而广泛的工业发展,俄国的欧洲部分就分布着很多工厂和工人的重要的中心,包括两个首都圣彼得堡(1914年之后改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行政和卫戍城市,并且彼此之间通过铁路和电报系统相互联系起来。¹⁵俄国的工业和铁路并不太发达,俄国的旧制度不能为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军事斗争提供保障,但却足以以为内战中任何一个竞争力量获得对全国核心地区的控制提供便利。如果一个城市政党能够发动产业工人并利用他们的支持,在沙皇独裁曾经统治过的地方建立行政和军事组织,那么,类似于全国性政府的机构就可以在革命后的俄国得到恢复。当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就。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为掌权而斗争

1917年春天和夏天,俄国的骚乱不断加深。在此情形下,只有布尔什维克这个原先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小、最极端的派别成功地操纵了局面并提升了策略的效度,获得了处于战略地位的民众的支持。临时政府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继续参战,对农民攫取土地的要求敷衍塞责,并且忙于整顿军队的涣散纪律,遏制工人对工厂的控制。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则整体上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不断地针对产业工人、卫戍部队以及前线战士进行批判宣传,迎合自发性的民众暴动的浪潮,要求和平、土地、面包、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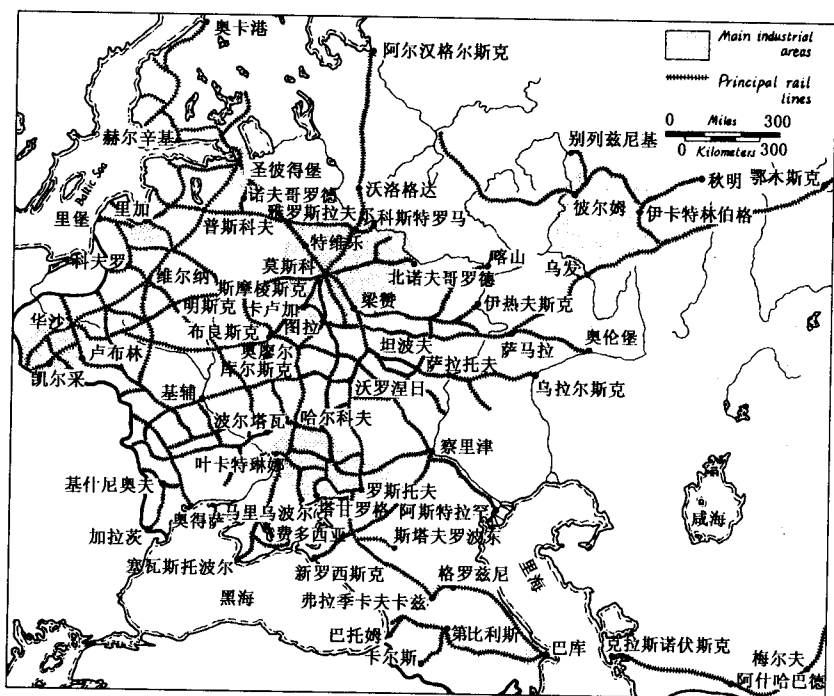


图4 欧俄地区的铁路与主要工业区:1917年以前

资料来源: Hugh 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780—782.

人掌权以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¹⁶ 这些策略让布尔什维克源源不断地吸收大批新成员，从仲夏到秋季，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又一个的苏维埃选举中获得多数。¹⁷ 最为重要的是，在彼得格勒附近地区，包括莫斯科、乌拉尔以及北方的军事前线地区的城镇和军队里，布尔什维克战胜其他竞争政党获得了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周边地区保持着相对的势力，而社会革命党人则控制着农业省份的城镇以及西部和西南部前线地区。¹⁸ 此外，尽管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纲领，但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他依然具备相当强的组织凝聚力，也更加贴近城市中心的民众的不满情绪。¹⁹

布尔什维克独自掌权的要求

“十月”在俄国革命中，不仅仅是临时政府的权力和权威被民众暴动彻底破坏的时刻，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正式甩开临时政府以夺取政权的最终阶段。布尔什维克是靠着逐步收拾俄国早已四分五裂的国家权力的潜在资源才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先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领导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在首都组织了军事政变。²⁰ 由于他们早已在俄国东北部各地的苏维埃站稳脚跟，而且反对政变的集团没有忠于自己的可以利用的完整军队，布尔什维克所遇到的军事反抗也很快就被制服了。²¹ 但是，获取国家权力是一回事，保持和运用国家权力则是另一回事。为了更好地掌握权力，布尔什维克多年间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家组织，并且把党员的忠诚、市民的支持以及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专家等资源，整合到一个能够控制并且保卫革命后俄国社会的集权化的政府。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面临着反对他们单独掌权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但也有一些苏维埃和工会，呼吁通过苏维埃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联合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后，还举行了早就计划好的基于普遍选举权的全国制宪会议的选举。11月和12月份，当会议代表聚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少数派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远远落后于农民大众支持的社会革命党人。而且，全国还有许多民众明显支持通过制宪会议建立自由民主政府，绕过了苏维埃，使布尔什维克政

变的成就化为乌有。

毫不奇怪的是，尽管党内发生了相当大的论战，布尔什维克最终还是被列宁说服，不放弃政变的成果。布尔什维克认定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和领导，着手保持并拓展它的统治，从而巩固、保卫俄国革命。在一小部分赤卫队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制宪会议，并且还运用各种操纵手腕和强制措施，消减并最终清除掉了孟什维克和其他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的影响。表面上是由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组成了一个新政府。但实际上苏维埃的一切事务越来越集中到执行委员会手中，而这个委员会是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或干预下“选举”产生的，并且负责贯彻由党所支配的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行政决定。²²

当然，在所有一切事务之中，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小心谨慎，还要使用各种政治手腕，因为最初他们权力的不断上升完全依靠党员的忠诚和战略要地民众的支持等综合资源。这样，当布尔什维克致力于削弱竞争对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十分小心，以避免过多地脱离群众的支持。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他们立即表示支持农民没收地主财产的要求，宣布愿意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并且颁布由士兵选举军官的命令，废除军队的军衔。他们甚至一度容忍工人控制工厂。²³ 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民众运动都有利于摧毁旧政权中统治阶级残留的财产基础。这些运动同样也动摇了竞争党派残存的制度基础——比如像工会这样一度由孟什维克控制的组织。

通过中央集权的强制性措施而获胜

这样，在十月革命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布尔什维克继续支持无政府形式的群众暴动。但是，既然他们要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不得不继续斗争以维持和加强对政权的控制，这一逻辑就要求他们重建行政和军事组织，并在党内加强集权化的纪律。1917年夏天，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描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图景，在这种政权下，常备军队和官僚机构全部被废除，全体人民通过工作轮换和选举随时可以撤换的代表来实行直接统治。但是，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俄国的条件之下，列宁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顶多是未来的乌托邦。随着社会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军

队的彻底解体，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中处于比原先的政权更加糟糕的境地。此外，1918年德国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1918年3月，俄国经谈判后提出妥协，同时中欧列强也在西线遭到失败。就在上述威胁减退的时候，以沙皇军官为基础的反革命政权在西伯利亚和南方地区卷土重来，西方的远征军又散布在俄国的欧亚边缘地区试图进行干涉。为了对付他们面对的巨大困难，布尔什维克迅速诉诸实施有组织的强制——运用赤裸裸的国家权力这一最后的手段。并且很快地，他们强制的矛头，不仅仅针对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而且为了恢复俄国社会秩序和政府规则而对准了革命大众。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很快就组建了一个政治警察组织——契卡(Cheka)。契卡是一个地位特殊的独立的行政机构，主要负责运用各种必要手段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颠覆活动。契卡武装人员并不归苏维埃当局甚至一般党员管辖，而是只听命于党中央的领导。一份官方文件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地写道：“契卡的行动是完全独立的，可以任意实施搜查、逮捕甚至处决，然后向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²⁴当然，契卡最主要的活动是对苏维埃政权的那些实际或可疑的政党和阶级敌人实施当场逮捕、囚禁，或者即刻处决。但是，它也变成了贯彻全国行政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特别是用来推行国家新政权管理经济活动的决策。正如钱伯林(William H. Chamberlain)指出的那样：

如果不运用恐怖的手段，在那些时期内，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在俄国生存下去……国民士气已经由于一战的失败而彻底瓦解。除非受到极端强制，没有任何人愿意履行对国家的义务。旧秩序已经崩溃；包含着新的习惯和行为准则的新型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通常情况下，不管是哪个政府代表，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代表还是白军军官，要想让别人听从他的命令，就只有挥舞手枪。²⁵

这样，如果红军或者城市中心需要给养，契卡组织就会到农民那里去强行夺取；或者，如果城市当局想要实施配给制度，契卡就会逮捕并处决某些“投机分子”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或者，要是战略运输中心或行政机关的工人表现出与红色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契卡就会杀鸡给猴看，逮捕并处决首要人员。

在上述情形中,如果契卡无暇顾及或者需要更多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就会组织工人委员会和红军支队提供暴力支持。布尔什维克继续依赖基层民众的集体力量,显示出它希望在需要民众支持的时候,能够获取热情参与以巩固新秩序。因为,产业工人是最有组织、最容易支持共产党的力量,所以经常参与布尔什维克的事务。由于布尔什维克到农村去寻求供给,所以也试图组织贫苦农民反对地主富农以支持城市新政权。²⁶然而,总体而言,自给自足并相对以村社为单位而团结起来的农民,并不可能被整合到新政权的革命基础中去。而且,农民依然占俄国国民的大多数,农业经济产品对于城市人口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布尔什维克不会放任农民支配其新近获得的土地,按照自身的意愿发展。相反,新政权采取了很多途径来吸引,必要时还强迫农民的参与。这样,农民自身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很多困境,其中最早的形式就是红军扩充队伍以进行内战。

与1793年的法国革命军不同的是,面对着因厌倦了战争而对民族主义的号召无动于衷的民众,俄国红军不得不白手起家。²⁷1917年的夏秋时节,旧政权军队的正规部队,特别是受到布尔什维克宣传至深的那部分部队,迅速瓦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年的失败和创伤之后,抗击德国、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口号已经没有多大效力了。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尔什维克与民族主义的群众动员无缘,而且不得不接受割让俄罗斯帝国领土的条件。²⁸巩固诞生于一战失败中的革命的紧迫性使得俄国领导人(在1917年到1921年期间,实际上直到二战结束之前)采取了退却-防守型、几乎没有扩张意识的姿态。²⁹

首先,到1918年中期,保卫革命、抗击反革命军队的任务主要落在工人赤卫队、偶尔忠诚的军队以及急于保卫家园和土地的分散的小股农民武装。³⁰对处于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城市中的共产党高层领导来说,这些自发的、分散化的防卫行为似乎没有价值。如果不遏制住这种分散化的趋势,未来内战的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反革命的胜利或者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俄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相互竞争,四分五裂(可能已经是这种状况了)。正如埃利斯(John Ellis)指出的那样:

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攫取了国家权力,接管了政府的许多行政机构,在他们的声誉没有被彻底摧毁之前,他们不会因为白军的进攻

而撤退到内地去。获得了国家权力之后,他们就不得不竭力去维持权力。为了这一目标,布尔什维克就必须以最短的时间来创建庞大的军队。而这样庞大的军队必须要由农民组成。³¹

在军事委员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在列宁和党中央的支持下,一支专业化的、纪律严明的、中央集权化的红军建立起来了。³²红军颁布了义务兵役条令,并开始小心谨慎地在忠诚的产业工人中实施,随后扩展到厌倦了战争的农民中去。最后,到1921年时,红军达到了五百多万人,其中农民的人数占到五分之四。³³这样,为了把那些没有文化、相当不情愿参军的人很快训练成有效的战斗力量,红军就完全恢复了传统军官的纪律特权,甚至包括可以枪毙士兵。由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人员组建的军事部,掌握着所有战场行动的指挥权力。并且,尽可能多的沙皇军官被吸收或强制加入红军队伍,并被赋予与其军事技术(假定他们是政治中立的)相称的军衔和权威。³⁴因此,一年之内,布尔什维克就颠覆了他们为了推翻临时政府而一度鼓励的革命——民主措施,回复到职业化、官僚化的军事组织的原则上去。

托洛茨基为红军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党的控制系统,这样,就不仅成功地把那些不情愿参军的农民、政治上不可靠的沙皇军官以及革命军队的散兵游勇聚合起来以适应需要,而且把这支武装转化成为受中央控制的、高效的军事组织。军队中的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监督并保证军事“专家”的忠诚;全心全意的共产党员(党员和工人)组成的分队散布在农民当中,以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同样关键的是,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都直接服从党支部或政委的政治行政的纪律约束和调遣,以消除自发的、不协调的政治行动。

这样,军队中就逐渐形成了控制所有政治行动的集权化机制,……这种机制本身又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反过来,党中央通过下属的各个分支的政治部门来控制政委和所有单位的政治行动。³⁵

1918年到1921年间,红军为共产党政权完成了两项根本任务。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是,红军击败了反革命的军事威胁。红军大致上是依照当时军事原则的惯例作战的,并且利用了内线作战以及掌握着俄国欧

洲部分的铁路与城市等优势。此外,红军要比白军更得民心——包括大多数农民边际化的偏向,如果没有这些支持,俄国革命在内战中肯定无法得到巩固。红军和白军都竭力强迫农民参与内战并且压榨他们的资源,但是,无论农民多么厌恶他们,他们最终还是害怕(尤其是在俄国的核心地区)白军的胜利会让他们推翻的地主卷土重来。³⁶

红军完成的第二项任务是:即当白军屡遭重创之后,红军逐渐发展成为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继续实施集权统治的牢固的基础。应征入伍的民众已经被整合到职业化的共产党统治的结构中去。非正规的军事组织——如无产阶级赤卫队、农民游击队等都遭到遣散并吸收到红军中来。最终,那些不能够被红军吸收改造的武装派别,如乌克兰的马赫诺(Makhno)农民游击队,就被击败、摧毁。³⁷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内战期间,俄国还建立了官僚化的、共产党监督之下的民政机构,国家对整个经济的控制越来越集中并且延伸到每个层面。民政事务机构的发展类似于红军扩充军官的方式。由于先前旧政权的官员和职员具备稀缺的技术,他们就被保留下来或者重新雇佣。名义上,这些技术官员是受苏维埃的监督,实际上受到散布在他们之中、之上的政党干部(比例很小)的控制。³⁸

迅速恢复的国家机器比以往承担着更多任务,尤其是经济控制和行政监督的职能。在1918年到1921年间,农民和工人阶级起来反对私有者,内战期间经济崩溃造成了城市和军队供给急需,还有一些党的干部不切实际地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动人前景。这些环境因素相互结合,催生了一种叫做“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的制度:“在此制度中,国家充当了唯一的生产者和分配者的角色,国家指导和组织之下的劳动是义务性的,实行实物分配,人民基本上不再需要和使用货币。”³⁹

随着这种制度的诞生,工人控制的工厂就成为直接的牺牲品。⁴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注意到,工团分子控制生产只能加重经济的动荡。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就采取行动将许多关键性的工厂国有化,并把工厂的控制权转交给与工会合作的中央行政机关。在清

除了工会内部孟什维克的影响,并以共产党员填补了空白之后,布尔什维克就用工会来取代那些最初从资本家和经理手中夺取到工厂的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反过来,工会又把管理权力交给了苏维埃行政机构任命的厂长们(往往是以前的那些“资产阶级”经理)。大型工厂里的这种制度永久地维持了下去,直到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的其他特殊制度被临时取消之后,这一制度基本上还继续存在。

共产党试图彻底取消市场机制,并通过国家命令指导生产和分配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做法只适用于内战的紧要时期。借助于恐怖的手段,共产党实行了很多措施,包括强制性地攫取农民的剩余产品,实施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及最终实行军事化的劳工管理等等。这些措施能够也的确有助于红军的胜利。的确,在一度时期内,尽管心存不满,但大多数人民都不愿意支持白军,因为后者不但跟共产党一样凶残,而且还是反革命的。但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俄国迅速崩溃、萎缩,比一战期间的情况还要严重。⁴¹在打败白军之后,新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发现,必须且有必要暂时放弃国家全面控制经济的措施。到1921年,新政权马上面临着工人们改善饥饿生存状态、提高工资、减少强制劳动时间等要求,以及农民们普遍的反对征收余粮的暴动。⁴²相应地,共产党领导一方面小心地维持他们的政治独裁并强化党内纪律,另一方面,适当让步并采取了一种“新经济政策”,允许恢复农业部门的市场调节以及中小型工厂和零售商业中的私人创业。在战争和内部斗争结束的情况下,到1925年,上述政策促使俄国的经济和人口基本上恢复到了一战前的水平。但是,恢复期间,大型的工厂和对外贸易依然处于党中央的控制之下(与1793年之后法国的雅各宾派不同的是),这使得共产党在国民经济中具备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利益。⁴³

从各个实践性目的来看,到1921年为止,共产党政权在工厂中的组织背景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基础所剩无几的东西。套用查连德(Gerard Chaliand)精辟的话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但是工人阶级本身却实际上解体了。”⁴⁴的确,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最初吸引了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工人的自发支持。但是,内战浪费或耗尽了布尔什维克最初的无产阶级支持者:有些从饥饿的城市散布到了农村地区;有的牺牲

在武装保卫革命的战争中；还有一些（就像 1793 年法国的无套裤汉一样）获得升迁，从工厂的工人变成了胜利之后共产党政权的官员。许多出身农民的人成为新的工人，填补了 1917 年无产阶级的位置，但是，在日益官僚化的坚如磐石的共产党政权中，他们几乎不可能具备政治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基础，也不会成为民主制衡力量。1921 年之后，革命新政权的面貌就取决于党的领导集团如何在俄国社会中运用国家权力。

第三节 斯大林主义者“自上而下的革命”

内战结束后立即实施的“新经济政策”（NEP）最终证明并不是俄国革命的稳定结果。到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新经济政策就让位于完全集体化的、行政官僚主导的社会，并在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指导之下，朝着迅速重工业化的方向发展。最初那些具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民众发动了革命，然而革命的结果却是这样，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就非常必要。首先，我们必须考虑新经济政策固有的矛盾，然后，还要了解从旧政权中继承下来的条件以及内战期间遗留下来的政治习性。所有这些因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共产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走上了农业集体化和加速重工业化的道路。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新政策下的各种混合制度有效运转——经济得到了恢复，人口持续增长。但到了 1926 年，种种困难的出现显示出采取根本的变革的必要性。而最严重的困境就是，羽翼未丰的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

农民的矛盾

到 1926 年，俄国工业的资本投资已经大致上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投入另外的资本与人力，它仍然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以供应农民生产者大众的消费需求，也不能为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而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⁴⁵相应地，除非农民能用出售粮食和原

材料的收入,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工业产品,否则,他们也不会增加农业生产或者上缴现有的余粮来供养城市、补给工厂。由于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存在着的特殊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农民具备积蓄的力量,也就是说,对国民经济的成败作用关键。1914年以前,大贵族和富农在粮食市场中占有很大部分的比重;1917年农民革命之后,这种现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实际上只存在着小生产者,其中的一大部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些小生产者的人口总数在1920年以后不断上升,要是自己选择的话,他们就不会把粮食放到市场中去。他们要么囤积居奇,要么用来供养家庭成员和喂养牲畜。⁴⁶

俄国农民革命给农业带来的后果,与法国农民反对领主暴动所造成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差距值得我们关注。⁴⁷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前工业阶段的农业国家,特别是许多农民通过市场与当地城镇交换产品,市场的相对参与程度比较高。⁴⁸确实,农村公社内部的社会政治的凝聚力足以鼓励农民来集体反抗(1798年的暴动)领主以及其他外来的想霸占农民剩余粮食的人士。但是,公有化的形式并没有阻碍或者减损法国农民私有产权和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倾向。这样,法国农民革命废除了封建领主的特权,但是没有没收或重新分配大部分的私有土地,不管是属于非农民的地主,还是属于富裕农民。而且,尽管许多村社保留了对个人使用土地的限制,但是革命却削弱了那些限制并助长了个体耕作的长期趋势。革命后法国农业经济的特色是由中型、小型甚至极小型的个体业主组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从整体来看,农业生产者习惯性地参与市场的活动并不比旧政权时期少,甚至要积极的多。一个主要的后果是:革命之后,尽管没有国家的积极指导,尤其是没有积极地干预农业生产,法国工商业经济依然能够持续增长,虽然步伐缓慢。

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与法国不一样的是,俄国的农民革命没收并重新分配了私有土地,在总体上处于贫困水平的条件下平分农民的地产,并且加强对个体事业不利的集体控制。⁴⁹其结果是,俄国农业的生产者总体上与1917年前相比,更加不愿意参与市场。而且,由于小农生产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更大,以至于严重威胁到任何市场导向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更不用说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计划)。

新经济政策最初推动了国民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极度萧条中恢复过来,之后它注定要面对一系列的经济矛盾,这是俄国农民革命所产生的特定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问题的本质很简单:没有相当适宜的经济刺激——即,苏维埃的工厂不能生产出大量廉价的消费品,农业生产的价格也非常高,而苏维埃当局又不允许农民提高价格,因为当局的既得利益驱使他们操纵贸易差价以有利于国家主导的工业发展——俄国农民自然就越来越少地参与到国民经济中去。实际上,整个20年代,粮食的市场销售比例一直都比1914年以前低得多,并且到1927年为止,农民通过市场销售粮食特别少,以至于导致了局势的危机。⁵⁰

在任何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运用政治组织手段都无法说服农民上缴余粮,更无法引导农民采用新型生产方式。因为,政党、苏维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在农村社区中立足不深,影响肤浅。⁵¹由于布尔什维克是通过城市暴动和常规战争来夺取国家政权的,其间,他们并没有渗透到农村去,也没有在农民中成功地培养那些具有相当影响且对党和苏维埃忠诚的政治领导力量。此外,整个20年代,依靠市场机制来促进农业生产恢复的措施,只是有助于相对富裕的地方农民领袖的产生,而他们又天然地反对在农业中实施政治动员的所有政策。因此,在农民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危机关头,苏维埃政权缺乏任何可靠的地方政治手段,来接触、重新组织以及重新疏导农民。农村地区中的地方苏维埃和(或)党的干部数量很少。而且,从政权当局的角度来看,他们要么是不可靠的(比如说,他们是市场导向的富裕农民),要么在其邻居中没有政治影响力(比如,他们是年轻贫穷的农业劳动者,由于高层的行政命令而被“选拔”或任命为地方官员)。

然而,如果苏维埃政权再次诉诸战时共产主义的那种粗暴的、强制型的征集制手段,同时却放任小农生产者和农村公社来控制农业生产,农民的反应就仅仅是,种植的越来越少,囤积的越来越多。确切地说,1927年之后,上述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粮食投放和销售的严重不足,促使当局运用行政力量来干预,结果导致1928年和1929年农业减产。⁵²这样,农民拥有小规模财产,实行村社集体化自治,主要倾向于维持生计;而政党国家又对市场力量不信任,急于扩展国家主导的工业,但在农村缺乏坚

实的政治基础,这两者之间紧张的共处关系,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础。随着城乡矛盾逐渐对立起来,新经济政策体系发展到了危机深化的阶段。

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的实施

俄国的形势需要实施关键性的政策,但究竟何种政策才可以促进发展?为此,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和政策斗争交织在一起,严重地影响着事件的进程。⁵³在为人们所熟知的“右派”中,布哈林及其同盟主张,为了诱导农民种植和销售更多的农产品,必须增加低价消费品的工业生产。另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主要采纳最初由遭到失败的托洛茨基“左派”所提倡的政策,并逐渐摸索出了另外一套办法。这套办法最终导致对重工业的大规模持续性投入,与之相伴随的是行政强制下的农业集体化,以强迫农民种植、上缴粮食,并为城市工业的急剧扩展释放剩余劳力。斯大林政策最终胜利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共产党国家与农民在粮食征收问题上发生冲突所产生的绝对推动力。然而,就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所提出、争论的分歧巨大的政策而言,与布哈林相比,斯大林逐渐成型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苏维埃领导成员的赞同。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的措施(其最终的结果并没有为世人料到)似乎是一条运用共产党国家的能力来解决俄国经济困境的捷径。⁵⁴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斯大林的方法似乎更具有广阔的前景:

首先,这种途径目的在于通过自力更生而迅速提升俄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水平。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被设想为只有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才可以实现,而且还在于,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敏锐地意识到,西欧不可能立即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得不在“一个国家中”维持发展,也只好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发展。此外,苏维埃俄国同沙皇俄国一样,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国家体系,容易再次卷入战争。所有的俄国领导集团都不会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遗漏扩军备战问题;在这一方面,斯大林力图推动重工业的迅速发展的战略,就比布哈林的主张更为有利。因为,如果布哈林的主张能够付诸实施的话,必然会导致俄国经济极其缓慢地增长。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就只好袖手旁观,放任市场力量、消费

需求以及轻工业的扩展来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步伐。⁵⁵

与布哈林截然不同的是，在充满军事意味的发言中，斯大林号召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国家回到内战时期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中去。这就是他的战略(包括最终采用了压迫农民的手段)之所以能更加吸引当时的政治精英的第二个原因。在内战中诞生的党和国家组织，依然由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领导着，他们对于在激烈战斗年代中的丰富多彩的体验津津乐道，非常适应且自然也就特别赞同斯大林所提倡的行动主义立场。发动以城市为基础的党和工人队伍进入政治上敌对的农村，夺取粮食并且改造农村公社，这正是在不久前的英雄年代中那些夺取胜利的人的行为方式。此外，这不仅仅是个人记忆和爱好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共产党国家本身的结构形式，就使得它必须采取从农村外部强行施压的方式，来施加对农民的政治影响，而不是从内部改造的方式着手。既然可以运用的政治组织手段已经限定，那么，新经济政策在危机关头的现实选择可能就是两个极端：要么放任农民，要么对他们发起“进攻”。从1929年到1935年，当开始推行集体化的时候，共产党控制的城市行政人员和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就完全采取了攻击的形式，来对付不知所措、顽固抵抗的农民。⁵⁶毫不奇怪，许多这样的苏维埃干部很容易就响应斯大林的号召，重新采用内战时期的措施，从而积极(而非消极地“撤退”)地应对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革命危机。

当然，最近这次任务并不是要打赢内战，而是要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斯大林主义的战略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组织能力和谐一致，但是它能够实施的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共产党国家建立在从革命前时代延续下来的经济条件之上。斯大林的战略之所以最终成功地突击完成了重工业化的进程，⁵⁷明显得益于早已大量存在的重工业基础(当然，这也是共产党权力关键性的组织基础)。如果苏维埃俄国所继承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发展良好的消费品产业，农业部门又相当繁荣和商业化，就足可以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那样的话，布哈林的战略就具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在现实情况下，上述条件都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布哈林的方法根本不可行。⁵⁸斯大林的方针实质上意味着，当共产党国家致力于推动俄国经济发展之时，所有的赌注都押在发展国家控制的重工业

上面。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性非常简单：国家“要以最小的成本征收农业产品”⁵⁹，而不会从农民的生存与富足或农业生产效率等角度来看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整体来看，集体化可能并没有真正提高从俄国农业生产中获得的剩余价值。⁶⁰但是，它的确使国家在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控制活动迅速扩大。农业集体化之后，党对农村的政治控制得到了巩固，这跟1921年之前城市中的情形一样。国家也不再用市场引导或自由放任的政策来讨好农民了，因为农民再也不能向国家的征收机构隐瞒哪怕是最必须的产品（特别是粮食）了。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农村的政治控制之后，苏维埃俄国的重工业就开始在旧政权遗留的基础上起步，并且能够以相当迅速的步伐发展起来——当然，只要统治者准备付出沉重的人力代价。

第四节 新制度

在1928年之后的几年中，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和斯大林式加速重工业发展的政策得到贯彻，俄国革命后果的基本模式就明确定型了。那么，俄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是什么？以我们已经掌握的革命原因和发展动力来看，这种模式有什么样的社会学意义？

革命后社会中被强化的国家

确切地说，新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复合体系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且要比沙皇政权权力更大，范围更广。数字统计就足以能说明问题。通过对革命前后“国家行政机关以及警察和司法体系的人员——军队人员另计”的统计数据比较，艾丁(Alf Edeen)估计，1897年人员总数为26万，其中的10万5千人属于警察系统；而到了1929年，俄国的行政疆域要比1897年大为缩小，但是工作人员却增加到39万人，其中的14万2千人隶属于苏维埃警察机关。⁶¹爱德华·卡尔(E. H. Karr)所提供的苏维埃统计数据则显示人数更多。⁶²当然，1897年距离旧政权的崩溃还有20年，在苏维埃接管政权之前（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前),有关人员的数目肯定还会增加。但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沙皇统治时期,国家工作人员的扩张趋势并没有达到1897年到1929年的程度。除此之外,艾丁对于1929年工作人员的估计还没有把因革命而接管了工业企业所增加的国家雇员包括在内。更不用说伴随着20年代到50年代国家推动的急速工业化的进程,厂长、技术人员、党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通过各种渠道为苏维埃政党国家服务的人员的数目增长。大体而言,上述扩张似乎达到了五倍以上,而同期俄国的人口才仅仅增长了三分之一。⁶³这样,国家行政机关庞大而持续的扩展就成为苏维埃体系的特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与原先官僚化的、政治包袱相对繁重的沙皇政权相比,1921年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本质上具有更大的政治负担;二是由于20年代中期以后,苏维埃国家通过更加直接的行政手段来推动工业化更迅猛地发展。

苏维埃国家不仅越来越庞大,而且能够完成更多的社会任务,而不必过多地关注社会中的反对力量,就连沙皇独裁都难以想象。这里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取代了沙皇及其随从人员的网络,并把它转化成为协调所有国家机关的代理机构。⁶⁴最明显的区别是,党的成员更多,分布网络更广泛。布尔什维克是由完全听命于党的高层领导并按照等级次序排列的干部组成,这样就比沙皇政权具备更有效的中央协调能力。此外,尽管到30年代中期,党员与行政、技术岗位上的精英部分地重合,但是,苏联共产党一直试图通过不断地吸收新党员作为激励,希望至少能够吸引社会生活各个行业中的部分人员。⁶⁵

这就涉及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苏维埃政权比沙皇政府本质上拥有更大的权力?沙皇独裁统治之下,有组织的代表和社会团体(比如说自治局、教会、村社)尽管隶属于国家权力,但是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行政管理,沙皇政权对此也比较满足。相反,共产党则力图通过中央执行机构密切联系群众,并把各行各业、全国各地的人民都整合到党领导下的国家体系中去。⁶⁶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包括地方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居委会等在内的各级代表和群众组织加以实现的。这些组织把民众聚集起来并促使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并把群众置于一定的领导之下,而这些领导人员(事实上或正式地)是由上层当局特别是党的领导人任命并对其负

责。为了强调这些组织在联系行政当局和群众的反应以及在贯彻国家政策中的作用,研究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有关人员把它们称作是“传送带”⁶⁷。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这些组织的确使得苏联的政治领导人(至少是潜在地)能够比沙皇政权更为直接地、持续地与民众的情绪和状况保持接触。

在革命化的社会中,贵族、沙皇官员、资产阶级等的特权都被废除了,而苏联政党国家广泛而强大权力的确让它站稳了脚跟。1917—1921年的民众暴动与1918—1929年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一起完成了彻底清除(从结构的角讲)贵族的地位以及他们各式各样的令人害怕的政治特权和地产等任务。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私有产权和对各类工商企业的控制,也同时遭遇到了灭顶之灾。这些特权阶层被彻底清除之后,一个直接的社会效应就是,许多提高社会地位的新机遇向出身卑微的苏联公民开放了。⁶⁸尤其是在整个20年代,红军和党的领导人主要是从产业工人和农民中培养起来的。30年代存在着从在在职的非党员精英中吸纳党员的趋势。然而,由于国家指导下工业部门的急剧发展所造成的对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迫切需求,为各种社会背景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人们可以直接通过工业部门或者党的渠道或者通过国家资助的中级和高级教育系统获得升迁。诚然,由于内战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以及30年代对现存精英的残酷清洗,苏联社会中的升迁几率一度膨胀,但此后呈现下降趋势。然而,1921年之后,诸如接受教育和社会流动等各种机遇向更多的人均等开放;而在旧制度中,只有贵族和富裕阶层才拥有法定的或实际上的特权与机会。总体上也可以说,到30年代中期,苏联公民所有的义务和权利(就像其本身那样)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就是说,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一点在旧制度的政治司法体系中从来没有完全实现。

工人和农民的命运

然而,为了深化对俄国革命后果的认识,我们就必须澄清几点言过其实的东西。我们先考察一下农民和工人的状况。在表象层面上,俄国社会的确要比沙皇政权更为平等和民主。然而,1928年之后,苏维埃政权

下的城市工人和集体化之后的农民的总福利则事实上没有得到提高，其社会政治的自治程度也没有改善——即便是依照旧制度中的低标准来看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跟20年代相对适宜的条件对比了。

1928年以前，苏维埃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要得到政府当局的许可，而且还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工会本身拥有参与企业管理并代表工人就工资和劳动条件等问题进行谈判的权利。但是，在实施强制性的加速工业化之后，单个企业的厂长由国家任命并受党的监督，他们在工厂中拥有绝对的官方权威。工会在“雇佣工人、生产计划、工资级别的制定、产品指标的确定以及劳动时间的变更”等问题上不再有任何影响。⁶⁹ 工会的任务转变为，“接受上级指示之后，重点组织、动员工人完成生产计划”⁷⁰，这样，俄国的工人就受到比现代工业化的任何阶段都更为直接的和强化的督促。苏维埃工会虽然还保留着管理某些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权利。但是，在推进工业化的最初期间，分配到工会手中的资源微不足道，因此上述权利对工人的一般福利几乎没有影响。实际上，由于社会福利是稀缺的，特别是由于工资水平一直很低，而生活必需品价格又很高，30年代早期工人的生存状况明显恶化——甚至低于1914年之前的标准——之后才又缓慢提高。⁷¹

随着农村集体化的来临，俄国农民失去了他们自己家庭耕种的土地以及农村公社集体的政治自治。⁷² 大多数农民组成了集体农庄(kolkhozes)，在集体农庄中，除了家庭的花园之外，所有土地都实行集体所有、集体耕作，农庄的首要任务是种植某些具体的农作物，并以固定的低价按照预定的产量上缴给国家征收部门。农庄制度是由大都出身于城市阶层的国家官员强制实行的，他们是由共产党国家任命并且很忠诚。这些官员不仅包括集体农庄的管理者，还包括与农机站有关的各类官员和政治代表。苏维埃政府设立农机站是为了把农业机械租赁给集体农庄的各个团体，这些农机站同时也是监督农民和攫取农业剩余的国家机关。

为了给重工业发展提供财政支持，苏维埃国家加强了对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的剥削：国家以很低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并以很高的价格销售给城市居民，这种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就是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⁷³ 然而，集体农庄的农民比工人的遭遇更惨，他们享受不到固定工资的保障

(尽管很低)。只有在完成国家任务之后(以及扣除将来生产所需),农民才能依照剩余中的个人份额来获取报酬。因此,农民的收入就随着收成的好坏而波动——这样,比如说,在30年代早期,强制集体化的实施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因此,在政府征收部门夺去了农民维持生计的口粮之后,数以百万的农民只有忍饥挨饿。⁷⁴此外,农村地区的社会服务严重欠缺,如果有的话,也根本无法与工业中心城市相比。毫不奇怪,俄国农民从来没有充满激情地接纳这种农业“集体”形式,因为这根本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一个直接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是,1928年之后俄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非出自于集体农庄部门,而是体现在农民自己狭小的自留地里。⁷⁵自留地的农产品可以拿到露天市场上出售,而为了弥补政府供应的不足,城市居民非常乐意光顾这些市场,而不愿意去商店采购。

等级制与强制性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1928年之后苏维埃制度的整体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制度建立了等级控制和社会经济报酬的显著不平等模式。在30年代苏维埃管理时期,所有官员都变得越来越特殊化,越来越专权。正如艾定指出的那样:“为了对那些权力膨胀、分工细密的行政机关加强控制并同时赋其更大的权威,(同旧制度时期一样)众多的规章条例被再一次引入。”⁷⁶苏维埃政权通过详尽的级别和明显的工资差别把官员和非官员区分开来,并把各级官员都纳入等级体系中。特别显著的是,到1940年,苏维埃的文职官员和红军的各级军官都制定了官衔、官阶以及制服,其详尽和精美的程度简直都可以与彼得大帝时期的制度相媲美。⁷⁷

与此同时,在社会中引入了差别显著的经济报酬——诸如为高级技术熟练工人提供的特殊津贴和消费特供、对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实行的计件工资等等——以刺激工人向极高的生产目标迈进。⁷⁸在农民之中也建立了类似的差别制度,这与农业集体化制度下集体农庄所要保持的报酬平均原则格格不入。⁷⁹此外,布尔什维克早期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厂长、技术人员、党的官员不能获得远远高于熟练工人的福利和工资——被斯大林(当作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不屑一顾地抛弃了。这样,不仅加强了管理者支配工人和农民的权威,而且厂长们及其技术人员(国家行

政人员和军官一样)也同样获得了比劳动工人高得多的工资与岗位福利。⁸⁰

最后,不论是与公认的沙皇政权,还是与其他在此之后的社会革命政权相比,苏联政权为了统治人民和清洗、控制自己的干部而诉诸的行政性组织强制与恐怖手段,都达到了超常的程度。要证明这一点,只需简单地引用几个人们记忆犹新的例子。例如,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完全是通过对极不情愿的农民实行无限的强制措施才得以实现的。并且,在集体化过程中,几百万的富裕农民(kulaks)以及反抗集体化的贫苦农民,被彻底剥夺一切财产,并被驱逐出自己所在的乡村。⁸¹在强制工业化期间,社会各个阶层的苏联公民都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真实的或虚构的罪名而遭受逮捕,然后被判处长期或无期徒刑而送到劳改营。事实上,这些庞大的劳改营形成了一个行政经济领域的独立王国,成为提供超度剥削劳力的重要源泉,甚至可以为当局用来完成恶劣条件下的战略基础项目(由于条件恶劣,雇佣自由劳力存在困难且费用高昂)。⁸²当然,苏联民众对于遭受逮捕和囚禁的普遍担心也强化了监狱之外的人民的劳动纪律,提高了生产效率。

苏联社会的领导集团也未能逃脱被监视和遭恐吓的命运。相反,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是和平时期社会内部的部分精英运用恐怖手段对付其他成员,这是最具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⁸³斯大林为了达到确立和维持个人独裁的目的——而不管民众的死活和领导集团才能与经验的浪费——是成千上万包括所有在世的老(也就是那些最初的)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领导人遭到逮捕、处决的最直接的原因。然而,斯大林镇压共产党领导集团中其他成员的残酷行为之所以出现和实施的背景,却是那些早已建立起来惩罚和驱使民众的强制性权力组织。大清洗期间,这些组织转而对付那些党员和行政人员中的精英,这些精英们意识到了(也应该对其负责)强制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民众所付出的代价。这样,斯大林体系下的受益者就有了得到升迁的机会,并走向前台。因此,这一短期运动之外的深远效应,可能会有助于斯大林体系下的制度特征的稳定。

总之,1928年之后的苏维埃制度与革命前的专制、独裁制度相比,形

式上更为平等，群众基础相当广泛，但实质上更加讲究职位级别、更加专断、强制。俄国革命为什么会这样特殊的连带效应？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抽丝剥茧式的解释，最后只要简单地加以编排，就能形成一个结论。

沙皇政府是维持旧制度下等级秩序的关键堡垒，但到1917年就突然彻底崩溃了，这样，在革命危机关头，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才可以从社会底层迅速产生。绝大多数农民具有公社平均主义的倾向，而城市中又缺乏稳固的工会和议会民主制度，因此就很难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引导民众的参与，而1917年的大众革命又迅速地动摇了特权集团的社会地位。上述背景为革命的根本任务增添了极端平均主义的色彩；而事实上，1917年俄国的社会革命也的确是世界上最彻底、最突然的一次革命。

但是，这场社会革命的突发性和完整性也意味着，政治组织的革命者——力图通过建立新型的国家组织来巩固俄国革命，并抗击反革命分子和外国入侵者——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既然沙皇政权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彻底瓦解，新型国家组织建立就必须要从无到有，迅速完成。此外，对任何可能的国家建设者而言，广大农民最多只是间接的、没有主动性的同盟。为了在此条件下建设革命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运用权宜之计，逼迫旧制度的工作人员参与服务，还强迫农民提供人力物力。结果，毫不奇怪的是，初生的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制度模式就综合具备下列特征：官僚等级制度、强调专家的特权，党对于工作人员、民众团体、特别是农民的高度集权化和强制性的控制。

革命政权初步巩固之后，农民问题并没有消失。由于农民反对大地主的革命给农村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在农村没有坚实的组织基础，羽翼未丰的苏维埃新政权很快就遇到了全国经济危机。由于众多的环境因素——包括政权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和不安全状态，以及革命前经济所遗留的经济状况——共产党政权转而实施国家主导的急速工业化，以求摆脱20年代的危机。然而，这就意味着，新政权会不可避免地恢复甚至强化先前出现在内战期间的那种国家结构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模式。因为目前新政权必须拥有一些持续的手段——集权化控制、不平等的个体激励以及无处不在的强制惩罚的可能性。上

述手段意味着,需要发动和操纵领导人和被领导者去承担艰巨的任务,付出巨大的牺牲,还要承受社会的灾难,而这种灾难正是由于急速工业化偏重重工业发展,抑制消费性商品和服务所必然带来的后果。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工业化发展的先决条件”⁸⁴。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既薄弱又不稳定,农民相对自治而且敌视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要想推动重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首先解决某些当务之急。

实际上,俄国革命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是最令人心酸的——农民的作用和命运。1917年农民自发地展开了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果变成了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世界中威胁革命后民族生存的因素。建设国家的革命者在对付国内外的政治对手的同时,为了对付这些自治的农民,逐步建立起一个极其可怕的、庞大的政权——对农民尤其如此。因此,俄国革命的结果就是,完全确立了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制度,其中所有俄国民众的集体力量都从1917年无政府式的反叛转变成为积极参与中央决定和领导的事务——当然,如果缺乏自主的热情就运用强制措施和恐怖手段。起初,这些事务主要是进行仓促而急剧的重工业建设。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转向了保卫俄罗斯抗击无情的敌人。不管付出的人力代价有多大——事实上代价非常可怕——这个革命体系最终证明了自己具备民族国家权力的性质。只要把二战期间苏联的命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沙皇俄国相对照,人们自然就会明白这一点。

法国与俄国:论点回顾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第二部分中讨论了法国和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后果。此刻,回顾并总结一下主要的观点逻辑应该非常有意义。就分析的方法来看,我采用了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主要从城市阶级的社会经济利益和政治行动的角度来解释法俄革命,强调分析两场革命之间的逻辑与结果为何完全不同。这样,法国革命就被看作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的自由革命,而俄国革命则被认为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之相反,我是从分析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相近之处着手研究的:因为在两个案例中,我都强调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

用,其中的一方面就是,农民针对地主的暴动所带来的直接成就和间接的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则是,在既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政治领导集团建立、运用国家组织的斗争。

从这一视角出发,而不是遵循正统的研究路径,我们就能够对法俄革命之间那些重要的政治进程和结果的共性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在两场革命中,大规模自治农民的自发性暴动消除了反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或者打破了自由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样也使得革命政治运动不可能在农村确立基础。而且,在两个案例当中,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领导集团都要要建立足够强大的国家组织,以击败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敌对势力。这一紧迫的要求意味着,革命必然会催生一个更加集权化和官僚化的政权。这种结果与自由主义议会制或直接民主制大相径庭,尽管两者最初的建立都要通过城市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法国的无套裤汉和俄国的工业无产者)。

依照我所运用的分析框架,还可以理解法俄革命之间的重要差异,这比把两场革命简单地归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要更接近现实。基本上,我是结合两类系列因素来解释革命进程和结果中的差异的:一类因素是,那些解释两场革命基本相似点的主要变量在具体形式上的差异,即,在革命危急关头农民如何暴动?建构国家的具体的任务有何不同?另一类因素是,每场革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世界历史背景以及国际环境的差别。

因此,我认为,由于两场革命中最初引发革命政治危机的方式截然不同,俄国革命转向深化和激进就比法国革命来得更突然。而且,俄国的革命军队完全是白手起家的,而法国的雅各宾派却可以利用现存的军队,这样,也许俄国革命就可以通过更为强制和权威的手段得到巩固。

为什么法国革命的顶点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与市场经济下的私有产权社会共存,而俄国革命却造就了一个致力于国家主导的民族工业化的政党国家?综合考虑,还有其他几点因素。法国的农民暴动并没有逾越界限去攻击和平分个人地产。(包括早已存在的以及农民反对封建领主的革命所带来的)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适宜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而且不存在国家推动工业化发展这种世界历史模式。这样,那些共产主义式

的、群众动员型的政党就不可能巩固国家政权。此外,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强国地位容易促使革命动员转向民族主义的军事扩张,而不是增强国内的政治变革。相反,俄国的农民革命攫取并重新分配了所有大型的地产,结果,严重损害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俄国先前就拥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还有国家主导工业发展的世界模式可以借鉴。而且,就地缘政治而言,俄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地位相当脆弱。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适应环境的要求,首先在城市工业的基础上巩固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然后自上而下地把权力范围扩展到农村,并运用这种权力推动苏联全国的迅速工业化。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与强调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性质来区分、定性法俄革命的研究方法相类似的某些现实问题,在本书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不同的是,我只是把法俄两国的城市工业和阶级结构作为一种分析背景——这种背景更能衬托出农村巨变和政治动因在研究分析中的重要性。的确,我一直都认为城市工业和阶级结构的差异,深刻的影响着革命的进程和结果。但是,这种影响的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扮演了关键性的政治角色,而是因为,不同的城市结构与农民革命的不同后果,为法俄两国革命性国家权力的巩固与运用是否可能设定了不同的条件。

注 释

1. 召开三级会议必然导致全国政治领袖的选举,这一过程允许所有成年的法国男性参加。同样的,普遍的 1789 年市政改革也使革命委员会和民兵获得了权力,尽管他们是由当地权势精英领导的,但却是由民众,小资产所有者(工匠、店主、职工和店员等)动员的并依靠于他们,而不仅仅依靠于之前与国王行政机构一同统治着城镇的特权寡头。参见 Lynn A. Hunt, *Committees and Communes: Loc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178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3 (July 1976):321—346。

2. 二月革命后的“双重权力”很好地描述于 Isaac Deutscher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vol. 12:403—432。同时参见: Marc Ferr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917*, trans. J. L. Richard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2), chap. 6; and Oskar Anweiler, *The Soviets*, trans.

Ruth Hein (New York: Pantheon, 1974), chap. 3.

3. 我是依据 Marc Ferrro in *February Revolution*, chaps. 3—5 提供的资料。

4. Roger Pethybridge, *Th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2), chap. 1.

5. 参见 Teddy J. Uldricks 的总体论述, The “Crow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wards Reassessing the Nature of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Society* 4:3 (1974): 397—413.

6. 参见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2 vols. (1935; paperbound reprint ed.,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5), vol. 1, chap. 11; John L. H. Keep,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67), pt. III.

7. 参见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chap. 12; Paul H. Avrich, Russian Factory Committees in 1917,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11:2 (June 1963): 164—182; and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chaps. 5—6.

8. Marc Ferro, 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 Undisciplined,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 *Slavic Review* 30:3 (September 1971): 483—512; Allan Wildma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rmy, *Soviet Studies* 22:1 (July 1970);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chap. 10.

9. Anweiler, *Soviets*, chap. 3.

10. 二月革命后政府问题的总体背景参见 Pethybridge, *Spread*; Paul R. Gronsky and Nicholas J. Astrov,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11. Anweiler, *Soviets*, chap. 3; 及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pts. II 和 III.

12. 参见注释 8 里的参考文献以及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Petrograd Garrison and Bolshevik Seizure of Power, in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in Russia*, eds. Alexander and Janet Rabinowitch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72—191.

13. 更生动地叙述参见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 (New York: Norton, 1976), chap. 8.

14. 参见 Katherine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p. 195ff; 以及 John Erickson, The Origins of the Red Arm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ed. Richard Pipes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9), pp. 292—295.

15. 参见第二章有关俄国一节关于旧政体下工业化的讨论及参考文献, 相关概述可参见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 S. S. R*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2), chap. 1.

16. Anweiler, *Soviets*, chap. 4; 及 Uldricks, *Crowd in Russian Revolution*,

pp. 410—412。

17. T. 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 S. S. R, 1917—1967*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57—68; 及 Anweiler, *Soviets*, pp. 176—192.

18. Anweiler, *Soviets*, pp. 176—192; 及 Oliver H. Radkey,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Promise and Default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February to October 19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19. 对既强调布尔什维克的内部矛盾又强调他们与民众导向保持联系的显著能力的论述参见 Alexander Rabinowitch, *Pre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rising*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及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20. Rabinowitch,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chap. 11—15 提供了出色的论述。

21. Anweiler, *Soviets*, pp. 176—207.

22. 参见 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55), pts I and II. 及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pts. IV and V。

23 Paul H. Avrich,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Workers' Control in Russian Industry*, *Slavic Review* 22:1 (March 1963): 47—63.

24. 引自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2, p. 79.

25. 同上, p. 81。

26. Lazar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43—150.

27. 关于法国与俄国对比的强调见于 Chorley *Armies and Revolution*, chap. 11。

28. 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得 1918—1921 年的建国者们做出了这些牺牲成为可能, 因为它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革命的最终方向, 而不是俄国的民族权利。换句话说, 在客观环境与夺得并成功巩固政权的政党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有选择的亲和关系”(elective affinity)。

29.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 1920 年夏天俄国红军尝试占领华沙波兰的失败, 参见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2, pp. 297—316。

30. Erickson, *Origins of Red Arm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ed. Pipes, pp. 301ff.

31. John Ellis, *Armies i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74.

32. 总体背景参见 Erickson, *Origins of Red Arm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ed. Pipes; Ellis, *Armies*, chap. 7;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2, chap. 21; 及 David Footman, *Civil War in Russia* (New York: Praeger, 1962), chap. 3。

33.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2, p. 29.

34. 在内战中,旧军队中有 5 万到 10 万军官加入了红军……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战争部的一万多文职人员,旧军队的参谋部和军事院校的主要人员也都被吸收进了(红军)。Raymond L. Garthoff, *The Military as a Social For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 Cyril E. Blac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329.

35. Schapiro, *Origin of Communist Autocracy*, p. 243.

36. 关于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参见 Footman, *Civil War*; 及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2. Chamberlin 论述到(并提出了证据)尽管在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农民既反对白军又反对红军,但他们更憎恨白军因为后者试图在他们占领的地区恢复地主的财产和权力。唯一的例外是在地主制对富有的小农而言已不构成威胁的地区,如西伯利亚。红军胜利的另一重要条件在于:那些被引发俄国革命的同一场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西方大国并没有为了白军发动重大的、持久的干涉。当然,俄国太大了以致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

37. 关于对 Makhno 运动的镇压见 Ellis, *Armies*, pp. 184—187; 及 Footman, *Civil War*, chap. 6.

38. Merle Fainsod,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The Russian and Soviet Case*, in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 Joseph La Palombar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49—253.

39. Chamberlin, *Russian Revolution*, vol. 2, p. 105.

40. 参见 Avrich, *Revolution and Workers' Control*, 及 Jeremy R. Azrael, *Managerial Power and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chap. 3.

41. Nove, *Economic History*, chap. 3.

42. 当时情形的深刻描述见 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New York: Norton, 1974), chap. 1, *The Crisis of War Communism*. 同时参见 Seth Singleton, *The Tambov Revolt (1920—1921)*, *Slavic Review* 25:3 (September 1966): 497—512.

43. Nove, *Economic History*, chap. 4.

44. Gerard Chaliand,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Myths and Prospects*, trans. Diana Johnston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p. 150.

45. Nove, *Economic History*, chap. 4, 特别是 pp. 94. 117—118.

46. 同上, chap. 4 及 Volin, *Century*, pp. 182—188.

47. 关于这一段论述参考第三章关于法国的论述和参考文献。

48. 出于比较的角度,参见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Russia, 1750—1800* 及 *Premodern Periodiz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5.

49. 参见 Keep, *Russian Revolution*, chaps. 29—30; 及 D. J. Male, *Russian*

Peasant Organization Before Collectiv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50.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105—114 及 148—151 及 volin, *Century*, pp.182—188。

51. 这一段落的资料来源有 Male, *Peasant Organization*, chap. 3; Teodor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s. 9—10; Moshe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trans. Irene Nov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t. I; 特别是 Thomas P.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ison*,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chaps. 3—5。

52. Volin, *Century*, pp. 196—202; Lewin, *Russian Peasants*, pt. II; 及 E. H. Carr,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Road to Collectivization*, i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Before and Af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pp. 95—109。

53. 参见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Unarm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9);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Bolshevik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73), chap. 6—9; 及 Alexander 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54. Cohen, in *Bolshevik*, chaps. 8—9, 相当多地强调了很多政党领袖向斯大林政策模式的一步一步地转变。

55. Bukharin 的方法几乎肯定要求俄国的经济向大量外资开放, 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样做难以获得成功。

56. 参见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2nd ed., rev. and enlarg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pp. 460—461; Bernstein,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chaps. 5—6; 及 Lewin, *Peasants and Power*, pt. III。

57. 参见 Nove, *Economic History*, chaps. 8—9, 关于斯大林工业化成就的论述。

58. 甚至同情布哈林的传记作家 Stephen Cohen 也承认布哈林的发展战略严重地“低估了国家对工业和农业生产干预的需要”, 参见 Bukharin, pp. 208—212。

59. Nove, *Economic History*, p. 184。

60. 参见 James R. Millar, *Mass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to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 Review Article*, *Slavic Review* 33 (December 1974): 750—766。

61. Alf Edeen, *The Civil Service: Its Composition and Statu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 Cyril E. Blac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76。

62. E. H. Carr,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3 vols. (New York: Macmilan, 1971), vol. 2. p. 489, table 66.
63. Warren W. Eason, Population Changes,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 73. 1928年后国家工作人员变成5倍的数字来自 Edeen, Civil Service,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p. 276—278.
64.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Patterns of Autocracy,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p. 93—109.
65. 参见 Rigby, *Party Membership*, passim.
66. Theodore H. Von Laue, *Why Lenin? Why Stalin?* 2nd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1), pp. 169—170, and chap. 9 generally.
67. Alexander Vucinich,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p. 207—209.
68. 这一段落依据 Edeen, Civil Service,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p. 278—292; Raymond L. Garthoff, The Military as a Social Force,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p. 329ff; 及 Rigby, *Party Membership*, chaps. 3—7。
69.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433.
70. Nove, *Economic History*, p. 206.
71. 同上, pp. 206—207。
72. 该段落依据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hap. 16;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181—184; 及 Lazar Volin, The Russian Peasant: From Emancipation to Kolkhoz,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p. 306—307; 及 Naum Jasny, *The Socialized Agriculture of the USS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t. III。
73. Nove, *Economic History*, p. 210.
74. 同上, pp. 179—180。
75. 同上, pp. 238—244; 及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pp. 463—464。
76. Edeen, Civil Service, in *Transformation*, ed. Black, p. 286。
77. 同上, pp. 286—287。
78.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208—209; 及 Schapiro, *Communist Party*, pp. 465—467。
79.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p. 450。
80. 关于这一点的特别生动的细节参见 Tony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London: Pluto Press, 1974), pp. 65—81。
81. Volin, *Century*, pp. 212—231; 及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165—176。
82. Stanislaw Swianiewicz, The Main Features of Soviet Forced Labor, pp. 277—292 in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Stalin*,

ed. William L. Blackwell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4).

83.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irties* (New York: Crowell & Macmillan, Inc., 1973).

84. 在 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把苏联革命后的不平等归因于任何经历工业化国家都要经历的“功能必要性”(functional necessities)。一个主要的例子是收录于 Alex Inkeles 中的论文 *Social Change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特别是 pt. III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第七章

中国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

统治阶级的特性深刻地影响着革命。与法国、俄国革命相对照，根深蒂固的地方士绅权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是从外围地区走向中心，而不是相反……

——佛朗兹·舒尔曼

与法国、俄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爆发于独裁的、半官僚化的旧制度的崩溃。并且以确立了更为集权的、大众参与的并在众多方面比革命前的政权更加理性和官僚化的新型政权而达到顶点。另外，三次革命中，农民都充当了变革旧式阶级关系的反叛力量的主要角色。在法国与俄国，社会革命的变迁依赖于农民暴动的兴起。然而，革命型的国家组织却主要建立在城市人口的支持之上，反而对农村地区实施等级结构的管理。尽管法国和俄国革命后的国家彼此间存在着不同，但都是一种职业化的官僚型政权。但在中国革命中，农民不仅充当了革命反叛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群众基础。其结果是，新型的革命政权不同寻常地推动广泛的民众参与，令人惊讶地抵制科层化官员与职业专家式的常规型等级支配。

导致中国革命与法国、俄国革命不同的原因，同法、俄两国本身存在的原因一样，在于其独特的社会革命形势和旧制度所留下的遗产。在中国的帝制国家垮台之后，乡村士绅依然在农村保持着固有的特权，军阀支配着各省与地区的大权。因此，革命的国家建设者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阻

力。只有在某些革命领导懂得发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反叛、建设以及政治参与的巨大动力之后，中国革命才得以最终完成。

第一节 1911年之后的社会革命形势

一旦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帝国权威的面纱剥落殆尽，中国的国家权力就分散到区域、省份以及地方层面。其实，中国地方上的权力本来就根深蒂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形类似于1789年的法国与1917年的俄国。所有三场革命中，先前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制瓦解之后，由于所谓的代议机构替代了君主，政治参与和发动议程的机会就更为普遍。但是，以地区为基础的军事组织在1911年之后所扮演的角色，使得中国的情况极为独特。

军阀割据的背景

在法国与俄国革命中，在中央革命政府没有出现之前，以地区为基础的运动并不足以成为一个重要因素。1914年之前，俄国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1917年，由于战争失败以及下层的无政府革命行动所带来的骚乱，俄国的帝国军队解体了。法国大革命初期，地区或者省份的军事力量无足轻重。这是因为，旧制度早已把曾经独立的各省军事总督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而1789年，国王的行政机构已经被在全国性与地方性利益之间摇摆的城市委员会与国民卫队所组成的松散网络所取代。

但是，在1911年之后的中国，特别是当总统（准皇帝）袁世凯（作为前清重要的军事大员，袁世凯能够控制众多的军队将领）在1916年去世以后，跨区域层面的政治控制就落在了拥有强制实力的军阀控制的区域性军事机构当中。宪法和议会等政治制度安排一直未能起作用。¹相反，“全国到处是独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割据一方，掠夺地方资源。作为一种体系结构，他们彼此只有地盘的大小，没有本质的区别。”²这些政权“通常都是民事管理与战争相互结合的等级结构组织”³。他们的权威都依赖于—

种互惠关系：下属对于既定军阀的效忠，反过来，军阀也必须为下属官员提供金钱、武器以及支配部分地盘的权力等作为奖赏。因为这些政权一直处于相互竞争之中，所以，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搜刮资源、招兵买马，与潜在的同盟者和国外的支持者谈判，当然，还有发动内战。⁴

军阀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制度的发展以及帝制国家的垮台方式。在清政权的最后数十年中，全国各地建立了包括兵工厂在内的许多现代运输设施与工厂。这些工厂大都临近通商口岸城市；即使有少部分在内陆城市，也是被地方权威当局所把持。⁵这些设施对于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总体而言是肤浅的。⁶但是，上述现代设施和工厂足以为地方军事将领提供杀伤性的武器和新的财政来源。而且，垂死的清政权实际上鼓励地方军事当局积极训练新军。因为，把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兴起的的地方武装转化为职业军队，镇守中国各地，被当作是抵制帝国主义入侵的唯一可行的途径。⁷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新军并没有成为有效的国防工具，反而与士绅相结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然后，一旦王朝消亡，并且随着早就支离破碎的儒家帝国行政机构陷入混乱，1916年以后，新军就蜕化为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工具。

就中国社会的整体而言，军阀割据时代的后果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内在的不稳定与本性的不满足，各个军阀政权之间持续地争夺地盘，都希望最终能够统一全国。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每个政权都极力压榨自己地盘上的民众。许多农民因不堪忍受苛捐杂税与兵役而逃离家园，又导致军阀的军队不断扩张；这种状况又导致更多的农民逃离日益恶化的农村。⁸与此同时，军阀并没有把城市和工业视为需要加以扶持和培育并使其逐渐成熟的现代经济中心，而是将其看作是比农村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获取军事资源的地方。⁹在极端的情况下，商人甚至因为军阀的压榨而破产。这样，社会积贫积弱，军阀及其帮凶则更加富强。因此社会在总体上处于一种“虚弱的平衡”状态，以致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全国的政治统一。

地方士绅的延续

那么，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命运又如何呢？封建王朝的消亡与军阀统治的到来对士绅有什么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区分文人与官员；另一方面要弄清楚盘踞一方的地主与村社组织管理人员的区别。

的确，1911年以后（实际上是1905年），囊括文人与官员的儒家精英群体作为一个成型的全国性的行政与文化阶层就解体了。¹⁰另外，上层文人与前清文官很难适应清王朝倒台之后的政治气候。1911年以前（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文人已经控制着新设立的地方代表会议咨议局；包括各省督抚在内的官员，名义上效忠于清王朝，但是已经逐渐向地方统治集团倾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个省份的代表议会和文官一度竭力与掌握军队的武官联手实施统治。但是到了1915年，地方议会终止活动，许多原先颇具声望的士绅无所事事，只有呆在大都市中，或者赋闲在家或者转而从事“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随着军阀割据时代的到来，一直到1927年以后国民党开始实行统治，一些前清文官都试图在军阀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在军阀割据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文职官员无论从数量上、职能上还是其薪金上来说，都相当有限；因为权力的核心是军事组织。此外，前清遗老遗少还要与非儒家出身的新贵们争夺那些职位。总之，许多，甚至大多数前清官员和上层文人都可以随着地方和全国权力结构的变迁而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可以通过现代的城市经营活动而发迹。但是辛亥革命之后，这部分士绅失去了原先的特权和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其命运类似于法国的宫廷贵族和城市贵族以及俄国的官僚贵族。

帝制政权的消亡、军阀割据的出现，对表面上属于地方支配阶级的士绅的影响就更为复杂，不过，肯定不同于君主政体的消亡对于法国封建领主和俄国土地贵族的影响。因为法国和俄国的农民享有相当大的村社团体的自治权利，而不完全受贵族控制，因此，当君主政权的行政机构和压迫机器于1789年和1917年突然崩溃之后，农民能够为自己而展开针对领主与土地贵族的斗争。但是，由于我们在第三章所考察到的原因，中国农民并没有因结构性的地位与地主士绅展开集体的自主斗争，而是依然在常规的地方性范围内行事。相应地，1911年中国帝制国家统治的消亡，并没有直接为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创造适合的条件；地方士绅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对土地的控制、对村社的组织领导，并没有直接受到下层民众的颠覆。

实际上，士绅原先就拥有的突出的地方政治权力，反而由于帝制国家

的垮台得到了加强。自19世纪中叶爆发的众多起义以来,乡绅就已经正式或非正式地篡夺了地方行政权力,并且充任了清政府为了羁縻他们而设置的地方官员。1911年之后,乡绅依然控制着这些职位。另外,他们还控制着地方税收财政和治安,因此就加强了他们对农民的控制与剥削。¹¹

当然,帝制国家的消亡也促进了乡绅的解体,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方村社领导集团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变得比较困难。这就使得原先的支配阶级在没有军阀或者国家军队的帮助下,无法对付大规模的起义与革命。士绅自己出面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¹²

第二,帝制国家垮台以后,区域或全国权力中心与地方精英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复存在。所有政权,包括1911年以后的军阀割据,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以及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的共产党和日本军队,为了把行政和军事控制渗透到地方基层,一般都采用与乡绅合作的途径。这样,代替帝国行政机构(乡绅们对于原先的清官僚的管理方式、政治观念、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了如指掌)的乡绅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接踵而来的军官、官吏、政党以及各种主义打交道。很自然,这就造成了地方精英内部的不稳定。与得势的军阀或者政党处好关系,乡绅就能抬高自己的地位。一旦军阀或政党下台,新的精英就会得利,而原先的精英就会丧失权力、财产甚至生命。

第三,儒教国家的消亡降低了儒家教育的影响,不管是文人还是受过教育的地主,在地方支配阶级中的影响都有所下降;而随着商业化和政治的不稳定却提升了商人、投机地主以及走私者的影响力。¹³地方精英与中央权力之间缺乏明确定型的关系,同时地方支配阶级的权力由于没有受到具有“全局观念”的外来者的限制而急速增长,导致了被研究者称为“机会主义”的理念在乡绅中膨胀。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对农民的剥削更加肆无忌惮。结果是,农民只要条件允许就容易起来造反,或者说,农民离开村社成为土匪或散兵游勇反过来加重了对于乡绅和农民的威胁。

因此,1911年以后,随着封建帝制国家的崩溃,以地方为基础的中国统治阶级全国性的政治文化外延就解体了。与此同时,在地方农村社区的层面上,士绅地主与其他经济统治成员就更加固步自封,更加脆弱。一旦遭遇到与骚动的农民而非当地统治阶层结盟的跨地区组织力量的攻

击，他们就显得相当脆弱。

总之，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法国与俄国革命始于君主政权完全、彻底的崩溃，随之而来的下层民众的造反急剧地推翻了支配阶级，而1911年中国专制统治的消亡并没有直接引发社会革命。当然，帝制-儒教行政体系的瓦解加剧了政治解体和社会张力。在这一背景下，致力于重新统一国家，并且发动民众的革命政治运动就有了施展的空间。但是，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必须消除军阀及其乡绅联盟的持续的军事与行政权力这一潜在的障碍。与1789年以后的法国，特别是1917年之后的俄国革命者相比，1911年之后中国的革命者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具备军事实力的旧制度的残余势力。

1911年之后中国社会革命的形势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即统一中国、重新确立中央权威，必须从军事体制内部着手。¹⁴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寻求适当的途径以超越军阀混战和体系分裂的正常范围与矛盾，即使是体系中存在着成功的、可能的结盟者。先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中国国民党（最初得到以城市为基础的共产党的支持），后来是1927年之后转移到农村的共产党，两者都面临着这种决定性的挑战和困境。这些革命政治运动都发展了自己的军事武装，获取了可靠的根据地以建立政府机构，因为或迟或早他们都利用了竞争对手无法利用的特殊资源。最终，这两股势力把纯粹的军阀排除出局，只与试图统一、治理中国的竞争者进行斗争。下面，让我们依次仔细考察一下国民党的最初成功与最终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失败与最后的胜利。

第二节 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党的盛衰

法国革命有雅各宾派，俄国革命有布尔什维克。而中国革命中有两股平行的革命政治势力。在1911年之后的社会革命情形下，两者都力图巩固国家权力并且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国民党主要是依托于城市民众的资源和支持，而共产党则在1927年以后立足于农村资源，获得了农

民的支持。当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共产党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他们具备有相当的能力,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社区,取代了士绅残余势力,发动农民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运动。但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存甚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还在于国民党依托城市来巩固国家政权的企图的落空。所以,在这一节中,我们必须不仅分析国民党的发展历程,还要试图理解为何依托于城市的运动在中国难以奏效——而布尔什维克和雅各宾派(及其官僚与武装继承者)却能够在原先农业与农民占主导的社会中,巩固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何中国革命会存在两股主要的运动势力来巩固国家政权——除了一股立足于城市的运动势力之外,还有一股依托于农村并最终获得胜利的势力。

1911年之后,从所有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倾向来看,政治统一运动的兴起是必然的。那些忠于传统思想的人仍然怀念封建大一统的好处。即使是军阀都打着统一中国的旗号发动战争。但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中国人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增加自身经济实力与独立地位的商人们,开始诉诸各种西方文化观念,并且公然提倡中国民族独立自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特权。这些现代民族主义者主要集中在大的口岸城市,其中大部分属于西方化的通商口岸。一战以后,这些城市成为经常性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首选之地,因为一战的条约和决议公然蔑视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的期盼,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选择这些20世纪初期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中心作为领导与组织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¹⁵

与共产党的合作与分裂

国民党与共产党几乎同时诞生,随后就进行了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对军阀、推行统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3位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会议。1922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即1911年革命组织同盟会的继承者,主要由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的政党,)同意接受苏联的援助和顾问,将自身改组为以民众为基础,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最后,1924年,共产党和新组建的国民党接受苏联的建议,同意联合起来为“民族与民主革命”而斗争。共产党员被国民党

接纳，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

从1923年到1926年，国民党，包括1924年以后的共产党，共同完成了三件大事。¹⁶第一，创立了有效的国民政府，并且逐渐扩大了以广东为基础的根据地。第二，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集中领导、具备政治观念的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第三，创建了一个集中控制但具有民众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推进社会改革的政党。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出力量来打败军阀政权，其关键因素在于苏联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发动民众参与以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成型——而所有这些正是军阀所缺乏的资源。

国民党在广东省巩固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建立国民革命军。在黄埔军校，由中国和俄国教官来训练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并灌输政治理念。俄国的财政支持和军事援助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机构下发的，因此有助于控制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各部成员。1925年，蒋介石已经能够领导国民革命军打败广东的对手。广东敌对势力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通过俄国贷款而新组建的中央银行统一整顿该省的税收制度，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提升了扩充军队和控制军队的能力。

与此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干部展示了相当的组织热情，使国民党党员从1923年到1926年间从几千人发展到20多万，同时还有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群众运动协会也获得了巨大增长。¹⁷由于特殊的效应，中国共产党及其青年团在1925年以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早期的共产党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它：

力图把全体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工会网络……与各个部门和大城市联合会相互联系，并最终形成由共产党自己控制的全国总工会。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二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成功地……发展、渗透和控制了几百个工会，若干大型的联合会，并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到1927年夏季为止，组织成员据称有大约300万之多。¹⁸

对于所有民族主义联盟中的人来说，广东根据地的巩固是为北伐和统一中国而做准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的主要目标是先夺取武汉(汉口)，再占领上海和南京，最后夺取北京，实现这个计

划需要先打败吴佩孚（盘踞湖北、湖南北部以及河南），再打败孙传芳（盘踞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以及江西），最后打败张作霖（占据满洲、山东以及直隶即河北）。¹⁹到1926年10月，北伐军迅速北上，攻取武汉。一些原先与国民革命军对抗的军队因为其最初的胜利而倒向“革命”。国民革命军进行一段时间的整编，然后于1927年春季顺利攻占上海和南京。但是，就在此时，由于国共分裂而导致了北伐的中断。

威尔伯（Wilbur）恰当地指出，“北伐的第一次胜利高潮结束之后，‘社会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就立刻尖锐起来。”²⁰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固有的张力就转变成为对立的矛盾。在国民党的领导集团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意见一致，都认为北伐不仅仅是统一中国的战争，更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与革命的前奏。众多的左派领导人积极从事发动工人与农民的热情。²¹他们许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反过来，利用民众的支持与社会革命来提升自己在国民党领导集团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一直就不信任左派以及群众运动，他们把革命看作仅仅是统一中国以及审慎的反帝事业。另外，他们不愿意被共产党的革命赶下台。1925年以后，民众运动高涨，民众支持北伐的热情导致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农村暴动的情况剧增。结果，国民党就很容易与资产阶级、士绅以及其地主家庭受到农协威胁的军官等产生共鸣。北伐初期对于外国平民的侵犯也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促使他们派遣军队到中国中部的通商口岸去保护其侨民。

这样，到1927年，民族统一战线就走到危机关头。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同时也靠私交关系把松散的军事联盟整合成为统一的军事力量，因此，他在决定如何处理前述问题中处于最佳地位。而且他也这样做了：先是在1926年*4月发动上海政变，然后在国民党控制的所有区域大肆清洗共产党员和民众运动领袖。国民党改变了方针，它不再继续依赖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所发动的群众。相反，它开始逐渐依赖新攻占的华中地区中国商人的财政支持，依靠来源于通商口岸的国际贸易税收以及西方列强的援助（包括军事顾问）。²²

* 应为1927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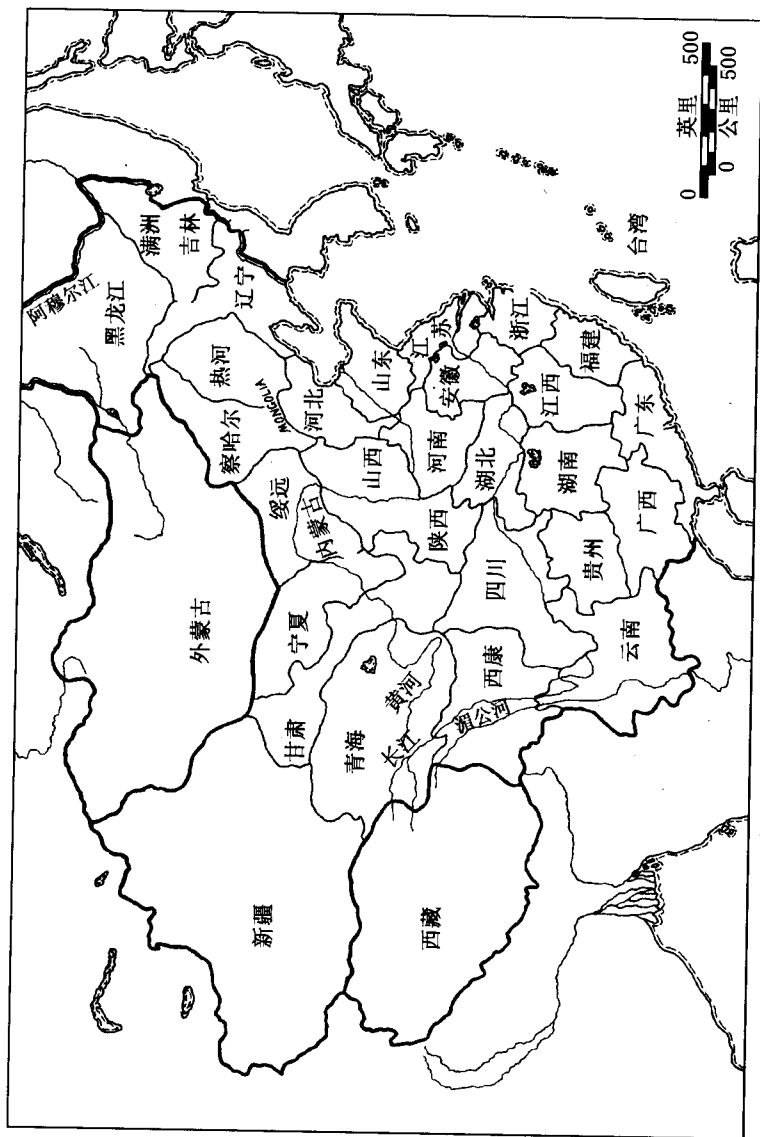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各省及其邻近区域:1930年

资料来源:James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 iv.

怎么会做出这样不同的抉择呢？民族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武力征服。孙中山之所以接受苏联的援助和顾问，就是因为能够为战胜军事对手提供超常的资源。共产党干部善于发动民众的特长，也是可以利用的独特资源。然而，一旦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失控，致力于武力统一的领导们就很自然地认为这是一种累赘：有可能会孤立上层的民族主义者，引起西方列强对国民党的不满，甚至招致外国干涉。另外，在北伐最初的成功之后，华中地区的财富也足以很好地取代苏联的援助。实际上，在1928年到1931年之间，宋子文财政改革的实施所带来的财富，足以使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这场统一中国的斗争采取的是典型的军阀战争的方式：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段，诉诸于战争、外交谋划、分化对手以及用金钱与武器弹药收买、笼络对手。²³

巩固全国性政权的失败

但是，即便以实现中国统一富强这一国民党自身的最高目标来看，所有这些最终都得付出代价。因为在1911年之后的中国，仅仅倚重于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城市，任何政权想要实现中央集权都不现实。跟法国和俄国革命作一简单的对比就可以说明原委。

与18世纪法国的商业口岸城市相类似，这些中国的现代化城市都处于大陆的外围，属于外向型的都市，也处于先前帝国权威所借助的城市行政管理等级的边缘。²⁴在国民议会主导法国革命期间，随着革命权力的巩固，来自于或者倾向于商业港口城市利益的政客往往会被来自于内陆城镇的政客所取代。²⁵但是在中国，这种城市型革命领导的直接更替却没有可能出现。作为农村的支配阶级，士绅在旧的行政等级结构的基层依然根深蒂固，是乡镇与农村关系网络的联结枢纽。另外，在1916年之后军阀割据的背景下，对于全国权力的竞争完全是武装斗争，先前内陆地区盘踞的军阀不可能被简单迅速地清除出去。因此，中国就不会出现雅各宾派山岳党人。

那么，国民党（或其他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为何不能效仿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建设战略，倚重现代工业，发动无产阶级，并把铁路运输转化为军事优势呢？答案是，没有这样的资源。尽管1928年以前，中国已经实

现了某种程度的工业化与铁路大发展。但总体发展水平远远低于1917年之前的俄国。所以,直到1949年,中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五,产业工人的数量始终不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一(而沙皇俄国晚期两方面大致的数字分别是16%和5%),更何况是1928年以前呢?²⁶另外,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中小型的轻工业,而且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图6所示)。中国的铁路线(如图6所示)不多而且分散,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重要网络从而连接所有主要的城市与乡镇。相比之下(如第六章图4所示),在1917年之前,俄国早已拥有一条完整的铁路枢纽系统;俄国的现代工业主要是大规模的重工业,且坐落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众多城市行政中心。因此,在俄国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就能够发动战略性地区的无产阶级支持国家组织的建设,以取代沙皇政府控制全国、主导农村的城市行政体系。但是,对于国民党(或其他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来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它只能转而希望向中国更小、更边缘化的现代工商业部门征税。由于局限于现代城市基础,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也就从来没有打破始终困扰着20世纪中国所有军阀政权的恶性怪圈:财政收入赤字与中央政治控制乏力。国民政府只不过是更大范围内——表面上是全国范围——重演了旧军阀的政权模式。仔细观察一下1927年之后的政权模式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从1925年开始一直到30年代,不论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整编其他部队,国民党的军事胜利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政治理念的灌输和中央的组织与财政都无法跟上形势。倒向国民党的军阀部队既无法解散,又不能完整编。所以跟以前一样,军队在通常情况下仍然由原先的军官指挥,依然从自己的根据地汲取工业、财政以及人力资源来过日子。南京中央政府靠发放军饷和武器来维持其忠诚。²⁷这样的制度安排自然使国民政府无法拥有一支统一有效的、服从中央的军队,更无法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资源实施行政管理。

这样,即使在1931年到1935年期间,南京政府借反共围剿的机会使中央的控制范围从最初的江浙地区延伸到其他十个“剿匪区”省份,但国民党政权仍然“在没有征求各省份统治者意见的情况下,不能随意任命官员。……国民政府也不能在这些地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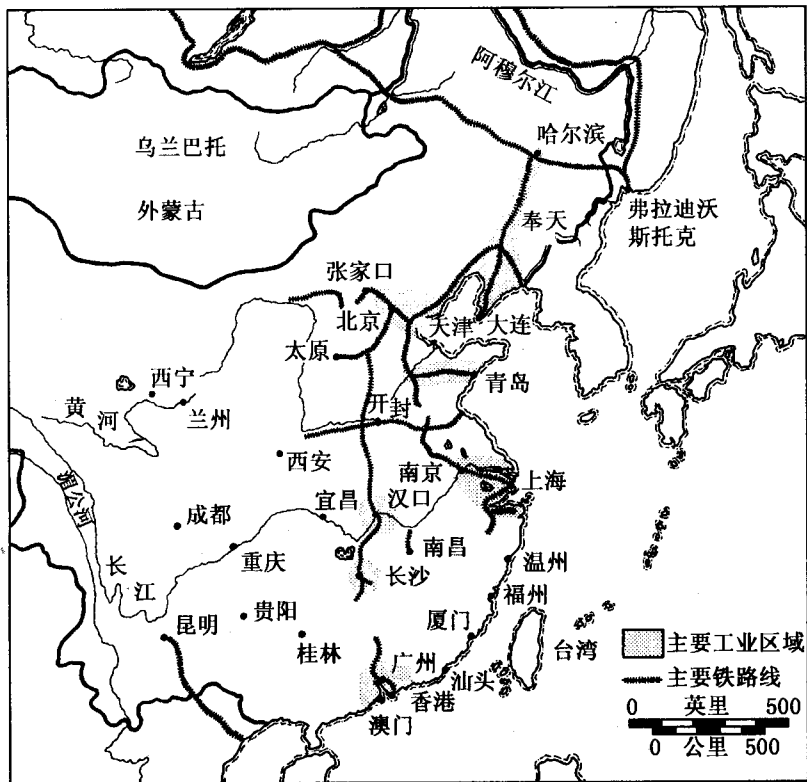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的铁路和主要工业区:1930年前

资料来源: James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p. iv; and Jean Chesneau,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 H. M. Wrigh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23—426.

各省的财政事务依然不受中央控制”²⁸。

另外:

在十个“剿匪区”省份之外,国民党的权威只是名义上的,甚至根本不存在。山西、甘肃、广东、云南以及四川仍然是地区主义的天下。贵州和华北以及西北地区的某些边缘身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自治。在上述地区,各省和地方的军阀自己委派官员、自己管理行政和财政事务,几乎或根本就不考虑中央政府的想法。²⁹

最后,即便是在已经确立了绝对军事和行政控制的省份,南京政府明

显缺乏能力或者极不情愿去改造基层乡村的政治制度，并推动社会经济改革。在县级官僚体系以下，士绅们依然控制着局面。³⁰

反过来讲，由于对农村的政治控制是极其肤浅的，南京政府在 1928 年到 1936 年把土地税收权力下放给了地方以及各省的统治者。国民政府转而完全依赖于容易征收的城市财政收入，包括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国际贸易关税，还有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发行的高利率的公债。³¹但是这种政府财政方式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从好的方面来说，上述财政措施对于幼稚的现代工商业部门毫无影响；从坏处来讲，这些措施反而限制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打击了民众的储蓄以及长期性生产投资的积极性。所以，国民政府如此倚重的城市经济即使不是被完全遏制，也是严重受限。³²国民政府更不可能直接投资于经济发展，因为它的全部财政收入都消耗在行政支出、特别的恩惠以及军费开支方面了。

最终，随着内部活力的逐渐丧失，国民党政权因为各种政治纷争而消耗殆尽，蜕化成为一帮依据与蒋介石的亲疏远近而划分的各个官僚派系。³³作为统领着军事委员会的“总司令”，蒋介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才智投入了如何对付其他军阀以及剿灭“共匪”的军事行动上。他还不得不关注如何控制互相争斗的政治派系和桀骜不驯的下属军官这一微妙的进程，要么以资助和荣誉职位加以收买，要么打破其平衡使之无法联合起来反对自己。文官参谋和行政机构附属于军事系统，其官员的任命仅仅按照蒋介石个人亲信的恩惠关系来设立。国民党停止吸纳民众所支持的人员，丧失了苏联指导下的那种决策与协调职能。群众组织不是自行萎缩，就是纯粹用来消减工人、农民以及学生的政治积极性。

如果国民党政府迎接国内挑战的时间有 20—30 年（而不仅仅是 10 年）的时间，那么，它也有可能在中国的核心区域确立长期的军事——政治霸权，虽然会付出社会经济的持续停滞的代价。但是，即便是这样都不可能，只要日益紧迫的农村危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匪和共产党军队的残存势力源源不断地提供农民后备军。而且，现代国家的政府又有哪个能够不受外来压力的干涉呢？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而言，1930—1936 年期间，国民党政权无力反抗日本的蚕食，最终招致 1937 年日本的全面入侵。不言而喻，南京政府肯定无法抵御一个工业强国发动的大规

模战争。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敌人力量太过强大，还因为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国民党政权的内部虚弱性：它无法动员中国潜在的财富，更不愿意冒危及到上层社会的军事统治的危险来发动民众参与。

国民党被迫从富裕的沿海城市撤退到了内地，这就更为加重了政权本身固有的弱点。迁都到重庆后，由于失去了可以征税的大城市，国民政府转而寻求应急手段：一方面通过地方士绅间接地从西南地区的乡村经济榨取税收；另一方面出借高利贷，滥发根本没有保证的纸币。苛捐杂税只能加重农村的苦难，并未使政府获得充分的财政收入与物资保障。高利贷和滥发纸币的政策带来了城市生活的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政府机构的人员和市民饱受物价飞涨和生活必需品短缺之苦。除了纯粹短期投机之外，任何投资都变得毫无意义。³⁴

虽然经历了如此的苦难，由于抗战一直进行得不顺利，国民党的城市支持者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巴芭拉·杜奇蔓(Barbara Tuchman)在其所著的《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在华经历》一书中所描述的情形相当可信。³⁵当可以任意压榨的资源被切断之后，国民党军事政权就纯粹为生存而挣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政权的军事组织分裂为各部军队各自为政，各个地区的长官兼管军事和民政的局面。表面上，各自为政可以防止被日本人一举击败。实际上，这本身反映并恶化了蒋介石无法从中央来直接控制全部军队的事实。除非害怕受到直接的攻击而削弱自身势力或者地盘被其他军事长官夺取，任何一个长官都不接受命令或劝告主动对日本人作战。另外，就连蒋介石本人也不情愿动用自己最精良的部队去抗击日军，甚至也不愿意用这些力量来控制半独立的下属。因为他认为，西方迟早会打败日本，要保存实力同共产党作战。蒋介石之所以能够控制住各派军队，是因为作为政府领袖，他自己拥有财政资源；特别是，他善于运用各种手腕与阴谋，扶持较弱的一方来遏制强大的一方。结果，40年代最终形成了让史迪威将军大为光火的局面：极其庞大散乱的军事组织根本无法进行战争，因为它根本上就是蒋家军事政权的一个松散的政治外壳(伪装/遮羞布)。只要触动一处，整个结构就会崩溃。

此外，战争一结束，蒋介石政权就迅速解体，特别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可怕的竞争对手。相同的条件可以加速国民党的解体，却提升了

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解释其中的原因，让我们回到1927年，看看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之后，共产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第三节 共产党与农民

1927年到1928年期间，经过国民党的整肃清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力量遭到了灭顶之灾。群众运动被遣散，数以千计的干部惨遭屠杀。痛定思痛，共产党从清洗中认识到“惨痛的教训在于，在变化多端的军阀与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仅仅依靠精英分子来发动工人与农民运动来组建政党组织和领导权力，将会是徒劳无功”³⁶。

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

共产党领导集团遗留下来的少量成员所面临的发展机遇相当恶劣。他们必须面对军阀和处于上升阶段的国民党政府等敌对势力，这些势力借助于城市生产力的优势和外国援助来保持军事实力，把共产党赶出了中国的城市。当然，许多共产党的领导难以消除对于大城市的痴迷。1927年之后几年中，共产党曾经举行了数次起义试图重新夺取大城市，一般是领导觉醒的农民和工人所组织的大规模暴动，以及寄希望于在与国民党较量中的落败者这样的假定会忠诚的小股武装力量。所有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并且牺牲惨重。虽然仍有一些领导人不时地尝试攻取城市，而且苏联（以及以城市为中心展开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一再要求共产党不要放弃工人无产阶级，但是，共产党的许多派别开始逐步探索获取胜利的新型战略：即以农村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³⁷

这一战略是当时环境下唯一可行的战略，因此，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采取与法国和俄国不同的方式来跟农民共事。共产党没有强迫农民加入由中心城市供给与指挥的职业化的常备军；相反，他们说服农民自愿地为红军提供人力物力。如果共产党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地区主义习惯的方式而行事的话，农民是

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红军提供这种支持。游击战争采取的是分散化的作战方式，因此内在地符合农民的天性。³⁸但是，从原则上讲，游击队也可能是打家劫舍式的、散兵游勇式的武装团伙。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直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建设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就在于既运用了游击战术，又通过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进而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而且，红军发展出了一种新型模式，即不仅要行军打仗，还要与农民合作，并发动群众。

与俄国内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以及1793—1794年由山岳党人领导的法国军队）一样，中国红军也充斥着政治委员和委员会。但是，苏联红军中党代表的首要任务仅仅保证由不同阶层组成的职业化的征募部队的忠诚。而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干部更加侧重于教育所有军队成员团结一致，完成党的目标。³⁹尽管基本的军事纪律没有松懈，但是淡化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地位和待遇差别，同时强调普遍的思想意识忠诚。在缺乏严格的、中心化结构的同时又处在经济窘迫的环境下，要想使军事行动有效，上述一切就是必需的。因为红军是一支游击队，是由能够采取独立灵活作战方式的分散作战的小股武装组成的。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红军必须能够有效地协调，随时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与苏联红军一个特别不同的地方是，中国红军的任务还包括团结普通民众。⁴⁰这就意味着，必须尊重农民的生命、财产和风俗习惯。这还意味着，红军只要能够在攻占的地区站稳脚跟，他们就会尽力以两种途径来参与当地农民的正常生活：一方面，红军自己从事生产劳动，自给自足，不给农民增加负担；或侵扰农民；另一方面，为了获取农民的积极支持，红军在他们保持联系的乡村展开政治教育，开展党的活动，建立民兵组织。总之，为了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红军不但从事战争，同时还承担了经济与政治宣传活动。

1927年之后的几年中，红军已经开始成形。游击战争是共产党人唯一可以采取的方式。在国民党统治或者军阀控制比较薄弱或者管辖范围相互交错、断层的地区往往可以组织队伍。同样重要的是，小股的、分散的游击队伍最初是由实际上并非定居在地主士绅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农村的个人或者团体组成的。相反，最初招募的游击队员可能是在偏远地

区——比如说几个省份交界的山区——从事非法活动的农民。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中国农村的情况以及那段时期危机情形来看，中国共产党非常幸运——但是也并非偶然，大量的潜在的、逃亡的农民可以源源不断地满足共产党招募士兵的需求。

这里有 20 年代末两支相对集中的共产党早期红军力量的相关资料：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游击队；⁴¹ 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进入华中地区的井冈山“红四军”⁴²（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两个地区的“革命”力量是由土匪、散兵以及走私者等社会各阶层的边缘分子组成的。领导他们的通常是本地的首领以及共产党的干部，而这些干部一般是一些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作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两个地区的队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除了散落在山区根据地的一些贫困村落之外，这些弱小的红军部队似乎没有长期控制着覆盖众多村社的广大地域。红军与农民的接触是短暂的，通常也是秘密的（比如在晚上跟山区根据地以外的乡村里的亲友接头）。这些红军不得不跟土匪一样，到外面去打家劫舍，以谋求自身的生存。但是跟土匪不一样的是，红军中的党员始终向队伍和暂时领导的农民进行宣传，始终铭记共产党纲领中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而且，只要条件允许，红军就没收士绅和地主的土地并且分配给农民，以此来吸引贫苦大众。

然而，当“红色土匪”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很明显，共产党自身有更大的目标。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早期策略的成功不仅使红军生存下来，而且还不断扩大。红军不断扩大使自身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跟当地从事生产的农民保持直接稳定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游击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心所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零散的游击队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成为夺取国家权力的军队。原则上，共产党能够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如征税、减租、没收士绅财产并重新分配、提供地方社会服务、抗击劫掠的军队等——这些措施都能够满足当地农民的需要。但是，要想贯彻这些措施，就必须直接深入农村社区，这就意味着在乡绅、富农及其支持者的身边或眼皮底下开展活动，并最终取代他们。相应地，要想实施这一相当复杂的政治过程，共产党干部就要到乡村中开展工作，并且至少有最

低限度的军事行政提供安全庇护。然而，获得对根据地的军事和行政控制，也正是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而不断扩展的红军的第一需要！中国共产党要走向最终胜利的道路，就必须发现并创造相应的条件，在保证根据地安全的同时，还要尽可能运用压力去渗透、重组当地社区——这样就可以让共产党与当地农民建立直接联系。

早期的“红色土匪”战术运用在敌人武装力量比较薄弱或者分化的乡村地区（例如在1928—1930年北伐之后，因为国民党和军阀之间的纷争不断，华中地区的统治就比较薄弱）。这些战术很快就“开始奏效，并创立了更大的内地根据地和扩展了军队”⁴³。这样，到1931年，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由于战争的胜利，所管辖的居民从9万增加到3000万。在短暂的苏维埃政府时期，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试验了发动群众的办法，吸引乡村资源来支持他们的队伍。⁴⁴但是，乡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结构的永久性变革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因此共产党也就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经济源泉和农民的人力资源。因为苏维埃的行政机构比较初级，从未直接深入到地方基层去取代地方精英。并且，根据地的安全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也就没有为攻击地主和富农、分享共产党干部所没收财产的农民提供可靠保护。

在平定了华中地区对抗南京政府的主要军阀势力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动其装备精良的军队进攻江西苏维埃政府，并受到了对共产党社会革命政策深感不安的各个地方当局的默许和支持。最初，游击战术成功地让国民党军队陷入困境。但是到1935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由德国军事专家策划）的成功，迫使共产党撤出了相对富庶的华中根据地。在经历了坚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之后，⁴⁵共产党的剩余武装到达了西北贫穷、落后、偏远的陕甘宁地区，在那里重新集结、延续。陕甘宁地区早就活跃着一支红军队伍，并且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当地的贫苦农民。⁴⁶在华中地区迁徙过来的红军与当地红军会师之后，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势力大增。

第二次统一战线：干部扩充与行政控制

就在这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国民党政权本身固有的弱点来理解——交织在一起。局势的变化使得共产党可以有时间

在西北地区立住脚，并且在有利的环境下发展根据地、壮大势力，并向全国推进。一方面，自从1930年以来，日本对中国主权的蚕食让众多关心政局的中国人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民族主义立场产生怀疑、失望。蒋介石所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即便从蒋的角度来看具有政治合理性，都不能吸引受过教育的市民。因此，当共产党在1935年开始重申自己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提倡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时，在城市中赢得了极大支持。⁴⁷此外，一旦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立住脚跟，蒋介石就不得不依靠拥有自主权的军阀张学良来打击共产党。但是，张学良的部队都是东北人，他们是被日本军队赶出家园的。因此他们就很容易和共产党结成事实上的同盟来抗击日本。结果，1936年，当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促他的军阀同盟加强征讨红军的时候，张学良“囚禁”了这位总司令，并在蒋公开同意与共产党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就予以释放。⁴⁸

对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获得喘息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在爱国主义斗争的背景下，共产党可以拓展对受教育人士的影响。加入统一战线之后，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在名义上受国民党的管辖。共产党同意淡化阶级斗争的宣传，转而提倡民族团结与温和的改革。作为回报，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那里获得了跟地方政权同等的津贴待遇，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国民党军队的骚扰。⁴⁹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于所有统一战线中的主要武装力量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军事灾难。所有的武装力量都无法阻止或者抵挡日本的进攻。但是，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大片领土这一背景，却为早已致力于农村发展的共产党创立了新的政治机遇。

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国民党赖以存在的城市，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无法有效地控制广大农村。所以，共产党游击队的根据地就迅速成倍增长。面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大西南地区，同时其政府权威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一并崩溃。这使得共产党能够突破原先延安胜地的范围，把政治与军事影响扩展到广大的华北和华中地区。……抗日战争期间，受农民支持的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逐渐撒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星星火种，到1946年国共两党展开全面内战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其决定性的影响。⁵⁰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削弱了国民党的能力,而共产党却能够利用这一条件,因为共产党把知识分子后备军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农民的利益(包括有效抗击日本和在地方性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消除士绅的权力)最终成功地协调起来。⁵¹一方面,共产党把他们的事业和坚决抗日的民族主义诉求联系起来,从而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延安去……并且在西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为日后共产党根据地和游击区的迅速扩大培养了大批政治、行政和军事干部”⁵²。另一方面,他们能够直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抗日、生产和阶级斗争,所以共产党就能够获得超常的资源,以至于在1946年之后把国民党赶出了大陆。然而,这两种运动并不是完全同步进行的,也不是没有矛盾。

1937年到1940年间,在统一战线如火如荼地开展阶段,共产党的主要利益似乎侧重于避免介入乡村的内部事务。当然,共产党也改革税收,鼓励青年参加红军,组织地方防卫力量,偶尔也有工作组进驻到乡村。但是,共产党没有系统地发动农民,没有试图大规模地重新分配土地。⁵³值得注意的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时期,许多传统的支配阶级家族和精英分子生活依旧不错。共产党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影响:比如说,地主经常被迫减租减息;富裕家庭比穷苦家庭要交纳更多的赋税。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花招:如果农民不在私下里交纳“正常”的租子,地主就会暗地里以收回土地相威胁;或者,富农家庭偷偷地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几个儿子,或者临时性地“赠给”同一宗族的穷亲戚,以逃避高额捐税。不着重建立乡村内部的组织以贯彻改革,变革就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际作用。而且,统一战线期间,所有阶级的成员都允许,甚至是受到鼓励来参与政治。结果,许多地主或曾经是地主的人员就在政府中供职,有的还发展成为党员。

本质上,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就像是新建立的中国传统王朝或是取得一定胜利的起义者,或者是受国民党监督的地方省份军事政权,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共产党竭尽全力地建立和巩固自己在地区和根据地的控制。⁵⁴自然,所有努力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红军主力部队以及支持游击队和民兵的发展。另外,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共产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加上有经验的高层政党干部和传统的官员做后盾(当时是鼓励这种做法的),所有这些都成为乡镇与地方

层次的管理者，制定出了社会经济政策和行政管理计划。作为主要决策中心的权力职能部门出现了，这些权力中心位于从地区层面往下延伸到基层各个部门的垂直体系的顶端。上述权力中心头重脚轻，只注重政策不注重乡村事务。它们的功能是共产党行政机构官僚化，而非发动农民实行改革。表面上，地方官员最接近民众，但实际上只知道贯彻政策，甚至是无所作为。到1940年为止，共产党对北方根据地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的程度，与传统的、有效的中国政府所能做的差不多。诚然，日本军队的占领使共产党难以进入城市和乡镇，也远离主要的交通和运输枢纽。频繁的战事也使根据地的边界动荡不定[根据塞尔登(Mark Selden)的研究，上述困难主要是在1940年之后才更加紧迫]。但是，总体而言，统一战线的第一年对共产党来说是很好的机遇，在国民党不情愿的默许之下，共产党巩固了对广大地区和众多人口的切实控制。

然而，到1941年，统一战线初期的成功发展“破坏了它的基础：共产党的迅速扩大加剧了与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的尖锐矛盾”⁵⁵。日本军队开始发动针对共产党的大规模进攻，因为共产党“对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⁵⁶。而国民党也加紧了对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封锁，停止向其军队和行政机构发放津贴。在外界的压力下，共产党不得不向农民施加了沉重的负担。并且，除非实行变革，否则共产党就必然要采取跟传统的行政机构同样的方式。正如塞尔登指出的那样：

到1940年，全国范围内军事失利与封锁加剧，农民和政府之间矛盾的升级，使共产党面临着是否能够在边区内实施充分的管理这一根本性问题。是不是仅仅要替换掉传统的精英分子，代之以新的干部中坚，而置农村的贫困和压迫于不顾？地方干部是否能够实行农村改革，并永久性地取代传统的地主精英，成为乡村生活中的统治力量？边区内孤立的乡村是否能够与党和政府的高层发出的全面政策建立有效的联系？建立垄断有文化、有经验的行政官员，同时代价巨大、距离遥远的官僚机构是否是边区治理和政治化最有效的手段？⁵⁷

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准备战争以及土地改革

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发现很有必要深入发动民众，以支持抗日战

争和发动同国民党的内战。^{*} 这一迫切要求促使共产党发展出“以统一的纲领实施战时动员的具体办法,就是把军事斗争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的,渗透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家庭甚至每个人”。⁵⁸ 这一纲领一开始并没有号召反对地主和富农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求党的干部直接参与农民生产,致力于提高经济产量。实际上,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是受到封锁的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关键。也是边区人民是否能够节余充分的资源以投入工业、教育以及至关重要的军事等非农业活动的决定性因素。

在党的干部到地方上承担发动群众的新任务之前,必须实行党内改革。从1942年到1944年,共产党进行了整顿(称之为整风运动)。⁵⁹ 这是一次彻底的党内教育运动,主要运用小组讨论和批评的手段。主要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思想、整顿党内的不同派别——包括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思想僵化的传统精英分子以及贫苦年轻的农民。“整风”运动之后,共产党形成了走“群众路线”的方针。上述方针认为,既要推进社会变革总战略的形成,又主张党的干部与群众的政治组织和具体的地方事务建立直接联系,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泽东对于群众路线的概括,毛泽东写道:

这意味着,把群众的意见(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和解释,作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看法是否正确。然后再次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⁶⁰

毫无疑问,群众路线的提出并没有描绘出事物发展的真实程度,即党的基本目标与动议并不是来自于群众,而是出自于党的高层领导。但是,也确实展示了现实图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最严酷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说服与参与的政治领导技巧。正如毛泽东在前面所引用的文件中指出的:“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将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

^{*} 此处与史实不符,当时中共的方针仍是团结抗日,同时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作斗争。——译者注

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密切结合，愈是需要将总体号召与特别的指导紧密联系。”

在党的整顿期间，边区的行政结构也实行了变革。⁶¹数以千计的高层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被委派到县或县级以上开展工作。工作的重点从原先地区层次上的功能性部门事务，转移到了地方层次上的发动乡村群众。党对行政工作的影响加大了，因为党专门负责政策协调与发动群众的事务。最后，党的干部——特别是那些以前领导无所作为的县乡等次区域行政机构的，年轻穷困的农民干部，当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干部——接受鼓励，到党号召建立的新型农村生产协作组去担任非正式的领导职务。

塞尔登和舒尔曼(Frangz Shurmann)都强调，合作化运动(1943年共产党发动的)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办法，更是在华北农村形成新型组织与领导模式的途径。⁶²这种新型模式并不实施强制的行政命令，反而加强了传统的劳动协作方式，并转化为由党的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领导的协作组织，而不是以前地主与雇农间的那种关系。当时，这种合作社的任务是不仅要帮助农民改善生活，还要支援战争。合作化运动值得注意，因为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乡村基层积极地介入生产活动这一农民生存的核心地带。党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开始发生转变，以前通常是针对地主和富农为主的经济活动。现在，党和行政工作的各个方面(即有关教育、经济改革、战争动员等事务)转而着眼于农村生活。这一切不仅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带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并最终促成了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⁶³

实际上，在1946—1947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与国民党的内战重新开始，共产党在解放区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土改政策。所有属于地主、富农以及各种组织的土地一律没收，并重新分配给贫下中农，无论男女老少，尽可能地按照人口绝对平均地分配土地。解放区正在处于全面内战的动员期间，上述政策几乎没有考虑促进内部稳定的问题。而且，就像舒尔曼指出的那样，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经济生产率，和/或扩大行政控制，避免激进的“阶级斗争”政策。

那么，为什么恰好在40年代晚期，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致力于夺取

最后的军事胜利并获得政权的同时,会发生这种革命性的土改呢?舒尔曼提出了一种包含了两方面因素的复杂解释⁶⁴:一方面,共产党先前发动群众的活动,早已造就了一批新型的年轻、贫苦的农民干部精英,他们在各种日常的乡村事务中一直在跟传统的地方领导势力作斗争(而且,外来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到乡村事务中,他们往往支持,甚至推动更加激进的变革,尽管舒尔曼没能强调这一点)。另一方面,在内战的背景下,党的高层领导也有理由希望一劳永逸地铲除传统的支配阶级。因为,只要这些家族手中把持任何权力,他们就会有意愿、有能力起来组织反对共产党的地方势力。此外,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分配给贫下中农,农民就更有动力支持地方民兵和人民解放军,因为这些队伍是为了保护他们新获得的土地权利而展开斗争的。⁶⁵舒尔曼的解释说明了两个问题:为何共产党高层领导会同意开展激进的土改运动,为何这些政策会在众多的农村引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因为,一旦展开,土地改革就具有了惯性。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提到的“极左”问题表明,他们并不能完全控制村干部的行为。许多人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离开了中国,在他们的回忆里,土改时期相当恐怖。随着军事斗争越来越激烈,土改中的激进倾向也更加严重。最初平分土地的计划最终引发了革命式的恐怖,并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精英。⁶⁶

1946—1949年在华北所经历的一切,是中国共产党军事需要与中国农民社会革命的潜在要求相互作用的独特结果。在发动农民支持根据地的行政机构与军队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渗透并改造了地方基层社会。因此,农民阶级获得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政治结构中所不具有的组织化的自治与团结。农民一旦获得了这些手段,(在农村中)成为了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就有可能像1917年的俄国农民那样彻底地打击地主,而事实上也的确这样做了。与俄国农民不同的是,中国农民除了在当地共产党干部的支持与鼓励之下反抗地主以外;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所提供的军事和行政的“保护伞”之下发生的。因此,与1917年俄国农民革命不一样的是,中国农民革命并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农民自治。相反地,中国的农民革命加强了农民与共产党之间原有

的政治联盟,并且鼓励农民加倍地支援红军,因为红军的胜利是保障农民社会革命、维持其获得农村财产的依赖。总之,中国共产党寻求农村资源以抗击日本侵略者、军阀以及国民党军队,并最终引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革命。相应地,社会革命则最终触发了农民参军的热情,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使得红军能够把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赶出城市,赶出了中国大陆。

第四节 新制度

1949年10月1日,获得胜利的共产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几年间统治重心向城市中心的彻底转化,到50年代末期,共产党已经巩固了不同于过去帝制政权、民国政权/军阀政权的新型政权。就其结构和运行机制而言,新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政治体系大体上类似于法国和俄国的新制度,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独特之处。因此,这一节将通过讨论中国革命后果与法国、俄国革命后果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而对这一章以及第二部分作一个总结。

国家官僚系统的强化

同法国和俄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经过革命高潮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催生了一个更为庞大、更加强有力、更加官僚化的新型政权。负责行政管理的政府与负责决策、协调,以及监督的政党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区别但是密不可分的组织层次体系。这一体系以北京为中心,中间经过许多层次,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工厂、学校和居民区。从孕育之时起,这种政党国家就已经规模宏大,相比之下,19世纪清政府的国家机器才拥有4万名官员,⁶⁷而国民政府倒台时期(1948年)也不过两百万工作人员。⁶⁸这样,到1952年,共产党的“国家干部”或者说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白领与行政事务人员,已经达到了331万,到1958年为止接近八百万。⁶⁹共产党员的人数也同样值得关注:1953年有610万党员;到1961年党员

人数急剧增加到1700万。⁷⁰1953年官方统计全国人口是5亿8千3百万,党员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人口的百分之一。⁷¹与之相比,19世纪拥有儒家功名的人员——类似于共产党员,占据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职位——的数量还不到总人口的0.3%。⁷²

鲍大可(A. Dock Barnett)指出,共产党政权“把中央政权的权限和影响拓展到史无前例的范围”:

在中国的传统中,至少在国家存在强大统一政权的时期,中央的权力经过完善的官僚机构,可以有效地传递到县一级。但是在县级以下的“非政府层面”上,传统的精英集团如“士绅”以及各种非官方的机构团体把持着整个局面。共产党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形。他们基本上摧毁了旧的精英集团和绝大部分传统的社会团体,代之以新的共产党精英和新型的共产党建立、控制的群众组织,把党和政府的正式的官僚机构的影响扩展到乡村一级。⁷³

同样地,新型的政权把自身的活动延伸到其他功能领域,如指导经济生产、提供社会和教育服务等方面,这在革命以前并不是国家的管辖范围。⁷⁴

共产党的新政权得到巩固之后,明显比旧政权更加官僚化,尽管革命前的帝制政权的官僚化程度已经非同一般了:由于旧政权通过全国统一的科举制度来招募官员,较其他的农业君主国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其官僚化程度更为突出。各级共产党领导人的任用采用新的标准,除了教育背景和技术专长之外,还要考虑,甚至更加看重其阶级出身和政治品德。但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政治标准还是以完全客观的方式进行的。尽管由于其招募正式官员标准本身的单一化,人们会认为共产党新政权的官僚化程度要低于旧政权,但是共产党政权在其他方面要更官僚化。那些关键性的变革类似于法国的情形,在法国的旧政权中也存在着阻止官僚化的类似障碍。社会中的更多领导职位,尤其是地方各级领导职位,转化为有组织的官僚等级体系中领取薪金的官职。同样地,从两个层面上看,所有的领导职位及其职责和特权都受到了客观的限定。一方面,它们被界定为隶属于某种机构并具有特定目标的官职,而不再是帝国儒家体制下所盛行的那种界定宽泛、职责不明的职务。另一方面,与帝国王朝时期相

比,这些官职真正地与私人利益和财产脱离开来。官员再也不能合法地把公共税收和个人收入混在一起,也不能在完成国家和政党的公务的同时,公然地追求自己的家庭(或者宗族、地方)利益和政治企图。

上述变化的意义在于,19世纪侵蚀了中国清王朝的中央行政和军事权威,并在1911年之后继续存在着的地方势力集团,随着共产党党国家的兴起而瓦解了。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相互融合以及中国中央权威缺乏控制政府官员和地方领袖的部署和活动的的能力,是导致1949年以前这些势力集团存在的原因。虽然在1949年以后,各个省份的政治派系斗争和彻底控制地方领导的问题仍旧不断困扰着中国,但是,共产党党国家的确立从根本上克服了阻止国家中央集权的结构性障碍。⁷⁵可能的地方势力集团会被(实际上已经)调走或者遣散,中央权威能够提出并贯彻自己的政策,深刻地影响到地方村社。

共产党中国与苏维埃俄国

如果说中国的新制度与法俄两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如集权化、官僚化以及国家在社会中占有很大分量等等,那么,新中国政权在某些具体的特征上更接近于俄国。傅高义(Ezra Vogel)精辟地指出,中共政权是一种“政治化的官僚机构”⁷⁶,而不是法国那样的以市场引导的国民经济为背景的理性-法治行政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权与苏联的一样,所有的政府组织都在党的控制之中,都要为实现党的高层领导所设定的全国性目标而协调一致。此外,还与俄国相同的地方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能与大多数群众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够贯彻自己的政策。这是因为公民被政治上相互协调的类似于“传送带”的各种组织机构整合起来,这些组织包括各级代表大会(从地方到全国的各个层次)、居民区和劳动团体、青年、妇女、工人等的群众性协会。⁷⁷

为什么中国的新制度更加类似于俄国而不是法国?的确,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是仍然值得回答。毕竟,在前面论述为什么俄国革命会产生政党控制的国家而法国的雅各宾派却最终失败的原因时,我强调了大规模现代工业(存在于俄国而不是法国)的重要性。这些工业为那些依靠发动群众,并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党提供了某种基础,使得政党在

完成了重建国家政权、抗击反革命威胁等最初的任务之后，得以生存下来并得到巩固。然而，从整体来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更类似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而跟沙皇俄国晚期突出的工业化程度不一样。18世纪末期的法国经济和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都是以农业-商业经济为主导，基本上以小农生产为主。中国革命后果的基本形式之所以接近俄国而不是法国，仅仅说明世界历史和国际背景两大因素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果：(1)先前的俄国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政治影响；(2)20世纪国家推动的民族工业化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首先，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有明显的塑造作用：只有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才得以深化为社会革命，并引发了政治革命运动。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在苏俄的指导下开始发展的，也都借鉴了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模式。另外，中国共产党在最初阶段还模仿布尔什维克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和导向的革命战略。即使当这一初期战略遭到失败，共产党撤退到农村并最终与无产阶级和苏联的指导割断联系之后，党依然保持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结构以及意识形态上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⁷⁸这种政党组织使得他们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积极地发动农民的广泛支持，在农村确立了法国革命者从未拥有的坚实的政治基础。1949年以后，在巩固对于城市乃至全国的控制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列宁主义组织模式和意识形态遗产就使其自然地模仿苏联政权的基本特征。

其次，1949年之后，中国的基础条件和国际诱因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苏联式政党国家模式。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不同的是，20世纪中叶的民族自治与国家权力都依赖于工业化。同样重要的是，国家指导的大规模现代工业以及国家为增进全国工业化而实施的计划和动员，是很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对于在已经具备一些现代工业的国家中获取权力的那些政权。在中国，从19世纪晚期开始，外国资本家和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已经在国家的边缘建立了一些现代工业，特别是在满洲——中国在二战后打败日本收复的地方。另外，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竭力模仿由国家推动民族重工业发展的斯大林模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初是在苏联指导下以无产阶级为

基础的政党；因为党从城市撤退到农村之后确立了群众基础；因为只有少量的大规模现代工业可以成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制高点”；因为斯大林式的迅速工业化的道路吸引着中国去模仿，所以，在 1949 年进入城市并且稳固了全国政局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自己的职能限定为管理经过改造的小农经济的国家行政人员。在整个 50 年代，共产党循序渐进，逐步发展：把党和国家的管理范围扩大到金融、工业以及商业企业；把城市民众（包括工人、学生、专业人员以及消费者）的群众组织置于党的影响之下；实行农业集体化；贯彻国家控制的国民工业化计划。此外，中国共产党（在 50 年代的前 5 年内）是在苏联的指导下运作的；技术专家和资本设备都来自于苏联；中国则是以出口农产品和在对外政策上听命苏联的霸权作为对苏联援助的回报。⁷⁹

事实是，到 20 世纪中叶，从组织机构方面来看，共产党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斯大林制度的翻版。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就确定无疑地体现了斯大林式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对其主要的目标做了精确的概括：

第一，首要的任务是实现经济增长率的逐年提高，或者至少五年总平均增长率的提高。第二，尤其要集中全力实现工业发展。第三，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第四，提高储蓄率，实现高投资，以确保前三个目标的实现。第五，牺牲农业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第六，实施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制度改造（如农业集体化）。第七，偏重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生产技术。⁸⁰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中共竭力照搬苏联的经济计划和调控模式。⁸¹ 中央设置了各个部委以调控工业投资，监督资源调配和企业运行。特别是在大型企业内部确立了“一长制”（one-man management）：在此制度下，厂长对国家计划具体要求的完成负责。通过明确的层级管理系统，借助于详尽的规章制度和落实到个人的生产标准，厂长控制着企业的所有运作过程。为了这种企业计划与调控体系顺利运转，还提倡实行区别对待，逐步拉开个人社会经济回报的差距。与此同时，与大多数农民和小型工商业单位的乡镇工人相比，现代大型重工业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50 年代期间，上述部门（即农业和小工商业部门）正在

经历集体化,但是它们在现存的国民经济计划中的角色,只能是生产更多的经济资源,以输往城市和重工业部门。

但是,从1957年起,中共的基本政策发生了调整。即便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中共领导就开始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政策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激烈的辩论,中共领导集团内部暂时形成了一种共识,赞成均衡发展的国民经济计划,重视农业的发展和以农村和消费者为导向的工业。⁸²另外,到60年代初期,中苏同盟分裂。苏联的援助和技术人员撤离中国,中国奉行与苏联对抗的外交政策,独立发展了自己的核能力。

就在上述基本政策开始调整的时候,中共领导就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发生了分歧: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动员群众?还是依靠缩小城乡差别,缩小领导与群众的差别以及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别的配套政策?当中共在50年代末期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的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领导人,鼓动不仅要增加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他们还号召党的领导人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来参与发展,并且要改革组织结构和报酬方式以促进这种发展。1958年到1960年间的大跃进实验表明,这种方式搞得一团糟。结果在60年代,中共围绕政策的抉择展开了激烈斗争。中共大体上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毛泽东路线,他们主张沿着以农村为导向和发动群众的路线继续前进,并扩展到城市工业和高等教育机构之中。另一派是刘少奇路线,他们主张回到以城市为导向的、依靠教育精英来实施官僚管理的战略,同时主张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和向农民提供优惠政策,来提高农民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农业发展。这场党内路线斗争最终发展成为1965年到1968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毛泽东发动的群众造反运动(以及由军队接管权力)。而斗争结果暂时倒向毛泽东路线一边。⁸³

10年后的现在,许多原先“倒台”的领导又重新恢复权力,并且调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实行的政策。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所有的领导集团和政策重心的起落变换之中,(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完全恢复到对斯大林模式的模仿,也没有同苏联重温旧好。中国共产党为了追求有自身特色的革命路径而不断摸索斗争。中共的斗争也没有沿着20

世纪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轨迹发展：斯大林在俄国胜利所带来的灾难并未出现在中国。⁸⁴相反，遭到整肃的领导集团（遭撤职和羞辱，但是没有遭杀害）不久又会重新复职；政策趋向不断变更，原先的成果有所倒退但随后并没有完全否定。所有这些领导集团的斗争和路线的改变之外，自1957年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民族发展战略，政治协调和领导方式，以及社会分层模式。所有这些不仅与法国革命的结果大相径庭，与俄国革命的结果也不甚相同。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中国革命的结果。

国家发展的均衡战略

与斯大林时期俄国极端偏重于城市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两条腿走路”战略。对于大规模的技术先进工业的投资仍在继续，但更多地侧重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培植小型乡镇企业和中型地区企业，以服务于农民的消费需求，出产农业必需品（如化肥、电力、农具等），对地方资源和农产品进行加工。⁸⁵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城市化速度，使其发展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使城市化的发展转向小城镇而非大都市。结果，用斯格森（Jon Sigurdson）的话说，

20世纪50年代常见的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内部人才流失——已经基本上发生了逆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受到了两股逆向人口流动潮流的影响。

首先……大批城市中学生接受号召上山下乡……

其次，在建设各种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大批专业人士——教师、管理人员、医生以及其他医护人员——也来到了农村。⁸⁶

此外，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设计出许多方法，不仅把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送到农村，还改造现代技术和专业技能以适应农村需要。有关措施包括发明创造出“中间技术”以解决地方工业；普遍推广简化的准职业性培训项目，如“赤脚医生”项目以及在农村地区自己创建全民教育体系，提供初等教育和面向农业的中等教育。⁸⁷

在这种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背景下，农业的集体化已经成为中国的动力部门，能够自力更生，还能为当地的工业和社会服务提供辅助和支持。中共并没有把农村的集体化和政党国家的机构仅仅当作是获取农业

剩余价值或者对农村生活加强控制的手段。1960年初期以后,中国农村生产核算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这是一个集体拥有生产资料、集体计划、耕作的单位。生产队的规模基本上是20户左右的农民,大概是一个小村子或者大村庄中相邻的几户农民。⁸⁸生产队的领导并不是领取工资的国家官员,而是本地选出的,并与其他农民一起劳动。相应地,半脱产的村级“大队”干部则负责各个生产队计划的协调,并负责动员农民参加造福于整个村子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当然,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要听命于上级。共产党的控制直接到达生产大队,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国家行政单位是公社,主要按照传统的集市区域来划分。公社那些领取工资的全职干部监督地方与国家通过协商所定计划的完成情况,协调广义的农业服务和社会服务,并且管理公社的工厂企业。农民负有义务向国家交税,以固定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此外,农民还要交纳一定的基金以维持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运作。然而,中国农村地方政府的显著特点在于其领导责任分散化,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负责人都可以提留本地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节余,并用于扩大再生产。结果,农民就可以经常体会到党的领导下以集体为基础的项目与自身家庭和村庄福利之间的直接联系。与俄国集体化之后的农民一样,中国农民也拥有小块自留地,而且出产率很高。但是,由于中共治理下的国家在物质上支持农业,并且利用地方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各种组织,因此,与苏联的情况相比,中国的集体农业经济生产能力高,对于中国农民乃至整个中国共产主义社会都具有社会生命力。⁸⁹

在此与法国做一个对照,法国的农民在革命之后基本上没有受到国家的保护,而是经历了市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波折变换。法国农业区的农民和受商业化发展恩惠的有特权农民获得了利益,而其他农民要么萧条停滞,要么干脆破产。⁹⁰在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富裕程度和发展水平也存在重大差异,特别是农村里的不同区域。⁹¹但是,由于存在着政党国家与集体化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政党国家对农民周期性的动员,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农民村社和家庭都包括在农业发展当中,并在其进程中赢得福利和收入。⁹²

政治协调、大众动员与平等主义

如果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独特模式的话,其组织领导和社会领导的方式,整体上也不同于苏联那种高度集权化和正规化层级支配结构的斯大林式制度。中国的模式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个是,中国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一直强调全国层面和地方、省份之间的协调与领导责任。所有的项目不可能完全按照各个部委所设计的蓝图和程序来实施计划和调控。相反,许多非大型工业、社会服务、农业发展等项目的策划与管理责任就下放给“低层”地方或地区领导。计划程序,特别是那些目的是在既定区域内调配经济活动的程序,都是相当灵活的,其侧重点不是执行上层详尽的指示,而是如何适应和协调当地的资源以实现全国总体目标中的某些具体任务。⁹³很明显,这种分权化的计划和领导模式对于工农业联系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⁹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大型工业组织中,自50年代中期开始就放弃了那种一长制的苏联模式,而是实行各种委员会领导制度。其部分原因在于,新模式能更好地适应企业内部的整合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协调,而一长制则突出地强调对预先设计并正式规划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的服从。⁹⁵

另一个是,与苏联完全恢复以职业专家和权威管理者施展个性化的约束方式,从而来控制工人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和城市机构中一再地尝试运用“群众路线”进行集体政治动员⁹⁶。在每一次尝试中,上层对现任的各个机构领导施加的政治压力似乎总是非常必要,因为正是这种压力才能督促厂长们、根深蒂固的政治领导们以及技术专家们放下架子,放弃特殊待遇,与普通工人“打成一片”。这一思想认为,以权威式的命令和拉大距离的方式来管理工人,会损害工人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积极性,所以,如果以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清除掉这些障碍,就能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⁹⁷这种“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哲学并不是一直都在中国占据上风。但是,从大跃进开始,在农村发动群众大搞生产建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在工厂中组建了有工人代表参加的管理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哲学都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烙印。⁹⁸

与俄国相比,与共产党中国这种领导方式相伴随的重要一点是,突出地强调有组织的政治领导。不管这种领导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还是来自

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化的人民解放军(党组织被破坏之后,军队临时扮演了共产党的角色)。在斯大林俄国,苏联共产党逐渐蜕化为领导精英们的俱乐部,其权力来自于他们的职务,如厂长、国家官员和技术专家。⁹⁹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在于,苏联社会的实际权力极度集中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一长制”的精英手中,共产党的作用只不过是监督并保障官僚统治阶层的统一和忠诚。但是在中国,政治干部和委员会一同行使诸如决策特别是政策协调贯彻等各种职能,而在俄国这些职能几乎完全被中央各部委所垄断。¹⁰⁰而且,中国还一再地进行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群众动员,政治指导而非官僚命令的领导方式就显得极其重要。总之,正如鲍大可指出的:

即便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相比,共产党在中国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由于下列事实而得到增强:共产党逐渐超越了纯粹的指导者和其他政治组织监督者的角色,而是不断地侵蚀政府管理之类的权力……在许多时候和许多领域,共产党不仅仅要监督形势的发展,还要介入其中并且领导其发展方向。¹⁰¹

最后,5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的社会分层模式也值得关注。同斯大林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相对而言实行平均主义。各方协调一致来抑制和缩小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城乡劳动者之间以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收入和地位差别。

有关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说明了部分情况。根据埃克斯坦统计,1951年以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为减小,因为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上涨幅度要高于工业产品在农村的销售价格,而且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57年到1972年只是稍微地”增长。¹⁰²埃克斯坦估计,对于城市工业部门本身而言,中国的工资差别(工人之间的不同技术级别)与当时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类似(我还要插一句,这要比30年代苏联的工资差别平等得多)。然而,我们必须考虑从高层厂长到专家以及普通工人的整个工资收入的范围幅度。中国的工资差距幅度是10比1(或者考虑极端的情况,到20比1),要比1934年的俄国平等得多,当时俄国的幅度是29比1,比今天的印度是(30比1)和美国(甚至达到了50比1)还要平等。¹⁰³另外,埃克斯坦还指出,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还要低,

因为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价格较低，很难买到奢侈品。与斯大林俄国的厂长、党的领导人以及特权工人的铺张奢侈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精英享受不到特殊津贴或者消费待遇。

除了控制、消除收入差距的倾向之外，中国还不断地对社会特权和权威发动攻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几年内，制定（或者说是在经过尝试后彻底贯彻）了许多效果显著的措施。¹⁰⁴红军的军衔标志一律废除。“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党的干部需要定期地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厂长、工程师和公社干部也“要求必须用一定时间与他们监督的工人、农民一起劳动”¹⁰⁵。工人代表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在单位具有管理权力。也许最突出的是，中学升入大学的竞争性考试也被暂停了。所有毕业生都必须到工业或农业部门参加劳动；地方基层组织和生产单位在选拔学生上大学的问题上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上述措施显然是力图切断大学精英的社会复制链条，因为实际上大学精英主要来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家庭，他们往往脱离了工厂和农村生产劳动的现实。

当然，把上述情况解释为中国的收入差距，甚至地位和权威的不平等已经完全被废除，就会犯错误了。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采取的一些激进措施随后就被拨乱反正了（尽管没有彻底放弃）。另外，即使是在毛泽东路线实验的高潮时期，（就中国权威领导人而言）也不存在消除不平等的真正意图。相反，正如怀特（Martin Whyte）认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平均主义最好理解为旨在实施对现存不平等的“弱化影响”之类措施和手段，以调动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国家发展。怀特认为：

可以看出，中国平均主义的特点并不在于减少或者消除收入、权力以及教育技能的差别，尽管在这些方面也有所表现。其主要目的在于弱化现存不平等的影响效果，比如说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以及人际关系的远近等等。在中国，职位较高的人就会被人们赋予一定的报酬和权威，但与此同时，同时又禁止炫耀权力和铺张浪费。这样社会中就存在着一种和谐的效应，以模糊现存的不平等的主观效应，以免损害革命名义上的发动者——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¹⁰⁶

另外，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平均主义似乎相当突出。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即使是曾经一再出现的致力于增进平等、深化群众动员

的“毛泽东路线”有可能寿终正寝，中国的平均主义依然会存在。因为事实在于，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在革命的国家权力得到巩固之后，都不存在经济和社会政治平等化的倾向。而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一直到 70 年代中期却引人注目。

中国革命独特后果的原因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后果在众多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尤其是与俄国共产主义体制相比)，这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到了。那么，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本书的分析角度来看，最根本的解释在于：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共领导人在巩固对国家权力和民族社会经济的控制之后，如何依据其政治能力对所面临的条件和可能性做出反应。其中的三种因素尤为重要：从旧制度继承的经济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战略环境；中共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所积累的特殊的政治能力，特别是与农民的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可以解释中国的新制度的发展路径，尤其是自 50 年代以后。

首先，1949 年之前中国的经济遗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最初采用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发展计划之后，短短几年内又放弃了。中共在 1949 年后能够并愿意采用苏联式的偏重大工业的战略，很大程度可以归因于他们突然获得了现代工厂，尽管已经遭受到了战争的破坏。只须投入相对少量的资本和管理技能，这些工业就能够迅速恢复甚至超过二战前的生产水平。¹⁰⁷正当中共在满洲和沿海地区把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他们面临着 20 年代的俄国没有遇到的经济限制。¹⁰⁸在中国，只有满洲具备成熟的重工业基地。在其他中心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总体处于弱势，占主导地位的是轻工业和商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与俄国截然不同。从 1400 年到 1900 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在传统技术、社会结构以及可耕地面积等因素的限制下，已经达到最大化。而且，中国的人口从 1700 年开始逐步膨胀，到 1850 年左右使得农业部门的扩展能力实际上达到了饱和。¹⁰⁹另外，直到 1949 年，中国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以地区间和地区内的集市网络贸易以及自给自足为主导，并且形成了依赖。¹¹⁰

这样，从阻碍方面来看，中共面临的状况是：即便是运用最粗暴的手段来压榨农民与农业，来促进城市化的重工业发展，也不可能达到俄国1928年以后的那种效果。与苏联相比，中国继承的现代工业基础极其有限，而强制性地骤然增加农业生产与市场销售所遇到的阻力也更加巨大。事实上，中共在谋求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增加农业发展和服务于农业的工业部门的投入，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此外，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生活在地方和地区层面上一直是生机勃勃的。传统上，农民被卷入了超越自己乡村范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之中，并且习惯上服从当地受过教育的非农业人士的领导。（非商业化的）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形成的繁荣体系在众多地区早已存在。总之，1949年之后，如果新政权能够运用适当的政治意志和手段，就可以抓住机会，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就是实现“现代化”。

其次，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也影响到中共新政权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始终存在着矛盾。¹¹¹ 毕竟，中国共产党更多是靠自己而获得政权的，对苏联的霸权很反感。在中国感觉到美国入侵朝鲜对自己形成威胁，并且希望在苏联的支持下收复台湾的时候，苏联却寻求同美国的和平共处。此外，中国发展计划的转向，放弃苏联模式，又增长了中苏矛盾。

中国决定自己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结果导致中苏之间最终分裂——在二战之后，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战略军事权力的基础和终极象征。¹¹²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中苏之间因核武器问题而分裂这一点，而是考虑到核武器的特殊本质，中国竟然要发展这种武器。这暗示着，当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扩展的时候，中国放弃了苏联的军事保护，虽然中国诉求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很少侧重于重工业的增长。很明显，中共在1960年左右之所以可能综合实施这些大胆的行动，仅仅是因为，与供给一支庞大的配备精良的机械化武器和空中保护力量的陆军相比，核武器所需要的经济开支和工业投入要少得多。而庞大的军费正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所面临的急迫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深刻地影响到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选择问题。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二战后的

战略形势，至少可以考虑在军事战略的抉择上采纳类似于经济发展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共可以把一些资源集中地运用于发展核威慑能力，同时也维持着大规模的非现代化解放军部队。后者能够在幅员辽阔的国家中组织分散的游击战争，从而可以（希望是）震慑住可能的入侵者。最后，中苏分裂之后，美国也停止了在亚洲的军事行为的升级，中国就以新的方式来利用这一国际局势——打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牌，来制衡苏联。上述观点并不是说二战以后的国际环境积极地推动并促成了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发展。但是，联想到一战之后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完全可以说，与之相比，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促使其独特地发展，就像中国的国内经济条件以及（特别是）中共积累的政治能力对其发展的影响那样。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中共逐渐积累的政治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一因素促使中共选择了具有偏重农业、强调平等与大众参与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径，并成为新中国政权的独特之处。其中，中国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当中共在50年代全面巩固了党对国家的权力并开始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们拥有20年代布尔什维克所缺乏的巨大优势——与农民直接的政治联系。

我们应该回忆一下中国农民历史上一直依附于地方（集市）社区内的地主士绅。农民不可能依靠自己来推翻地主阶级的经济与地方政治权力；只有借助红军的保护以及地方上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农村才会发生社会革命。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华北地区发生了土地革命，在50年代初期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土地革命扩展到了中国南方地区。在两个阶段中，土地革命的进程始终具有政治涵义，属于政治发展的附属物。共产党干部渗透到每一个村庄，组织贫下中农参加农会，并且从当地农民中选拔干部领导农会，然后鼓动农民与地主（还有富农）展开斗争，在这之后，地主阶级及其制度才最终被取代。其结果不仅仅是农民重新分配到大片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此外，在地方上建立了新的领导和以农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并取代了原先包括宗族势力在内的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构。中共当然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俄国的情形与中国大不一样，1917年之后农民的自发暴动使得农民社区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割裂开来，导致布尔什

维克在农村没有立足之地，而且一直也找不到出路。而土地革命之后中国农民社区反而跟中共政权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革命之后的乡村到处是新旧“中农”家庭，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的受益者，并且通过新型的组织接受当地农民干部的领导。这些干部要么是党员，要么已经习惯同共产党合作共事了。

1949—1952年之后，上述乡村干部构成了共产党政权获取基层支持、加强领导的制度网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可估量的资源。¹¹³ 共产党依赖他们首先在许多地区组织了“互助组”以支持、补充小农生产，然后，从1955—1958年，推动了大多数土地的拥有者和农业生产实际集体化进程。从某些外在方面来看，中国集体化的驱动力与1928—1933年的苏联相类似——比如说，两者的目标都是促进对农业生产和剩余的政治控制，发展模式都是在最初制定了温和的计划，一旦确立之后就逐渐加速发展，以至于变得相当激进。但是，两者的手段和结果都存在重大的差异。正如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指出的那样，俄国共产党通过“命令动员方式”，即依靠城市特派员实行强制高压手段实现农业集体化，因为俄国的农村干部人员不足，又不可靠。与之相反，中共就能以“参与式动员”的方式来发展集体化，运用说服、团体操纵等手段并辅之以少量的压力，因为发展进程中的领导大部分来源于那些生活在本地或者附近的政治忠诚的农民。¹¹⁴ 而且，苏联集体化的后果是，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短期崩溃以及集体部门长期的停滞不前；而中国集体化的进程(就其本身而言，不包括大跃进)造成的直接损失很小，并且为日后高产的集体部门奠定了组织基础。

所有这一切整体上对新政权的特色有什么作用？通过调动并拓展他们在农村早已存在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农业的集体化。反过来，这又使得中共能够依赖并积极地塑造农业增长和农村的发展，使之成为国家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这样，共产党与农民之间在完成、巩固中国社会革命的事业中就早已结成特殊关系，为日后共产党国家发动农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变革创造了特殊的可能性。

同样，上述因素还为贯彻和维持相对平衡和平等的国民经济发展

政策创造了持续的“牵引力”。因为，即使通过各种政治组织手段有可能说服农民参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农民们仍然不会真正地有所反应，除非看到实际的好处。为了激发农民潜在的政治能力，中共就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对于农业、乡村工业以及社会服务的投资，提高农民在教育、医疗、消费等方面的水平以接近全国标准，同时还允许比较现代化的城市过快地扩大它们的优势。反过来，要贯彻这样的政策要依靠地方上那些负责任的、积极的政治领导以及反复的集体化动员。如果没有上述政策和领导模式，想说服农民参与根本不会成功。只有运用这些政策和模式，整个中国才能够向前发展，尽管可能会缓慢，甚至一再出现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仍然获得了全面的显著进步。

这样，与法国和俄国一样，中国革命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行动以及他们与巩固革命、建构国家的领导力量之间的关系。在俄国农民自发地进行了平分土地的革命，之后反而形成了对革命后国家中经济和社会生存的消极威胁。结果，最终形成的斯大林主义的结局，其中的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力图运用命令和恐怖等手段强行控制农民。在法国，农民发动了相对有限的革命来对抗对自己剩余劳动产品的剥夺，在此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团结，并最终在恩威并施的情况下参与到全国市场中去，与行政官僚国家共同生存，与此同时，他们的位置也逐步地被资本主义无情地侵蚀殆尽。惟独在中国，尽管农民自己无法发动革命，而有组织的革命者在城市和城镇中也不能直接获得权力。共产党和农民必须结成同盟来完成革命。结果，上述同盟创造了某种特殊的可能性使得革命者在获得国家政权之后，能够通过大众参与式的群众动员方式，来增进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而农民的行为和福利问题自然就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结论

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危机引发革命斗争，而这些危机所具备的障碍与机遇深刻塑造着社会革命的结果。同样，革命领导集团重建、巩固并且利用国家权力的斗争不可脱离具体的环境。其所处的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

与国际环境,限制、塑造了社会革命的结果。用一般的术语说,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分析观点。表2总结了对于三次革命的总体逻辑以及各自的独特发展过程。

第二部分的观点和比较逻辑完全建立在第一部分的研究基础之上。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在原因与结果方面大致的相似性,主要归因于导致三场革命爆发的社会危机——都具有行政与军事组织解体和农民反叛这些特点——具有类似之处。革命冲突进程以及后果之所以存在差异,部分的原因在于每次革命危机自身的特点:每一个旧的国家政权是如何垮台的;先前的农村结构又促使农民采取何种反叛形式。上述差异还可以归因于在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背景或多或少造成的阻滞与延续。

诚然,社会革命完成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它们对于变革的影响也只是在历史既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实现的。而且,社会革命中的阶级与政治冲突源自于旧制度危机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因此,要想更好地理解社会革命的冲突与结果,就要像本书所述的那样,首先要理解旧制度的结构与处境,从社会革命危机的缘由开始着手分析。毕竟,革命变革的完成依赖上述基础和所处的背景。

当然,社会革命的结果并不标志着所有变革的终结。在19世纪之后的法国,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俄国,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依旧发展。但是上述三个国家的革命后果的确为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框架。而且,它们为未来国内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政治斗争设置了障碍,同时也提供了机遇。

表2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旧制度的社会经济遗产	国际与世界历史环境
相似之处 自由主义式的稳定不可能。 支配阶级的脆弱性。 民众团体易于在政治上动员起来。	仍然是以农民为多数、农村居支配地位的社会。	在革命期间及之后,国家卷入激烈的国际竞争。

续表

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旧制度的社会经济遗产	国际与世界历史环境
<p>法国 经历过自由主义阶段,但不稳定。 君主正规军的组织架构得以存续。 农民的反叛废除了领主制,但是没有重新分配地产。</p> <p>俄国 没有经历自由主义阶段。 沙皇军队彻底解体。 农民驱逐了地主,重新分配了地产;然后就埋头于村庄事务。</p> <p>中国 军阀的政治与军事割据。 农民自身无力造反;地主士绅在地方维持着权势地位。</p>	<p>中小规模的农业-商业经济;工业尚未机械化。 没有产业无产阶级。 小业主支配着经济。</p> <p>大规模现代企业、主要是重工业的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集中于战略要地。</p> <p>传统的农业-商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改造。 少量的、边缘性的现代工业,主要是轻工业。</p>	<p>法国作为潜在霸权国家卷入大陆军事竞争。 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但是不具有世界历史的可能性。</p> <p>自191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在欧洲国家体制中处于防御地位。 国家推动工业化成为可能。</p> <p>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受到侵略;二战后处于防御地位,尽管美国和苏联作为核大国而居支配地位。 国家推动工业化成为可能。</p>

表 2(续前)

革命性国家建设的进程	新制度的性质
<p>相同点 对民众进行政治-军事动员,以为反对国内反革命和竞争对手的战争提供支持,并反对外来入侵。</p>	<p>与旧制度相比,国家的规模更大,更加集权,更为官僚化,也更为容纳大众参与。国家无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性。 地主阶级的特权被废除。</p>
<p>法国 雅各宾派对城市民众力量实施准政党动员,振兴了国民军队;在工业和农民中缺乏持久的基础。 军事胜利后,雅各宾派垮台;只是在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下,行政机器才得以巩固。</p>	<p>职业官僚国家不受政党控制;推动了国内稳定和军事扩张。 私人产权的社会和市场导向的经济。 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有利于富有的有产者。</p>

续表

革命性国家建设的进程	新制度的性质
<p>俄国 布尔什维克党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村没有根基。必须使用强制手段，白手起家，迅速重建国家组织。 为了在农民包围中和在危险的国际环境中生存，政权求助于强制集体化和迅速的重工业化。</p> <p>中国 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不能站稳脚跟。中共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1949年后，政党国家控制了工业，但依然保持和利用在农村的独特政治基础。</p>	<p>层级制的、诉诸权威和强制的政党国家。 国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偏重重工业和迅速城市化。 扩大地位和经济报酬的不平等。</p> <p>相对分权和大众动员式的政党国家。 国家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十分强调农业和农村发展。 努力逐步缩小或控制不平等。</p>

注 释

1.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19*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chap. 2.

2. C. Martin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 in *China in Crisis*, eds.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 1, bk. 1, p. 204.

3. 同上, p. 205.

4. 关于军阀统治,除了参照上面的注释外,还可参见: Lucie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71)及 His-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5. 参见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6.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2 (February 1965): 195—228. 同时参见 Rhoads Murphey 在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中的论点, eds. Mark Elvin 及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7—72.

7. 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8.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p. 78.

9. 比如参见 Robert A. Kapp, *Chungking as a Center of Warlord Power, 1926—1937*, in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s. Elvin and Skinner, pp.

144—170。但是重庆并不是一个被军阀榨干了的的城市,主要因为它仍然可以从周边的农村地区获得稳定的税收来源。

10. 这一段落的资源来源包括:Frederic Wakeman,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p. 253—255; Pye, *Warlord Politics*, pp. 55—57;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pp. 238—239; 及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s. 7—8。

11. 首先见 Philip A.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257—298。同时参见 Ernest P. Young, Nationalism, Reform, 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 James B. Crowl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pp. 173—178; Yuji Muramatsu,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 *Bulletin of the Yem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18; Yung-the Chow,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New York: Atherton, 1966) 及 Morton H. Fried, *The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53)。最后提到的两部著作不过是 1920—1930 年间众多研究中国地方区域的两部,这些研究表明,地方权贵仍然大行其道。

12. 在他的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一书中, Philip Kuhn 展现了地方权贵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儒教国家体制的运行使其成为可能,他们可以拥有军队和民兵,而正是这些军队和民兵打败了 19 世纪中期声势浩大的起义。像曾国藩那种高级文士一样,可以动员贵族阶级从地方到“国家”都进行自卫,这在帝国体系瓦解后是不可能发生的。

13. 参见 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ed. Margaret Park Redfie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4.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in *China in Crisis*, eds. Ho and Tsou, vol. 1, bk. 1, p. 220。

15. Robert C. North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in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eds. Harold D. Lasswell and Daniel Lern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pp. 376—395。

16. 此处我沿用 Wilbur 的观点,参见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in *China in Crisis*, eds. Ho and Tsou, vol. 1, bk. 1, p. 224—241。

17. 同上, pp. 224—225。

18. C. Martin Wilbur,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How the Early Years Helped to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ed. John Wilson Lew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6. 同时参见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 H. M.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9.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in *China in Crisis*, eds. Ho and Tsou, vol. 1, bk. 1, p. 242.

20. 同上, p. 245。

21. 有关早期共产主义农民组织参见 Shinkichi Eto, Hai-lu-feng-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 *China Quarterly* no. 8 (October—December 1961): 161—183; 及 no. 9 (January—March 1962): 149—181;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7), chap. 5; 特别是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组织的处理相当幼稚: 大部分的重点放在向农民的“动员”上, 而目的仅仅是使他们加入协会组织。根据文件显示, 到 1927 年时已有数目巨大的成员, 他们由地区、省和全国的中共领导者协调。温和的改良过的口号被运用于农民身上, 其中包括反封建和减租的诉求。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联盟国民党, 中共的干部试着区分了“土豪劣绅”和“爱国地主”。这些对帝国主义几乎没有直接感受的农民, 积极响应了共产党的经济号召。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找出不同类型地主的细微差别。而且, 农民一旦动员起来就很难从上面加以控制。因此这些中共干部的鼓动, 无论初衷是多么的温和, 却加剧了农村的紧张局势。但这些骨干却并未真正准备好农民阶级战争。为了保护他们(及他们鼓动起来的农民)抵御地主雇佣兵, 他们以绝对的信任完全依靠国民党控制的军队。

22.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in *China in Crisis*, eds. Ho and Tsou, vol. 1, bk. 1, pp. 245—253.

23. 同上, pp. 253—260。

24. 参见 Elvin and Skinner, eds.,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一书中的卷末地图。

25. 参见第四章的注释 8。

26. 有关中国的数字见: 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chaps. 3—5; 及 Chesneaux, *Chinese Labor Movement*, chap. 2. 关于俄国的数字见 Raymond W. Goldsmi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sarist Russia, 1860—191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3 (April 1961), p. 442 及 Teddy J. Uldricks, *The ‘Crow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4:3 (1974), p. 402。

27.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in *China in Crisis*, eds. Ho and Tsou, vol. 1, bk. 1, pp. 244—245; 259—260。

28.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80.

29. 同上, p. 181.

30. 同上, chaps. 5 和 6;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和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p. 787—788, 793; 和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s. 1, 3, 5.

31. 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pp. 54—56.

32. 同上, pp. 57—59; 和 Douglas S. Paauw, *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1928—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February 1957): 213—220. Eastman, in *Abortive Revolution*, pp. 226—239, 他并不同意 Paauw 关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现代化部门将“陷于停滞”的说法, 但他提供的仍然是一幅灰暗的画面。

33. 这个段落特别依据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pt. 1; Patrick Cavendish, *The ‘New China’ of the Kuomintang*, in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ed. Jack Gr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38—186;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assim;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chap. 6—7; 及 Eastman, *Abortive Revolution*.

34. Feuerwerker,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pp. 54, 59—62.

35.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关于国民党统治期间的农村情况参见 Graham Peck, *Two Kinds of Time*, rev.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36. Mark Selden, *The Guerilla Movement in Northwest China: the Origins of the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Part I)*, *China Quarterly* no. 28 (October-December 1966), p. 68.

37. Franklin W. Hou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3), chap. 3 及 Robert W. McColl, *The Oyüwan Soviet Area, 1927—193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 1 (November 1967): 41—60.

38. John Ellis, *Armies i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 10.

39. Ying-mao Kau,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s Nation-Building*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3), pp. xxi—xxv.

40. 同上, pp. xxv—xxvi.

41.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42—78.

42.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7), pp. 124—145;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reprint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 pp. 164—88; 及 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bks. 6—7. 有关其他早期红军基地的信息见 McColl, “Oyüwan Soviet”。

43. Wilbur, *Military Separatism*, in *China in Crisis*, eds. Ho and Tsou, vol. 1, bk. 1. p. 260.

44. 参见 Ilpyong J. Kim, *Mass Mobilization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Develop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78—98; 及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414—416.

45. 参见 Dick Wilson, *The Long March, 1935* (New York: Avon Books, 1973)。

46. Selden, *Yenan Way*, chaps. 1—3.

47.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1966)。

48. Edgar Snow 在 *Red Star Over China*, pp. 431—478 一书中对西安事变做了生动的阐述。

49. Selden, *Yenan Way*, pp. 116—120.

50. Maurice Meisner, *Yenan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 James B. Crowl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pp. 278—279.

51.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撑 Chalmers Johnson 的著名论点, 即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扩大是由于“农民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党对农民社会经济利益的诉求。大多数农民并没有足够的政治觉悟(站在超越地方乡土的高度)成为“民族主义者”, 他们积极支持共产党似乎因为后者无论何时都在试图保护农民的利益——无论是更大的经济安全还是保护其(无论任何民族)免受军队的掠夺。相关论点及论据参见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elden, *Yenan Way*, pp. 91—93, 119—120; 及 Donald G. Gilin,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2 (February 1964): 269—289.

52. Meisner, *Yenan Communism*, in *Modern East Asia*, ed. Crowley, p. 279.

53. Selden, *Yenan Way*, chap. 4.

54. 同上, pp. 144—161。

55. Mark Selden, *The Yen-an Legacy: The Mass Line*,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 102.

56. 同上, pp. 101—102。

57. 同上, pp. 103—104。

58. 同上, p. 151。

59. Selden, *Yenan Way*, pp. 188—207.

60. Stuart Schram,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9), pp. 316.

61. Selden, *Yenan Way*, pp. 212—229.

62. Selden, *Yenan Way*, pp. 237ff; 及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pp. 416ff。

63. 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权力均势的变化在日军直接占领的村庄也明显地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 William Hinton 的 *Fransh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一书中,长碗村就是一例。那些年轻的贫穷农民首先承担了领导村里地下反抗活动的角色。而传统的精英与日本人合作。因此当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后,“爱国”党员便向“背叛”的传统精英发起了挑战,这便成为推进土地改革的序幕。

64.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pp. 427—437.

65. John Gittings 评论到 1946 年后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作战中的军事战略的核心部分就是在已解放地区获得民众的支持。1947 年冬天一场新的,更加激进的土改方案发布了,共产党并为第二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募,军队和政党也进行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的调整。参见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

66.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pp. 431—432.

67. Franz Micheal, *Stat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Modern China*, ed. Albert Feuerwerk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4), p. 58.

68. Ying-mao Kau, *Patterns of Recruitment and Mobility of Urban Cadres*, in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ed. John W. Lew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98—99.

69. Victor C. Funnell, *Bureaucra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urrent Scene* 9:5 (May 7, 1971), p. 6.

70. Fairbank, Resichauer 及 Craig 的 *East Asia*, p. 896。

71.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78.

72. 这些估计是以 Michael,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ed. Feuer-

werker, p. 60 中提供的文人数字为基础的,同时依据了 Ho, *Studies*, p. 278 中的人口估计。

73. 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28—429.

74. 有关中共政权的整体背景特别参见 Barnett, *Cadres and Bureaucracy* 及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75. 比如高岗,一个在满洲有强大基础的主要政党领导人就在 1953—1955 年被撤消了地方职务,参见 James Pinckne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Praeger, 1972), pp. 467—468. 同时 Ezra Vogel 的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中的主题也是中央控制和中央计划对广东省的影响。Richard Pfeffer 认为甚至在党和国家的集中控制有所削弱的“文革”时期,地方领导人仍然被罢职或调任。参见他的 *Serving the People and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52 (October-December 1972), pp. 632—633。

76. Ezra F. Vogel, *Political Bureaucracy: Communist China*, in *Communist Systems in Comparative Syste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s. Leonard J. Cohen and Jane P. Shapiro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74), pp. 160—170.

77. Fairbank, *Reischauer* 及 Craig, *East Asia*, pp. 896—898.

78. 参见: Roland Lew, *Maoism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5*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pp. 115—159 中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做了特别有见地的讨论。

79. 有关中共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政权巩固和早期政策决议的背景参见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t. II; 及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特别是 chap. 4; pp. 371—380 in chap. 6 及 pp. 438—364 in chap. 7。

80. 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50—51.

81. 参见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pp. 236—262; Stephen Andors,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pp. 53—59; 及 Eckstein, *Economic Revolution*, pp. 50—54。

82. 参见 Eckstein, *Economic Revolution*, pp. 54—56 及 C. K. Yeh, *Soviet and Communist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in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d. Donald W. Treadgol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 327—363。

83. 关于“两条路线”参见 Stuart R. Schram, *Introdu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1—109 及 Jack Gray, *The Two Roads: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pp. 109—157, both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 Sch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84. 在我早期的一篇文章中——Old Regime Legaci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s in Russia and China, *Social Forces* 55:2 (December 1976), pp. 305—309——我曾错误地认为 1921 年后的苏俄和 1949 年后的中共在领导权的争夺上具有极其相似的情形和路径。

85. 参见 Eckstein, *Economic Revolution*, pp. 58—63; Carl Riskin, 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46 (April-June 1971): 245—273; 及 Jon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86.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pp. 28—29。

87. 有关“中间技术”参见 Jon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 in *Authority and Participation*, ed. Schram, pp. 199—232。关于教育参见 Richard D. Barendsen, The Agricultural Middle School in Communist China, in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p. 304—332; Pfeffer, *Serving the People*, pp. 639—645 及 John Gardner and Wilt Idema, China's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Authority and Participation*, ed. Schram, pp. 257—289。关于“赤脚医生”计划, 参见 Vitor W. Sidel and Ruth Sidel, The Delivery of Medical Care in China, *Scientific American* 230:4 (April 1974), pp. 19—22。

88. Byung-joon Ah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eople's Commune in China: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3 (May 1975), p. 637。我关于集体农业组织和农村地方政府的讨论完全根据这一整篇文章。

89. 同上, pp. 657—658。Eckstein, *Economic Revolution*, pp. 206—213; 及 Sterling Wortman, Agriculture in China, *Scientific American* 232:6 (June 1975): 13—21。

90. 关于 19 世纪的法国农民参见 Theodore Zeldin, *France: 1848—1945, Volume I: Ambition, Love, and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 9 及 Maurice Agulhon, Gabriel Désert, and Robert Specklin,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vol. 3, *Apogée et Crise de la Civilisation Paysanne, 1789—1914*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6)。

91. 这些不平等及其原因在 Audrey Donnithorne,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52 (October-December 1972): 605—619 中有强调。

92. 正如 Richard Madsen 对广东一个贫穷村庄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 甚至是之前十分边缘和衰退的地区都有收获。参见 *Revolutionary Asceticism in Communist China: Soci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mitment to the Maoist Ethos in a South China Village*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77)。

93. 有关概述参见 Marianne Bastid, *Level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Authority and Participation*, ed. Schram, pp. 159—197 及 Peter Schran,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ed. John M. Lindbeck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pp. 193—220.

94. 参见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pp. 7—10, 35—42, and chap. 3, 特别是 pp. 115—117 及 Donnithorne,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95. Andors,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p. 3 and passim; 及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pp. 263—308.

96. 有关中国“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的最新两项研究参见 Victor G. Nee, *Community and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77); and Charles P. Cell,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Cell 的这本书提供了重大运动的概览, 并检视了有关它们效果的假说。他做出了如下结论: 群众动员, 尤其是经济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有效策略。

97. “毛主席”领导风格的基本原理参见 Martin King Whyte: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2 (April 1973): 149—163, 其中有很好的阐述。同时参见 Iron Law versus Mass Democracy: Weber, Michels,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s and Explication*, ed. James Chieh Hsiung (New York: Praeger, 1974), pp. 37—61.

98. 有关工厂管理的影响参见 Andors, *Industrial Revolution*, 特别是 chap. 4, 7—8 和结论。

99. T. 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 S. S. R., 1917—1967*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 6.

100. S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chaps. 2—5. 在这整个三章里都作出了与苏联的明显比较。

101. Barnett, *Cadres and Bureaucracy*, p. 430.

102. Eckstein, *Economic Revolution*, p. 303.

103. 同上, pp. 299—301. 有关 1934 年的俄国, 参见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2nd ed., rev. and enlarg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p. 465.

104. 有关概述参见 Martin King Whyte,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ember 1975): 684—711; 及 Pfeffer, *Serving the People*, pp. 635—653.

105. Whyte,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pp. 695—696.

106. 同上, p. 695.

107. Perkins, *Growth and Changing Struc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y*, ed. in Perkins, p. 147.

108. 这一点是上一著作(Perkin)和 Harry Magdoff, *China: Contrast with the U. S. S. R.*, *Monthly Review* 27(July-August):12—57 的中心论点。

109. 参见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和 Ho, *Population*:1368—1953。

110.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February 1965):195—228.

111. Fairbank, Reischauer 和 Craig, *East Asia*, pp. 919—921; 及 Harrison, *Long March*, pp. 480—481。

112. 我这里的想法极大地受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New York: Pantheon, 1974), pt. II 的影响。

113. Thomas Paul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ison*,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特别是 pp. 111—132, 179—200 中着重强调了土地革命遗留下来的地方领导。

114. 同上, chap. 6。

结 论

“国家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¹ 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曾经写下了上述话语，这是他作为革命组织者讲这番话的。然而，作为革命理论家，列宁始终奉行马克思的理论。他主张，阶级关系的历史发展是最终导致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结构性模板，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资产阶级革命是强化国家官僚与暴力统治的工具。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为国家的最终消亡铺平道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以劳动阶级的名义并依靠劳动阶级的支持而展开的，那么，革命后的国家就不应该成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²

本书的分析研究主要揭示了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正确与不足。国家政权问题一直是社会革命改造的根本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把国家政权简单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能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结构的变化。就法国、俄国以及中国而言，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数次的革命浪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先前革命形势的出现，与革命斗争之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都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组织结构以及某种程度国内相关阶级和政治力量的自主与动力关系，甚至还取决于其相对的国际地位。

革命之前的法国、俄国与中国都是相对完善发达的帝国，都有充足的能力来维护自身的霸权，保护支配阶级的权力，镇压下层的反叛。只有上述国家的行政机构与军事组织先行瓦解，社会革命才会发生。1789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以及1911年的中国发生了社会革命；但是，上述情况

并不是公然叫嚣的革命者或者旧政权中强大的政治集团精心策划的结果。政治革命危机之所以发生,并相应地导致行政机构与军事组织的崩溃,都是由于这些帝制国家受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国外日益险恶的军事竞争与入侵;另一方面是,既存的农业阶级结构与政治制度对于君主政权做出相应反应时所施加的压力。旧制度之所以容易引发这种革命危机,是因为既存的国家结构使其在面临现在环境中各种特殊的紧急局面的时候,难以自如地应对。

一旦旧制度国家土崩瓦解,根本性的政治与阶级斗争就开始兴起,直到新的行政与军事组织得以确立巩固,冲突才会逐渐平息;下层群众的反叛是直接针对先前的支配阶级的财产和特权的,因此必然造成阶级关系的巨变,否则这种变革难以形成。但同样重要的是,农民起义与城市工人阶级的造反对全国的政治斗争产生重大影响,既阻止了反革命的复辟,也削弱了确立自由主义的可能性;而革命领导集团发现,可以放手发动民众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建设新的国家政权,打倒国内的竞争对手,并且反击外国侵略者。与旧制度下的帝制国家相比,法国、俄国以及中国建立的新型国家政权,在国内社会中更加强大、更加独立自主,在国际体系中更有力量战胜国外竞争对手。另外,农民与工人促成了革命的胜利,因此在革命后也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与事业。这种更加强大的民族国家不仅仅是法国、俄国或者中国自身革命的成就,而且,国家秩序的变化也是革命改造的一个最显著成果。

三场革命都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更加独立自主。历史事实表明,不论是革命斗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如俄国与中国革命;或者是大体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如法国革命,基本上都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机制。战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革命危机的助产士。进一步讲,国内的武装冲突斗争能催生新的革命政权,而国际环境中险恶的军事形势反而能够巩固这种新型国家政权。法国、俄国和中国都在面临外部竞争性的国际环境中巩固革命成果,从而使那些有意愿并且有能力组建强制性的、中央集权型的行政组织的领导团体走向革命的前台,也为他们在革命后创建社会秩序中行使国家干部的权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外,类似于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现代社会革命,总是发生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国家里。随着“世界时间”(world time)的推移,上述国家就有了利用国家权力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模式。因此,以俄国和中国为例,在新政权刚刚确立之后,革命领导团体就利用国家权力推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改造。这些社会经济改造无疑有助于民族生存(如二战中的俄国)或者有助于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如中国)。但是,如果没有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主动干预,没有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众多方面的政治控制,这些改造的实现又谈何容易。

我们可以尝试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列宁相比,马克斯·韦伯对于革命后果的理解更胜一筹(更富有指导意义)。在韦伯看来,革命的功用归根结底就是加强官僚统治,特别地,如果革命促成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完全控制,国家的官僚化就属于必然的事情。³不过,这种观点并不足以解释法国、俄国以及中国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考虑到革命的结果对于农民的影响,因为在所有三个国家的革命舞台上,农民始终是决定性的角色,并且不论是革命前后,农民始终占到社会的大多数。从斯大林时代俄国农民的最终命运来看,所谓“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必然会比法国或者墨西哥的非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更加照顾农民利益”的说法明显不成立。但是,认为“在‘极权的’共产主义的政权统治之下农民的生活日益窘迫”的论断也同样不正确。中国革命的史实就证伪了这种肤浅的论断。俄国革命的结果否定了“反对资本主义”就自动等同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公式,中国革命的结果同样对公认的“民主”与“极权主义”截然相对的分类方法提出了挑战。作为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成就的直接后果,中国农民享受的物质条件整体上明显优于1949年以前的处境。此外,与1929年以后的俄国农民或者1789—1793年之后的法国农民相比,中国农民对于自身的生活拥有更多的直接参与权与决策权。进一步讲,虽然与革命前的政权相比,新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但仍然为地方上的计划与动议提供了相当大的自主空间。所以,这些现象表明,与韦伯看法不一致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强化型的革命并不总是导致更加充分的、西方式的官僚化统治模式。

无可否认,不能把中国革命的结果描述得过于浪漫化。在以集团操

纵权力、打压持不同政见者为特点的政治生活背景下,社会主义民主的美好理念远未实现。然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政权下参与质量显著提高。中国大多数农民也争取到了切实参与地方决策的真实成就。如果我们囿于政治分类的成见,就会对上述的革命结果视而不见。中国的国家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地方性的集体民主也得到加强。那些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属于官僚式理性化发展的理论视角,根本无法完全理解中国革命的后果。相反,必须从比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考虑在革命性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具体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旧制度的崩溃、革命斗争以及农民暴动等突出形式的作用。

法国、俄国以及中国的革命并不是现代世界所仅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这三个国家革命的相同点与差别也是本书详细考察与致力探讨的内容。我们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某一社会的国家与阶级结构迅速而根本地得到改造,并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来自下层阶级的反叛。大多数研究者可能会赞同说,所谓的社会革命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发生,比如说1911—1930年的墨西哥、二战以前的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玻利维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以及埃塞俄比亚等等。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革命与法国、俄国以及中国革命相似:它们都发生在农业性国家,都是在原先的国家行政组织与军事政权崩溃后才引发革命。在各国革命进程中,农民造反或者发动农民进行的游击战,都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另外,各国有组织的革命领导集团(即原先属于边缘化的受过教育的精英)在革命危机关头走向历史的前台。并且,这些领导成员都致力于新型的、权力增强型的国家组织,从而巩固革命变革的成果、维护民族独立。

上述革命之间宽泛的相似性引出了本书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本书的论点可以适用于法国、俄国和中国之外的革命吗?在一定意义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不能把对法俄中三国革命具体的因果分析,随意泛化为能够解释一切现代社会革命的“一般性革命理论”。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上述努力注定要失败:第一,不论是单个案例,还是一组相似案例,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的不同,其革命的原因必然会不一样。米尔斯曾经很聪明地说:“我们不知道

关于历史变迁的普遍性原则，因为变迁机制随着我们所观察的社会结构不同而不同，社会结构丰富多彩，相应地，历史变迁的原则也是色彩纷呈。”⁴第二，革命的因果模式必然会受到世界历史根本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权力基础的变动等因素的影响。革命的可能性与表现形式会随着世界时序的变化而变化，正如米尔斯在同一段落里指出的那样：“历史变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

第一个论点的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考虑到，事实上除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以外，其他现代社会革命都发生在相对弱小的前殖民地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体系背景下，这些国家非常脆弱，并且处于依附地位。试举两个可能相当不同的国家为例：就墨西哥和越南而言，这两个国家社会革命的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历史上独立自主、功能完善的帝制国家与国外军事竞争者或者入侵者间的对抗结果。要理解其革命危机的根源，就必须追踪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对每个国家本土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影响以及墨西哥与越南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权力转换中所受到的间接冲击。比如说，软弱的墨西哥民族政府就是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一种遗产：虽然中央集权但联系环节薄弱，尤其是军事组织虚弱。革命前迪亚斯政权的大起大落，受到了众多因素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北大西洋发达工业国家权力的转换，外国资本流入墨西哥全国各地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导向与政治平衡重心的变化。⁵同样，越南革命则是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之后发生的。法国殖民主义取代了原先本土的帝制政权，但随后被日本的侵略和二战时期的失败所打断。⁶

此外，依附型国家的社会革命的原因与后果，不仅为防御实际的或潜在的外来入侵者以及维护自我的必要性所制约，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外直接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的约束。向新兴革命者提供这种援助的，往往是极力想影响新政策的政策与方向的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的革命政权会完全成为大国的“代理人”。实际上，与革命前的政权相比，新政权拥有更加独立的国际地位。而它们跟援助国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很紧张。似乎可以说，与法国、俄国和中国新政权的政策相比，依附型的革命政权所奉行的政策，受援助国更直接影响以及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所受压力更大。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古巴：古巴革命切断了对于美国的过分依赖，

使其可以追求更加独立的地位,奉行国家主导的平均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但与此同时,古巴越来越依赖于苏联的经济援助,最终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与苏联的对外政策联结在一起了。⁷

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不一样的是,其他近期的社会革命大都发生在具有不同的政治历史背景,并处于依附型国际地位的国家。因此,从三个大国推演出的特殊的因果模式的普遍性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外,经典社会革命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所受到的更为根本的限制,源于国家权力的形式与基础相对于国际层面的历史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上受资本主义控制、军事上受敌对的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里,几十个新兴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现代武器技术与官僚职业化的军事组织扩散到各个主权国家。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希望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系统,既可以装点门面,又拥有强制性的实力。这样,所有的发达国家就不得不为其盟国或者代理人提供装备和供给而相互竞争。如果大多数新兴国家缺乏现代军事装备,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不会出现全面彻底的社会革命。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军事装备所具有的绝对威慑力所致。乔利(Katherine Chorley)早在1943年就说过:“一旦军队全力以赴地镇压反叛的话,任何革命都不会胜利。”⁸既然这样,官方力量与没有外援的非官方力量之间原先存在的巨大差距,就更加悬殊。但是,这种差距本身并不是唯一的理由。毕竟,即使是法国旧制度下的传统军队也能够镇压下层的反叛。

比拥有绝对强制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现代职业化的军事机构(当权派)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在社会中,都同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中的经济支配阶级逐渐分化开来。今天,在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军官的出身不再主要限定于地主或资产阶级,而是低级官员和小资产者家庭。而且,军官团体拥有强大的利益,侧重于增进自身在国家机器中的利益,同时也维护国家当局的权威。⁹这些职业化的军官团体对于国家行政官员与经济支配阶级之间的政治争斗漠不关心,除非自身的事业与组织利益受到威胁。另外,不管军官们是袖手旁观还是通过政变来加以干涉,这种政治斗争也不会危及军队本身的强制性权力。这样,二战后的社会革命危机就不同于波旁法国或者晚清中国时期的革命,而是在国家内部包括在军官集团

内部拥有组织力量的行政集团与经济支配阶级之间展开的政治斗争的副产品。实际上,殖民统治的崩溃倒成为了革命危机的最普遍的根源。一旦实现非殖民化,并且成功地确立现代军事机构,即使军事政变相当频繁,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也日渐式微。事实上,所有政变,即使是“改革派”的政变,也不过是顺延了现存国家的形式与统治,而且还会禁止下层民众的暴动与反叛。¹¹

所以说,由于世界历史背景的变迁,各国的政治历史与国际环境相去甚远,本书中关于法、俄、中三国革命具体的、描述性的概括与因果分析,就难以自然而然地推及到其他社会革命的分析中去。对于其他国家革命的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大体上相似的几个案例放在一起加以研究(以找出共性),还要将是经历了社会革命的国家与具有同样处境但是并未爆发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研究(以找出差异)。许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卓有成就,如沃尔夫、邓恩、佩奇以及埃克斯坦等。¹¹当然,仍然有很多工作等待人们去完成。就目前而言,本书对于法国、俄国以及中国革命进行比较分析的框架与原则,对于分析研究其他的社会革命应该是会有所裨益的。从前面对于近期革命模式的简单研究可以看出,对于影响革命爆发与结局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历史背景的系统关注,其重要性相当突出。实际上,所有对于20世纪革命所做的比较历史研究都很注重这种影响。

对于历史上的革命与当代革命的研究者来讲,尽管不那么明显,但同样紧迫的一点是,要运用结构性视角,侧重于不同境遇的团体与民族间的客观关系与冲突,而不是探讨革命期间特定角色的利益、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有组织的革命先锋队对于自身在“创造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角色的自觉性与日俱增,甚嚣尘上。但在我看来,近期的革命危机,与导致传统社会革命的危机一样,完全是国内外结构性矛盾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公然叫嚣的革命者的尽心策划之力。对于革命进程的战略预测,第三世界先锋队并不比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或者中国共产党高明多少。因此说,虽然人民容易透过意识形态先锋队的视角来分析革命,但是,如何解读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革命危机的结构性与综合性原因,以及塑造革命斗争、巩固革命结果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才是对

比较历史分析的真正挑战。

最后,立足于分析国家组织及其与国际环境、国内各个阶级以及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是对革命进行结构分析的关键。在边缘地区的国家中,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取决于非殖民化危机期间国家机器的延续与中断,取决于新殖民政权的相对强制能力与国际性的脆弱程度。社会革命一旦展开,就会紧紧围绕着革命领导者建设国家的活动。革命的成果则取决于建设国家的革命者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状况以及他们与国际友好或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建设国家的革命者与国内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同等重要。从墨西哥到越南,所有边缘国家的社会革命中,农民要么自觉地发动反叛,要么直接由革命政党组织暴动。工人无产者则在众多场合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玻利维亚和墨西哥革命。国内、国际的资产阶级在每次革命斗争中至少也起到一定作用。各个国家/阶级关系的模式可谓千差万别,不一而足。但是,分析研究的相关论点仍然是集中的:在具体革命情形下,不论是控制生产与经济联系等主要手段的资产阶级,还是造反、军事暴动从而推动革命斗争的民众阶级,所有阶级力量都通过冲突与合作、命令与动员而与国家和国家的建设者之间互动而又相对独立的关系相互纠缠。政权类型不同,世界历史阶段不同,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革命的模式自然也是千差万别。然而,突出研究国家之间,国家与经济之间以及国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联系,对于解读社会革命的因果逻辑依然有所裨益,无论其对象是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革命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革命。

本书的许多论点或多或少吸收了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念。到目前为止,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社会革命,尽管也体现出阶级斗争的因素,但明显与马克思的理论预期与道德理念大相径庭。这些社会革命大都发生在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农业国家中,而非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即使是那些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名来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革命,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产生马克思所设想的繁荣、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社会革命实际的历史模式之间的脱节表明,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理论的一些基本路径,其紧迫性超过了当代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主义者所愿意承认的限度。的确,对发达社会而言,马克思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召唤依然有效;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丝毫没有减损社会主义号召的潜在的或实际的必要性。但事实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预见或者不能充分解释,无论好坏与否,在军事化的国际体系中作为行政与强制机器的国家权力都具有自主性。甚至即使是发达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在国内国际层面上都成熟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者,他们也将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国家暴力相抗争,与现存国家的强制性能力,与革命巨变中无意产生的、不可预见的新型的国家统治所伴随的威胁相抗争。当然,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的农民起义所体现的下层阶级组织相比,(这种上层阶级的组织)本身就是非常困难和不同寻常的。在伟大的历史革命中,农民起义最终与革命领导团体建设国家的努力和最终统治是相吻合的。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会对上述模式亦步亦趋。

我想做一点推断:如果一场社会革命试图改造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我猜测,那将是一场与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迥然不同的革命,而且会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国际条件之下。因为,如果不同时摧毁社会,想要瓦解现代国家的行政与强制能力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一场现代革命就不会是疾风暴雨式的,而是经由一系列“没有改革者的改革”¹²逐渐导致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推动的从经济、政党、军队到文官系统等各个主要制度的逐步民主化的结果。在任意一个既定的发达工业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化,都需要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同时开展民主化运动,而且每一项民主化运动都必须首先要求以达成裁军协议与实现国际和平为关键目标而持续进步。为了剥夺威权主义国家行政机构维持自己生存理由,必须要弱化先前曾引发和塑造社会革命的军事竞争。

总之,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不可能在未来发达工业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中简单再现。但是,历史也给予我们一些关于未来的启示:它表明,如同过去一样,在未来的革命中,国家领域依然是中心命题。正如纽曼曾经指出的:“对于政治权力的斗争,即为争夺强制性机构的控制权,如警察、法院、军队、官僚机构以及外交政策等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¹³只有彻底地理解这一点,人们才更可能有效地实现马克思关

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¹⁴并且,社会中的国家已经“从统治社会的工具转变为完全服从社会的机关”。¹⁵

注 释

1. Lenin, “The Dual Power”, 最早发表于 Pravda on April 9, 1917; reprinted in Robert C. Tucker, ed., *The Lenin Anthology* (New York: Norton, 1975), p. 301.

2. 参见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reprinted in *The Lenin Anthology*, ed. Tucker, pp. 311—398.

3. 特别参见 Weber on “Bureaucracy”,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and trans.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ap. 8. Lenin 和 Weber 关于国家和官僚制的观点在 Erik Olin Wright, *To Control or Smash Bureaucracy: Weber and Lenin on Politics,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74—1975): 69—108 中有令人信服的比较。

4.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50.

5. 特别参见 Stanley J. Stein and Barbara H.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及 Walter Goldfrank, *World System, State Structure, and the Onset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5:4 (1975): 417—439.

6. John Dunn, *Modern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 5 中强调了这些因素并对越南战争进行了简洁描述。

7. Susan Eckstein, *Capitalist Constraints on Cuban Socialist Development*, mimeograph (Bost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8. Katherine Chorley,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 243.

9. 关于第三世界军官阶层,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参与模式的出色概括参见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10. 20 世纪中期的葡萄牙在推翻 Salazar 独裁统治后的一段时间里可以成为普遍规律中的一个例外,此规律即军事政变不会鼓动来自下层的叛乱;但是葡萄牙的激进趋势从那以后就停滞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扭转。同一年代另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Ethiopia)。在那里叛乱军官通过求助于动员群众来对古老的国家和地主贵族加强攻击,而当面对索马里的入侵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

的地区分离，他们又依靠群众军事动员来捍卫国家主权。尽管由政变开始并强烈地受到大国干涉的影响，埃塞俄比亚革命整体上转变成为了经典的社会革命模式。但像这样的革命不太可能再发生，因为与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的旧政权相比，很少有其他政权，甚至是名义上的绝对君主制可以像前者一样呈现出半官僚和贵族制的特点。

11. 参见 Dunn, *Modern Revolutions*; Eric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Jeffer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Susan Eckstein, *The Impact of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xico and Bolivi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ology Series* (Beverly Hills, Cal.: Sage Publications, 1976); 及 Susan Eckstein and Peter Evans, *The Revolution as Cataclysm and Coup: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xico and Brazi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ology* 1(1978):129—155。

12. 这是 André Gorz 的说法，这个观点在他的 *Strategy for Labor: A Radical Proposal*, trans. Martin A. Nicolaus and Victoria Ortiz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一书中有说明。

13. Franz Neumann, *The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ed.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57), p. 264.

14. From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printed in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p. 53.

15. 来自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摘自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 and trans. T. B. Bottomo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6), p. 255。

参 考 文 献

本参考书目所开列出的是被当作本书论据而使用的主要著作。参考书目中的著作与注释条目有交叉,但并不完全一致。在正文中,为了支持特定的观点而引用的论文和专著的章节,在这里就没有列出来;同时,这里所列的书目也并不包括那些有关反例的英国、普鲁士/德国和日本的著作。然而,这个参考书目还是包括了那些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案例进行总体分析和深度讨论专著和论文,而这些著作却并没有在注释中开列出来。本参考书目分别在下面的几个主题下按字母顺序开列:

1. 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
2. 俄国:旧制度与大革命
3. 中国:旧制度与大革命
4. 理论与历史背景

总体而言,那些对第一章、第四章和导论、第二章、第三章影响较大的著作,主要开列在第四部分;而第一至第三部分所开列的各种专著和论文,是我认为在每一个案例中的历史学家和区域研究专家们的作品,具体内容则包括对旧制度、革命事件和革命后果的研究。

I. FRANCE: 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 Acomb, Frances. *Anglophobia in France, 1763-1789*.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0.
- Agulhon, Maurice; Désert, Gabriel; and Specklin, Robert.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vol. 3, *Apogée et Crise de la Civilisation Paysanne, 1789-1914*,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6.
- Amann, Peter. *The Eigh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French or Western?* Lexington, Mass.: Heath, 1963.
- Barber, Elinor G. *The Bourgeoisie in 18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Barker, Ernest.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in Western Europe, 1660-19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 Behrens, C.B.A. "Nobles, Privileges and Taxes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Ancien Régim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5 (3) (April 1963): 451-475.
- The Ancien Régime*. London: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7.
- Beloff, Max. *The Age of Absolutism, 1660-181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 Bernard, Leon. "French Society and Popular Uprisings Under Louis XIV."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3: 4 (Fall 1964): 454-474.
- Bien, David D. "La Réaction Aristocratique avant 1789: l'Exemple de l'Armée (à suivr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9: 1 (January-February 1974): 23-48.
- Bloch, Marc. "La Lutte pour l'Individualisme Agraire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Siècle."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11: 7 (July 1930): 329-581 and 11: 8 (October 1930): 511-556.
- "Sur le Passé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Quelques Jalons de Recherche."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8: 40 (July 1936): 366-578.
- 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anslated by Janet Sondhei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 Bois, Paul. *Paysans de l'Ouest: Des Structur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Epoqu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 Le Mans: Imprimerie M. Vilaire, 1960.
- Bordes, Maurice. "Les Intendants Eclaires de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Revu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39: 1 (1961): 57-83.
- Bosher, J. F.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From Business to Bureau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Bouchard, Gérard. *Le Village Immobilable*. Paris: Librairie Plon, 1972.
- Braudel, Fernand, and Labrousse, Ernest, eds.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 2, *Des Derniers Temps de l'A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Age Industriel (1660-178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 Brinton, Crane. *The Jacobins: An Essay in the New History*. 1930. Reprin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1.
- Bromley, J. S. "The Decline of Absolute Monarchy (1683-1774)." In *Franc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M. Wallace-Hadrill and John McManners, pp. 134-160. London: Methuen, 1957.
- Bruun, Geoffrey. "The Balance of Power During the Wars, 1793-1814."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9, pp. 250-2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ameron, Rondo E. "Economic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France, 1815-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0: 1 (March 1958): 1-13.
- Cavanaugh, Gerald J. "The Present Stat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Alfred Cobban and Beyond."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 4 (Fall 1972): 587-606.
- Chalmin, P. "La Désintégration de l'Armée Royale en France à la Fin de XVI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de l'Armée* 20:1 (1964): 75-90.
- Chaussinand-Nogaret, Guy. "Capital et Structure Soc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5: 2 (March-April 1970): 463-476.
- Church, Clive H. "In Search of the Directory." In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 1500-1850, edited by J. F. Bosher, pp.261-294.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3.
-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French Central Bureaucracy Under the Directory 1795-1799." *Past and Present* no. 36 (April 1967): 59-72.
- Clough, Shephard Bancroft. *France: A History of National Economics, 1789-1939*.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4.
- Cobb, Richard. "The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in France 1793-1794." *History* 52 (1957): 181-196.
- Les Armées Révolutionnaires: Instrument de la Terreur dans les Départements, Avril 1793-Floréal, An II*. Paris: Mouton, 1961-1963.
-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18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Paris and Its Provinces, 1792-180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Cobban, Alfred.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 1, 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1715-1799*.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57.
-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 2, From the First Empire to the Second Empire, 1799-1871*.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1.
-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0.
- France Since the Revolut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0.
- "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112-130. New York: Norton, 1970.
- Crouzet, François. "Wars, Blockad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1792-181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4 (December 1964):567-588.
-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conomic Growths." In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edited by R. M. Hartwell, pp.139-174. London: Methuen, 1967.
- "French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considered." *History* 59: 196 (June 1974): 167-179.
- Darnton, Robert.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51 (May 1971): 81-115.
- "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 (1971): 113-132.
- Davies, Alun.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Peasant Revolution of 1789." *History* 49: 165 (February 1964): 24-41.
- Davis, Ralph.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 Dawson, Philip. "The *Bourgeoisie de Robe* in 1789."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4: 1 (Spring 1965): 1-21.
- Provincial Magistrate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France, 1789-17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Delbeke, Baron Francis. *L'Ac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Avocats au XVIII^e Siècle*. Lowain, France: Librairie Universitaire, 1927.
- Doyle, William. "The Parlements of France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88."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6: 4 (Fall 1970): 415-458.
- "Was There an Aristocratic Reac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57 (November 1972): 97-122.

- Edelstein, Melvin. "La Feuille Villageoise, the Revolutionary Press, and the Question of Rur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 2 (Fall 1971): 175-203.
- Egret, Jean. *La Révolution des Notables: Mounier et les Monarchien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0.
- "L'Aristocratie Parlementaire Française a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Revue Historique* 208 (July-September 1952): 1-14.
-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 Eisenstein, Elizabeth L. "Who Intervened in 1788? A Commentary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 1 (October 1965): 77-103.
- Faucheux, Marcel. *L'Insurrection Vendéenne de 1793: Aspects Economiques et Sociaux*.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64.
- Fohlen, Claude. "France 1700-1914." In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pt. 1,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edited by Carlo M. Cipolla, pp. 7-75. London: Collins/Fontana, 1973.
- Ford, Franklin L.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Era: How Much of a Watershe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9: 1 (October 1963): 18-29.
- Robe and Sword: The Regrouping of the French Aristocracy After Louis XIV*.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Forster, Robert.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0.
- "The Noble Wine Producers of the Bordelai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4: 1 (August 1961): 18-33.
- "The Provincial Noble: A Reappraisal."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8: 3 (April 1963): 681-91.
- "The Survival of the Nobil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 37 (July 1967): 71-86.
- The House of Saulx-Travannes: Versailles and Burgundy, 1700-18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 Fox, Edward Whiting. *History in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e Other France*. New York: Norton, 1972.
- Furet, François. "Le Catéchisme Révolutionnair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6: 2 (March-April 1971): 255-289.
- Furet, François, and Denis Richet.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Stephen Hardman.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 Gay, Peter.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 3 (April 1961): 664-681.
- Gershoy, Leo.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1933 Reprint.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4.
- Godechot, Jacqu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rd. ed., vol. 2, pp. 1-5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2nd, rev.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 Goodwin, A. "The French Executive Directory - A Revaluation." *History* 22: 87 (December 1937): 201-218.
- "Calonne, the Assembly of French Notables of 1787 and the Origins of the

- Révolution Nobiliar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61: 240 (May 1946): 202-34 and 61: 241 (September 1946): 329-377.
- Goubert, Pierre. *Louis XIV and Twenty Million Frenchmen*. Translated by Anne Car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 L'Ancien Régime, 2: Les Pouvoirs*. Paris: Armand Colin, 1973.
- The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1600-1750*. Translated by Steve Cox.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 Greenlaw, Ralph W., e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58.
- Greer, Donald.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Gruder, Vivian R. *The Royal Provincial Intendants: A Governing Elit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 Hampson, Norma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 The Enlightenment*.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8.
- Hartmann, Louis. "Les Officiers de l'Armée Royal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Révue Historique* 100 (January-April 1909): 241-268; and 101 (March-August 1909): 38-79.
- Hauser, H.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to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 3 (October 1933): 257-272.
- Higonnet, Patrice L. R. "Montagne, Gironde et Plaine: Bourgeoisie Provinciale, Bourgeoisie Urbaine, Bourgeoisie Rurale." Unpublished pap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n.d.
- Hoffman, Stanley, et al. *In Search of France: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Holtmann, Robert B. *The Napoleonic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7.
- Hunt, Lynn A. "Committees and Communes: Loc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178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 3 (July 1976): 321-346.
- Jackson, J. Hampden, ed. *A Short History of France From Early Times to 1972*.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Kaplow, Jeffrey. *Elbeuf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4.
- "On 'Who Intervened in 178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 2 (January 1967): 497-502.
-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Wiley, 1965.
- Kemp, Tom. *Economic Forces in French History*. London: Dobson Books, 1971.
- Knapton, Ernest John. *Revolutionary and Imperial France, 1750-181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 Labrousse, C. E. *La Crise de l'E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3.
- Le Paysan Français des Physiocrates à nos Jours*. Paris: Cours de Sorbonne, 1962.

- "The Evolution of Peasant Society in France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n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 Since the Old Regime*, edited by E. M. Acomb and M. L. Brown, pp. 44-64.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 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Lefebvre, Georges.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ille, France: Librairie Papeterie, 1924.
-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 Questions Agraires au Temps de la Terreur*. La Roche-sur-Yon, France: Henri Potier, 1954.
-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easants." In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Robert Greenlaw, pp. 73-83. Lexington, Mass.: Heath, 1958.
- "Urban Society in the Orleanais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19 (April 1961): 46-75.
- The French Revolution*. 2 Vols.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Moss Evanson (vol. 1) and John Hall Stewart and James Friguglietti (Vol.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64.
-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 "Répartition de la Propriété et de l'Exploitation Foncière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In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279-306.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 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ranslated by Joan White. New York: Pantheon, 1973.
- Le Goff, T. J. A., and Sutherland, D. M. G.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tany." *Past and Present* no. 62 (February 1974): 96-119.
- Léonard, Emile G. "La Question Sociale dans l'Armé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 2 (April-June 1948): 135-149.
- L'Armée et ses Problèm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Plon, 1958.
-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Révoltes et Contestations Rurales en France de 1675 à 1788."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9: 1 (January-February 1974): 6-22.
-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Translated by John Da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 Lévy-Leboyer, Maurice. "Croissance Economiqu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3: 4 (July-August 1968): 788-807.
- Lewis, W. H. *The Splendid Century: Life in the France of Louis XIV*.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7.
- Lublinskaya, A. D. *French Absolutism: The Crucial Phase, 1620-1629*.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Lucas, Colin.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 60 (August 1973): 84-126.

-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Luethy, Herbert. *France Against Herself*. Translated by Eric Mosbacher. New York: Praeger, 1955.
- Lyons, Martyn. *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Marczewski, Jan. "Som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France, 1660-195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3 (April 1961): 369-386.
- "The Take-Off Hypothesis and French Experience." In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edited by W. W. Rostow, pp. 119-13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3.
- Markham, F. M. H. "Napoleonic France." In *Franc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M. Wallace-Hadrill and John McManners, pp. 188-206. London: Methuen, 1957.
- Martin, Kingsley. *French Liberal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Phoenix House, 1962.
- Mathiez, Albert.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A. Phillips.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2.
- Matthews, George T.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 Mazauric, Claude. "Vendée et Chouannerie." *La Pensée* no. 124 (November-December 1965): 54-85.
- McManners, J. "France." In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Albert Goodwin, pp. 22-4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Mitchell, Harvey. "The Vendée and Counterrevolution: A Review Essa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5: 4 (Fall 1968): 405-429.
- "Resistance to the Revolution in Western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63 (May 1974): 94-131.
- Mornet, Daniel. *La Pensé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26.
- Mousnier, Roland. "Recherches Sur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avant la Fronde." *Ré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 (1958): 6-113.
- Murphy, J., and Higonnet, P. "Les Députés de la Noblesse aux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Ré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0 (April-June 1973): 230-247.
- Murphy, James Michael; Higonnet, Bernard; and Higonnet, Patrice. "Notes sur la Composition de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6: 217 (July-September 1974): 321-326.
- Palmer, R.R. *Twelve Who Ruled: The Year of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 "Georges Lefebvre: The Peasan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1: 4 (1959): 329-342.
- "Popular Democ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view Articl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 4 (December 1960): 445-469.
- The Worl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Parker, Harold T. "Two Administrative Bureaus Under the Directory and Napole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4: 2 (Fall 1965): 150-169.
- Patrick, Alison. "Political Divisions in the French National Convention, 1792-

- 9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1: 4 (December 1969): 421-474.
- Piétri, François. *La Réform de l'Eta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Editions de France, 1935.
- Ponteil, Félix. *Napoleon I^{er} et l'Organisation Autoritaire de la Franc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6.
- Porchnev, Boris.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Oeuvres Etrangères, no. 4.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VI Section, Centres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1963.
- Prestwick, Menna. "The Making of Absolute Monarchy (1559-1683)." In *Franc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M. Wallace-Hadrill and J. McManners, pp. 105-33. London: Methuen, 1957.
- Ranum, Orest. *Paris in the Age of Absolutism*. New York: Wiley, 1968.
- Reinhard, M. "Observations sur le Rôle Révolutionnaire de l'Armée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168 (April-June 1962): 169-181.
- Richardson, Nicholas. *The French Prefectoral Corps, 1814-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Richet, Denis. "Croissance et Blocage en France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3: 4 (July-August 1968): 789-797.
- "Autour des Origines Ideologiques Lointa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lites et Despotism."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4: 1 (January-February 1969): 1-23.
- Ross, Steven 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bat Divis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Armie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4: 1 (Spring 1965): 84-94.
- Rudé, Georg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3-181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 Robespierre: Portrait of a Revolutionary Democrat*.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6.
- Sagnac, Philippe. *La Formatio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Moderne*. Vol. 2.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6.
-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Americaine (1763-178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2.
- Saint-Jacob, Pierre de. *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 Dijon, France: Imprimerie Bergniaud et Privat, 1960.
- Sargent, Frederic O. "Feudalism to Family Farms in France." *Agricultural History* 35: 4 (1961): 193-201.
- Scott, Samuel 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In *On Military Ideology*, edited by Morris Janowitz and Jacques Van Doorn, pp. 5-56. Rotterdam, Holland: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3 (September 1970): 307-330.
- Sée, Henri.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Franc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Edwin H. Zeydel. New York: F. S. Crofts, 1931.
- Shennan, J. H. *The Parliament of Par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 Sheppard, Thomas F. *Lourmar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a French Villag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 Soboul, Albert. "Classes and Class Struggl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17: 5 (Summer 1953): 238-257.
- "The French Rural Commu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no. 10 (November 1956): 78-95.
- La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Economie et Société*.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1960.
- The Sans-Culottes: The Popular Movement an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1793-1794*. Translated by Rémy Inglis Hall.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72.
-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1799: From 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to Napoleon*. Translated by Alan Forrest and Colin Jo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 Sydenham, M. J. *The Girondin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1.
-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 Taylor, George V. "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9: 312 (July 1964): 478-497.
-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 2 (January 1967): 469-496.
- "Revolutionary and Nonrevolutionary Content in the *Cahiers* of 1789: An Interim Report."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 3 (Spring 1972): 479-502.
- Temple, Nora. "The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of French Towns During the Ancien Régime." *History* 51: 171 (February 1966): 16-34.
- Thompson, J. M.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 Tilly, Charles. *The Vendé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1793*. New York: Wiley, 1967.
- Tilly, Louise. "The Food Rio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 1 (Summer 1971): 23-57.
- Tocqueville, Alexis d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5.
- Treasure, G. R. R.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Rivingtons, 1966.
- Vovelle, Michel. "L'Elite ou le Mensonge des Mot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9: 1 (January-February 1974): 49-72.
- Williams, Gwyn A. *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Popular Movements in France and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Norton, 1969.
- Woloch, Isser.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Young, Arthur. *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Edited by C. Maxw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 Zeldin, Theodore. *France: 1848-1945*, Vol. I, *Ambition, Love, an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II. RUSSIA: 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 Anweiler, Oskar. *The Soviets: The Russia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Councils, 1905-1921*. Translated by Ruth Hein. New York: Pantheon, 1974.

- Avrich, Paul H.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Workers' Control in Russian Industry." *Slavic Review* 22: 1 (March 1963): 47-63.
- "Russian Factory Committees in 1917."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11: 2 (June 1963): 161-182.
- Russian Rebels, 1600-180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 Kronstadt 1921*. New York: Norton, 1974.
- Azrael, Jeremy R. *Managerial Power and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Baykov, Alexand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7: 2 (1954): 137-149.
- Berdyayev, Nicholas. *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 Bergson, Abram, and Kuznets, Simon, eds. *Economic Trends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Bernstein, Thomas P.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iso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 Bettelheim, Charles.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First Period: 1917-1923*.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Billington, James H. "Six View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18 (April 1966): 452-473.
- Black, Cyril E.,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Black, Cyril, E., et al.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 Blackwell, William L. *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1800-18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ed.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Stali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4.
- Blum, Jerome.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Boyd, John R. "The Origins of Order No. 1." *Soviet Studies* 19: 3 (January 1968): 359-372.
- Brezekinski, Zbigniew K. "The Patterns of Autocrac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ited by Cyril E. Black, pp. 93-10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Carr, Edward Hallett.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51-68.
-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 3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58-64.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Peasant."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9 (1963): 69-93.
-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1929*. 3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 The October Revolution: Before and Aft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 Carson, George Barr, Jr.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ussia, 1890-1939." I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Hugh G. J. Aitken, pp. 115-147.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9.
- Chamberlin, William Henr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2 Vols. 1935.

- Reprint.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5.
- Charques, Richard. *The Twilight of Imperial Russia*. London: Phoenix House, 1958.
- Chayanov, A. V.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Edited by 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1966.
- Cherniavsky, Michael. *Tsar and Peop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Cliff, Tony.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New York: Pluto Press, 1974.
- Cohen, Stephen F.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New York: Knopf, 1973.
- 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 Daniels, Robert Vincent. "The Kronstadt Revolt of 1921: A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0: 4 (December 1951): 241–254.
-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9.
- Deutscher, Isaac.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2nd ed., Vol. 12, pp. 403–4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Dobson, Richard B. "Mobi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 (1977): 297–329.
- Edeen, Alf. "The Civil Service: Its Composition and Statu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ited by Cyril E. Black, pp. 274–29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Elkin, Bori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edited by Richard Pipes, pp. 32–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Ellison, Herbert J.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Imperial Russia: Purposes and Achieve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5 (December 1965): 523–540.
- Emmons, Terence. "The Peasant and the Emancipation." In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edited by Wayne S. Vucinich, pp. 41–71.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Erickson, John. "The Origins of the Red Arm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edited by Richard Pipes, pp. 286–325.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9.
- Erlich, Alexander.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Esper, Thomas. "Military Self-Sufficiency and Weapons Technology in Muscovite Russia." *Slavic Review* 28: 2 (June 1969): 185-208.
- Fainsod, Merle.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Feldmesser, Robert A. "Social Classe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ited by Cyril E. Black, pp. 235-2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Ferro, Marc. "The Russian Soldier in 1917: Undisciplined, Patriotic, and Revolutionary." *Slavic Review* 30: 3 (September 1971): 483-512.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February 1917*. Translated by J. L. Richard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 "La Naissance du Système Bureaucratique en U.R.S.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1: 2 (March-April 1976): 243-267.
- Field, Daniel. *Rebels in the Name of the Tsa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
- Fischer, George. *Russian Liberalism: From Gentry to Intelligent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Florinsky, Michael T. *Russia: 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5.
- Footman, David. *Civil War in Russia*. New York: Praeger, 1962.
- Garder, Michel.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Army*. New York: Praeger, 1966.
- Garthoff, Raymond L. "The Military as a Social For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ited by Cyril E. Black, pp. 323-3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Problems and Patterns of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ited by Cyril E. Black, pp. 42-7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Russia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1861-1917."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 140-24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Getzler, Israel. "Marx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Dilemma of Power." In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in Russia*, edited by Alexander and Janet Rabinowitch, pp. 88-112.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72.
- Goldsmith, Raymond W.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sarist Russia, 1860-191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3 (April 1961): 441-475.
- Golovine, Nicholas N.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 Granick, David. *The Red Executive: A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 Man in Russian Industr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0.
- Gronsky, Paul P., and Astrov, Nicholas J. *The War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9.
- Haimson, Leopold.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917." *Slavic Review* 23: 4 (December 1964): 619-642 and 24: 1 (March 1965): 1-21.
- The Russian Marxists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Harcave, Sidne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 Hellie, Richard. *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 Hoetzsch, Otto. *The Evolution of Russi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6.
- Inkeles, Alex. *Social Change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Jasny, Naum. *The Socialized Agriculture of the USSR*.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Jenkins, Joseph Craig.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Peasant Revolution—Russia 1917."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April 1974.
- Karcz, Jerzy F. "From Stalin to Brezhnev: Soviet Agricultural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oviet Rural Community*, edited by James R. Millar, pp. 36–7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 "Thoughts on the Great Problem." *Soviet Studies* 18: 4 (April 1967): 399–434.
- Karpovitch, Michael. *Imperial Russia, 1801–1917*. New York: Holt, 1964.
- Keep, John L. H.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Study in Mass Mob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 Keller, Theodore. "To Lead the People: Note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volutions* 5: 3 (Summer 1973): 94–121.
- Kennan, George F. "The Breakdown of the Tsarist Autocracy."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edited by Richard Pipes, pp. 1–32.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9.
- Kingston-Mann, Esther. "Lenin and the Beginings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 The Burden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July–October 1917."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50: 121 (October 1972): 570–588.
- Kochan, Lionel.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3.
- Laird, Roy D., and Laird, Betty A. *Soviet Communism and Agrarian Revolution*.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0.
- Lane, Davi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USS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
- The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1898–1907*.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Laqueur, Walter. *The Fate of the Revolution: Interpretation of Soviet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7.
- Lenin, V. I.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 Lewin, Moshe. "The Immediate Background of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Soviet Studies* 17: 2 (October 1965): 162–197.
-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Translated by Irene Novè.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Lenin's Last Struggl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 Liebman, Marcel.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rnold J. Pome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 Lincoln, W. Bruce. "The Genesis of an 'Enlightene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25–1856."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20: 3 (September 1963): 321–330.
- Longly, D. A. "Officers and Men: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

- tudes Among Sailors of the Baltic Fleet in 1917." *Soviet Studies* 25: 1 (July 1973): 28–50.
- Lyashchenko, Peter I.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L. M. Herman.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 Male, D. J. *Russian Peasant Organization Before Collectiv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Matossian, Mary. "The Peasant Way of Life." In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edited by Wayne S. Vucinich, pp. 1–40.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atthews, Mervyn. *Class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Walker, 1972.
- McGrew, Roderick E. "Some Imperative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 Under the Last Tsar*, edited by George Stavrou, pp. 202–22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9.
- Menashe, Louis. "Vladimir Illyich Bakunin: An Essay on Lenin." *Socialist Revolution* no. 18 (November–December 1973): 9–54.
- Mendel, Arthur P. "Peasant and Worker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lavic Review* 24: 1 (March 1965): 23–33.
- Meyer, Alfred G.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 Millar, James R., ed. *The Soviet Rural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1.
- "Mass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 to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 Review Article." *Slavic Review* 33 (December 1974): 750–766.
- Millar, James R., and Guntzel, Corinne A.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Mass Collectivization Reconsidered: A Review Articl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8: 2 (Fall 1970): 103–116.
- Miller, Margaret 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1905–1914*. 2nd ed. London: P. S. King, 1967.
- Miller, Robert F. *One Hundred Thousand Tractors: The M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ols in Soviet Agri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oore, Barrington, Jr. *Soviet Politics—The Dilemma of Power: The Role of Ideas in Social Chan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Terror and Progress USSR: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Mosse, W. E. "Stolypin's Villages."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3: 101 (June 1965): 257–275.
- Nettl, J. P. *The Soviet Achievement*. London: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7.
- Nove, Alec.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9.
- Owen, Launcelot A.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1906–1917*. London: P. S. King, 1937.
- Pares, Bernard.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Pavlovsky, George. *Agricultural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30.
- Perrie, Maureen.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of 1905–1907: Its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Past and Present* no. 57 (November 1972): 123–155.

- Pethybridge, Roger. *The Spread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ssays on 1917*. London: Macmillan, 1972.
- Pintner, Walter M.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Bureaucracy." *Slavic Review* 29: 3 (September 1970): 429-443.
- Pipes, Richard, e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Revolutionary Russia: A Symp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9.
-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Scribner, 1974.
- Pushkarev, Sergei.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Russia, 1801-1917*. Translated by Robert H. McNeal and Tova Yedli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
- Rabinowitch, Alexander. *Pre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1917 Uprising*.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68.
- "The Petrograd Garrison and the Bolshevik Seizure of Power." In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in Russia*, edited by Alexander and Janet Rabinowitch, pp. 172-191.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72.
- 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 New York: Norton, 1976.
- Radkey, Oliver H. *The Election to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Peasantry After October." In *Russian Thought and Politics*, edited by Hugh McLean, Martin Malia, and George Fischer, pp. 457-47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Promise and Default of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February to October 19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 The Sickle Under the Hammer: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in the Early Months of Soviet Ru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Raeff, Marc. "The Russian Autocracy and Its Officials." In *Russian Thought and Politics*, edited by Hugh McLean, Martin Malia, and George Fischer, pp. 77-9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6.
- Imperial Russia 1682-1825: The Coming of Age of Modern Russia*. New York: Knopf, 1971.
- Reed, John H.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7.
- Rigby, T. H.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Rimlinger, Gaston W. "Autocracy and the Factory Order in Early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 1 (March 1960): 67-92.
- Robinson, Geroid Tanquary.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1932. Repri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Rosenberg, Arthur.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Rosenberg, William G. "The Russian Municipal Duma Elections of 1917: A Preliminary Computation of Returns." *Soviet Studies* 21: 2 (October 1969): 131-163.
- Liberal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1917-192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Rowney, Don Karl.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Some Demographic and Career Characteristics, 1905-1916." *Slavic Review* 31: 1 (March 1972): 101-110.
- Rozman, Gilbert. *Urban Networks in Russia, 1750-1800, and Premodern Period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ablinsky, Walter. "The All-Russian Railroad Un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General Strike in October, 1905." In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in Russia*, edited by Alexander and Janet Rabinowitch, pp. 113-133.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72.
- Schapiro, Leonard.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55.
-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Soviet Union*.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2nd ed., rev. and enlarg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 Schwarz, Solomon 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Bolshevism and Menshevism*. Translated by Gertrude Vak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Seton-Watson, Hugh. *The Decline of Imperial Russia, 1855-1914*. New York: Praeger, 1952.
-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hanin, Teodor.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Russia 1910-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Singleton, Seth. "The Tambov Revolt (1920-1921)." *Slavic Review* 25: 3 (September 1966): 497-512.
- Sontag, John P. "Tsarist Debts and Tsarist Foreign Policy." *Slavic Review* 27: 4 (December 1968): 529-541.
- Starr, S. Frederick. *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in Russia, 1830-18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Treadgold, Donald W.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vol. 1, *Russia, 1472-191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Trotsky, Le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elected and edited by F. W. Dupee.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 1905*. Translated by Anya Bostock.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 Tucker, Robert C.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79-1929*. New York: Norton, 1974.
- ed.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7.
- Ulam, Adam B. *The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5.
- Uldricks, Teddy J. "The 'Crow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wards Reassessing the Nature of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Society* 4: 3 (1974): 397-413.
- Venturi, Franco.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Translated by Francis Haskell.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6.
- Volin, Lazar.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From Alexander II to Krusc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Von Laue, Theodore H. "Russian Peasants in the Factory, 1892-19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1 (1961): 61-80.
- 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Russian Labor Between Field and Factory, 1892-1903."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3 (1964): 33-65.
- "The Chances for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Slavic Review* 24: 1 (March 1965): 34-46.
- Why Lenin? Why Stalin?: A Reappraisa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0-1930*. 2nd e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71.
- Vucinich, Alexander.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edited by Cyril E. Black, pp. 191-20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Vucinich, Wayne S., ed.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Wade, Rex A. "The Rajonnye Sovyets of Petrograd: The Role of Local Political Bodie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20: 2 (June 1972): 227-240.
- Walkin, Jacob.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Last Three Czars*. New York: Praeger, 1962.
- Wallace, Sir Donald Mackenzie. *Russia on the Eve of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 Watters, Francis M. "The Peasant and the Village Commune." In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edited by Wayne S. Vucinich, pp.133-157.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Werth, Alexander. *Russia at War, 1941-1945*. New York: Avon Books, 1964.
- Wesson, Robert G. *The Russian Dilemma: A Political and Geopolitical View*.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4.
- Wildman, Allan. *The Making of a Workers' Revolution: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1891-190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in the Russian Army." *Soviet Studies* 22: 1 (July 1970): 3-23.
- Wolfe, Bertram D. *An Ideology in Power: Reflection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Stein & Day, 1970.
- Yarmolinsky, Avrahm. *Road to Revolution: 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 Zelnik, Reginald E. *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The Factory Workers of St. Petersburg, 1855-1870*.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Russian Worker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6 (Winter 1971-72): 214-234.

III. CHINA: 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Ahn, Byung-jo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eople's Commune in China:

-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3 (May 1975): 631-658.
-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 Andors, Stephen.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 Balaz, Etienn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Barendsen, Robert D. "The Agricultural Middle School in Communist China." In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edited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pp. 304-332.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Barnett, A. Doak.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Praeger, 1963.
-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 Bastid, Marianne. "Level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pp. 159-1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Baum, Richard, with Bennett, Louise B; eds. *China in Fer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 Bergère, Marie-Claire. "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ited by Mary C. Wright, pp. 229-29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De la Chine Classique à la Chine Actuelle: Fluctuations Economiques et Révolution."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4: 4 (July-August 1969): 860-875.
- Bernstein, Thomas P.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s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A 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no. 31 (July-September 1967): 1-47.
-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iso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 Bettelheim, Charle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Translated by Alfred Ehrenfe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 Bianco, Lucien. "Les Paysans et la Révolution Chine, 1919-1949." *Politique Etrangère* no. 2 (1968): 117-141.
-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Translated by Muriel Bell.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Buck, John Lossing. *Chinese Farm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 Cavendish, Patrick. "The 'New China' of the Kuomintang." In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edited by Jack Gray, pp. 138-1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Cell, Charles P.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

- ture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 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 Chang, P'eng-yüan. "The Constitutionalsist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ited by Mary C. Wright, pp. 143-18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Chao, Shu-li. *Rhymes of Li Yu-tsai and Other Stories*. Peking: Cultural Press, 1950.
- Ch'ên, Jerome.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hesneau,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easant Revolts in China, 1840-1949*. New York: Norton, 1973.
- Chesneau, Jean; Bastid, Marianne; and Bergère, Marie-Claire. *China: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1911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nne Destena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 Ch'i, Hsi-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Chiang, Siang-tsch. *The Nien Rebell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4.
-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how, Yung-teh.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New York: Atherton, 1966.
- 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Clubb, O. Edmun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Cohen, Paul A. "Ch'ing Chin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1850-1900."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ames B. Crowley, pp. 29-6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 Crook, Isabel and David.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9.
- Diamond, Norma. "Collectivization, Kinship,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Rural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Special Issue: Asian Women* 7: 1 (January-March 1975): 25-32.
- Dittmer, Lowell.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Domes, Jürgen.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Translated by Rüdiger Machetzki. New York: Praeger, 1973.
- Donnithorne, Audrey.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52 (October-December 1972): 605-618.
- Eastman, Lloyd E.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Eberhard, Wolfram.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1952.
- A *History of China*. 3r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Eckstein, Alexander.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Elvin, Mark, and Skinner, G. William,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Eto, Shinkichi. "Hai-lu-feng—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 *China Quarterly* no. 8 (October–December 1961): 161–83 and no. 9 (January–March 1962): 149–181.
- Fairbank, John 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r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Fairbank, John K.; Reischauer, Edwin O.; and Craig, Albert M.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 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1 (July 1946): 1–17.
-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Fei, Hsiao-tung, and Chang, Chih-I.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 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ed. *Modern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4.
-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5.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9.
- Rebell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1.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
- Fincher, John. "Political Provin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ited by Mary C. Wright, pp. 185–22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Franke, Wolfgang.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ultural Encounter, 13th to 20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R. A. Wil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Translated by Stanley Rud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Freedman, Maurice.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5.
- Fried, Morton H.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53.
- Friedman, Edward.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Friedman, Edward, and Selden, Mark, eds. *America's Asia: 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 Gamble, Sidney D.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 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Gardner, John and Idema, Wilt. "China's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ommunist China*,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pp. 257-2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Gillin, Donald G.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2 (February 1964): 269-289.
-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 Gittings, John R.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The Chinese Army." In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edited by Jack Gray, pp. 187-2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Gray, Jack. "The Economics of Maoism."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5: 2 (February 1969): 42-51.
- "The Two Roads: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pp. 109-1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Griffith, Samuel B., II.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 Gurley, John. "Capitalist and Mao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merica's Asia*, edited by Edward Friedman and Mark Selden, pp. 324-356.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 Harrison, James Pinckney.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72*. New York: Praeger, 1972.
- Hatano, Yoshiro. "The New Armie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ited by Mary C. Wright, pp. 365-38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Hofheinz, Roy, Jr.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orn, Joshua S. *Away With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1954-196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 Hou, Ching-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Houn, Franklin W.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3.

-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Hsieh, Winston. "Peasant Insurrection and the Marketing Hierarchy in the Canton Delta, 1911." 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pp. 119-142.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Ichiko, Chūzō.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China in Revolution*, edited by Mary C. Wright, pp. 297-3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Isa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nd rev. ed. New York: Atheneum, 1968.
- Israel, Joh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1966.
-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Daedalus* 97 (Winter 1968): 229-253.
- Jen, Yu-w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Johnson, Chalmers A.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Karol, K. S. *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 2nd ed. New York: Hill & Wang, 1968.
- Kau, Ying-ma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s Nation-Building*.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3.
- "Urban and Rural Strategi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Peasant Rebellion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edited by John Wilson Lewis, pp. 253-270.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Kim, Ilpyong J. "Mass Mobilization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ited by A. Doak Barnett, pp. 78-9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 Kuhn, Philip A.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pp. 257-2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Lampton, David M. *Health, Conflict,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8.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4.
- Lee, Rensselaer, W. "The Hsia Fang System: Marxism and Moderniz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28 (October-December 1966): 40-62.
- Lew, Roland. "Maoism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5, pp. 115-159.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 Lewis, John W.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 ed.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Lindbeck, John M.,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 MacKinnon, Stephen R. "The Peiyang Army, Yuan Shih-k'ai,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 3 (May 1973): 405-423.
- Madsen, Richard. "Revolutionary Asceticism in Communist China: Soci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mitment to the Maoist Ethos in a South China Villag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77.
- Magdoff, Harry. "China: Contrasts with the U.S.S.R." *Monthly Review* 27: 3 (July-August 1975): 12-57.
- Maitan, Livio.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Translated by Gregor Benton and Marie Collitti.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McColl, Robert W. "The Oiyüwan Soviet Area, 1927-193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 1 (November 1967): 41-60.
- "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Revolution: China, Vietnam, and Thailan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1: 2 (June 1967): 153-167.
- Meisner, Maurice. "Yenan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ames B. Crowley, pp. 265-297.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73.
- "Utopian Socialist Themes in Maoism." In *Peasant Rebellion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edited by John Wilson Lewis, pp. 207-252.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ichael, Franz. "Stat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World Politics* 7 (April 1955): 419-433. Reprinted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pp. 57-69.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4.
-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vol. 1, *Hist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 Milton, David, and Milton, Nancy Dall. *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64-1969*.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
- Muramatsu, Yuji. "Some Themes in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pp. 241-267.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9: 3 (1966): 566-599.
- Murphey, Rhoads.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pp. 17-72.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yers, Ramon H.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Nee, Victor G. "Community and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1977.
- North, Robert C., and de Sola Pool, Ithiel.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In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edited by Harold D. Lasswell and Daniel Lerner, pp. 319-455.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Oksenberg, Michel.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Bureau-

- crazy." *China Quarterly* no. 57 (January–March 1974): 1–39.
- Paauw, Douglas S. "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1928–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February 1957): 213–220.
- Parsons, James B.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0.
- Peck, Graham. *Two Kinds of Time: 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Rev.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 Perkins, Dwight 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1969.
-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Growth and Changing Structure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Economy." In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wight H. Perkins, pp.115–166.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feffer, Richard. "Serving the People and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52 (October–December 1972): 620–653.
- Powell, Ralph 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Pye, Lucie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 Warlord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71.
- Rankin, Mary Backus.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Rawlinson, John L. "China's Failure to Coordinate Her Modern Flee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y, and Mary C. Wright, pp.105–13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Rhoads, Edward J.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Richman, Barry M. *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9.
- Riskin, Carl. "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46 (April–June 1971): 245–273.
- "Incentive Systems and Work Motivations: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Working Papers for a New Society* 1: 4 (Winter 1974): 27–31, 77–92.
- Rossanda, Rossana. "Mao's Marxism."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1. London: Merlin Press, 1971.
- Rozman, Gilbert.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Scalapino, Robert A.,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 Schram, Stuart R. "Mao Tse-tung and Secret Societies." *China Quarterly* no. 27 (July–September 1966): 1–13.
- Mao Tse-tung*.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67.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9.

-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Schran, Peter.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edited by John M. Lindbeck, pp. 193-220. Seattle: University of Seattle Press, 1971.
- "On the Yen-an Origins of Current 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wight H. Perkins, pp. 279-302.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Schurmann, H. Franz. "Organis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edited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pp. 87-98.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Russia and China." In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dited by Donald W. Treadgold, pp. 297-32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Schwartz, Benjamin I. "The Intelligentsia in Communist China: A Tentative Comparison." In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edited by Richard Pipes, pp. 164-18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Selden, Mark. "The Guerilla Movement in Northwest China: The Origins of the Shensi-Kansu-Ningshia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no. 28 (October-December 1966): 63-81, and no. 29 (January-March 1967): 61-81.
- "The Yen-an Legacy: The Mass Line."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ited by A. Doak Barnett, pp. 99-15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Sheridan, James 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 Shih, Kuo-he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In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Two Introductory Essays*, edited by Marion J. Levy and Kuo-heng Shih, pp. 19-63.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 Shih, Vincent Y. C. "Some Chinese Rebel Ideologies." *T'oung Pao* 44 (1956): 150-226.
- The Taiping Ideology: Its Sources,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Sidel, Victor W., and Ruth Sidel. "The Delivery of Medical Care in China." *Scientific American* 230: 4 (April 1974): 19-27.
- Sigurdson, Jon. "Rural Industry and the Inter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 In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pp. 199-2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kinner, G. William.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3 pt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November 1964): 3-43; 24: 2 (February 1965): 195-228; and 24: 3 (May 1965): 363-399.
-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3: 3 (July 1971): 270-281.
-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kinner, G. William and Winckler, Edwin.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In *A Sociological Reader on Complex Organizations*, 2nd ed., edited by Amitai Etzioni, pp. 410-43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 Smedley, Agnes.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Reprin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
- Solomon, Richard H.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Spector, Stanley.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 Tan, Chester C.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71.
- Tawney, R. H.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1932. Repri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Taylor, George E.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6: 4 (1932-3): 545-614.
- Taylor, Romeyn. "Social Origins of the Ming Dynasty, 1351-1360." *Monumenta Serica* 22 (1963): 1-78.
- Teng, Su-yu. *Historio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Thaxton, Ralph. "Tenants in Revolution: The Tenacity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Modern China* 1: 3 (July 1975): 323-358.
-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Townsend, James 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Treadgold, Donald W.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volume 2, *China, 1582-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Tuchman, Barbara W. *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 Van Slyke, Lyman P.,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Vogel, Ezra F.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Politicized Bureaucracy: Communist China." In *Communist Syste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Leonard J. Cohen and Jane P.

- Shapiro, pp.160–170.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74.
- Wakeman, Frederic,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High Ch’ing: 1683–1839.”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ames B. Crowley, pp. 1–28.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 Wakeman, Frederic, Jr., and Grant, Carolyn,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Wang, Yeh-chie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Watt, John R. *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Whyte, Martin King.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2 (April 1973): 149–163.
- “Iron Law Versus Mass Democracy: Weber, Michels,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s and Explication*, edited by James Chieh Hsiung, pp. 37–61. New York: Praeger, 1974.
-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ember 1975): 684–711.
- Whyte, Martin King; Vogel, Ezra F.; and Parish, William L., Jr. “Social Structure of World Regions: Mainland Chin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 (1977): 179–207.
- Wilbur, C. Martin.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 In *China in Crisis*, 2 vols., edited by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vol. 1, bk. 1, pp.203–26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How the Early Years Helped to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edited by John Wilson Lewis, pp.35–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Wilson, Dick. *The Long March of 1935: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 New York: Avon Books, 1973.
- Wittfogel, Karl A.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Wolf, Margery, and Witke, Roxan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Wortman, Sterling. “Agriculture in China.” *Scientific American* 232: 6 (June 1975): 13–21.
-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 Cambridge: M.I.T. Press, 1965.

-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pp. 174-2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Yang, Martin C.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g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 Yang, Shang-kuei. *The Red Kiangsi-Kwangtung Border Reg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 Yeh, C. K. "Soviet and Communist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In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dited by Donald W. Treadgold, pp. 327-36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Young, Ernest P. "Nationalism, Reform, 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ames B. Crowley, pp. 151-17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 Young, Marilyn B.,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5.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IV.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 Adam, Heribert. *Modernizing Racial Domination: South Africa's Political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Alavi, Hamza.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pp. 241-277. London: Merlin Press, 1965.
- Allardt, Erik. "Culture, Structure and Revolutionary Ideolo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2: 1 (March 1971): 24-40.
- Althusser, Louis. "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 In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pp. 87-12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 Amann, Peter. "Revolution: A Redefini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7: 1 (March 1962): 36-53.
- 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 Aston, Trevor.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7.
- Barker, Ernest.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in Western Europe, 1660-19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 Barracrough, G. "Universal History." In *Approaches to History: A Symposium*, edited by H. P. R. Finberg, pp. 83-109.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 Bell, David V. J.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 Ben-David, Joseph, and Zloczower, Awraham.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Systems in Modern Societies."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3: 1 (1962): 45-84.
- Bendix, Reinhard.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Wiley, 1964.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1967): 292-346.

- Beqiraj, Mehmet. *Peasantry in Revolution*. Cornell Researc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5. Ithaca, N.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6.
- Bittner, Egon. "Radical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Radic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6 (December 1963): 928-940.
- Black, Cyril E., and Thornton, Thomas P., eds. *Communism and Revolution: The Strategic Uses of Political Viol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Bloch, Marc.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edited by Frederic C. Lane and Jelle C. Riechersma, pp. 494-521.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1953.
- Block, Fred.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volution* no. 33 (May-June 1977): 6-28.
- Blum, Jerome. "The European Village as Community: Origin and Functions." *Agricultural History* 45: 3 (July 1971): 157-178.
-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Polity of the European Village Communit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 4 (December 1971): 541-576.
- Borkenau, Franz.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ociological Review* 29: 41 (1937): 41-75.
- Braudel, Fernand. "European Expansion and Capitalism, 1450-1650." In *Chapter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rd ed., vol. 1, 245-28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Brenner, Robert.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no. 70 (February 1976): 30-75.
-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25-92.
-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1938. Rev.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Bukharin, Nikola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Translated from 3rd Russian edition, 192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9.
- Calvert, Peter. *A Stud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Cammatt, John M.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arr, E. H.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 Chaliand, Gerard.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Myths and Prospects*. Translated by Diana Johnston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 Chirot, Daniel. *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 Chorley, Katherine.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 Repri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 Cipolla, Carlo M. *Guns, Sails, and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New York: Miverva Press, 1965.
- Cohan, A. S. *Theories of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alsted Press, 1975.
- Cohn, Norma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Rev. and expande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Collins, Randall.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Political Sociology." In *State and Society: A Reader*, edited by Reinhard Bendix, et al., pp. 42-6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Conflict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 "Some Principles of Long-Term Social Change: The Territorial Power of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Illinois, September 1977.
- Daniels, Robert Vincen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Russian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13: 2 (1961): 210-230.
- Davies, James C.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1962): 5-18.
- "The J-Curve of Rising and Declining Satisfaction as a Cause of Some Great Revolutions and a Contained Rebellion."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ited by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Robert Gurr, pp. 671-709.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9.
- ed.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A Reader i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Dehio, Ludwig.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Translated by Charles Full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 Deutsch, Karl W.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September 1961): 493-514.
- Deutscher, Isaac.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me Suggestive Analogies." *World Politics* 4: 3 (April 1952): 369-381.
- DeVries, Jan.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Dorn, Walter L.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 Dunn, John. *Modern Revolu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litical Phenome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Modern Revolutions." In *Radic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vol. 3, edited by S. Bialer and S. Sluzar, pp. 83-114, 305-318.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 Eckstein, Harry, ed. *Internal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On the Etiology of Internal Wars." *History and Theory* 4: 2 (1965): 133-163.
- Edwards, Lyford P.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27. Repri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Eisenstadt, S. N.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6.
- "The Social Framework and 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Forthcoming in L. Kriesberg,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Greenwich, Conn.: J. A. I. Press.
- Eisenstadt, S. N., and Azmon, Yael. *Socialism and Tradi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5.
- Ellis, John. *Armies i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Ellwood, Charles A.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Revol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 1 (July 1905): 49-59.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 Feierabend, Ivo K.; Feierabend, Rosalind L.; and Gurr, Ted Robert, eds. *Anger, Violence, and Politics: Theories and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 Feierabend, Ivo K.; Feierabend, Rosalind L.; and Nesvold, Betty A.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ross-National Patterns." In *Violence in America*, edited by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Robert Gurr, pp. 606-68.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9.
- Feldman, Arnold S. "Violence and Volatility: The Likelihood of Revolution." In *Internal War*, edited by Harry Eckstein, pp. 111-129.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Forster, Robert, and Greene, Jack P., eds.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 Freeman, Michael. "Review Article: Theories of Revolu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3 (July 1972): 339-359.
- Friedrich, Carl J., ed. *Revolution*. New York: Atherton, 1966.
- Geertz, Clifford,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Geschwender, James A.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Social Forces* 42: 2 (1968): 127-235.
- Gillis, John R. "Political Decay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789-1848." *World Politics* 22: 3 (April 1970): 344-370.
- Goldfrank, Walter L. "The Causes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73.
- "Theories of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Without Theory: The Case of Mexico."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7: 1 (January-March 1979).
- Goodwin, Albert,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Goetz, André. *Strategy for Labor: A Radical Proposal*. Translated by Martin A. Nicholas and Victoria Ortiz.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 Gottschalk, Louis. "Causes of R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1 (July 1944): 1-8.
-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a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Greene, Thomas H. *Compar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4.
- Griewank, Karl.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A Reader*, edited by Bruce Mazlish, Arthur D. Kaledin, and David B. Ralston, pp. 13-17.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 Gross, Feliks.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4.
- Gurr, Ted Robert. "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7 (1968): 1104-1124.
-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ivil Violence." *World Politics* 20 (January 1968): 245-278.

-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The Revolution—Social Change Nexus." *Comparative Politics* 5: 3 (April 1973): 359–392.
- Hagopian, Mark N. *The Phenomenon of Revolution*. New York: Dodd, Mead, 1974.
- Hatto, Arthur. "'Revolu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Usefulness of an Historical Term." *Mind* 58: (229) (January 1949): 495–517.
- Hermassi, Elbaki.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volu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 2 (April 1976): 211–235.
- Hintze, Otto.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edited by Felix Gilbert, pp. 422–25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In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edited by Felix Gilbert, pp. 178–2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Hobsbawm, Eric J.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the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Norton, 1965.
- Bandits*.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69.
-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an Francisco, August 1975.
- Hopkins, Terence K.,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Societi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6: 5 (October 1967): 25–58.
- Hopper, Rex D. "Revolutionary Process." *Social Forces* 28 (March 1950): 270–279.
-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Johnson, Chalmers.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Stanford, Cal.: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64.
- Revolutionary Chang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 Jouvenel, Bertrand de. *On Power: Its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Growth*. Translated by J. F. Huntingt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 Kautsky, John H. "Revolutionary and Managerial Elites in Modernizing Regimes." *Comparative Politics* 1: 4 (July 1969): 441–467.
- Kemp, Tom. *Industrial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Longman, 1969.
- Kirchheimer, Otto. "Confining Con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 (December 1965): 964–974.
- Kramnick, Isaac. "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in Recent Scholarship." *History and Theory* 11: 1 (1972): 26–63.
- Landes, David S. "Japan and Europe: Contrasts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edited by William W. Lockwood, pp. 93–18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Landsberger, Henry A. "The Role of Peasant Movements and Revolts in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 Peasant Movements*, edited by Henry A. Landsberger, pp. 1–6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 ed. *Rural Protest: Protes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73.
- Langer, William L. "The Pattern of Urban Revolution in 1848." In *French Society and Culture Since the Old Regime*, edited by Evelyn M. Acomb and

- Marvin L. Brown, pp. 90-11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 Laqueur, Walte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3, pp. 501-507.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 Lasswell, Harold D., and Lerner, Daniel, eds.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Studies in Coercive Ideological Movement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Leiden, Carl, and Schmitt, Karl M.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 Lewis, John Wilson, ed. *Peasant Rebellion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Lichtheim, George.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2n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5.
- Lijphart, Are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September 1971): 682-693.
- Lockwood, Davi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George K. Zollschan and Walter Hirsch, pp. 244-25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
- Lubasz, Heinz, ed. *Revolution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 Lukács, 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 Lupsha, Peter A.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 Som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Versus Indign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2: 1 (Fall 1971): 89-104.
- MacIntyre, Alasdair. "Ideology, Social Science an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 3 (April 1973): 321-342.
- Malia, Martin. "The Escalation of European Revolution: 1640, 1789, 1848, 191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odern European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Georgia, December 1975.
- Marx, Fritz Morste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Bureau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 McNeill, William H. *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igdal, Joe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offett, John Thurber. "Bureaucratiz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Regimentation of the Western Social Order."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
- Moore, Barrington, Jr.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Revolu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969): 6-12.
- Moore, Wilbert E. "Predicting Discontinuities in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June 1964): 331-338.
- Mosca, Gaetano. *The Ruling Class*. Edited and revised by Arthur Livingstone. New

- York: McGraw-Hill, 1939.
- Moulder, Frances V. *Ja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a. 1600 to ca. 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ousnier, Rol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Muller, Edward N. "A Test of a Partial Theory of Potential for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September 1972): 928-949.
- Nagel, Ernest, ed. *John Stuart Mill's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 Hafner, 1950.
- Neumann, Franz.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Edited by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 Neumann, Sigmund. "The Structure and Strategy of Revolution: 1848 and 1948." *Journal of Politics* 11 (August 1949): 532-544.
- Nisbet, Robert A.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Nordlinger, Eric A.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 Oberschall, Anthony R. "Rising Expectations and Political Turmoi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6: 1 (October 1969): 5-22.
-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3.
- Overholt, William H. "Revolu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Croton-on-Hudson, N.Y.: The Hudson Institute, 1972.
- Paige, Jeffery M.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 Palmer, R. R. "The World Revolution of the West: 1763-180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9: 1 (March 1954): 1-14.
- Parkin, Frank. "System Contradic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rchives Européenne de Sociologie* 13 (1972): 45-62.
- Parsons, Talcott. "The Processes of Change of Social Systems." In *The Social System*, chap. 9.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Pettee, George Sawyer.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8.
-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1944. Repri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 Portes, Alejandro. "Leftist Radicalism in Chile." *Comparative Politics* 2: 2 (January 1970): 251-274.
- "On the Logic of Post-Factum Explanations: The Hypothesis of Lower-Class Frustration As the Cause of Leftist Radicalism." *Social Forces* 50: 1 (September 1971): 26-44.
- Rafael, Eliezer Ben. "Social Aspects of Guerilla War." Ph.D. dissertation, Hebrew University, October 1972.
- Richter, Melvin. "Tocqueville'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edited by Carl J. Friedrich, pp. 75-121. New York: Atherton, 1966.
- Riezler, Kurt.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Modern Revolution." *Social Research* 10: 3 (September 1943): 320-336.

- Rosenau, James N., e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Civil Str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Russell, D. E. H. *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Armed For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fteen Countrie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Cuba and South Afric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Russett, Bruce M.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The Relation of Land Tenure to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6 (April 1964): 442-54.
- Rustow, Dankwart A.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3 (April 1970): 337-363.
- Salert, Barbara.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ies: Four Theories*. New York: Elsevier, 1976.
- Scheiner, Irwin. "The Mindful Peasant: Sketches for a Study of Rebell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 4 (August 1973): 579-591.
- Schorske, Carl.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New York: Wiley, 1954.
- Schram, Stuart R.,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 Praeger, 1969.
- Schurmann, Franz. "On Revolutionary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 1 (1969): 36-53.
-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 Schwartz, David C. "A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Behavior." In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edited by James C. Davies, pp. 109-132.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Political Alienati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s First Stage." In *Anger, Violenc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Ivo K. and Rosalind L. Feierabend and Ted Gurr, pp. 58-66.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 Selden, Mark. "Revolution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Liberation*, edited by Norman Miller and Roderick Aya, pp. 214-248.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Selznick, Philip.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 Sewell, William H., Jr. "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6: 2 (1967): 208-218.
- Skocpol, Theda. "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4: 1 (Fall 1973): 1-34.
- "Explaining Revolutions: In Quest of a Social-Structural Approach." In *The Uses of Controversy in Sociology*, edited by Lewis A. Coser and Otto N. Larsen, pp. 155-175.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 "France, Russia, China: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Revolu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 2 (April 1976): 175-210.
- "Old Regime Legaci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s in Russia and China." *Social Forces* 55: 2 (December 1976): 284-315.
-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5 (March 1977): 1075-1090.
- Skocpol, Theda, and Trimberger, Ellen Kay. "Revolutions and the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1977-8): 101-113.
- Shanin, Theodor, ed.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1.
- Smelser, Neil J.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 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6.
- Smith, Thomas C. "Pre-Modern Economic Growth: Japan and the West." *Past and Present* no. 60 (August 1973): 127-160.
- Snyder, David, and Charles Tilly.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1830 to 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October 1972): 520-532.
- Sorokin, Pitirim A.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25.
- Stein, Stanley J., and Stein, Barbara H.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Stinchcombe, Arthur L.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Rural Class Relations." In *Class, Status, and Power*, 2nd ed., edited by Reinhard Bendix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pp. 182-190.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 "Stratification Amo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In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James G. March, pp. 169-180.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 Stone, Lawrence. "Theories of Revolution." *World Politics* 18: 2 (January 1966): 159-176.
- Tanter, Raymond, and Midlarsky, Manus. "A Theory of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1: 3 (September 1967): 264-280.
- Tilly, Charles. "Collective Violence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Robert Gurr, pp. 4-42.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9.
- "Does Modernization Breed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 3 (April 1973): 425-447.
- "Town and Country in Revolution." In *Peasant Rebellion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edited by John Wilson Lewis, pp. 271-302.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Revolution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edited by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pp. 483-556.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 Tilly, Charles; Tilly, Louise; and Tilly, Richard.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iryakian, Edward A. "A Model of Societal Change in Its Lead Indicators." In *The Study of Total Societies*, edited by Samuel Z. Klausner, pp. 69-97.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67.
- Trimberger, Ellen Kay. "State Power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Japanes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7 (Spring 1977): 85-98.
-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78.
- "A Theory of Elite Revol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7: 3 (Fall 1972): 191-207.
- Tucker, Robert C.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lassical Marxism." In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chap. 3. New York: Norton, 1970.

- ed. *The Lenin Anthology*. New York: Norton, 1975.
- Vagts, Alfred.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Civilian and Military*. Rev.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 Von Laue, Theodore H. *The Global City*.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9.
- Wallace, Anthony F. C.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 (April 1956): 264-281.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4 (September 1974): 387-415.
- Walzer, Michael. "Puritanism as a Revolutionary Ideology." *History and Theory* 3: 1 (1963): 59-90.
-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New York: Atheneum, 1968.
- "Regicide and Revolution." *Social Research* 40: 4 (Winter 1973): 617-642.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3 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 Wertheim, W. F.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The Rising Waves of Emancipation*.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4.
- Willer, David, and Zollschan, George K.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Revolutions." In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George K. Zollschan and Walter Hirsch, pp. 125-51.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64.
- Williams, E. N. *The Ancien Regime in Europ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 Wolf, Eric R.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6.
-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National Liberation*, edited by Norman Miller and Roderick Aya, pp. 48-67.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 Wolin, Sheldon S. "The Politics of the Study of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 3 (April 1973): 343-358.
- Wolpe, Harold. "An Examination of Some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Telos* no. 4 (Fall 1969): 113-144.
- Wright, Erik Olin. "To Control or Smash Bureaucracy: Weber and Lenin on Politics,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1974-75): 69-108.
- Yoder, Dale. "Current Definitions of R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November 1926): 433-441.
- Zagorin, Perez. "Theories of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8: 1 (March 1973): 23-52.
- "Prolegomena to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 2 (April 1976): 151-174.
- Zelditch, Morris, Jr. "Intelligible Comparisons." In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Ivan Vallier, pp. 267-30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美)斯考切波(Skocpol, T.)著;何俊志,王学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ISBN 978-7-208-06774-5

I. 国… II. ①斯…②何…③王… III. 历史社会学-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5708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美] 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379,000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774-5/D·1180

定价 38.00 元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by Theda Skocpol

Copyright © 197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7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东方编译所译丛·政治科学

- 国家与社会革命 [美] 西达·斯考切波 著 何俊志 等译 38.00 元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 集体暴力的政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谢岳 译 24.00 元
- 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 [丹麦] 奥勒·诺格德 著
孙友晋 等译 28.00 元
- 政治社会学导论(第四版) [美] 安东尼·奥罗姆 著
张华青 等译 30.00 元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挪威] 斯坦因·U. 拉尔森 主编
任晓 等译 42.00 元
-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第六版) [美] W. 菲利普斯·夏夫利 著
新知 译 22.00 元
- 参与和民主理论 [美] 卡罗尔·佩特曼 著 陈尧 译 18.00 元
-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即出
(公元 990—1992 年)
- 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的视野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等著
杨红伟 等译 即出
(第八版)

以上图书均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购买到。

邮购地址:上海市绍兴路 54 号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 编:200020

联系电话:021-64313303

邮购方法:在定价的基础上加收 15% 的挂号邮寄费,量大者(请先致电联系)
可免邮寄费。

欲了解更多相关书目,请浏览上海人民出版社网址:www.spph.com.cn。